中国文库

·艺术类·

中国书法史

隋唐五代卷

朱关田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國文庫

中国文库
艺术类

中国书法史

（隋唐五代卷）

朱关田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史. 隋唐五代卷/朱关田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9
(中国文库)
ISBN 978-7-5343-8661-9

Ⅰ. 中… Ⅱ. 朱… Ⅲ. ①书法—美术史—中国—隋唐时代
②书法—美术史—中国—五代(907～960) Ⅳ. 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671 号

责任编辑：胡新群 徐金平
整体设计：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董文权

《中国书法史》编撰工作委员会

顾　问：沈　鹏

主　任：张胜勇

副主任：朱关田

委　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丛文俊　白谦慎　朱关田　华人德　刘　恒

刘　涛　张胜勇　徐宗文　黄　惇　曹宝麟

《中国书法史》各卷编撰分工

丛文俊　先秦·秦代卷

华人德　两汉卷

刘　涛　魏晋南北朝卷

朱关田　隋唐五代卷

曹宝麟　宋辽金卷

黄　惇　元明卷

刘　恒　清代卷

目　录

概　述/1

第一章　隋代与初唐书法/7
　第一节　承前启后的隋代书法/7
　第二节　欧阳询与虞世南/17

第二章　唐太宗与书法复兴/39
　第一节　唐太宗及其书法/39
　第二节　唐太宗王羲之论/44
　第三节　唐代书法教育与科举/49
　第四节　关于《兰亭序》/53
　第五节　一代教化主褚遂良/58
　第六节　昭陵碑志书人/73

第三章　盛中唐书法/85
　第一节　盛中唐书法的演变/85
　第二节　李邕与行书名家/90
　第三节　张旭与怀素/109
　第四节　李阳冰与篆书名家/123

第五节 盛中唐的馆阁书家/129
第六节 其他书家/145

第四章 雄秀独出的颜真卿/157
第一节 生平事迹/157
第二节 书法艺术/161
第三节 颜书的影响/169

第五章 晚唐书法/173
第一节 柳公权/173
第二节 “元和脚”及其他/180

第六章 唐代文化与书法/185
第一节 书法藏庋、鉴赏及其他/185
第二节 儒家与书法/196
第三节 佛教与书法/209
第四节 道家与书法/222
第五节 文房用具/235

第七章 唐代墓志/247
第一节 初唐/249
第二节 盛唐/255
第三节 中唐/260
第四节 晚唐/262

第八章 唐代书法的域外传播/267
第一节 日本/267
第二节 朝鲜半岛/278

第九章　五代杨凝式及其他书家/283

第十章　唐五代的书法理论/291

第一节　初唐崇王论/292

第二节　盛中唐书论的推进/300

第三节　晚唐及五代书论/308

附　录/317

隋唐五代书法史大事年表/317

主要参考文献/407

概　述

隋朝一统天下，南北书风随之自然融合，渐趋中和，可谓上接北朝，下启三唐。惟其立国短暂，仅三十余年，所见书法不夥，且以碑、志为主，尤以楷书为多。其结体大抵可分为“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前者来自北魏、东晋，其中峻严方饰一路，以《董美人》《苏孝慈》为代表；平正和美一路，以智永《真草千字文》、丁道护《启法寺碑》为代表，下开欧阳询、虞世南的格局。后者出自北周、北齐，秀朗细挺的如《龙藏寺》，浑厚圆劲的如《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已见褚遂良、颜真卿的先声。至于诸体掺杂的书法，如《青州默曹碑》，隶中见篆；《曹植庙碑》，楷间参用篆、隶，虽是东魏旧习，也已别开生面。颜真卿的《裴将军诗》，楷书中掺杂行草，便是隋时的遗风。

隋代书家，似难界定，不是发迹周、陈，便见成名初唐，如赵文渊为后周书学博士，智永乃陈之高僧，至于欧阳询、虞世南，至暮年发轫，则当归之于初唐。若

必举列为典型，以卒隋者为限，其可称述者，惟智永、丁道护两人。

唐初，军国多务，未遑改制，一切仍因循旧制，沿袭杨隋风规。当时人士，大都经历陈、隋两朝，虽政治上各抱宏志，希望能在李唐新王朝施展才智，事业上有一番建树，如虞世南“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①，终因暮齿，积习难改，书写手段一无更变，仅更趋精密、纯青而已。

至贞观年间，社会安定，封建经济日益繁荣，一切制度也渐具李唐规模，唐太宗李世民又喜好书法，出重金收集三吴遗迹，藏入内府，君臣共相赏玩。尤重王羲之之书，亲自为《晋书》撰写右军传赞，有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不特虞世南书出王氏，誉之“书绝”，褚遂良亦因“甚得王逸少体”②，即日召为侍书。上之所好，下必行之，研习王字，蔚为风尚。同时，以书育人，直仿北周，国子监六学，书学居其一，设置书学博士主持之。又承汉制，以书取士，科举六科，书占其一，官员铨选，“身、言、书、判”四才，“楷书遒美”为其先决条件；同时，制举又经常设置如书判拔萃诸科，专事升擢善书的官员，即使流外吏胥的叙用，也明言以“工书”为首务。由是，藉书入仕，擢居要津者不乏其人。朝廷据此取士，世俗以此相高，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临书习字，风气日炽。

其后，有唐帝王如高宗、睿宗、武后、玄宗，也能秉承遗风，并重书法。尤其武后，“顺天经而永保先业”③，藏庋赏玩，不下太宗，惟搜刮法书，不见一个赚字。如王方庆献历代先祖遗迹，知其宝重，似见献者勉强，乃不夺其志，摹写留内后，竟全数装潢归还之。此事虽小，亦见高明，唐一代帝王几无人可及。联想到肃宗，因贩书人穆聿强括王方庆家武后所还书，白身授长史，此事，或出集贤院之请，然较之武后，自有天壤之别。至于唐玄宗，出自其父睿宗之熏陶，规模尚古，偏重隶书，且延揽名贤，善书者如韩择木、蔡有邻、顾诫奢以及吕向诸人，或聘为侍书，或充任学士，顾问于左右，竞为其用。《述书赋》论其书，有称：“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诸子多艺，天宝之际。迹且师于翰林，嗟源浅而波细。”其“迹且师于翰林”者，道出

玄宗隶书之所出。翰苑书人之声望地位，自可想见。开元、天宝年间，翰苑之外，集贤院亦是书家荟萃之地，著名者如贺知章、吕向、赵冬曦、韦述、卫包、史惟则，皆为院中善书人，至于徐浩，虽成名于肃、代两朝，然其之明鉴善书，实基于早年任职院内八年行政事务官之时。唐代馆阁书家尤盛，与唐玄宗重视经籍图书、完善馆阁制度、礼遇学士、注重艺文有关。

有唐帝王重视书法，其经世济用，虽然意在文字，是以楷正为尚，即使如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诸位，留心真迹，赏玩传习；君臣论书，倡导新风，抑或出于粉饰治具的需要，但客观上却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以，有唐一代书法之盛行，名书家之辈出，可谓远迈魏、晋，后盖宋、元、明、清。

有唐一代书法，略可分成初唐、盛中唐、晚唐三期。

初唐，唐太宗崇尚右军，注重骨力，丰神劲拔，以真、行书为胜。是时，欧阳询具八体之能，尤以真、行书，自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自羊（欣）、薄（绍之）以后，略无勍敌，惟永公特以训兵精炼，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④。其比肩智永，可谓雄峙一时。然囿于时尚，终逊于虞世南。欧、虞之书，张怀瓘《书断·中》曾加比较，有云：“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㕙也。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君子藏器”，不独张氏一己之见，亦乃时风之所向。然而，虞世南纯粹是王献之“今体”善继人，且入唐后，书契之作，意在记言应用，虽渐加遒劲，更见雅正，但是积习久深，未见改易，所“恭守无舍”者仍是智永制度。武后书论家李嗣真评述初唐书家，允居上流三品者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其虽有碍于武后之不容褚氏，多作贬词如“丰艳雕刻”，“恨乏自然”，“褚传羲制，邈乎天壤”，然亦记“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盛为当今所尚”。“盛为当今所尚”者，道出褚氏当时之影响。有唐楷书著名者如薛稷、薛曜以及后之徐浩、颜真卿，莫不承其流风，复启后昆；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书法出自习褚或近褚者亦十有八

九。初唐三家,开启李唐门户者实褚氏其人。

盛中唐,唐玄宗推重隶书,宽博华丽,一改翰苑旧习,影响所及,行、楷、篆、草,适时应变,齐趋厚硕,终于新境大开,各成规矩,茂逸圆劲,而为盛唐气象。

有唐隶书,初则承传魏晋遗习,隶、楷混杂,似隶似楷,或隶形少而楷势多,或楷形多而隶势少,莫不随笔所致,依刀而见。即使著名如欧阳询,其崇尚汉法,铭石谨严,且刻手高明,形神不失,亦不免挑拔险峻,隐见楷法。惟经唐玄宗登高一呼,顿成气候,丰碑巨碣,几占泰半。卢藏用、张庭珪启发于前,梁昇卿、郭谦光光大于开元初叶,至吕向、蔡有邻、韩择木、史惟则诸人出,馆阁书体乃藉玄宗之峥嵘碑版,大行于世。其结体运笔,出自魏碑而加警策,严整平满,一改初唐模规;丰丽圆厚,遂成唐隶新体。

真、行之书,朝野通行,自古以来,并为大宗。其间人材济济,各领风骚。李邕用笔坚劲,纵横一时;徐浩运用精熟,名重三朝;尤其张旭,为一代宗师,其弘八法,演五势,备九用,启发中晚唐楷书之格局,影响更见深远。大抵初、盛唐,并用二王行法,多出之于怀仁所集王字《圣教》,至徐浩、颜真卿出,始见篆、隶笔势,雄健厚硕,遂为盛唐典型。按米芾《海岳名言》所称:"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参司空图《书屏记》所记时论,谓徐浩之书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其怒猊之抉石,渴马之奔水,岂属肥俗之状?又参徐浩之论书,"夫鹰隼乏彩,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翠翟备色,而翱翔百步,肉丰而力沈也。若藻耀而高翔,书之凤凰矣"⑤。其又何尝迎合时尚,力崇肥俗?况且,徐浩功名成就,乃在肃、代两朝,当时明皇之书,已见轻视,上引《述书赋》所评"迹且师于翰林,嗟源浅而波细"者,便是。窦臮为徐浩之友,且属下僚,其所言者自当知晓。联想到米芾有称"徐浩为颜真卿辟客",徐浩较之鲁公,年纪、职事并高,且属元载集团,为别一营垒中人,斯殆不知徐浩其人故也。其实,徐浩之真、行书,虽囿于绳律,或有乏韵致,然参入隶法,亦不失为盛唐新风之始肇者,且久居中书,职掌集贤,声望之

崇，影响之大，无人可及。中唐以后，墓志书法大多从其而出。

草书，贺知章、张旭并见著名，尤以张旭，减省王字，肆其意恣，雄逸气象，卓然而为盛唐典型。其又精绝楷书，且正、草并施，回互兼涉，为唐代书法嬗变之中枢。后之怀素，劲拔怒张，或誉之“以狂继颠”⑥。中唐草书，大都出自僧人，是固属张扬外学，实乃释门戒律太多，禁锢过重，藉此而聊适意气，畅发胸襟。吕总《续书评》记有唐草书家十二人，怀素列末位，惟张旭、孙虔礼以下如张怀瓘（其自诩数百年间拟可独步）、邬彤（怀素姨表，曾为其传张旭笔法）诸士大夫之类，并不见书迹流存。

篆书则首推李阳冰，其玉箸篆，劲利豪爽，盖为有唐新体。其始见称于《述书赋》，复延誉于《续书评》，至朱长文《续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评述历代书家，阳冰乃与张旭、颜真卿三人并列为“杰立特出”之“神品”，且有言：“自阳冰后，虽馀风所激，学者不坠，然未有能企及之者。”“学者不坠”，纵观中唐以后作篆者如李庾、唐玄度及毛伯贞诸人之书，朱长文之评，洵为不虚，足见李阳冰影响之深远。同时，史惟则、瞿令问之悬针篆，虽不及“玉箸”之丰劲，然亦为有唐新体，堪可记述。

元和年间，书法自硕厚而趋瘦劲，其间柳宗元以章草名高湖湘；刘禹锡正书婉劲，不让子厚；牛僧孺学锺有称于宋贤；李德裕习颜自鸣于岩壁；其他温庭筠、郑馀庆、杜牧以及范的诸人，或遒媚、或劲熟、或清健、或茂密，亦并为晚唐杰品。尤其是柳公权，本自家学，出入颜氏，然后追仿锺、王，又兼取欧、虞以至褚、陆诸人，终于“体势劲媚，自成一家”⑦，然限于时代，未能脱尽颜书之影响而卓然独立。是时，唐宪宗重振儒风，整理书馆；柳公权侍书禁中，亦以中兴为己任。然艺文已见颓势，书坛寂寞，亦每况愈下，咸通之后，更是衰败，几无名家名碑可称。至于志石，更是多出经生、书手乃至刻工如韩师复之流，其平俗粗陋，已不复可见中唐之气象，更遑论盛唐之风流。晚唐书法，若以柳公权为代表，刘禹锡有《酬柳柳州家鸡之赠》称“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其支离之体，瘦劲之风，则已有兆见凋敝之象。

五代之季，干戈频起，已不允书家从容笔墨之间悠然赏玩，恬然传

习，加上翰苑院体盛行，且愈演愈鄙，笔法日趋衰微。其间人物寂然，风流几乎扫地，书坛之杰出者，如篆书名家王文秉，出身刻石世家，虽见称于欧阳修，其文采亦可想见；楷书杰出者如李鹗，书出欧阳，其恭守法度，不敢有一丝私意，虽为印刷宋体之所祖，终难以书道言之；至于草书，有僧贯休，号称“草圣”，其仰息中唐释门之书法，而加发挥，虽争鸣于时，终难比肩于怀素，即使较之高闲，也不见同步，尚可称述的惟其《观怀素草书歌》一诗。若贯休能以出世之心而颂怀素之书，倡言骨力，崇尚闲逸，则自当便宜杨凝式以佯狂而独称雄杰。杨凝式身处乱世，经历五朝，其佯狂适世自有过人处，以其过人之量而注意书法，遂能独行其事，不为世俗所囿，且又追仿晋唐诸贤，雄逸是寄，是可堪称神绝。苏轼、黄庭坚之力倡杨氏者，固然出于一己之私曲，亦乃其雄强特出，洵为五代乃至晚唐之杰立者。

有唐书论，大都出自士大夫，莫不本之于时尚，留意于教化，如孙虔礼之崇王；李嗣真之贬褚；张怀瓘不满时俗而力倡“风神骨气”；窦臮缅怀盛唐而亟称“雄逸天纵”，即使偶有发明，亦多不睽时君之好，著名有如二王之优劣论。至于著述之形制，品第之等级，评述之好尚，以及笔法之阐述，纯属学术，已无关宏论，故多作发挥，乃见本意，无论其逸品之设，神、妙、能之分，还是传记之立，字格之列，抑或帖目之记，印章之例，诸如此类，能发前人之未发，见重当时，而延誉后世，并属首创，良可称述。至于诗文散篇，时见妙论，亦自有不逊专著者。

---

① (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五《评汇一》引徐献忠语。

②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③ (唐)窦臮《述书赋·下》。

④ (唐)张怀瓘《书断·中》。

⑤ (唐)徐浩《论书》。

⑥ (宋)朱长文《续书断》记谓颜真卿语，而托名怀素《自叙帖》引作李舟。

⑦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柳公权传》。

第一章

隋代与初唐书法

第一节

承前启后的隋代书法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南北。登基之初,甚重文治,优礼学者,曾"诏购求遗书于天下"①。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派遣使者到各地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平陈之后,因其书多出陈宣帝太建时所抄,纸墨不精,书亦拙劣,于是"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馀卷"②。至大业初年,天下承平日久,且炀帝又重视江南文化,好聚集图书经籍,《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有称:

> 炀帝即位,秘书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紺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

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由是，朝廷甚重书法，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三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③。虽然杨隋书手的情况已不可考，但据韦述《集贤院注》：“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作萧子雲体，赤轴绮带，最丽好。”④其书法出自萧子雲，当属南朝流风，院中书手或多属南人。当时国子监设书算学，各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四十人。隋启唐制，是时既设有书学，吏部取士，亦应有书科。

纸无千年之寿。由于隋时经籍及文书之类甚少见存，所见书法，大都是铭石之书，且以楷书为主，因此分析隋时书法只好囿于楷书范围。其结体大抵分作“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前者出自北魏、东晋，后者源于北周、北齐。风貌主要有四种，一平正和美，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一峻严方饰，以《董美人》《苏孝慈》为典型；一秀朗细挺，以《龙藏寺》为代表；一浑厚圆劲，以《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为典型。前二种启欧阳询、虞世南之格局，后二种开褚遂良、颜真卿之门路。其承前启后，中枢所在，功不可没，诚不容轻视之。

《董美人》，全称《蜀王美人董氏志》，蜀王杨秀撰，开皇十七年(597)十月十二日入窆万年县。清嘉道年间出土。是志多六朝别体，书法端庄遒丽，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八称“字迹端妍含古意，与欧(阳询)、虞(世南)伯仲”，盖为确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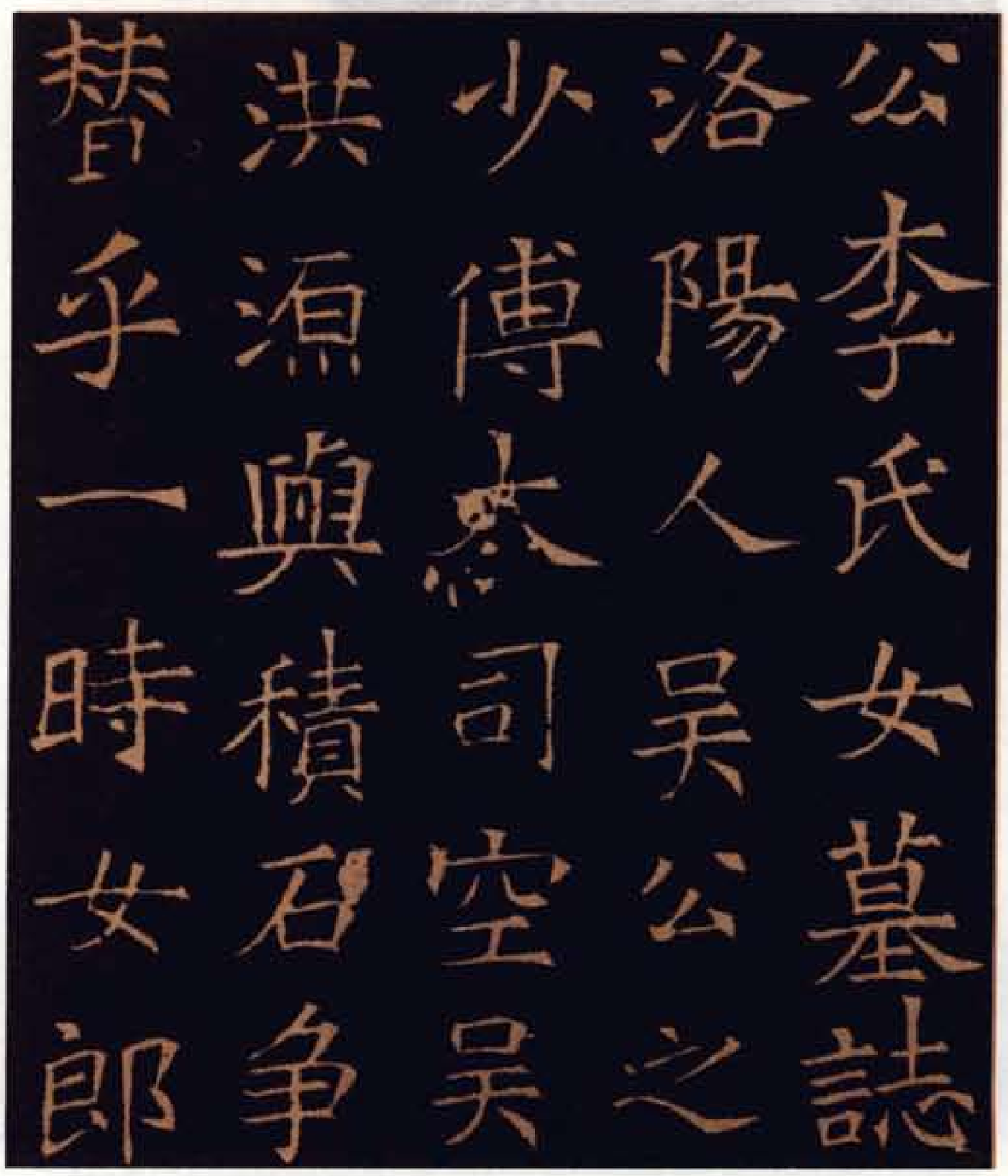
《苏孝慈》即《苏慈志》(图 1－1.1)，孝慈乃苏慈之字。仁寿三年(603)三月七日入窆同州。清光绪十四年(1888)出土，著录首见毛枝凤《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其有称：“楷法精健绝伦，实为佳刻，盖隋人楷法，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其沉着痛快处，有唐人所不能到者。”

《龙藏寺碑》(图 1－1.2)，齐开封参军张公礼撰。开皇六年(586)立石于河北正定县寺内。是石为隋碑之最煊赫者，后人多以欧阳询、虞世

1－1.1　《苏慈志》(局部)(603)

1－1.2　《龙藏寺碑》(局部)(586)

1－1.3 《贺若谊碑》(局部)(596)



1－1.4 《尉富娘志》(局部)(615)

南相论述，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有评“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赵崡《石墨镌华》卷一亦谓“碑书遒劲，亦是欧、虞发源”。按是书结体宽博，运笔细挺，与褚遂良同一境界，即以书风而言，平正冲和有似虞世南处，但绝无欧阳询峭劲峻严之态。其承习北齐馀绪，崇尚秀朗，与绍继北魏、偏重峻严者纯属二途。杨隋一代，南北书风渐趋融合，已启初唐门户，是碑洵为典型，王澍《虚舟题跋》称其书“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云，甚是。

《曹植庙碑》，又称《曹子建碑》，开皇十三年（593）立石于山东东阿县鱼山祠内。楷书中掺杂篆、隶，错综变化。书法浑朴雄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以为“快刀斫阵、雄快峻劲”，阳舒处乃为诸隋碑之最。

《章仇氏造像》，又称《章仇禹生等造经像碑》，开皇九年（589）十二月七日立石于山东汶上县。碑已断为三，楷书，兼作篆、隶。书法开宕峻爽，为北齐遗风之渐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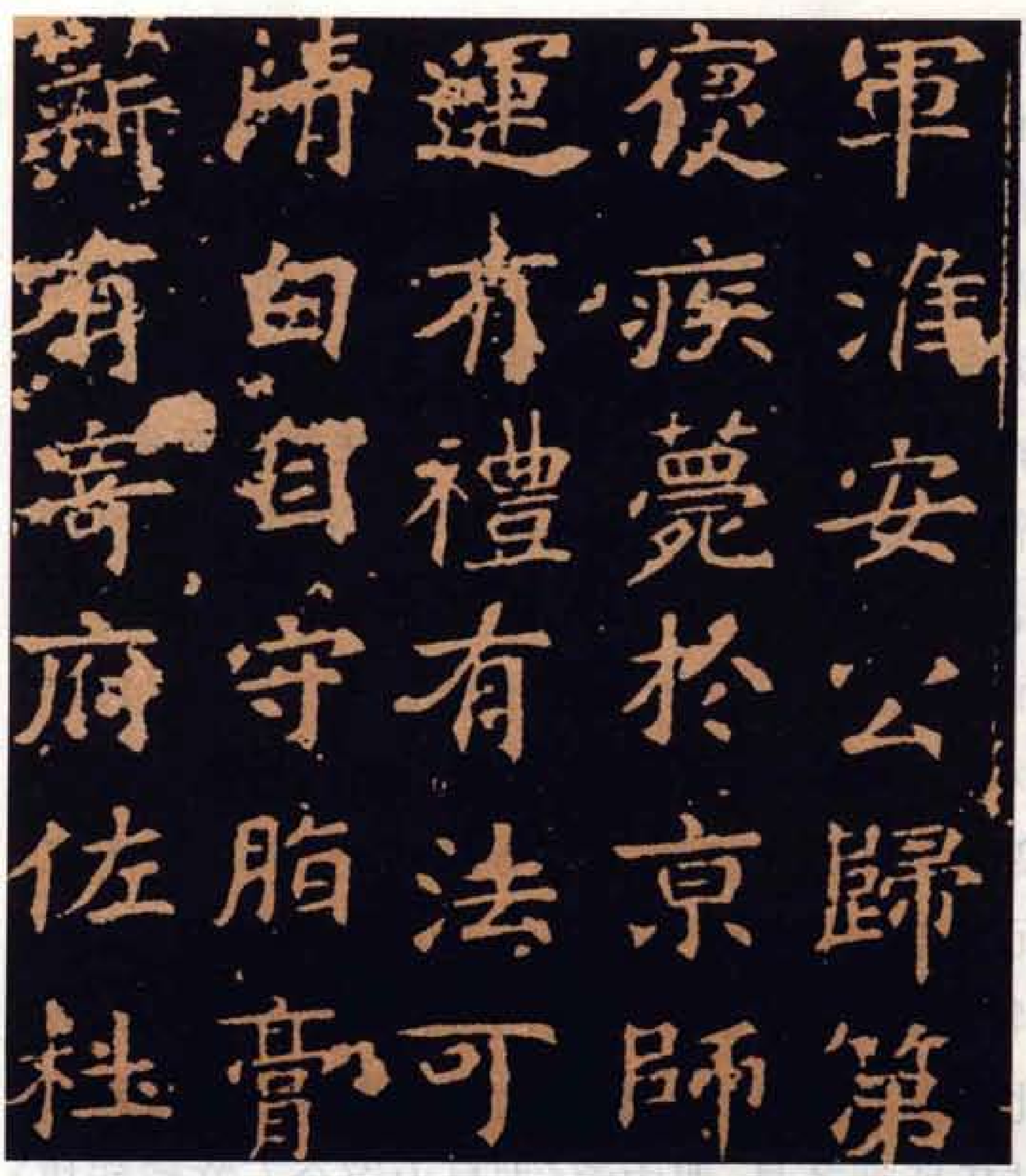
其他，诸如开皇十五年（595）的《巩宾暨妻陈氏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月出土。书法郁穆高爽，为近世金石收藏家所推重，如段嘉谟《金石一隅录》称：“字体高古，有锺、羊法，篆盖亦得汉魏遗意，后人不能及也。”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谓“书法方整跌宕，已开唐初诸贤法门”；开皇十六年（596）的《贺若谊碑》（图 1－1.3），书法峻严宏爽，《石墨镌华》卷一有称“是唐初诸人前茅”。《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六也谓其“字画精整，隋刻之佳者”。

大业十一年（615）的《姬氏志》《元智志》，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同时出土，书法端丽，有双璧之称。杨守敬《丁戊金石跋》曾评之曰：“两志书法并精整，此隋代变南北朝书体之始，以《苏孝慈》《尉富娘》照之，可知其时风尚矣。”按《元智志》多六朝别字，书法秀朗遒劲，上承六朝下开初唐，尤胜《姬氏志》，特见称于后人，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三评以为：“文字雅驯，书法严杰，北宗也。而结体一洗南北纤俗之习。世重欧、虞书，此为先导也。”不独陆氏所评若是，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也以为“书法劲秀，刻画峻拔，乃石刻中之妙品”。张廷济《清仪阁金

石题识》卷二论之更甚，有谓“文词典则，书格精整，古志石中绝无仅有之作”。《姬氏志》虽少疏朗之气，然亦饶有古意，两志或并出一人之手。

与《姬氏》《元智》两志同年入窆的《尉富娘志》（图 1－1.4），清同治十年（1871）出土。书法方整遒丽，《丁戊金石跋》以为“书法峭健，上嗣丁道护，下开欧阳率更，实出《元公》《姬氏》墓志上。在今所出古墓志，无与匹者”，盖独具会心，不失高见。

大业三年（607）的《常醜奴暨妻宗氏志》，明代出土，著录首见《石墨镌华》卷一，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间见佚。骈文典赡，其书法谨严雅丽，翁方纲《復初斋文集》以为“结体遒整，无齐、梁、魏、周之习，而开虞、欧、褚、薛之派”，又称：“不著书人名，而实在丁道护《啓法寺碑》之上。”斯亦可见隋时无名书家的造诣，而诸如此类的无名书家正是隋代书法发展的主流所在。



1－1.5 《赵芬碑》（局部）（590）

此外，《赵芬碑》（图 1－1.5）（开皇十年），《正解寺碑》（开皇十六年）和《青州舍利塔铭》（仁寿元年）诸石也并为隋刻佳品，堪可称述。

隶书碑志，著名的有开皇三年（583）《梁邕志》，1931 年出土，书法清劲秀逸；开皇九年（589）《□真暨妻王氏志》，1929 年出土，疏逸瘦劲；仁寿三年（603）《张俭暨妻胡氏志》，1926 年出土，

遒劲雅丽。其三石已多楷意，也可见唐隶整饬风规之初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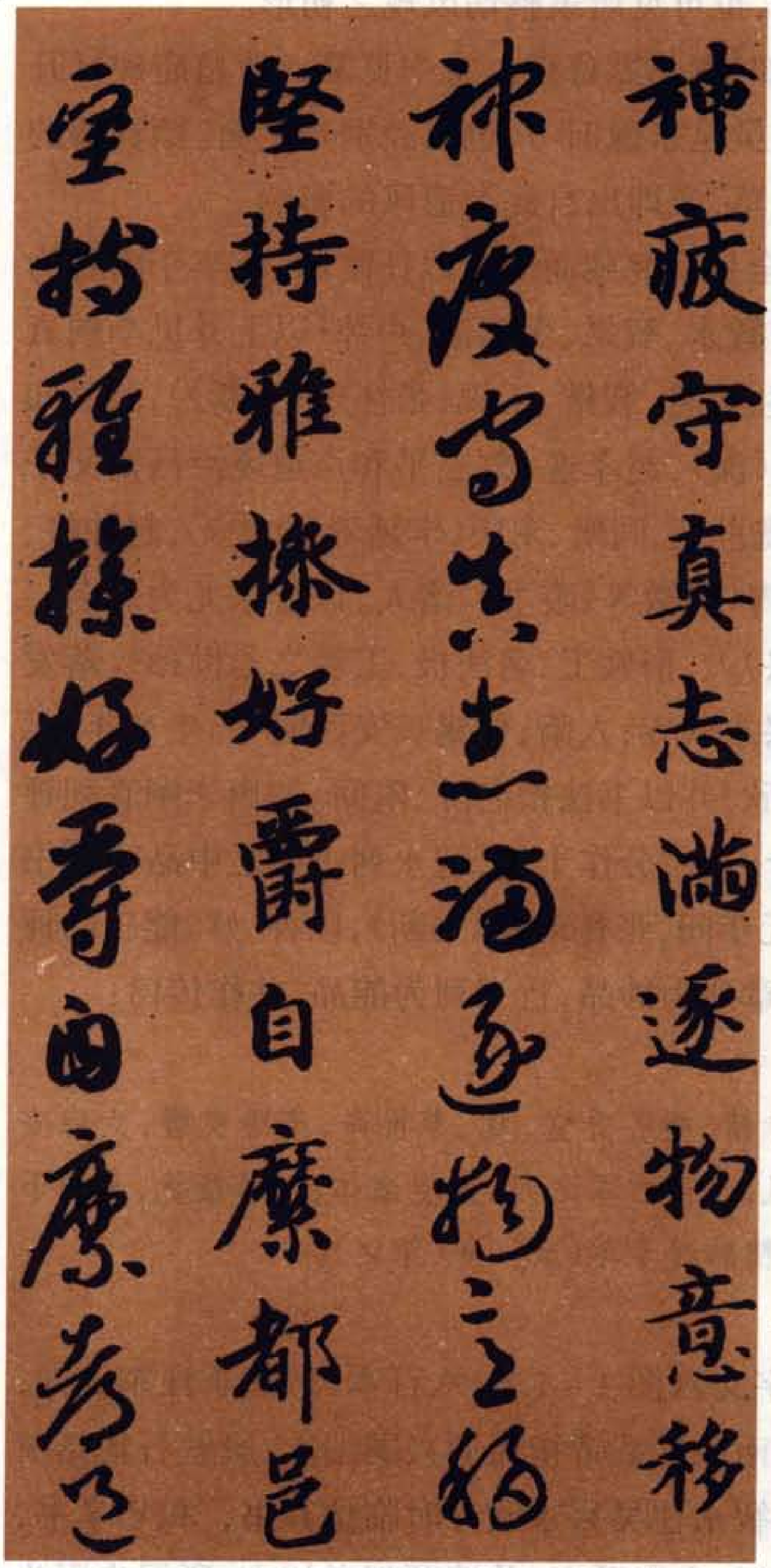
至于诸体掺杂的书法，如《青州默曹碑》，隶中见篆；《曹植庙碑》（开皇十三年），楷间参用篆、隶，虽是东魏旧习，也已经别开生面。颜真卿的《裴将军诗》，楷书中掺杂行、草，或即出自此类遗风的影响。

隋代善书者甚多，其实全从南北朝而来。以任隋职、或卒于隋者为限，其见称于唐人著述者，有智永、智果、房彦谦、卢绰（以上并见李嗣真《书品后》，下同），史陵、释述、释特、智楷、丁觇（张怀瓘《书断》），蔡君知（蔡希综《法书论》），赵文渊（深）、赵孝逸、刘玄平和卢道虔卢昌衡父子（窦臮《述书赋》）以及杨素、虞世基、阎毗、窦庆（李延寿《北史》），赵仲将、刘缊（李百药《北齐书》），殷胄（魏徵等《隋书》）诸人。以智永尤为著名。

智永，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俗姓王，名法极，王羲之七世孙[5]。落发会稽嘉祥寺。在陈，寄籍吴兴永欣寺；入隋，住锡长安西明寺。生卒年，无考。与兄智楷（孝宾，改名惠欣）并以书法擅名陈、隋间。初唐李嗣真列评秦汉以来迄至唐世书家八十一人，分作十等，智永列于中之中品，其《书品后》评云“精熟过人”。开元年间，张怀瓘撰《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评述历代书家，智永之楷、草、章列为妙品，行书列为能品，并作传曰：

> 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

相传其曾有真、草《千字文》（图 1－1.6）八百本，散诸于江东佛寺，各施一本。按《千字文》出自南朝梁武帝指命周兴嗣编次，殷铁石集拓王羲之书而为之。《书断》有记智永住吴兴永欣寺时临仿其书，“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又记“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馀，而五簏满”[6]。若是，智永研习先人遗迹，其精熟者自可想知。传世



1-1.6 智永 《千字文》(局部)

《千字文》墨迹本系唐摹本，多六朝别字，书法秀逸，风神娟静，信是出自其所临右军之手迹。

后世释门书法多从智永出，其衣钵相传，沿习而称之为“铁门限家法”。近世敦煌出土有唐贞观十五年(641)七月蒋善进临本智永《千字文》(伯3567)，亦可见其在俗众中的影响。著名的《兰亭序》，相传也以为是智永传留于其弟子辩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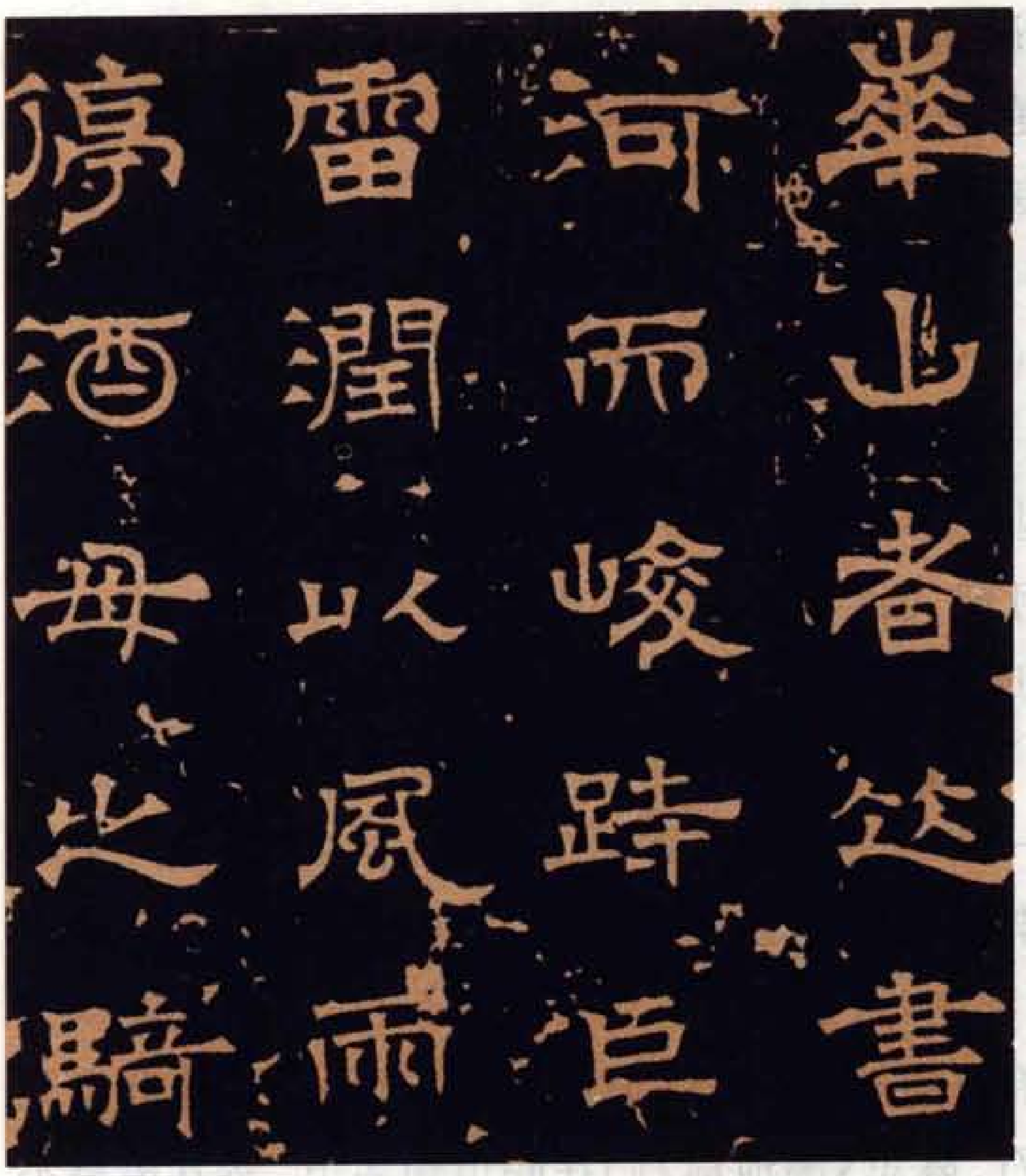
智永有弟子智果，曾知遇于隋炀帝，《书断》有记：“工书铭石，甚为瘦健，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其自负若此，盖非庸僧。《书断》又评曰：“夫筋骨藏于肤内，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而非猛，虚张夸耀，毋乃小人儒乎？”故其所擅楷、行、草，仅入能品。《述书赋》曾根据其带名草书真迹，并称于乃师，有“智永、智果，禅林笔精。天机浅而恐

泥，志业高而克成。或拘凝重，萧索家声；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犹能作缁门之领袖，为当代之准绳。并如君子励躬而有道，高人保志以居贞”云。相传有《心成颂》一篇，专言结法，恐已非全文。

明代丰坊作《书诀》，历评锺、王以来善书者，隋凡四人：史陵、薛道衡、丁道护、赵文渊（深）。史陵为褚遂良、唐太宗以及汉王元昌之师，书法虽称高古，至中唐《述书赋》，已不及见。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606）五月立在越州，有跋云：“其文字摩灭十五六，而其末隐隐可辨，云‘会稽郡’……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当时名笔也。今此碑摩灭而仅存，世之藏书者皆未尝有，非余收录之富，则遂不复见于世矣。”《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记施宿当时尝令拓之，仅得 224 字；薛道衡（540—609），字玄卿，薛曜之曾祖，虽名重一时，书迹却流传不多。唐时曾见李怀琳所作之伪品，虽咄咄逼人，或近似之，然终非真迹。宋朝内府藏有《和南》正书一帖，《宣和书谱》有称：“非泯泯众人之笔。”《金石录》亦记有开皇五年（585）十月（《集古录跋尾》作开皇元年）所立《尔朱敞碑》一石，陈思《墨池篇》归在薛道衡名下，然其语焉不详，所见拓本盖已残缺不全。其后，更绝无一纸片石见之于世。

赵文渊（深），字德本，后周书学博士，见称于《北史》，卷八十二本传有记“雅有锺、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惟文深、冀儁而已”。《述书赋》也评以为“文深、孝逸（赵孝逸），独慕前踪，至师子敬，如欲登龙，有宋、齐之面貌，无孔（琳之）、薄（绍之）之心胸”。其注又云：“深师右军，逸效大令，甚有功业……惟此二人独负二王之法，俱入隋。临二王之迹，人间往往为货焉。”存世有隶书《华岳庙碑》（图 1－1.7）一通，万钮于瑾撰，天和二年（567）十月十日立在华阴，系奉敕书，赵崡《石墨镌华》卷一甚加推崇，以为“碑字小变隶者，时兼篆籀，正与李仲璇《孔庙碑》同，亦褚河南（遂良）《圣教》、欧阳兰台（通）《道因》之所由出也”。然其终非隋代书迹。赵文渊入隋，其书迹一无著录，或属暮齿，且时日不长，仅临二王而已。

隋代善书者，智永之外，尚可称述者实仅丁道护一人。



1-1.7 赵文渊 《华岳庙碑》(局部)(567)

丁道护，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亦称："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惟道护独自著之。"又特许蔡襄跋语"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云者为精鉴。赵明诚《金石录》收其《兴国寺碑》（李德林撰，开皇六年正月立石）和《启法寺碑》（周彪撰，仁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立石）二石，并早佚，惟《启法寺碑》传世尚有宋季拓本可见，尤以临川李宗瀚所藏贾似道钤印本为最著名。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此亦可见隋时楷书，盖不尽从北派脱胎。

第二节

欧阳询与虞世南

1. 欧阳询(附欧阳通)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生于广州(今属广东)。祖籍渤海千乘(今山东高青),自十世祖晋欧阳质避祸南迁,遂为潭州豪族。当是时,欧阳询祖父欧阳颁正以克定岭南之功,出任广州刺史,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诸军事。其后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征南将军,封爵山阳郡公,天嘉四年(563)卒于任上,由欧阳询之父欧阳纥承继爵位。欧阳纥曾随父平定岭南,其后继任广州刺史,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十余年。有干略,颇具政绩,史称"威惠著于百越"⑦。至陈宣帝陈顼因纥久在外郡,疑其怀有贰心,征召入朝拜为左卫将军。纥惧,乃据广州起兵反叛。翌年,兵败伏诛,家口籍没,惟欧阳询因隐匿独免于难。时为太建二年(570)正月,欧阳询年十四岁,由父友江总收养之。

开皇九年(589)陈亡,欧阳询随养父江总入隋,客居长安。杨隋一代,欧阳询仕途蹭蹬,仅见任太常博士一职,是一位职"掌五礼仪注,引导乘礼,定诔谥,及守祧庙,开闭坎堂及祥瑞之事"⑧的七品清选官,虽然欧阳询也曾与同僚褚亮等人奉诏参修《魏书》,但文名未起,仅以善书名重长安。当时王公大臣诸如右武侯大将军周罗睺、屯卫大将军姚辩、左仆射元长寿、上仪同杨缙等人的碑志,即使序铭出自重臣虞世基等一代大手笔,也必由欧阳询以隶、楷书之。

隋亡,欧阳询与虞世南并为窦建德的东夏王朝所留用,欧阳询任太常卿为朝廷礼仪方面最高执行长官。两年之后,东夏王朝被秦王李世民

讨平，欧阳询再次作为降臣入唐。是时武德四年（621）四月，欧阳询六十五岁。因欧阳询是唐高祖李渊隋时的旧友，入唐即招纳麾下，且起为五品给事中。

给事中是欧阳询一生中最为显达的职守，据白居易说："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9]是一位集谏、宪、注于一身的门下省常务长官。当时，欧阳询不独在省内执行封驳、司法、人事审查以及监考诸职权，还奉诏参修《陈书》，又领修《艺文类聚》。特别是《艺文类聚》，其"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其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0]。这种以"类事居前，文列其后"的编集手法，一改以往类书如《皇览》偏重类事、轻视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常规，使之事、文相兼，不仅给予当时学者在写作骈文、诗赋时参考或采集词藻典故提供诸多方便，而且由于所搜集的由汉至隋大量的词章名篇，"多为今世所无之文集"[11]，直至晚清，仍为编文纂集者所重视。冯惟讷的《诗纪》、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的编集，莫不视《艺文类聚》为金山玉海，藉以汲取隋以前的佚散文献和资料。

《艺文类聚》，始编于武德五年（622），迄于七年（624），先后三年，参与者著名的史学家有令狐德棻、赵弘智等人。全书凡百卷，分四十六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成为继虞世南在隋时所编《北堂书钞》后的又一部巨著。然而，在欧阳询修毕《艺文类聚》呈上并获赐帛二百段后不久，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并于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欧阳询因是李建成太子集团中人，权臣罢位，即从中枢机关调入东宫，初为太子中允，后除太子率更令，职掌藩邸"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12]，成为辅佐太子李承乾从四品上阶的职事官。其间，虽因出于李世民的政治需要，也曾封爵渤海县开国男，散官又至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但已是一员闲散无事的文儒老臣。有轶事二则，可见欧阳询在当时的地位：

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长孙无忌先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獦猴？"询应声答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太宗敛容曰："汝岂不畏皇后闻耶？"无忌，后之弟也。⑬

文德皇后丧，百官缞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⑭

更有《补江总白猿传》，托名江总，造言以诬询⑮。

唐贞观十五年（641），欧阳询卒于率更令任上，时年八十五。史不记欧阳询赠官、谥号及死时礼遇，或仅以三品散官制度处置之。

欧阳询是位全能的书家，《书断》有称："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所谓八体，盖大小篆、隶（八分）、真（隶）、行、草以及飞白、章草诸书。其中飞白、楷、行、草列为妙品；大小篆及章草并入能品。是书撰于开元年间，距欧阳询时代不远，所见书迹亦多，其评盖有所本：

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跌宕流通，示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后，略无劲敌，惟永公特以训兵精炼，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

按欧阳询飞白、章草出自萧子云，惟世无传本。篆体亦仅小篆可见一二，散见于所书碑版题额，刚劲雄逸，然不甚高明。真、行两体，无论《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抑或《梦奠》《张翰》诸帖，风神凝重，结体沉稳，形势峻爽，不愧张氏之评。草书，仅存《千字文》，几经摹刻，已不能窥视本来面目，其"惊奇跳骏"处亦只能以形质论之。至于隶书，所见《宗圣观记》、《房彦谦碑》（图 1－2.1）以及《昭陵六马赞》，虽古雅幽深，气格并高于蔡

有邻、韩择木诸人，但功力平平，影响不大，故为张氏所不齿。

欧阳询少长江南，养父江总“教以书计”⑯，其学书之始当受到梁、陈书风的影响，而梁、陈书风则以王献之为主流。按江总（519—594），字总持，官至陈尚书令，不独以文学称著于世，其书法亦为唐书论家所重。《述书赋》历评陈时书家智永等二十二人，江总名列其间，其评又云：“坡陀总持，独步方外。甘率性而众异，非接武于兴会。若时违隐沦，卒不冠带。”欧阳询自少孤寒，其之所以后来能博览经史，精熟《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三史，尤其书法“八体尽能”，笔法绝伦，盖出自当年养父的教诲与影响。

《旧唐书》本传称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然根据宋释适之《金壶记》所记“欧阳询因见《右军教献之指归图》一本，以三百缣购之而归。赏玩经月，喜而不寐焉。于是始临其书”云，欧阳询初学右军之书，始于《右军教献之指归图》。按《右军教献之指归图》，即张彦远认为赝品加以删除的《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孙虔礼《书谱序》早已明言“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若《金壶记》所记不误，欧阳询初学的当是由梁陈人所伪托的王字。梁、陈社会，“比世皆高尚子敬……贵斯式略”。其托名王字者，风貌自必近似或即出于大令。综观欧阳询行、草书，蹙缩皴节，以收济放，渊源出于大令。史书所记学右军者，或系高标时尚，以唐文皇于大令有饿隶之诮而讳之也。

1－2.1 欧阳询 《房彦谦碑》(局部)

《述书赋》又说：“若乃出自三公，

一家面首，欧阳在焉。不顾偏丑，颛翘缩爽，了枭黜纠，如地隔华戎，屋殊户牖。”三公者，即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字仲宝)，其书今世绝无一纸，窦氏所见也仅是草书，据他所评：“萧条北齐，浩瀚仲宝。劣克凡正，备法紧草。遐师右军，欹尔由道。究千变而得一，乘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岛。”及《宣和书谱》谓“书法自王氏羲、献父子以来，其道浸以衰陋，至齐尤甚。珉善草、隶(真)，遂能一洗俗学之谬，远追羲之，颇得其法，落笔佳处往往凌轹古人”云，其“劣克凡正，备法紧草”者，格律必高于时俗。窦氏所谓“一家面首”，当以草书言之。窦氏在代宗朝是一位“久游翰苑，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⑰，且为世人所折服的书论家和鉴赏家，上距欧阳询仅百余十年，其说又不囿于时俗之习评，是记或当可信。若是，欧阳询真、草，盖专师此人，尤其真书，结体峻密处或即出自刘氏而上溯北魏，加以整严。其存世《八法》所谓“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随之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裁，东映西带”的结字规律，或亦由刘氏而敛入规矩，遂演变成杨隋一代楷书。

关于欧阳询学书的记载，还有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八所引《国史异纂》一则：“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宣和书谱》曾加引用，且以为“乃悟其妙……由是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画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此事果若不虚，其揣摩模拟者，与笔力全无关系。《宣和》所言“悟其妙”者，盖其意态风神。索靖书属章草，其“银钩虿尾”之势，梁人袁昂《古今书评》喻之为“飘风忽举，鸷鸟乍飞”。《书断》以为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气势自与欧阳询同属猛利一路。且欧阳询擅长章草，颇有心得，徐浩《论书》甚称“欧阳率更云：萧(子云)书出于章草，颇为知言”。《书断》亦引率更《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语“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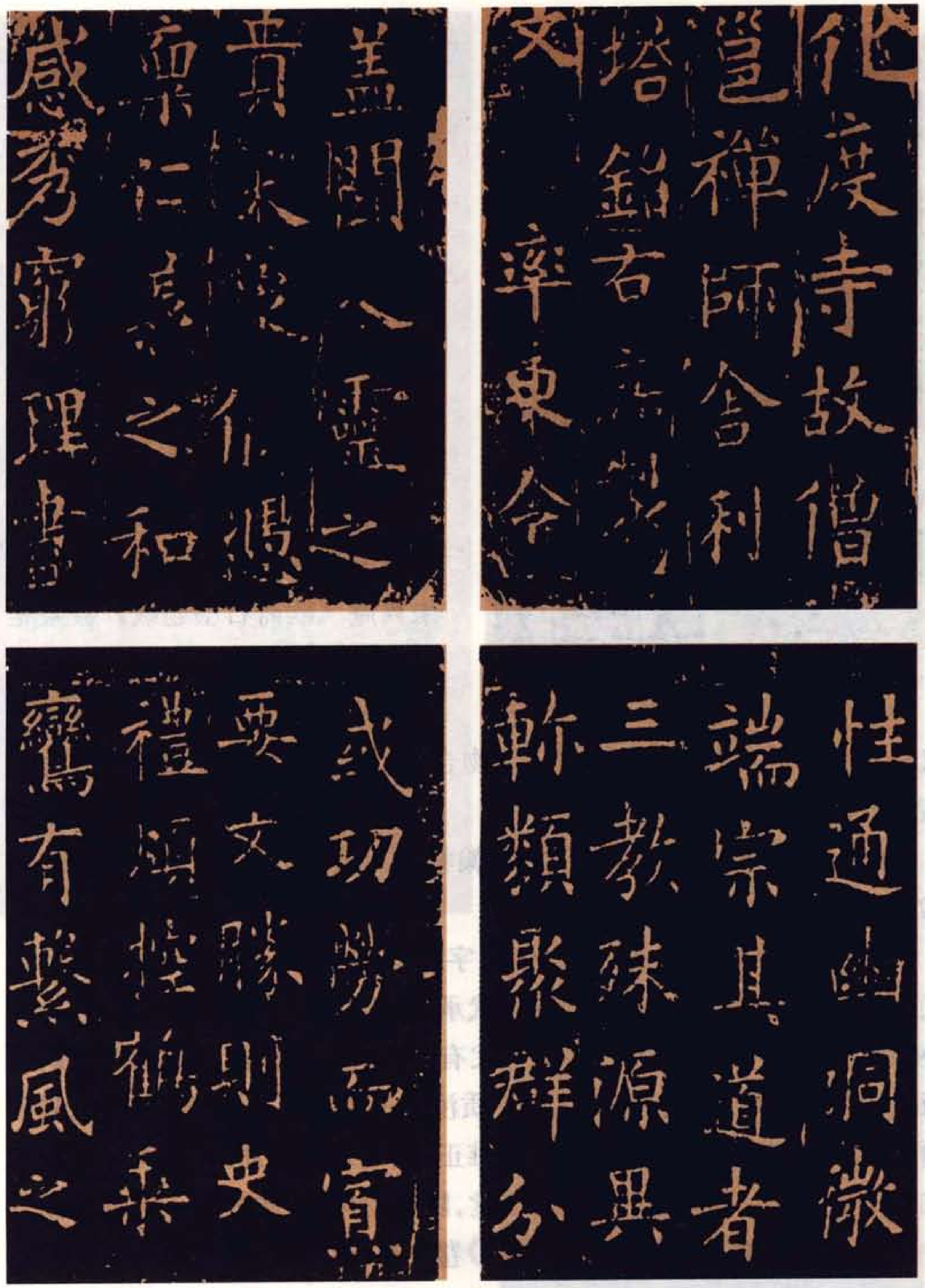
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句，以证草书之嬗变。简言之，欧阳询用笔全出章草，其沉着痛快处正得自索靖“银钩虿尾”之趣。

综上所述，欧阳询初习梁陈时风，得大令展蹙之秘；复师北齐刘珉，笔力为之瘦挺；其后参学章草，领悟索靖用笔三昧；终于综合六朝精华，融为杨隋书品。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初影响很大，史有称：“询……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18] 这虽然是武德年间的事，但联想到贞观初欧阳询以一受贬闲员、李建成集团中人，仍能受到朝廷的重视，偕虞世南赴弘文馆教示楷法；当时王公大臣之碑志，即使宰相杜如晦之碑，序铭出自虞世南之手，亦诏令欧阳询书之。这虽出当时政治之宽松，也完全与其书法及之声名有关。他的代表作有《房彦谦碑》（隶书）、《化度寺碑》和《九成宫醴泉铭》（楷书）。

《房彦谦碑》，李百药撰，贞观五年（631）三月二日立在山东章丘县，隶书。有篆额“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是碑结体端严，笔意险绝，尤见称于吴玉搢《金石存》，其卷十二有评：“极跳拔险峻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兰台》因亦全是此种风味也。”

《化度寺碑》（图 1－2.2），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李百药撰，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十六日立在洛阳化度寺，其遒劲清古，历来论书者引以为欧阳询正书之冠。自姜夔评以为《化度寺碑》有胜《九成宫醴泉铭》之后，赵孟頫也谓两者为楷法第一，而《化度寺碑》似又胜之，有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19]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九十六《玉堂嘉话》以为“《化度碑》规模一出《黄庭》，至奇古处，乃隶书一变”。其朴茂浑穆，盖其晚岁之合作。清季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道士王圆箓于鸣沙山千佛洞发见唐拓本，存前 226 字，至十行“耀秀华字”止，共六页，首页 39 字，为法人伯希和所



1－2.2　欧阳询　《化度寺碑》(局部)(631)

1-2.3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碑额(632)

得,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余五页为英人斯坦因所得,现藏英国伦敦[20]。

《九成宫醴泉铭》,魏徵撰,贞观六年(632)四月立于陕西麟游。有篆额"九成宫醴泉铭"六字(图1-2.3)。是碑严谨峭劲,《石墨镌华》卷二评以为欧阳询正书第一,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谓信本书"太伤瘦俭,古法小变,独《醴泉铭》,遒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作"。近人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甚宝是碑,再三题记,频加歌咏(有绝句十首),并以是碑证欧阳之《书授诀》,有谓"诀中所云,无不与碑字吻合,此正率更自道书《醴泉铭》之甘苦语,非泛泛论笔诀也"[21]。

另外,存世的行书墨迹本《张翰帖》《卜商帖》和《梦奠帖》(图1-2.4)相传也是欧阳询的佳迹。

欧阳询之子欧阳通(?—691),字通师,少夫人徐氏之所出。武后朝官至宰相,封爵渤海县子。因谏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遂忤武后之意,为酷吏所陷被诛。书法出自家学,与其父有大、小欧阳之称。史称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22]。其书结体雅正,用笔劲挺,《述书赋》有"继美"之誉。且评之云:"父掌邦礼,子居庙堂,随运变化,为龙为光。"通亦甚重其书,尤喜修饰文具。张鹭《朝野佥载》卷三有记:"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复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坚薄白滑者,乃书之。"若是,反观其父之"不择纸笔,皆能如志"[23]者,自可想见

1－2.4　欧阳询　《梦奠帖》(局部)

1－2.5　欧阳通　《道因法师碑》(局部)(663)

欧阳父子对书法理解的异歧。《书断》以为其书“瘦怯于父”者，不独与用笔刻意有关，实亦乃时代之使然。龙朔三年(663)的《道因法师碑》(图1－2.5)(李儼撰)和调露元年(679)的《泉男生志》(王德真撰)是他的代表作。

2. 虞世南(附陆柬之)

虞世南(558—638，图1－2.6)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欧阳询一岁，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出生于东南名门望族。父亲虞荔，官至陈太子中庶子，以德行知遇于陈文帝，其卒时，虞世南仅四岁。叔父虞寄无子，世南七岁时便过继于他，所以弱冠取字曰“伯施”。虞世南虽与欧阳询一样，都是年幼失怙，但在陈时，欧阳询是叛将之子，而虞世南乃良臣之后，境遇便大不相同。史称：“天嘉中(天嘉二年)，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胜丧。陈文帝知其二子(虞世基、世南)博学，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24]至太建十三年(581)继父虞寄卒后，即召虞世南继其兄入建安王府为法曹参军，时年二十三。其后官至五品西阳王友。

1－2.6 虞世南像

开皇九年(589)，陈亡，虞世南偕兄世基徙居京都。以文学受知于晋王杨广，“辟书交至”[25]，征为王府学士。杨广为太子，又改为东宫学士。杨广即位，乃除秘书郎，负责掌管四库图书经籍，并兼任文学侍臣，偕名才士虞绰、庾自直、蔡允恭等应召居于禁内供奉待诏。史称“(炀帝)虽爱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为七品十年不徙”[26]，至大业中叶才转为六品起注舍人。其间，虞世南在秘书省后堂摘抄“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27]，集为160卷，凡852类，取名曰《北堂书钞》。又和虞绰、庾自直等文学之士编纂

《长洲玉镜》等类书十余部，大行于世，遂成为一代名儒。而欧阳询仕途蹉碍，仅见任太常博士一职。

隋亡，虞世南与欧阳询并为窦建德的东夏王朝所留用，欧阳询征为朝廷礼仪方面的最高执行长官太常卿；虞世南则出任中枢机关门下省的“贰侍中”要职，成为他一生中品位最高且具权威的一个官职。然而，两年之后，随着东夏王朝遭到秦王李世民的讨平，虞世南与欧阳询一样再次作为降臣并入于唐。是时，武德四年(621)四月，虞世南六十四岁，经秦王李世民收留作了幕僚。

虞世南入唐受知于李世民，初为秦王府参军事，后转为六品记室。是时，李世民“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28]。“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29]。文学馆初置之时，虞世南即以记室充任学士，成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他“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世，并包六艺”[30] 的文才更受到李世民的仰重。从此君臣一体，雍容相从，而为一代名臣，诚如编撰《旧唐书》的史臣所说：“虞永兴之从建德……盖大渴不能择泉而饮，大暑不能择荫而息耳，非不识其饮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群贤雾集，人知所奉，方得跃鳞天池，擅价春山，为一代之至宝，则所托之势异也。”[31]

虞世南擅长诗文，史记类似徐陵，有称“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32]。隋炀帝爱其才学，曾召引为学士，待诏供奉达十年之久。存世诗作，诸如《奉和》《应制》《赋得》之类，大都属于宫体艳诗，甚至连《应诏嘲司花女》，其淫绮鄙亵，托名于虞世南，后人也莫不深信，以为是谄媚时主之作。《唐会要》卷六十五曾记：贞观七年(633)九月二十三日，唐太宗谓侍臣曰：“朕……尝戏作艳诗，虞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唐太宗知虞世南工徐陵、庾信之体，故作艳诗令其唱和。按唐太

宗好效徐、庾，宋人早有定论，不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引宋神宗赵顼语："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文。"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亦引苏轼《书潭州石刻》句："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见之。"是知虞世南与唐太宗君臣同调，并为徐、庾传人。且唐太宗初置文学馆时，年仅二十四岁，其先虽曾就张后胤受《春秋左氏传》，终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33]，所以史称"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34]又说，太宗"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35]。唐太宗之所以好效徐、庾，固然出于自齐周、陈隋乃至初唐社会风尚的熏染，亦当与文学侍臣尤其虞世南的影响有关，或即受其"顾问"。只是到了贞观中叶，史臣如魏徵、姚思廉等人群起而力贬徐、庾，斥之为亡国之音，虞世南也"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36]，遂有发"更有斯文，死不奉诏"之语。唐太宗自此大事宣扬，亦以明其方正而加保护之。

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册为太子，虞世南即出任"中舍人"，成为东宫职掌行令、书令、旨及表启等事务的机要秘书。李世民即位之后，改为著作郎，在秘书省内负责撰写碑文、祝文、祭文和管理档案的事务。又以"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充任弘文馆学士，偕欧阳询、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诸名儒轮番入直，在内殿与唐太宗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日见亲近。虞世南在著作郎任上，曾与褚遂良、萧德言等人采集经史百家之中的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事，编《群书治要》凡五十卷，为唐太宗"以古为镜"，明古代君王得失功过以为元龟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贞观七年(633)，虞世南经秘书少监转为秘书监，并受爵永兴县子。按秘书省作为国家图书管理机构，唐初仅设秘书监一职，由魏徵担任之，曾领导抄书手百人抄写四库群书。唐太宗为了安置年迈的虞世南，特设少监一职，遂始有正副长官。虽然秘书监与秘书少监，并是三品简闲官，但由于虞

世南曾为瀛州学士，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智囊集团中人，尽管暮年衰老，政治上仍受到唐太宗的倚重，史称："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入谈论，共观经史。"[37] 虞世南也藉谈论先古帝王为政得失的机会，不时地戒骄奢，劝节俭，止狩猎，提出一些拾遗补缺性质的谏议，其恳恳诚诚之状甚得唐太宗的尊重，加上陈隋时代的孝行、友悌行为和诗文、书法以及儒学的影响，终于博得唐太宗所谓"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38] 的称誉。综观虞世南入唐后之书翰、词藻，盖副其赞。以诗篇而论，"洗濯浮夸，兴寄独远……治世之音，先人而兴"[39]，如《从军行》二首，《结客少年场行》《出塞》诸篇，明人高棅《唐诗品汇》卷一尊以为"唐世五言古风之始"。因此，唐太宗所赞，洵非仅出于教化之意评也。

虞世南自贞观二年(628)以年老上表请求致仕不许，至十二年(638)已经十年，遂再次上表恳祈退归田园，终于"优制许之"，带着银青光禄大夫三品散官和弘文馆学士的职衔，以及"五绝"殊荣，赋闲田园。旋卒于乡里，享年八十一岁。

虞世南卒后，唐太宗为之十分动情，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有谓"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40]。不独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以礼部尚书，谥号文懿，还手敕魏王李泰代之宣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当代名臣，人伦准的。"[41]未几，又作诗悼念引以为知己，令起居郎褚遂良持之诣灵帐前宣读祭奠之。直至数年后，唐太宗还缅念于心，追怀不止，以致梦中相见，如若平生。唐太宗为申述思旧之情，特于虞家设立五百僧斋，并选天尊像一区"以资冥助"。同时又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其肖像置于凌烟阁中供人瞻仰。虞世南有文集三十卷，唐太宗诏褚亮为之作序赞述之。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长安永嘉坊有虞世南庙，或即建之于太宗朝。

虞世南书法，胎息智永，偏工真、行，纯粹是一位王献之"今体"的善继人。史称："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42] 按智永，陈永兴寺僧，工于真、草二体，时人智果和尚以为得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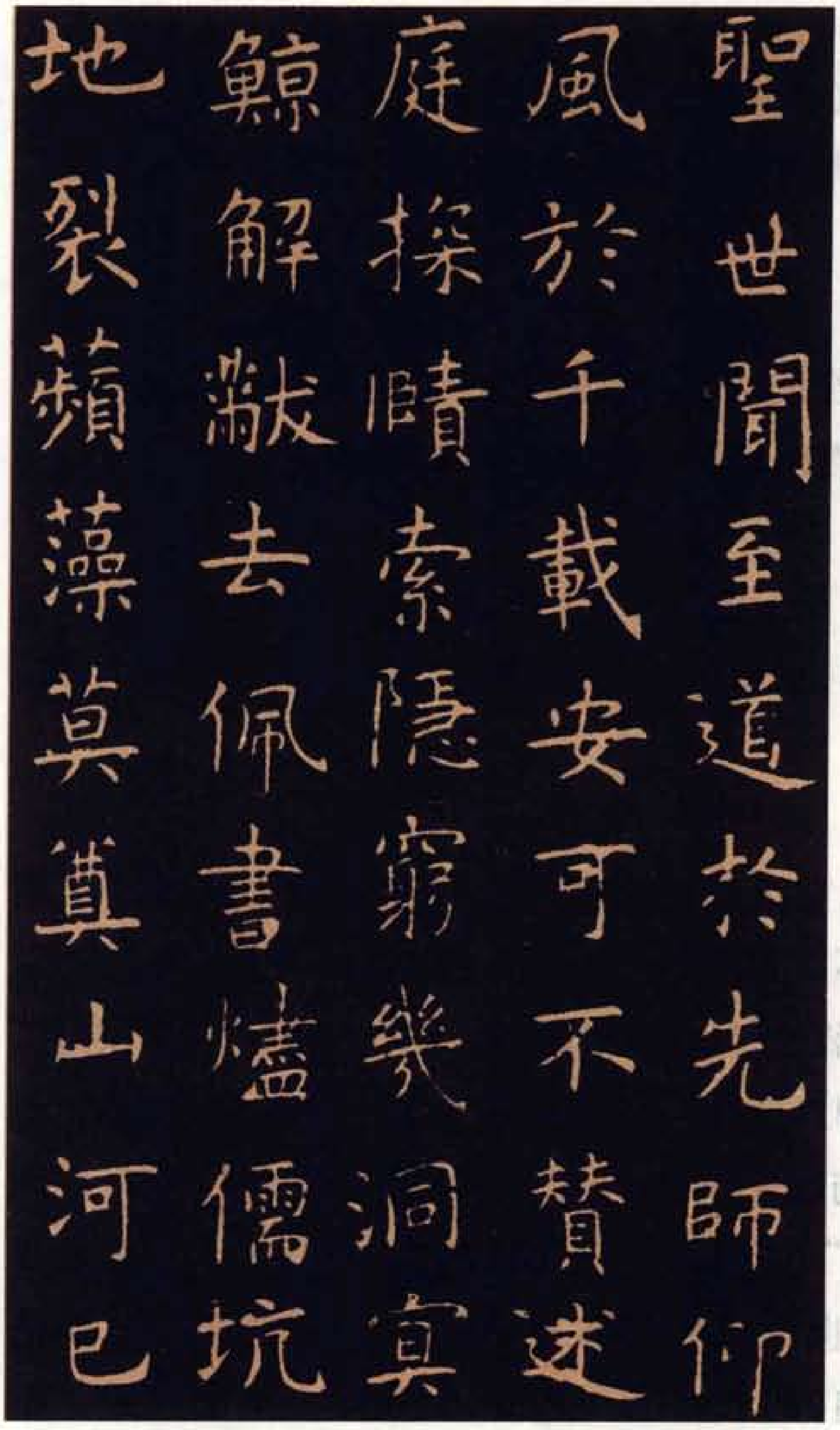
军之肉。智果所谓“得右军肉”者，虽讽其仅得形体而弃隶书(章草)笔法之内涵。但究其实，智永真、草二体，易方为长，结法全自大令而来。又唐初“军国多务，未遑改制”，一切因循旧制。且当时士人都由周、陈入隋而归唐，虽在政治上各展其才，谋猷允协，以致富贵，但书法终因积习难改，仍保留着杨隋乃至周陈风规。而书法艺术自永嘉百家渡江之后，中原格局亦随之南迁江左。其后，王献之一变乃父制度，独创新体，大行于世，加之南朝禁碑，笔札草草，多以稿行为主。“比时皆高尚子敬……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43]。即使一江之北，自北魏历北齐而至北周，虽时重古法，汉魏旧规莫不善加保守，但由于北朝君主并重南方士人，多引以为待诏学士，如北齐文林馆待诏颜之推等人即为梁人，北周麟趾殿学士如颜之仪、王褒诸位亦是自荆襄入徙关中的才学之士，更何况江左流美之风，其妍妙轻捷处深为北朝人士所仰慕。《北史》有记：北朝书家赵文渊(深)，雅有锺、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惟文渊是望，一俟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赵文渊之书，遂被遐弃。文渊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及，并改习褒之书。至杨坚篡周立隋，随后灭陈一统天下，南北之风自然随之渐趋中和。其间稿行之书，或求细密，或取流便，多从南朝之习。而铭石之体，意在宏廓，则仍沿袭齐周遗绪，尤其楷法，几乎全从北朝而来。欧阳询书出大令，后掺入章草笔意，敛入规矩，且改用北朝结法，以合时尚，终于传六代之精华，启三唐之奇峻，为杨隋一代名品。入唐则炉火纯青，更趋精善。是时，虞世南书名未起，凡王公大臣诸碑志大都出于欧阳询之手，所以史有称“询……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44]《书断》亦称：“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惟永公特以训兵精炼，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虞世南入唐与欧阳询一样已属暮年，记言应用，意在儒学，“不使一日失业”[45]。其书虽渐加遒劲，更见雅正，但积习久深，未见改体，所“恭守无舍”者为智永制度。按《书断》曾引初唐书家王绍宗言：

鄙夫书翰无功者，特由微水墨之积习。常清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陆柬之）论及此道……将余比虞君，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肚，与余正同也。

陆柬之为虞世南外甥，所说若是，虞世南也当为“书翰无功者”。其“清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者，熟练而已。所以《书断》又称：

其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宜乎！

所谓其“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色”者，正是杨隋书品，惟陈、隋乃至初唐武德年间虞世南不以书名也。虞世南书名始于贞观年间，初奉敕与欧阳询于弘文馆“教示楷法”[46]，复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绝之誉，所书《孔子庙堂碑》（图 1－2.7）又获王羲之黄银印之赐[47]。于是殊荣之下，声名鹊起，遂与欧阳询并名天下。虞世南之所以独在贞观年间琅琅成名，不仅其书法“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48]，更重要的是出于唐太宗之崇仰。李世民虽然宣称书学右军，有“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49]之说，但实际上书出虞氏。不独《宣和书谱》有记“太宗乃以书师世南。然尝患‘戈’脚不工，偶作‘戩’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今窥圣作，惟戩字戈法逼真。’”米芾《书史》也说：“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传世《晋祠铭》《温泉铭》酷似虞书也是事实。综观唐太宗广求二王书迹，乃至赚取《兰亭》，陪葬昭陵，又亲撰右军传赞，誉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联想到虞世南笃好且仿效宫体艳诗而不加倡言赞许，反以死相谏规劝时主鄙弃之，以及唐史关于唐太宗所言“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50]的记载，其缘情设教，倡导王字，迎合自北周提倡魏晋传统以来一



1－2.7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局部)(633)

直相继踵行而渐趋纯正的社会书风，或即出于虞世南的“顾问”。虞世南既为唐太宗之师，其书又专精真、行，系右军嫡系，“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后之论书者遂囿于太宗五绝之论、崇王之说，每每扬虞抑欧，著名如《书断》有“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之评。

虞世南存世碑志，可信者仅见《孔子庙堂碑》。是碑，唐贞观七年(633)间立石，盖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因诏封孔子，重修圣庙，由国子祭酒杨师道奏请，虞世南奉敕撰文铭石者。长安三年(703)四月八日相王李旦题额，曰“大周孔子庙堂之碑”。锺绍京拓，光宅刻。或记原碑“仅拓数十本赐近臣，未几庙火煨烬，武后敕相王旦重刻”[61]。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奏请去“大周”改“大唐”字样。由于石本进呈，有黄银印之赐，是碑在当时影响很大，“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62]，盛况空前，绝无来者。至中唐，尚有贾耽称述之，其《赋虞书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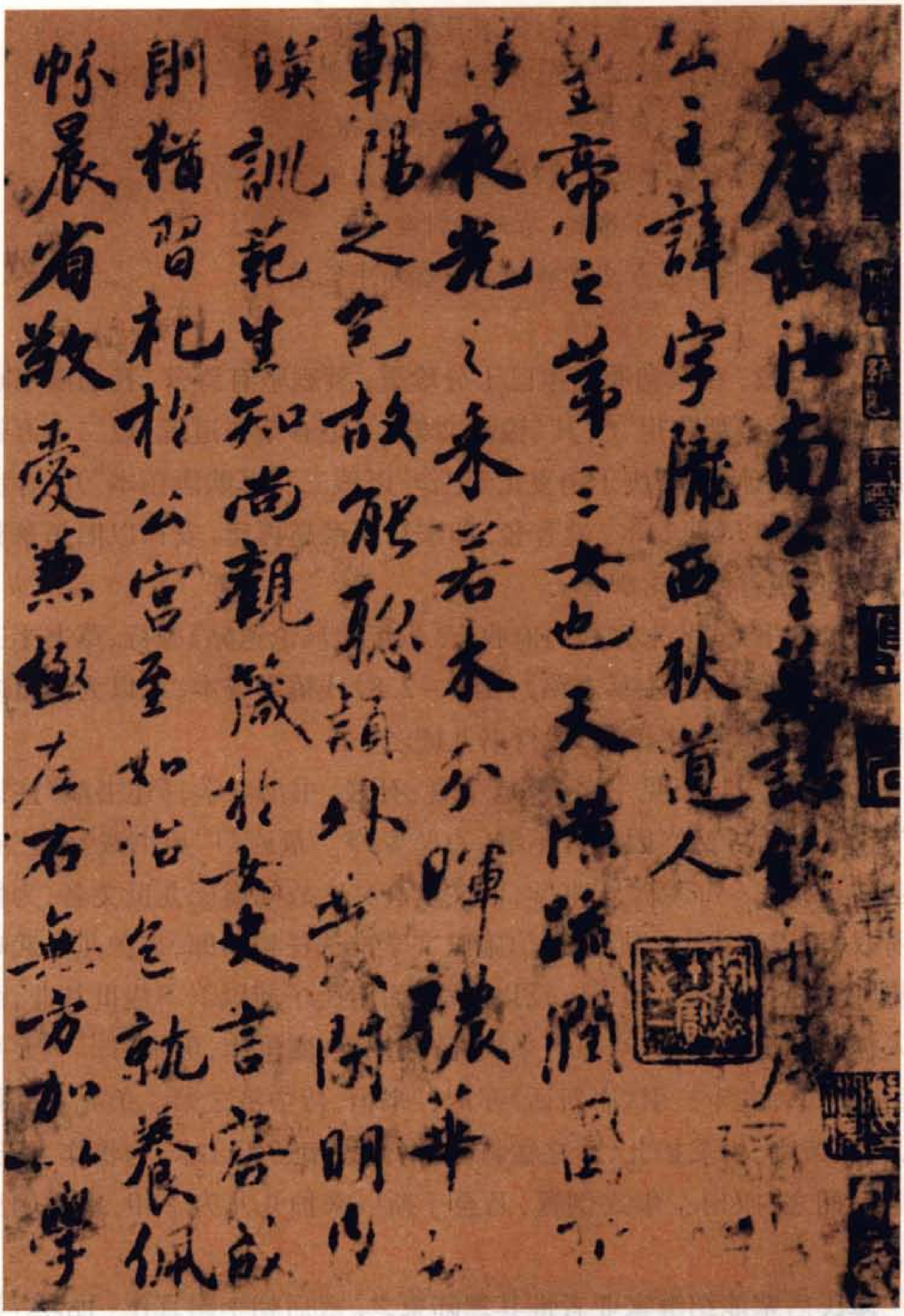
众书之中虞书巧，体法自然归大道。
不同怀素只攻颠，岂类张芝惟创草。
形势素，筋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
孤青似竹更飕飕，阔白如波长浩渺。
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到难寻奥。
须知《孔子庙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宝。

是碑早毁，在宋初原拓本已十分珍重，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53]，其《豫章文集》又记有荣咨道者，以二十万钱买此碑旧刻（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记作“以钱三百万购唐拓本”）。存世重刻本甚多，以《西安本》最著名，即宋初王彦超再建，安祚以旧拓摹刻者，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虞世南书迹，北宋宣和内府收有《积年帖》《论道帖》等行、草书十三通。存世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图 1－2.8）残稿墨迹本，或以为出自虞世南手笔，为《宣和书谱》所载行书九迹之一。

虞世南子昶，不见书名；其族子纂、孙焕，书出家学，《述书赋》注以为“能继世”业，然终因风骨不继，有坠家声。董逌《广川书跋》卷三有记：“虞世南……子纂虽识书学，而文业衰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为儒林所叹，可以为难也。方隋时，伯施以文学推选任秘书郎，来护儿以武略任将帅。至唐，来氏有恒、济，反以文显；而虞氏子昶以下不能世其业，而为人仗宿卫。故陆元方戏曰：‘来护儿，儿把笔；虞世南，男带刀。’”《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三引《唐新话》亦记：“来恒，侍中济之弟。弟兄相继秉政，时人荣之。恒父护儿，隋之猛将也。时虞世南子无才术，为将作大匠，许敬宗闻之，叹曰：‘事之倒置，乃至于斯。来护儿儿为宰相，虞世南男作大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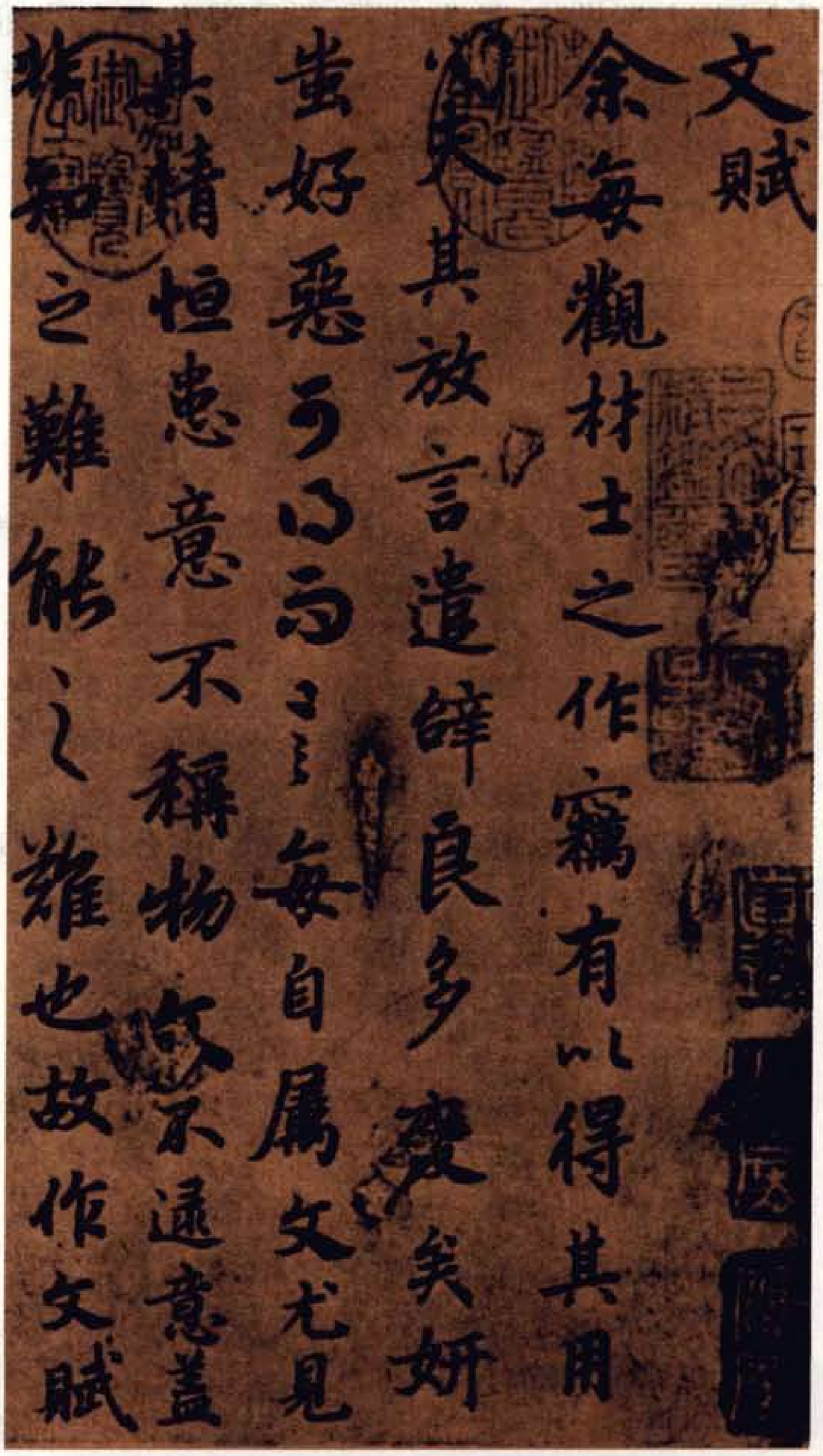
虞氏后辈能绍继家业者惟其甥陆柬之。武后朝李嗣真作《书品后》，虞世南、欧阳询、房玄龄、褚遂良、陆柬之、王知敬、高正臣并列，以为近代莘野之器，箕山之英。玄宗朝张怀瓘作《评书药石论》视虞、欧、褚、陆



1－2.8 虞世南 《汝南公主墓志铭》(局部)

同侪，并为唐初善书者，有称：“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其《书断》以虞、欧、褚、陆四人行、楷并入妙品。至代宗朝，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则虞、陆并称，有“草稿之作……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之谓。

陆柬之，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世为著姓，高宗朝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上），崇文侍书学士，也便是皇太子弘的东宫书法教师。他的书法出自舅氏，后仿二王，尚其古雅。《书品后》称：“柬之学虞草体，用笔则青出于蓝，故非（萧）子云之徒；正隶（楷）工夫恨少，不至高绝也。”《书断》称其“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已



1－2.9　陆柬之　《陆机文赋》(局部)

后，乃备筋骨。殊矜质朴，耻夫绮靡……尤善运笔，或至兴会，则穷理极趣矣”。总章(668—670)之后，盖改习二王，掺入魏晋行法，故异于早年临写虞监者也。宋季内府藏有行、草书迹六帖，盖出晚年之书，鉴评者以为其“擅出蓝之誉，遂将咄逼羲、献。落笔浑成，耻为飘扬绮靡之习，如马不齐髦，人不栉沐，虽为时鄙，要是通人之达观。但览之者未必便能识其佳处，论者以谓‘如偃盖之松，节节加劲’，亦知言哉”[54]。存世《陆机文赋》(图 1－2.9)墨迹一通，相传为其手迹。

---

① 《隋书》卷一《高祖上》开皇三年三月丁巳条。

②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

③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

④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引。

⑤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翰墨”条下记：“僧法极，字智永，会稽人，王右军七代孙，号永禅师。”(元)陆友《研北杂志》卷上引之，多出数句，有谓：“僧智永名法极，王右军七代孙，百岁乃终。”其或本自(唐)何延之《兰亭记》“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句而稍加修正者。若是，智永名法极，智永乃其字，或以字为法号而行于世。上引“百岁乃终”，或“近百岁乃终”者，已无确考，然其大抵生于梁武帝时代当属无疑。

⑥ 见张宗祥抄本陶宗仪《说郛》卷九十二。《法书要录》本不见是记。

⑦ 《陈书》卷九《欧阳纥传》。

⑧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九》。

⑨ 《白居易》卷四十八《郑覃可给事中制》。

⑩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欧阳询《艺文类聚序》。

⑪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⑫ 《唐六典》卷二十七。

⑬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

⑭ 《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三引《谭宾录》。

⑮ 卞孝萱《补江总白猿传新探》有称：“从唐初书坛形势以及褚遂良的野心来分析，以谤伤欧阳询为目的之《补江总白猿传》，当是贞观十二年，虞世南已死，褚遂良‘侍书’之时，为巩固其地位，授意手下的轻薄文人所作。”其附会穿凿，盖出奇思，甚可一噱。

⑯⑱㉒㊹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欧阳询传》。

⑰　(唐)徐浩《古迹记》。

⑲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引。

⑳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㉑　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卷二:“率更贞观六年七月十二日书付善奴,授诀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长短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决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按此碑书于贞观六年四月以后,适在书授诀之前三月耳。诀中所云,无不与碑字吻合,此正率更自道书《醴泉铭》之甘苦语,非泛泛论笔诀也。”

㉓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有记:“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㉔㉕㉜㊷　《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

㉖　《新唐书》卷一百二《虞世南传》。

㉗㊵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

㉘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总论》。

㉙　《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

㉚　《全唐文》卷一百七褚亮《十八学士赞》。

㉛　《旧唐书》卷七十二《史臣传赞》。

㉝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引唐太宗语。

㉞　《旧唐书》卷七十三《邓世隆传》。

㉟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引李百药《封建论》。

㊱㊴　(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五《评汇一》引徐献忠语。

㊲㊻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

㊳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引《国朝杂事》,同。旧传改称五绝,次序为:“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资治通鉴》,从之。

㊶　(唐)李世民《命魏王泰祭尚书虞世南手敕》。

㊸　(南朝梁)陶弘景《论书启》。

㊺　(宋)董逌《广川书跋》卷七《虞世南别帖》引虞世南语。

㊼　(明)都穆《金薤琳琅》卷十八:“谓以此文石本进呈太宗,特赐王羲之黄银印一颗,则世南之书贵重于当时固已如此。”

㊽ (唐)窦臮《述书赋·下》。

㊾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之唐太宗《传赞》。

㊿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引。

(51) (清)杨宾《大瓢偶笔》。

(52)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六。

(53)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引。

(54) 《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章

唐太宗与书法复兴

第一节

唐太宗及其书法

唐代书法的发展与李唐王朝历代帝王尤其唐太宗的重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尽管其间亦有出于怡神文艺，收揽文士的政治需要。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图 2－1.1），甚重艺文，尤敬名贤，秦邸初建，即开文学馆收揽彦哲，有名儒十八人为其学士。既即帝位，即于殿左置设弘文馆，引纳学士以本官兼任之，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①。其间侍臣，大都善书，诗笔草隶并为时贤，诸如虞世南、欧阳询、褚亮、萧德言、薛纯陀、杨师道等人，且相与论书，不拘主体。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无名氏《唐朝叙书录》记有故事二则：

> （贞观）十四年（640）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

2-1.1 唐太宗像

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以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贞观年间，天下无事，太宗万机之暇，更是留心翰墨。《唐朝叙书录》又记：

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韦述《叙书录》称当时搜访右军等真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唐太宗鸠集王字，天下几尽，至有赚取《兰亭》，陪葬昭陵之传说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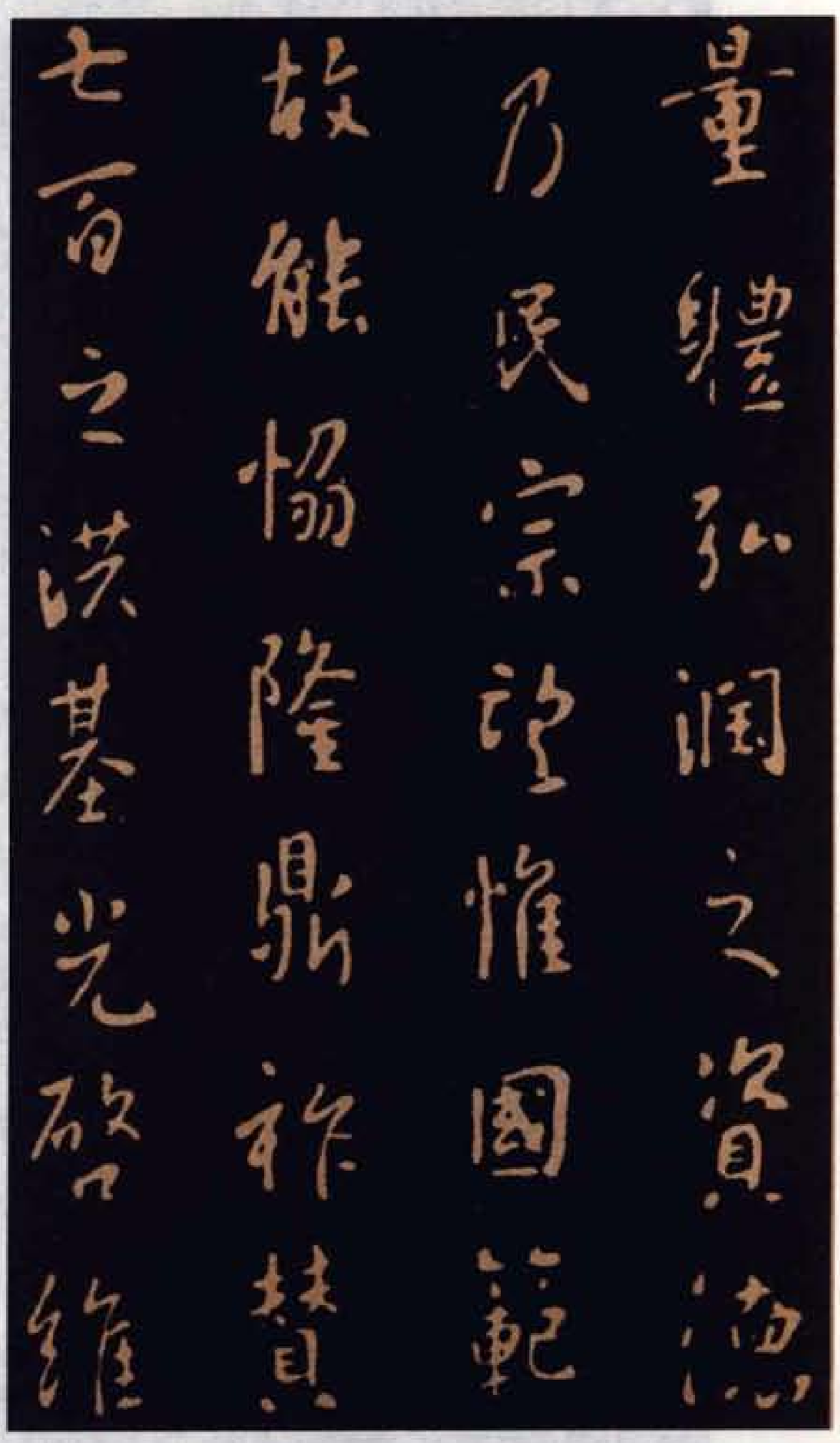
太宗工行、草，不独《唐朝叙书论》有誉"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当时名臣也甚加称颂，喻之为锺繇、张芝，不仅刘洎《论太子初立请尊贤讲学表》有云"摛玉华于仙札，则流霞成彩……锺、张何阶于入室"，房玄龄《谏伐高丽表》更是溢美，直谓"笔迈锺、张……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太宗自己亦以为学书"有成"，曾称："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③并矜其善飞白，常书之赐近臣，"庶动清风，以增美德"④，加以激赏。史所记当年刘洎争夺御书飞白的所谓"常侍登床"之事

外，尚有飞白答刘洎文，即贞观十六年(642)诏 12 句 55 字[5]。

书论家评述唐太宗的书法，始于武后朝的李嗣真，他在《书后品》序中称："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世南)，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是其妙处"，乃道出唐太宗书法之所出。按史陵，隋或唐初人，《书断》称其书法"古直，伤于疏瘦"，可知其书并非属于疏放妍妙之类。陈思《书小史》称其"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其书既可与欧、虞相论，则当归属于陈隋书风。

开元年间，张怀瓘推崇尤高，其《书断》有称"翰墨之妙，资以神助，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随后，乾元初窦臮的《述书赋》也相继赞述："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蹑闾井，未登阶陛，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总法体。"一以草芥遗民而称帝王，一以翰林书人而论圣主，莫非夸饰其辞，肆加颂谀，遂始可成文，其评难以公允者，也是情理中事。

至北宋《宣和书谱》出，后之论昔，乃见中肯，其卷一《太宗传》有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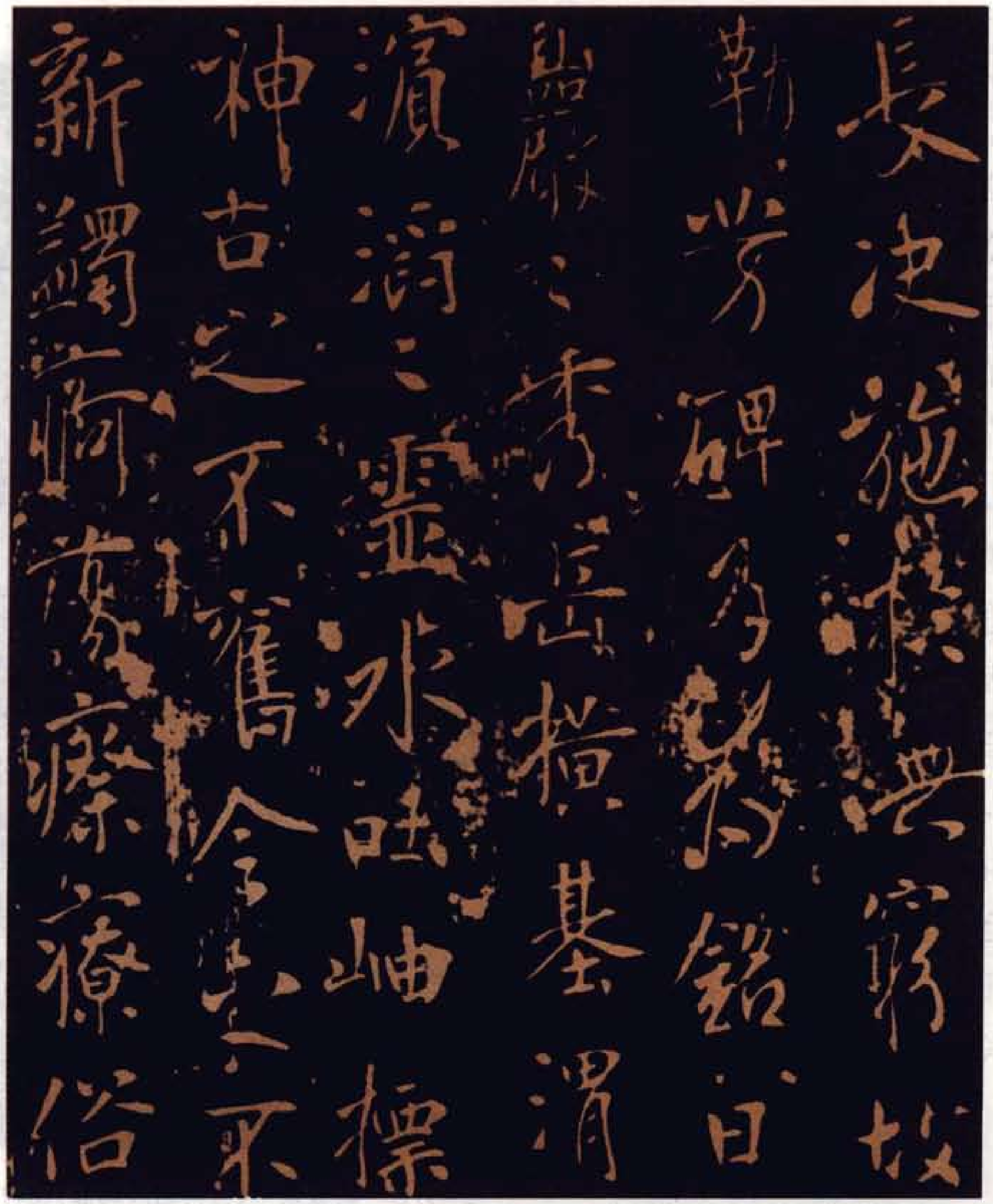


2－1.2　唐太宗　《晋祠铭》(局部)(647)

先是释智永善羲之书，而虞世南师之，颇得

其体。太宗乃以书师世南。然尝患“戈”脚不工，偶作“戩”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今窥圣作，惟戩字戈法逼真。”太宗叹其高于藻识，然自是益加工焉。

米芾《书史》所云“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者，盖出同调，或另有凭信。其学右军不能至者，非其功用才智不侔，实乃时代相异，神情悬殊。其实，太宗行书，乃出自史陵，而后参学虞世南，追仿王羲



2－1.3　唐太宗　《温泉铭》(局部)(648)

之，终于笔力遒劲，遂为一时之绝。存世书法，陈思《宝刻丛编》记有石刻五种，《宣和书谱》收有书迹十四件。然传世可见者，惟《晋祠铭》《温泉铭》《屏风帖》三通。

《晋祠铭》（图 2－1.2），行书。撰书于贞观二十一年（647）七月，著录首见赵明诚《金石录目》第五九八。用笔遒劲，气势阔绰，诚如《石墨镌华》卷二所评："全法《圣教序》《兰亭》而纵横自如。"

《温泉铭》（图 2－1.3），行书。书撰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十七日。原碑早毁，拓本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见于敦煌鸣沙山千佛洞，旋为法国人伯希和所有，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是本，有永徽四年（653）八月三十日墨书题记，盖唐初拓本，惟残存末段，凡五十行。书法酷似《晋祠》，而趋圆熟，可谓极浏漓顿挫之妙。据《宝刻类编》卷一记碑尚有隶额"贞观"二字。

《屏风帖》草书，书于贞观十四年（640）四月二十二日。南宋淳熙九年（1182），祝宽夫借观于从兄季平处，有言谓绍兴初得之于北人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素绢。冯尧章曾分别于淳熙十四年（1187）、庆元元年（1195）获观题识，称其"高古"，"不乏丰致"。嘉泰四年（1204），王允初摹勒于余杭县。著录首见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此帖笔法遒纵，风韵轻俊，惜其天骨小乏，戈法犹滞，或疑为伪。

第二节

唐太宗王羲之论

《晋书》有唐太宗的四篇史论，其中《王羲之传赞》，为中国书学发展史上较早且系统的一篇书法论述。其云：

书契之兴，肇于乎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馀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锺、王以降，略可言焉。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枒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馀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按《晋书》的编写，是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的，在此之前，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⑥，曾诏许令狐德棻关于修前朝史的请示，并委派了史官分头负责编写魏（萧瑀、王敬业、殷闻礼）、周（令狐德棻、庾俭）、隋（封德彝、颜师古）、梁（崔善为、孔绍安、萧

德言）、齐（裴矩、祖孝孙、魏徵）、陈（窦琎、欧阳询、姚思廉）等诸朝正史。然而晋史的修撰却不同于前述各朝正史，它是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合并诸家传记而附益之。又“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馀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⑦，“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记”⑧。掌其改撰责任者是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同时是书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修成，历时不到三年，唐太宗竟连撰四篇史论，而对于其他所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之史不见一辞。这种现象，史家认为是出于唐太宗对西晋王朝的重视。

唐初文人，大都经历陈、隋两代，他们出身不同，地望各异，经历也各不相同，但在政治上立足于反隋，且又各抱宏志，冀在事业上有一番建树却是一致的。唐太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深知“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⑨。故敬崇名贤，广揽文士；且听朝之闲，则与之讨论典籍，杂以歌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甚称当时盛况，有谓：“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亮）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变风变雅，主体不拘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于百氏。”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卓越的诗人和书法家，对文学艺术有着十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艺术“释实求华，从人以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因而必须“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放”⑩。这种反对浮华侈丽文风的理论观点，是当时要求斟酌古今、融合南北文风的社会呼声的代表。早在隋代，李谔已经对文体轻薄的风气深为不满，他在《上隋文帝书》中说：“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至唐，魏徵

更是以“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11]的梁、陈绮丽文风为反动。他在《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中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李延寿在《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序中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唐太宗的《王羲之传赞》，可以说正是在当时文学批评影响下所产生且有总结历史、指导唐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卓有见地的理论文献。更何况自六朝以来至唐初，书法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往往互为表里，是很难区分的。

《传赞》批评锺繇“古而不今”“长而逾制”的书体以及王献之“疏瘦”“拘束”的字势和萧子雲无“筋”无“骨”“无丈夫之气”的风韵，而极力赞赏王羲之“烟霏露结”（笔）、“凤翥龙蟠”（势）的书法，既与当时的文学观点相一致，也和他平日有关书法的言论相贯通。

《唐朝叙书录》引述唐太宗论书语一则，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骨的本义是骨骼，文学批评引申为作品的理路和笔力，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二八《风骨》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这里引为笔致，即遒劲的笔力和雅正的气质。当时托名为卫铄的《笔阵图》称“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即胎息于此。唐太宗号称临学逸少书法，“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观此，则可知其为求骨力，而非取其形势。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多重气质；江左笔札，疏放妍妙，独贵清绮。隋时南北流风渐趋融合，然而萌而未融，尚多中原馀意；方严刚贞，未兼南北之长。入唐，梁陈书风乘反隋心理，席卷书坛，唐高祖李渊便是典型。他的书法，“师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风

格焉”⑫。梁朝风格便是建筑在王献之(包括萧子雲)书法艺术基础上形成的。梁代陶弘景在《论书启》中说:“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锺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唐太宗排抑献之,喻之为“隆冬之枯树”“严家之饿隶”,固然属于崇尚古雅,以逸少为轨范,亦因梁、陈遗风俱肆巧媚,都乏典重。同样,唐太宗崇扬王羲之,评之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固然出于个人之好尚,近臣之倚重,亦因其声望、地位以及艺术造诣足可以号召社会书势。当时的社会书势是隋代书势的延续,其发展的趋势是与唐太宗的理论主张相一致的,故唐太宗缘情设教,以达到纠偏改良、折衷南北、倡导雅正书风的目的。以此可以略见唐太宗的书法理论,原则上主张继承王字传统,实际上是以陈隋书风为基础,发扬中原古法,引导书法艺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唐太宗说:“声音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并对魏徵“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观点表示赞同⑬。此虽以音乐而言,也可领略唐太宗对书法艺术的态度。或以《传赞》文辞浮华,多失睿鉴,评述玄虚,俱系意会,如锺繇“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王羲之“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其实,斯为近臣之代撰,并非出自太宗亲笔。唐太宗其笃尚王字,独尊右军,鸠集天下遗迹,以至赚取《兰亭》,陪葬昭陵者,“乐在人和”,意尤在政治。

众所周知,东晋自从永嘉南渡之后,统治集团中的“渡江名士”即所谓渡江百家,并无恢复中原之心,或消极偏安,大置庄园,颐养闲暇;或标榜门第,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他们大都信奉“五斗米道”教,服药石,崇扬老庄,剖析名理。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庄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距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之后,此风弥甚,有违者,惟一二枭雄而已”。王羲之厕身其间,严重地沾染上时俗习气。他虽然致书谢安、谢万

谏劝他们勤于王事，“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希望能俯察下情，以与吏士共艰苦。又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邻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14]。但这种高尚的经济之志，并没有切实地付之实践，当然也不可能付之实践。在崇尚清谈、故为疏放的时代潮流中，他亦随之沉浮，始终表现了“随事行藏”的隐沦行径，处处表现了消极脱俗的思想情绪。“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15]旷达疏放，几乎超越老庄。这种人生观，是清谈时俗浸透无余的东晋士大夫缩影。而唐代不是崇尚清谈的时代，尤其是史称“贞观之治”的时候，其士大夫大都勇于任事，富有积极用世的“有为”精神。同时，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艺复兴，其威震于遐迩而四海无虞的景象，绝非东晋王朝所可企及。因而，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书法绘画艺术，都具有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身处如此发展的初唐社会的书家，尤其是具有显宦达官身份者，其思想、气质、情操和胸襟，自与右军迥异。

唐太宗的《王羲之传赞》，不仅迎合久经动乱、初具安定并渐趋繁荣的社会心理，还出于文治的需要，积极地利用王羲之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倡导王字，代表了初唐书势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要求，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学习王字成为一种时尚，蔚为风气。上至朝廷，下及经生，莫不趋之若鹜，群起而模拟临仿之。但真正体察唐太宗睿旨的，不是赵模、冯承素、释怀仁之流，而是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社会书势。他们在继承王羲之书法的旗帜下，积极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要求和艺术标准，既直传六朝碑版之意气，又吸取江左简牍之风貌，“变古制今”，“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不断地充实，改造王羲之书体，终于形成外晋内唐或名晋实唐的一代书风。

第三节

唐代书法教育与科举

唐代书法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一切都依藉人工抄写，唐王朝又大力提倡儒学，兼及佛道，著述典藏蔚然成风，“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⑯。另一方面也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及其重视书法教育有着一定的关系。

当时东西两京的国子监，各设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其中书学是培养书法人材的专门学校，始于贞观二年（628），龙朔二年（662）随国子监分设东都洛阳。内设书学博士（从九品下）二人主持教学，助教一人辅助，典学二人执行学规，不时招收十四至十九岁八品以下文武官员及庶人之子入校学习。学生，西京十人，东都三人，开元年间最多为三十人。馆内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礼。礼于师，纳绢一匹，并酒酺。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归助教。教学的内容，“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⑰。学业完成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合格者经祭酒审定，参加省试。登科后经吏部铨选，即以九品下阶铨叙官职。按《石经》即魏正始年间由诸儒刊定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上石的《五经》，从书学所规定的“《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以及书科所考仅止许慎《说文》、吕忱《字林》二项来看，所习《石经》主要在于古文、篆、隶三种书体，盖为技巧性即书法临写研习的常课，也可以说基本功。而有关《说文》、《字林》等文字学，则是他们学习的文化课程。鉴于这些学习内容和书学曾隶属于兰台的史实，当时培养书法专门人材或许即是为了秘籍缮写

的需要。

书学之外，其他诸学即使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的国子、太学、四门这样的学生，也规定“学书，日纸一幅”[18]和兼习《说文》《字林》《三苍》一类的字书。至于弘文、崇文两馆的学生，虽然都是“以资荫补充”的贵胄子弟，考试可以不拘常例，但“楷书字体，皆得正详”[19]，有着明文规定，是十分严格的。同时，弘文馆还不时专门招收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有性爱书和有书性的子弟入馆学书，内府所珍藏的历代真迹包括锺繇、王羲之的法书则作为观赏临仿的范本。史记贞观元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20]。地方上的府学、州学以及县学、村学，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从贡举的科目设置以及“若有乡闾无景行及书判全弱，选教纵深，亦不在送限”[21]的举选规定来分析，书法也与中央一级的学校一样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

唐代不仅对士人要求研习书法，即使深处内宫的宫人也设置内教博士教习书法，有楷书二人、篆书一人、飞白书一人负责之[22]。

至于唐代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书法都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先决条件。

贡举即分科取士，常设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诸科。明书，简称书科，又名明字，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文字学和杂体书法。大凡参加考试不论出自京都两监的生徒，抑或由州府举选的乡贡，一般先口试，然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23]。懂得训诂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

铨选即是吏部考核六品以下文官的一种制度，原则上有四条标准即所谓“四才”：“一曰身（取身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24]一年一选。先试书判，即书法和判案的文词，然后铨，也就是察看身、言。若书判、身言都合格，便根据选人的意愿和条件注拟所授官职，最后唱名当众宣布。这种试铨拟唱的程序，往往由于当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吏部不能一一铨察其身、言，便出现仅凭书、判的现象。虽然天宝九载（750）颁有“取人不得限以

书判”[29]的明令，但徒行文书而已。书、判，其实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即字体是否正详、笔迹是否流美，直接影响到判案即如何处理狱讼的文辞质量，因此书法又是试判的关键。

另外，唐代随时设有制举之科，如书判拔萃、善六书文字、辨其声相以及手笔俊拔、超越流辈诸科，即便是为了拔擢善书官吏的一种临时措施。至于流外官，即使一般的令史、书令史也以书法为首务。《唐六典》卷二记载：

> 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

参阅《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都事”条下注：“《汉官仪》云：‘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由来无拜，吏部郎选试同第，及工书者奏补。”其“令史、书令”条下又注：“尚书都省令史、书令史，并分抄行署文书。”作为分抄文书的令史、书令史是必须通晓文字和掌握一定书写技能的，既谨又速，要求也十分严格。其抄写文书，执送施行并有限程，以尚书都省为例，《唐六典》卷一记：“凡尚书省施行制敕，案成，则给程以抄之。（下注：通计符、移、关、牒二百纸已下限二日。达此以往，每二百纸已上，加二日。所加多者，不得过五日。）若军务急速者，不出其日。”《唐律疏义》也记：“其赦书，计纸虽多，不得过三日。军务急速，皆当日并了。”若违反程限，则要处罚。稽缓一般州县文书，“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若是赦书，处分则重，‘诸稽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至于一时抄错或有所改易，处理更有明文规定：“写制书误者，事若未失，笞五十；已失，杖七十”；“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诸制书有误，不即奏闻，辄改定者，杖八十；官文书误，不请官司而改定者，笞四十。知误，不奏请而行者，亦如之。辄饰文者，各加二等”。同时，根据唐代判文，如裴腾《对字诂判》：“甲也游学，效于文字。工彼汗简，尝观太史之书；临诸墨

池，能妙右军之笔。”吕因《对字诂判》“甲手挥五色，已临科斗之书；躬写六经，方填麒麟之阁”及郭立《对学书判》“弱龄有志，操觚游艺，负笈从师，服膺孔甲之书，留心田沛之业，精务小学，声洽大成”云云，对于工书者的要求也同样包含着书写技巧和文字知识两项，而且非熟练不可。斯亦可明当时社会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令史、书令史，以年劳升至流内的，见诸史乘的有张先其人，郑樵《唐故括州遂昌县令张府君墓志铭》：

> 公讳先，字普贤，范阳人也……公聪明正直，博闻好古，学无常师，道一以贯，而尤精墨妙，早鸣誉于天下，弱岁秉笔，缮录王言，周旋翰林，有年数矣。国之爵赏，胥及逸勤，竟以校功，一命补彭州导江尉……天子复申，命公直中书省，仍授左司御率府仓曹。

张先之“直中书省”者，即唐代直官中的“能书”一职，以善书的前资官充任，负责特殊的书写任务。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定制门下省二人，中书省四人，集贤院六人。“能书”直官，以武后朝的锺绍京为最著名，《旧唐书》卷九十七本传记：

> 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

明堂、九鼎之题，盖出天子特许，其书声名之重，亦可想见。锺绍京之书已只字无存，米芾曾见其《千文》，《书史》所评“笔势圆劲”者，或可凭信。

还有一位张文哲，唐德宗贞元年间以前恒王府参军充集贤院书直，近世出土所书墓志三石：贞元三年（787）正书刘震《司马齐卿暨妻王氏志》，行书并篆盖尹雲《张偭暨妻贾氏志》，十三年（797）正书《崔氏（无生忍）志》，并见清逸，尤其行书，不染翰苑陋习，为善学《圣教序》者。

第四节

关于《兰亭序》

《兰亭序》(图 2-4.1)，简称《兰亭》，又名《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禊序》《禊帖》，是王羲之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与孙绰、谢安、郗昙、支遁等四十一位名士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祓禊之礼时为诗集所写的一篇序。在唐初声誉甚高，孙过庭《书谱序》称“《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它的流传始末，始见于唐开元十年(722)四月二十七日均州刺史何延之命其子皇太后挽郎永进呈的写本，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收录，目曰：何延之《兰亭记》。其云：

2-4.1　《兰亭序》(局部)(唐摹本)

> 《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邪王羲之字逸少所书

之诗序也……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并付弟子辩才……辩才尝于所寝方丈梁上，凿其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惟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赍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辩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殁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辩才之处。又敕追辩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遍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为得一智略之士，以设谋计取之。"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诏见翼，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于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辩才院，止于门前。辩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擅越？"翼乃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若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茶果等……酣乐之后，请宾赋诗……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辩才云："擅越间即更来此。"翼乃载酒赴之，其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遂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门皆传二王楷书法，弟子又幼来耽玩，今亦有数帖自随。"辩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辩才。辩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辩才曰："《兰亭》。"翼佯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向拓伪作耳。"辩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

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颡曰："果是向拓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梁槛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辩才时年八十馀，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后辩才出赴灵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惣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有墨敕，可报汝都督齐善行……"于是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辩才。辩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得矣。故唤师来取别。"辩才闻语，身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而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辩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惟啜粥，岁馀乃卒。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及弓剑不遗，同轨毕至，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

是记，宋初李昉、徐铉等编《太平广记》引入卷二百八，改曰：购《兰亭序》。《兰亭记》文体近似传奇，历来多加怀疑，如宋人王铚便以为"此事鄙妄，仅同儿戏！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尪残老僧，敢靳一纸耶？诚欲得之，必不狭陋若此！况在秦邸，岂能诡遣台臣，亦猥信之，何耶？"晁补之《跋兰亭记》也说："《太平广记》载唐太宗遣萧翼购《兰亭叙》事，盖谲以出之，辄叹息曰：'《兰亭叙》若是贵耶，至使万乘之主损信于匹夫……

其老而将传，至从其子求书从葬，亦累矣。’”[26]然何延之其记既为呈本，对于辩才弟子玄素的“亲向吾说”，自当是深信不疑的。

关于《兰亭》故事，与何延之同时或稍后的刘餗，有《隋唐嘉话》加以叙述，其卷下有记：

>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文宣王。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此文与何记相参，异处甚多，然《兰亭》得之于越州辩才，曾拓之以赐近臣，以及陪葬昭陵事则并存认同。存世的诸种摹写《兰亭》和开元年间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及太宗晏驾，本入玄宫”的记载，也可以说明这或许是不争的事实。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温韬传》曾记唐末温韬盗昭陵事，谓“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锺、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温韬掘墓得锺、王墨迹事，还见于阙名的《江南馀载》，其卷下记：“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锺、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郑元素曾从温韬乱，盖五代时人，《江南馀载》当出宋初人之手。欧阳修之记，或本是书。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亦载有温韬盗发昭陵，《兰亭》复流落人间事。

唐时《兰亭》之临摹者甚多，相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

赵模、汤普彻、诸葛贞（思桢）、薛稷等能书近臣和内廷拓书手各有摹本。后世所存各摹、刻本，著名者有“定武本”“张金界奴本”“神龙本”诸种。

定武本，相传出自欧阳询所临，后存定州定武军库中，初拓本遂以定武为名。著录首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黄庭坚甚为称重，《山谷题跋》卷四云：“书家晚得定武石本，盖仿佛存古人笔间耳。”卷七又曰，“定武本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犹可想其风流”。故宫博物院藏有赵孟頫、俞和临定武《兰亭序》墨迹本。

张金界奴本，乃墨迹本，因其末元人题有“臣张金界奴上”字样，故名。或以为出自虞世南所临。为乾隆内府“兰亭八柱”第一本。

神龙本，亦墨迹本，以其前后骑缝处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半印，又称“神龙半印本”，或以为出自冯承素所摹。为“兰亭八柱”第三本。

张金界奴本、神龙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唐人临本，为“兰亭八柱”第二本。后有米芾题诗一首，其诗见于《宝晋英光集》，目“题永徽中所抚《兰亭序》”，永徽去贞观不远，得真为最，相传以为出自褚遂良所摹。

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有唐人所抄《兰亭序》（伯 2544），系敦煌石室旧藏，或出自生徒之手。

宋代《兰亭序》研究专著，以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初为《兰亭博议》十五卷）和俞松《兰亭续考》二卷为代表。

第五节

一代教化主褚遂良

1. 生平事迹

褚遂良(596—658,图 2-5.1),字登善,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生于长安。其先祖世居阳翟(今河南禹县),自十二世祖晋安东将军扬州都督褚裒随晋元帝渡江,始迁居丹阳(今安徽当涂),其后一支移居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遂为东南著姓,所以史称杭州钱塘人。但唐代文士大都沿袭六朝旧习,每以郡望称之,曰"阳翟褚氏"。当时,其父褚亮,任东宫学士,为晋王杨广府属。按褚亮(560—647),字希明,陈秘书监玠之子,史称:"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喜游名贤,尤善谈论。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商榷文章,深异之。陈后主闻而召见,使赋诗,江总及诸辞人在坐,莫不推善。"[27]

2-5.1 褚遂良像

弱冠入仕,初任职太子舂坊,后至尚书殿中侍郎。陈亡,入隋与虞世南并以文学受知于晋王杨广,召为东宫学士。隋大业七年(611)见任太常博士,与欧阳询共掌隋王朝礼仪制度,并奉诏参修《魏书》。其后官至黄门侍郎。九年(613)八月,因礼部尚书杨玄感谋逆事受到牵连,左迁西海郡司户。是时,褚遂良十八岁,亦即偕父远

徙陇右。十三年(617)金城府校尉薛举据州起事,号西秦霸王。旋称帝,建元秦兴,即拜褚亮为黄门侍郎,委以机务大任;遂良随父入伍,任通事舍人,受理外交事务。翌年,薛举病死,其子仁果于十一月败降于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久闻褚亮贤名,求访而获,"深加礼接",亮亦从容自陈,不以降臣屈节自辱。秦王乃大悦,即赐物二百段,马四匹,令从还京师,授以六品王府文学。褚遂良也一并被收纳,留京为秦王府近臣,任职铠曹参军,执掌王府器械及公廨营缮之事。未几,秦王府设置文学馆,褚亮即偕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诸名士并以本官充任学士,"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无常礼之间"[28],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人。史称"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从,军中宴筵,必预欢赏,从容讽议,多所裨益"[29]。至贞观九年(635)封爵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成为备顾问应对的开国资深元老。十六年(642)进爵三品县侯,尔后致仕,至二十一年(647)十月老死于长安平康坊私第,享年八十八岁。赠太常卿,谥曰康,以贞观功臣陪葬昭陵。

褚遂良是褚亮第二子,自武德初年随父入唐之后,在其父政治关系的影响下,始终得到唐太宗以及父友魏徵、虞世南、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顾眷,尤其贞观初年以贵胄子弟出任秘书省秘书郎之后,不独在魏徵(贞观二年为秘书监)、虞世南(贞观四年任秘书少监,七年任秘书监)掌领下,执掌省内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四部经籍图书,分判贮藏由楷书手缮写的天下之书,还担任弘文馆"馆主"[30],检校馆务,安排并陪同弘文馆学士轮番进内殿与唐太宗讲论经史,商略政事。又在魏徵监修下,随同虞世南、萧德言诸名儒一起采集经史百家中的嘉言善语,以及明王暗君的事迹,编为五十卷,号《群书理(治)要》,为唐太宗能明鉴前代帝王得失事提供玄规。其后,由于"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31],遂由六品秘书郎历起居郎、谏议大夫、太子宾客、黄门侍郎、检校大理卿,数年之间,最后位至佐天子而执大政

的中书令和辅佐太子即位的顾命大臣。

史载褚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32]，大都是太宗朝的事，其中以反对夺嫡换宗尤为典型。按唐太宗共有十四子，其中长子太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并是长孙皇后所生。承乾自武德九年(626)十月立为太子，后因其渐好声色，又亵狎群小，且患足疾，行走不便，至贞观十年(636)唐太宗乃移爱于李泰，并生易嗣之意。李泰亦引召学士，接纳朝臣，潜怀夺嫡之计。褚遂良从维护封建礼仪制度出发，反对唐太宗移宠于李泰。先是平抑诸王，于贞观十三年(639)针对每月给魏王府的料物超过皇太子的现象，提出异议：

> 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止。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礼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33]。

后又在十六年(642)催促唐太宗把制定太子、诸王的名分作为最急迫的事来处理，以便成为今后各代帝王可以效仿的一种制度，进而积极地主张嫡尊庶卑的传统礼仪和自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以维护李承乾的太子地位。然而太子却因图谋魏王，事泄而败，于十七年(643)四月被废为庶人。

唐太宗易嗣伊始，曾明示：“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34]睿意如是，给事中崔仁师便立即承旨密奏请立魏王为太子。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亦劝之。其他大臣即使秦府旧属如司空房玄龄、司徒长孙无忌等人也大都坐观时势，缄口不言。惟有褚遂良对唐太宗面许魏王泰为太子不以为然，他说：

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35]

正由于褚遂良一语破的，道出太宗“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36]这种久贮胸中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遂逼使唐太宗在严峻事实面前改变初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祎、褚遂良等重臣商议，共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终于避免了一场因夺嗣而引起的政治祸乱。

然而，在李治即高宗受禅嗣位后不久，褚遂良却因谏阻改立武则天为后而遭到无情的贬斥，最后甚至病死于岭南外郡荒蛮之地。

永徽初年，褚遂良曾经踌躇满志，承受唐太宗的临终顾托，积极协助秦王府重臣长孙无忌等人共同辅佐新主，执行贞观制度，诚如他所说的“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37]，甚得高宗倚重，曾封爵河南县开国公，旋晋郡公。其后，虽因抑卖中书省译语人的地产而遭到监察御史韦仁约的弹劾，曾一度出贬同州，但不久即召回，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宰相之职，并兼任太子宾客。永徽四年(653)晋位右仆射，成为佐助天子、总管百官、治理万事的首席宰相。是年，适值高宗移宠于武则天，自才人册立为昭仪。至六年(655)，因王皇后无子，遂生废立之心。对此，贞观元老莫不以为有悖礼教，褚遂良、长孙无忌也曾与长安令裴行俭私下议论，认为“国家之祸必自此始”[38]。所以一旦高宗召集朝廷权臣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祎、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等人，正式商议废立之事时，褚遂良便决定廷争面折，以死相谏。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于是一进内殿，明白上意

之后，即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剴切陈情："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翌日，又慨然上奏，明以利害，认为："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说着便把朝笏放置殿阶之上，脱冠解巾，伏阶叩头，朗声宣言："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竟不惜以失礼逆旨相抗争，直至头血迸溅，意犹未止。高宗顿时龙颜大怒，命人执送出廷。武氏也在帘内大骂："何不扑杀此獠！"[39]此事，高宗虽经元舅长孙无忌的谏劝，罪不加顾命大臣，暂时未加惩处，但由于司空李祎的阿意，以"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的一句乖巧话，一锤定音，遂不顾权相重臣的谏议，决意废皇后王氏而改立昭仪为后。改立皇后不久，褚遂良即遭左迁，初任潭州都督，后改为桂州都督。不数月，又以"潜谋不轨"之罪贬为爱州刺史。旋卒于任上，年六十三，时显庆三年(658)。

从李治即皇帝位到褚遂良出贬潭州，虽然不到六年，即使后来蒙诬遭罪，追削官爵，子孙流配，两子彦甫、彦冲被杀，上距也仅十年时间，但永徽之治以及废立皇后事却造就了褚遂良千古英名。史称："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采，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40]从而更博得后人，尤其是有正统史学观的文人由衷的仰慕。

2. 书法艺术及其影响(附薛曜、薛稷)

褚遂良的书法，《书断》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虞监者，即褚遂良父友虞世南，隋时曾与褚亮并官东宫学士，惟其书名未隆，褚遂良年尚幼稚。以褚遂良贞观年间所书《伊阙佛龛碑》(图 2－5.2)、《孟法师碑》(图 2－5.3)，其古雅峻严处迥异于虞书；从其平画宽结的特点相推测，褚遂良志学之年，留心翰墨者，盖为齐、周馀烈。当时，天下

一统，南北书家云集京都，周旋交流，互为影响，铭石之书，多袭齐、周遗绪，尤其楷书，无论平画宽结抑或斜画紧结，几乎全从北朝而出；而稿行之体，又意在轻捷，南朝士人莫不善加保守，然而至大业年间则已趋平和，敛入规矩，融为杨隋之品，其间尤以欧阳询最具代表性。其博涉多体，综合运用，既融大令之展蹙，又参刘珉之瘦挺，最后悟入索靖之峻险，遂传六朝精华，启三唐奇峻，名高一代，且时为太常卿，与褚亮并官太常，共居于太常寺院内。按褚亮大业七年(611)任太常卿，时褚遂良十六岁，正值志学之年，参其早期楷书多具隶笔，与欧阳询同调，并出自章草法，或当受欧阳询的影响。李嗣真《书品后》曾记褚遂良与唐太宗、汉王李元昌“皆受之于史陵”。史陵之书，虽无可见，然以唐、宋人所评，当类似欧、虞隋日之风格。褚遂良书法疏瘦劲练处，或即出自史氏。李嗣真所记褚遂良先师虞监，后学史陵，因唐太宗同学之，乃嘱史氏“此法更不可教人”云，意以为盖有所本，然其先后之说，或乃李氏囿于声名地位而有所倒置者也。

2-5.2　褚遂良　《伊阙佛龛碑》(局部)(641)

虞世南，长褚遂良三十九岁，两人行谊始于武德四年(621)四月入唐留任秦王府参军之后，是时褚遂良为王府铠曹参军。褚遂良入唐，《旧唐书》本传记初任“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唐制州府无铠曹之职，其乃东宫属官。武德初年惟秦王、齐王两府制同东宫。褚遂良既在铠曹，则必

2-5.3 褚遂良 《孟法师碑》(局部)(642)

为秦王府属。《旧唐书》盖误。若《旧唐书》所记不误，秦州或置“铠曹”，虞、褚行谊，更当推迟到贞观初年并官秘书省之时。褚遂良之“师虞”，盖始于任职秘书省之时。

众所周知，秘书省自从武德五年（622）令狐德棻因内府“丧乱之馀，经籍亡逸”，“奏请购摹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手），令缮写”[41]之后，曾经“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42]。至贞观初年褚遂良出任秘书郎时，已具规模，弘文殿所聚四库群书有二十多万卷。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徵又“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书图籍，粲然毕备”[43]。同时又命薛收、褚亮、虞世南等“鉴识艺人”整理御府所藏古今工书及锺、王等人真迹（据《唐朝叙书录》所记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登记在册的已有 1510 卷之多）。史记贞观元年（627）太宗曾诏集京官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的子弟：“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

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44]以及次年国子监恢复书学，设置书学博士收徒讲学，传授《石经》《说文》《字林》等专业。参考弘文馆学生“楷书字体，皆得正详”的要求和当时别置校书郎二十人、楷书手百人入秘书省缮写校对四库群书的情况分析，无论敕命欧、虞“教示楷法”，抑或置设书学专科，其目的或许是为了培养缮写秘书的书法专业人材。虞世南既“教示楷法”，又辅助和接替魏徵负责四库群书的缮写工作，他的书法对于楷书手必有相当影响。作为分判课写工程的秘书郎褚遂良，其书法亦必受当时楷书手书风的左右。《书断》所谓“服膺虞监”者，即始于贞观初年。而其“祖述右军”，则在贞观十三年(639)以起居郎“监掌装背”即负责四库经籍装帧审查工作之后。

唐太宗搜集王羲之的书法，并出御府金帛大肆购求事，始于贞观十三年(639)。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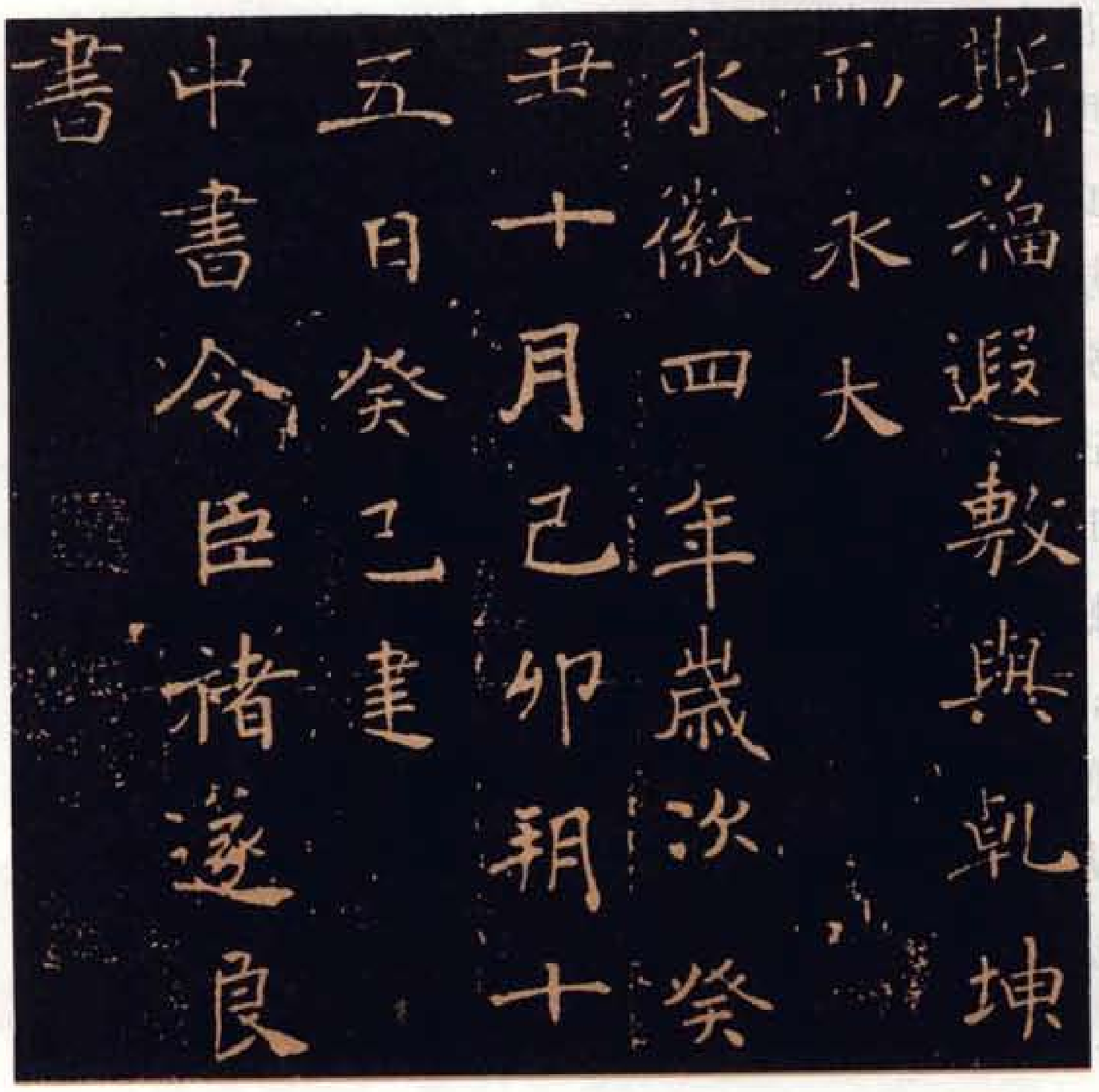
> 贞观十三年(639)，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内出右军书，相共参校……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卷)……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记当时图书押署，褚遂良亦始见于贞观十三年(639)起居郎任上。褚遂良自贞观十年(636)由于魏徵的荐引，即日被唐太宗召为“侍书”，其时遂良尚未博览右军书法，即使“服膺”二王嫡传虞世南之书，亦未见得其神髓，所书《伊阙佛龛碑》(贞观十五年)、《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或奇伟、或古质，颇多隶意，其似出欧阳询而加北齐结法者可证。所以阮元有“(魏)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荐其人，非荐其书”[45]之说。

《旧唐书》本传称："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按王右军书，自南朝以来，真伪相杂，且屡经战火，遗失几尽，至唐君臣倡导，重金搜集，遂"天下争赍"，古迹毕献。综观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列为第一者《乐毅论》，萧梁时已疑为伪，不仅梁武帝《答陶隐居书》认为"微粗健，恐非真迹"，而且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也说："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频涉有悟。"其列之为第二、第三的《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唐、宋人亦不敢苟同，徐浩《古迹论》称之为"伪迹不近真"；米芾《书史》视之为"恶札"。至于其他行草书，后人或评之谓"有女郎材，无丈夫气"[46]，或讥之为"俗书趁姿媚"[47]。斯非评者之严峻，实乃传世王字多见伪讹。褚遂良所谓"一无舛误"者，情同应制唱和，盖为供奉阿谀之论。然而，亦因褚遂良能体察唐太宗倡导王字的睿旨，"克俭克勤，伏膺《告誓》，锐思猗文"[48]，遂悟入二王行法，以虚运实，化实入虚，形成既饶骨力，又丰神韵，瘦润华逸之风韵，诚如《书断》所评"若瑶台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的一代书品。是时书法，以永徽初年的《房玄龄碑》（图 2－5.4）、《雁塔圣教序》（图 2－5.5）为代表，其中尤以《雁塔圣教序》为最著名。

此碑分序、记二通，序为唐太宗文；记为唐高宗在东宫时所撰，褚遂良分别恭书于永徽四年（653）十月、十二月间，时为中书令，年五十八，下距卒年仅五年。且褚遂良自左迁潭州之后已无书迹可见，此碑或为褚书最晚作品。此碑妍媚超逸，甚得历代论书家所推重，或以为王虚舟一"虚"字评得最是。他说此碑"笔力瘦劲，如百岁枯藤，空明飞动，渣滓尽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直欲离纸一寸，如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又说："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挫，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间之意，不可穷其端倪。"[49]然亦有微言者，尤其对其"丰艳雕刻"者，如《书后品》有"恨乏自然，功勤精悉"之评；《述书赋》更不以为然："河南专精，克俭克勤。伏膺《告誓》，锐思猗文。恐无成如画虎，将有类乎效颦。虽价重

2－5.4　褚遂良　《房玄龄碑》(局部)(永徽初年)



2－5.5　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局部)(653)

衣冠，名高内外，浇漓后学，而得无罪乎！”《太平广记》卷二百八曾引《国史异纂》记，褚遂良与虞世南论书事：

>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意，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其实，虞世南也是不择纸笔而皆能如意者，见《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所记裴氏言：“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纸笔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褚、虞论书是否确有其事，尚待研究，但野史所记，个中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对褚书的意见。意谓褚氏后期所书碑志，固然是由于“精笔佳墨”，使之“手和笔调”，若“遇合作”者，但其用笔轻细流动，腕力显然处，实与刻碑有关。一，当时自从唐太宗《晋祠铭》摹勒上石之后，书丹传统已大有突破。褚氏身为中书令，意又矜持，或疑其书亦为摹勒上石。二，《雁塔圣教序》出自隋、唐间刻字名家万文韶之手（《孟法师碑》亦是万氏所刻），传真程度必然极高，因而空灵飞动，行迹笔意跃然碑上。同时，自隋入唐，由于贞观年间社会安定，文化经济日益繁荣，书法艺术之相关制度渐具李唐规模。且唐太宗喜好书法，鸠集三吴遗迹，君臣共相教学，又崇尚右军书法，不仅重金购求，锐意临仿，还亲为《晋书》撰写传赞，称其尽善尽美，古今第一。虞世南为右军嫡系，誉为书绝。褚遂良因“甚得王逸少体”，即日召见侍书。上之所好，下必行之，研习王字蔚为风尚，致使魏晋行法融入楷体，演进为初唐格局。从孙过庭《书谱》所言“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无点画，不扬魁岸；真无使转，都乏神明。真势促而易从，草体赊而难就。）[50]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云云，也可窥见当时楷书演变的趋势。

褚遂良晚年楷书，多见二王行法，用笔也在欧、虞以及史陵的基础

上加以轻细。这种宽绰疏逸、丰润劲练的格局，正是初唐书势开始脱离隋代书品影响而启立门户的代表，也是有唐一代楷书成熟的时代标志。无论李嗣真《书品后》“丰艳雕刻，或为当今所尚”，抑或窦氏《述书赋》“浇漓后学”之说，以及毛枝凤在《石刻书法源流考》中所申述的，“自褚书既兴，有唐楷书，不能出其范围。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习褚书者十有八九，诸拓俱在，可复案”云，莫不说明褚遂良“变古制今”、自创新路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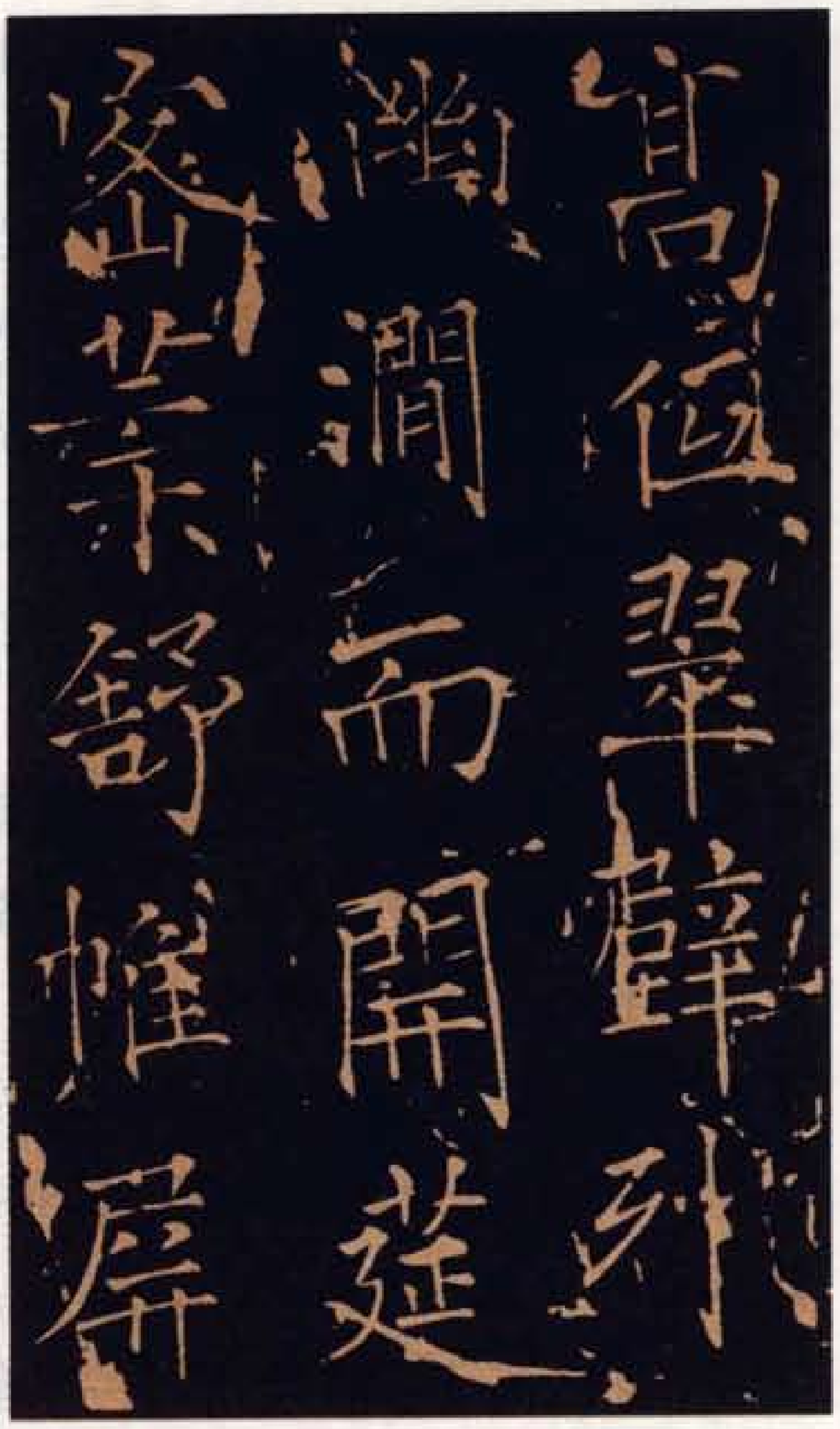
自武后朝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并称以来，因其迎合初唐书法发展的趋势，“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戛然独造，高标新格，或谓初唐三家。然而欧、虞入唐，已属暮年，其书虽趋精善，仍不失隋代书品，所书碑版，格局几与隋碑相同。后人论隋人书法，亦往往以欧、虞相评述，不独欧阳修以“有欧、虞体”评《龙藏寺碑》为然也。至褚氏永徽碑版一出，有唐楷书始有门户可寻，且其书瘦润华逸，刚柔相济，遂使魏晋流风一变而尽。所以初唐三家，真正启开李唐楷书之门户者，实褚氏一人。综观武后一朝，乃至玄宗开元初年的书坛风貌，以及其后书家如徐浩、颜真卿，莫不受其影响，刘熙载《书概》所誉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者，盖为至言矣！

王澍《竹雲题跋》谓：“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柳公权，稍纤媚则锺绍京，稍腴润则吕向，稍纵逸则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其以偏概全，或有夸饰。然颜、柳诸家受褚氏之影响，尤其颜之《宋璟碑》、魏之《善才寺碑》，具体褚法，也是事实，或私淑之。至于褚遂良乃薛曜之舅祖，其薛氏兄弟之于褚书，盖为家学，且时人有誉“卖褚得薛，不失其节”[51]，评以为褚氏之善守者，洵属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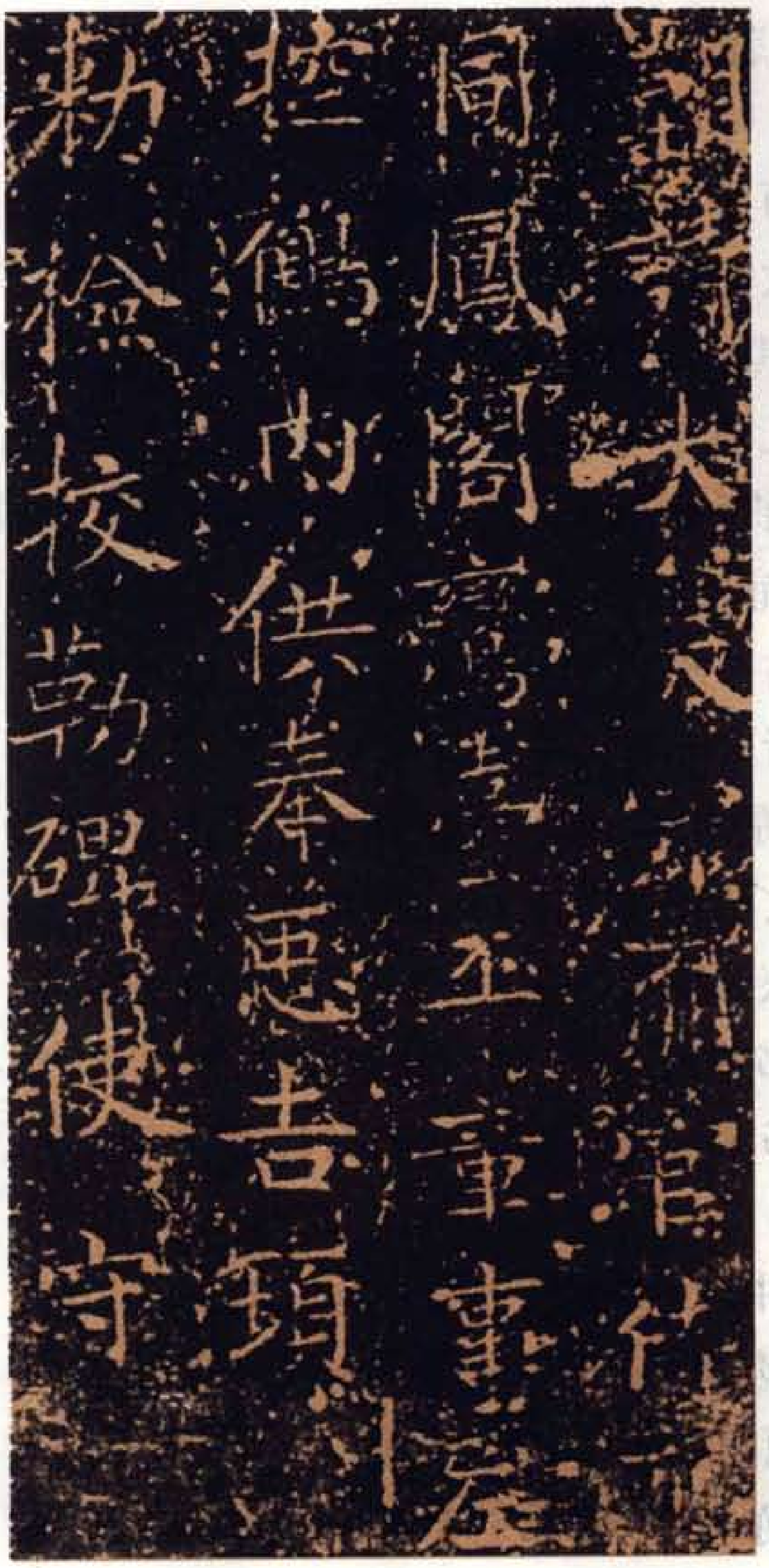
薛曜（642—703），字昇华，祖籍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世代为儒雅之家。曾祖父道衡（540—609），字玄卿，隋内史侍郎，为当时名士，不仅以诗著名，有“才杰”之誉，书法也见称于史，《宣和书谱》记其《和

南》正书,“非泯泯众人之笔也”,参其书有《尔朱敞碑》(开皇五年十月),当也是一位善书人。祖父薛收(592—624),字伯褒,隋名儒王通的及门弟子,为“河东三凤”之一,史称薛收为长离,其族兄德音为鹔鹴,侄元敬最年少,为鹓雏。入唐,以文学受知于秦王李世民,官至天策府记室,兼任弘文馆学士。父薛振(622—683),字元超,以字行,袭爵汾阴男,尚和静县主,官至中书令。以荐引寒士、奖掖后进为一代文宗,唐初文士大都出自他的门下,诸如文坛四杰之一杨炯、文章四友之一崔融,都是由于他的引荐而声名天下的。薛曜为元超长子,褚遂良乃其舅祖,生平事迹,史记不详。可知者为王勃文友,咸亨初年曾与之游于四川锦州,王勃有送别诗二首记其事。万岁登封年间(696)见任春宫郎中(礼部郎中),神功年间(697)改正议大夫,与再从弟中书舍人薛稷并以辞学知名朝野。圣历二年(699)为奉宸大夫,与天下名士李峤、员半千、阎朝隐、沈佺期、徐坚、张说、刘知幾、宋之问、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共撰《三教珠英》,凡1300卷。久视元年(700)五月十五日侍从武则天游幸登封石淙山,应制《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图2-5.6),并奉敕正书武后与诸侍从大臣的唱和诗。其后行踪无考,或即卒于长安末年(703—704)。河南登封所立《封祀坛碑》,遒密有致,为其代表作。

薛稷(649—713),字嗣通,是薛曜的堂兄弟,名相魏徵外孙。早年与郭振、赵彦昭同学于国子监太学,其后登进士科,又于长寿三年(694)举临难不顾、徇节守邦科。曾任彭山县令。神功元年(697)见任中书舍人,负责中书省内的诏书起草事务。圣历二年(699)正月,控鹤监初置,稷以才敏文学之士召为供奉。曾为武后《昇仙太子碑》检校勒碑使(见图2-5.7)。寻改奉宸大夫,参与编撰《三教珠英》。景龙二年(708)置修文馆学士,稷以谏议大夫充任直学士。当时学士并为天下文华之选,从帝游幸,帝有所感,学士属和,时人荣之。稷存世诗篇大都出自中宗朝应制之作,其内容或无可取,然其形式力求工致,声律尤见精善,与李峤、崔融、宋之问齐名,张说有“良金美玉,无施不可”[52]之誉。著名的《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其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气象,尤见称于杜甫。



2－5.6　薛曜　《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局部)(700)



2－5.7　薛稷　《昇仙太子碑阴》(局部)(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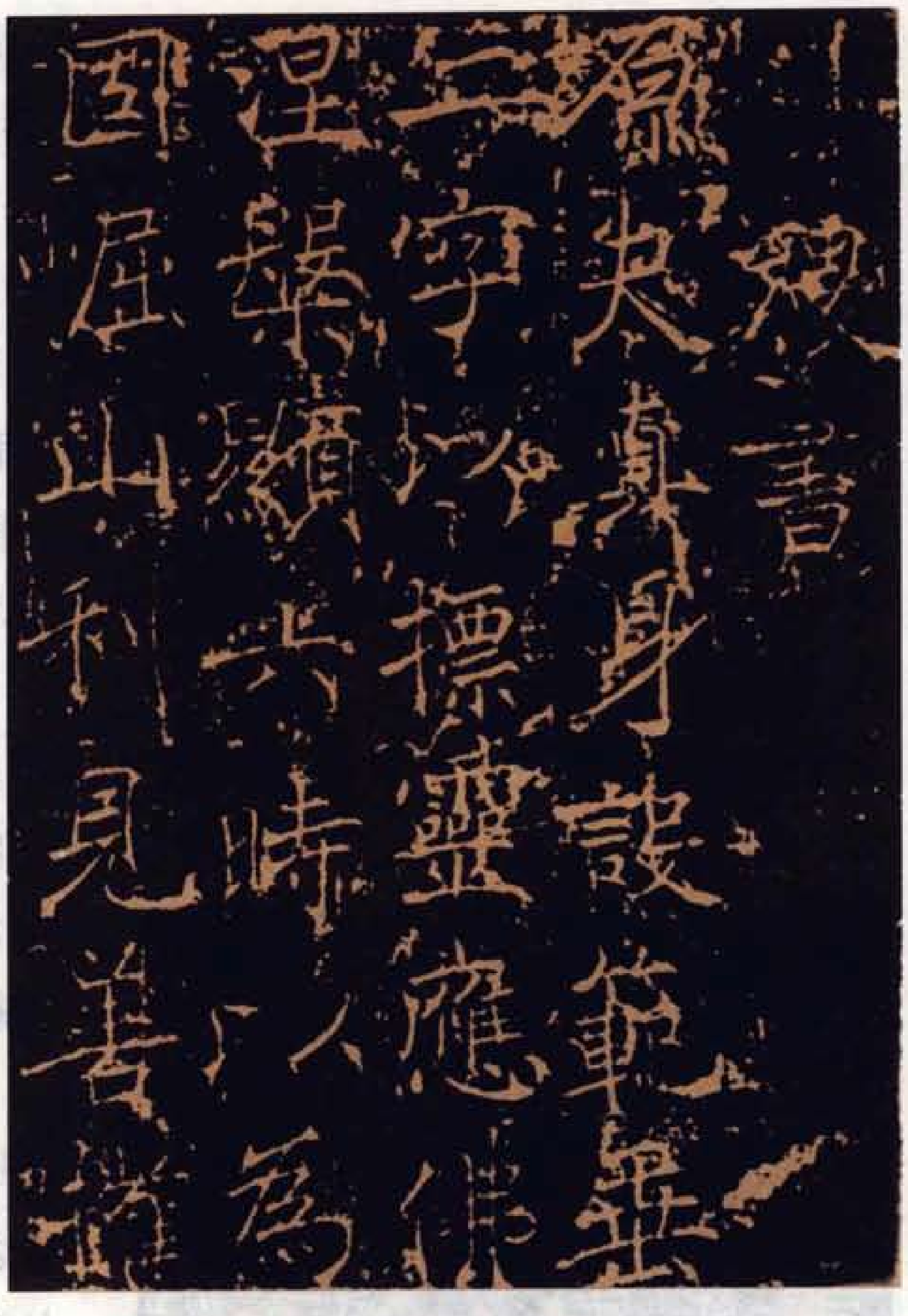
薛稷仕途，始显达于睿宗朝。史记睿宗在藩时，留意小学，尤重书法，尤其赏识薛稷工书善画和博学鉴识的才华，将他的第五女仙源县主（后册封公主，晋凉国公主）下嫁给薛稷之子薛伯阳，结为儿女亲家。受禅即位后，更见器重，累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寻因与中书令钟绍京争权，改左散骑常侍。其后历工部、礼部尚书，官至太子少保，史称“薛少保”。又以翊赞之功，封爵晋国公。睿宗以其为姻亲，常招引出入宫内，参与朝政，时有恩绝群臣之称。开元元年（713）窦怀贞伏诛，稷以知其谋，赐死于万年狱中，年六十五。

薛稷多才艺，善画，尤以画鹤著名，号称一绝，杜甫《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有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鹅邻……赤霄有真骨，耻饮污池律。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宣和画谱》也说薛稷画鹤，能得其神，宜其精绝千古，有评：“世之养鹤者多矣……然画鹤者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盩之掀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手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云。唐著名诗人如李白、宋之问诸人亦有诗歌赞述之。

稷出身太学，日习书一幅，受是时虞、褚书风的影响。及长，得舅氏魏叔瑜的传授。家中又多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手札表疏，稷一一锐意临仿，穷年不倦。其后供奉内廷，获观秘府所藏钟、张、二王等魏晋名迹，赏玩追摹，遂与中表兄弟魏华以书并名天下，开元名相张说誉之谓“前有虞、褚，后有薛、魏”[53]。后之论书家，去魏补欧（欧阳询），列欧、虞、褚、薛为“初唐四家”。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董

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54]，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图2-5.8），越王贞撰，神龙二年（706）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2-5.8　薛稷　《信行禅师碑》（局部）（706）

第六节

昭陵碑志书人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长安西北醴泉县九嵕山。自从贞观十年（636）十月文德皇后卒后葬此始，迄至太宗去世告竣，先后

营造凡十三年。由于唐太宗仿承周代陪葬制度，凡“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给以秘器，使窀窆时，丧事无阙”[55]，陪葬诸臣甚多，据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昭陵陪葬名氏”记载就有155人[56]，其中还不包括陪葬诸臣的合祔夫人和从葬子孙。陪葬出自敕命，丧事所须，并由所司供给，且又有五品以上官员兼任监护使护丧，所以昭陵碑志，其撰、其书，尤见郑重。旧制秘书省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专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57]之职，又有楷书手从事缮写。昭陵碑志无署撰、书人姓氏者，盖出其手。有撰人而无请托书家者，其书或亦出自馆阁书手。

昭陵碑志书人，所请托者大都是以书名世的士大夫，可见者除欧阳询、褚遂良之外，著名的还有殷仲容、王知敬、高正臣、赵模、诸葛思桢、于立政、王行满、李玄植、姜晞、白羲晊、畅整、窦怀哲诸人。

2-6.1 殷仲容 《马周碑》(局部)(674)

殷仲容，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初唐著名书画家殷令名之子，颜真卿之舅祖，历官秘书郎、戎卫兵曹（乾封初年）、相王（李旦）府咨议（永淳元年）、麟台丞（久视元年）、工部郎中、申州刺史。善隶书，尤以题署知名。乾元初年窦臮曾见其所题资圣寺额，其《述书赋》有评：“殷公、王公（王知敬），齐名兼署，大乃有则，小非无据。麒麟将腾，鸾凤欲翥。”名下又加注“奕世工书，尤善书额……书汴州安业寺额，京师褒义、开业、资圣寺，东京太仆寺，灵川神马观额，皆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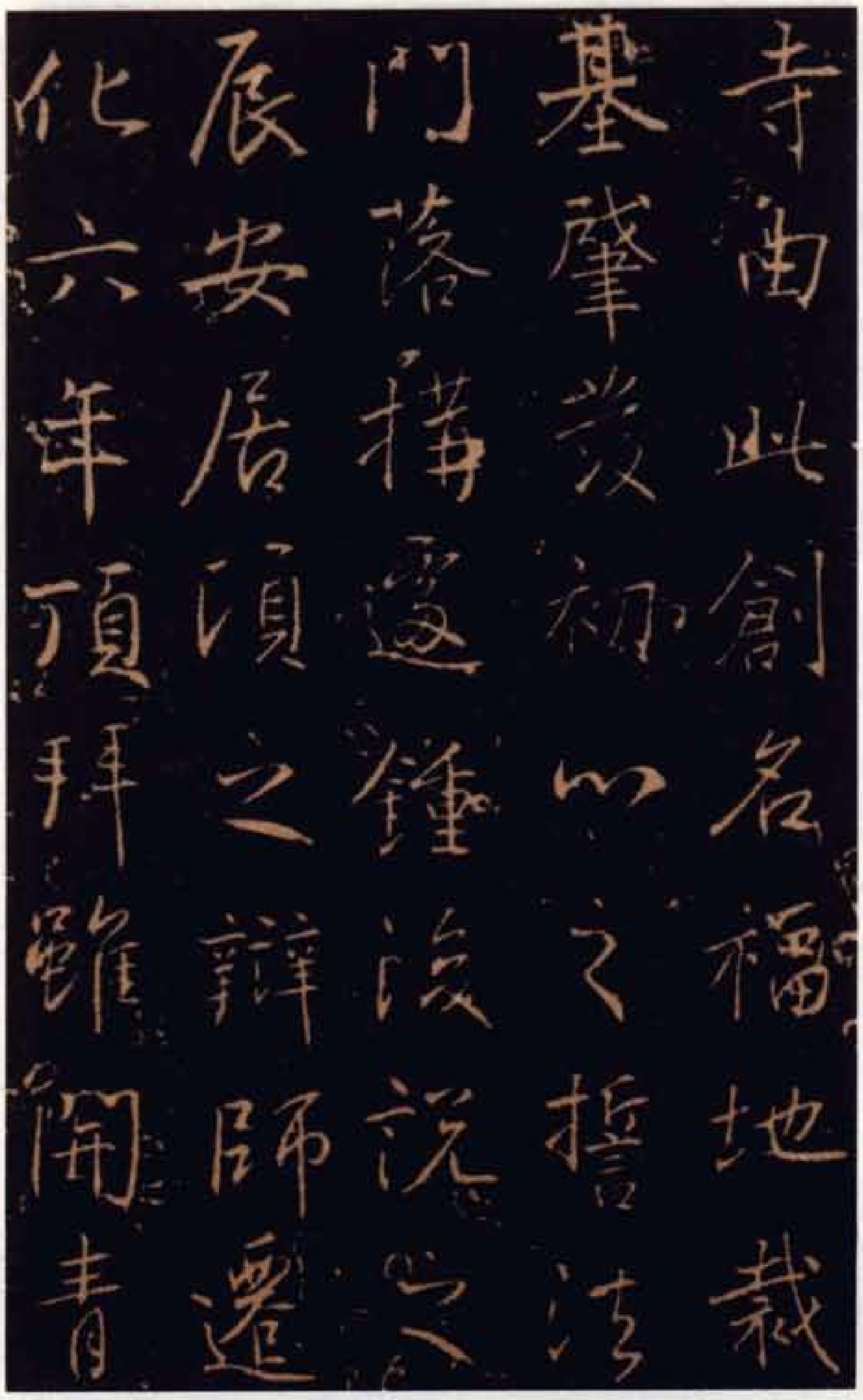
妙旷古”。颜真卿《颜元孙碑》也有“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之记。昭陵碑版可见者，如弘道元年（683）《褚亮碑》，乾封三年（668）《武氏碑》，上元元年（674）《马周碑》（图 2－6.1），以及《诸王题名》，并隶书。

王知敬，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望出太原，历任秘书郎、少府监丞、城门郎、膳部员外郎（咸亨元年）、冀王友（咸亨三年）、太子洗马（上元三年）、司门郎中、太孙咨议（永淳二年），终太子家令，史称“王家令”。从其咸亨三年（672）已获得奉敕书写《金刚经》的殊荣，便可见他的书法在朝廷的影响。武后朝，李嗣真评书，分为十等，王知敬名列中中，与萧子雲、智永、陆柬之同品，《书品后》有其“碎玉残金”“云间孤鹤”之喻（《卫景武公碑》，图 2－6.2）。玄宗朝开元年间，张怀瓘撰《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较其优劣，上、中、下三等究其臧否，而列王氏草、行及章草并入能品，章草与欧阳询同类，行书与薛稷并侪。且立传评之云：“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肤骨兼有，戈戟足以自卫，毛翮足以飞翻。”至肃宗朝乾元初年，《述书赋》论述前后所亲见、翰墨可入品流者，遂与殷仲容并称，其注云：“王知敬……工正、行，善署书，与殷（仲容）同工而异曲。兼草书……与仲容齐肩。天后诏一人署一寺

2－6.2　王知敬　《卫景武公碑》（局部）

额，仲容题‘资圣’，知敬题‘清禅’，俱为独绝。《洛川长史德政二贾碑》在修行寺东南角，即知敬之迹，极峻利丰秀。清禅、资圣寺，至今路人识者，驻马往观。”所书昭陵碑版，诸如显庆三年(658)《李靖碑》，健劲严正，见称于赵崡《石墨镌华》，其卷二有“直是欧阳率更、虞永兴之匹敌”论。咸亨元年(670)又书有《尉迟宝琳碑》，已佚。

高正臣，广平（今安徽宿县）人，望出渤海。为唐高宗第四子即后之睿宗李旦(殷王、豫王、冀王、相王)府属，是朝廷的一位专职书法家庭教师。经历可见咸亨三年（672）为奉议郎、直右春坊侍皇太子书；上元三年（676）朝议郎、行左金吾卫长史。其后官至卫尉少卿。曾外放任润、湖、申、邵、襄诸州刺史。好交游，曾置酒招宴京华名流，陈子昂有《晦日宴高氏林亭序》称述之。与陆柬之及张怀瓘父张绍先有行谊。《书断》列其正（隶）、行、草入能品，并立传云：“习右军之法，脂肉颇多，骨气微少，修容整服，尚有风流，可谓堂堂乎张也……宋令文曰：‘力则张(绍先)胜，态则高强。’……自任润州、湖州，筋骨渐备，比见蓄者，多谓为褚（遂良）后。任申、邵等州，体法又变，几合于古矣！”昭陵碑志，诸如麟德元年（664）《杜君绰碑》和咸亨二年



2-6.3 高正臣 《明徵君碑》(局部)(676)

(671)《燕氏碑》并作于王府侍书任上，上元三年(676)《明徵君碑》(图2－6.3)，盖其早年风貌，《书断》所谓“修容整服，尚有风流”，盖知言者矣！惟其晚岁体法，“几合于古”者，已无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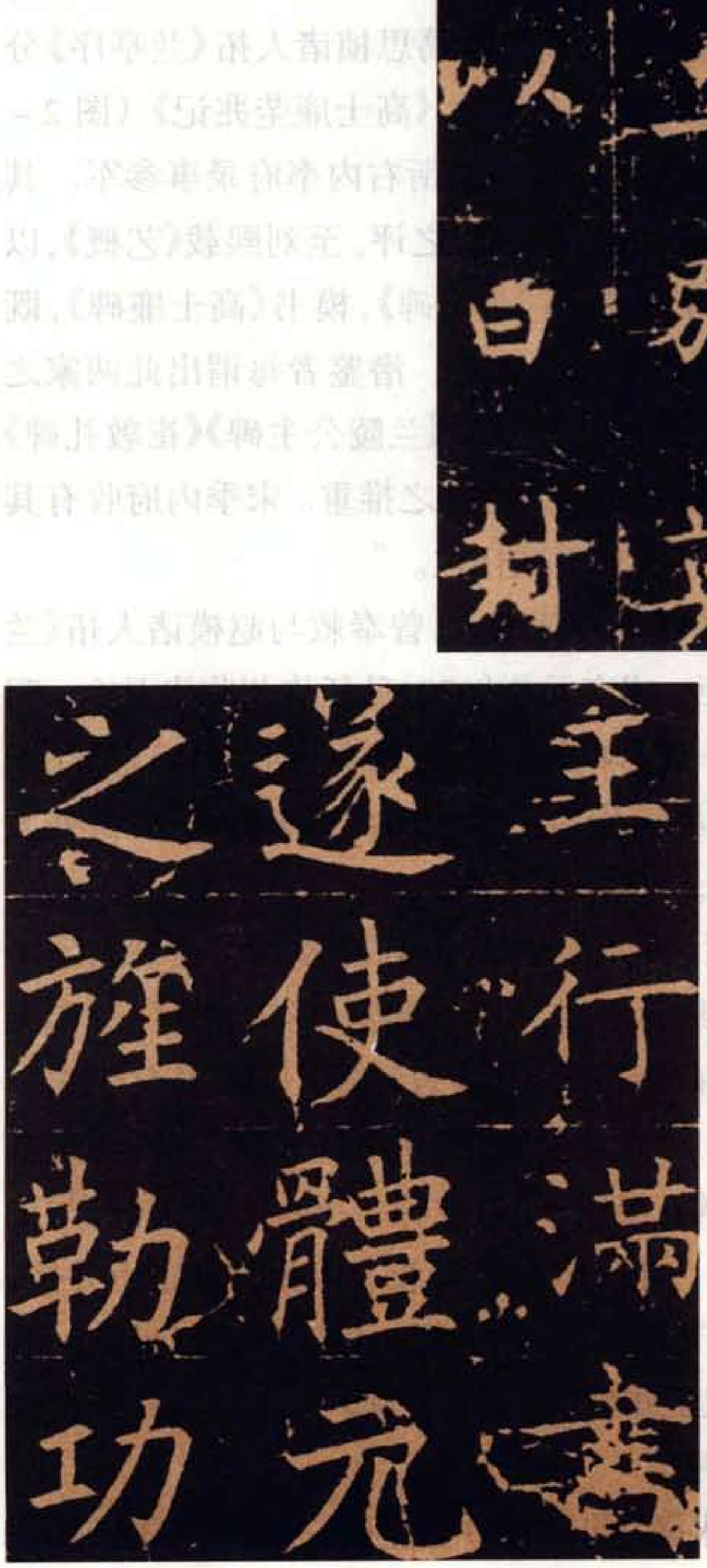
赵模，内廷供奉拓书人，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二日，见署右内率府录事参军，曾奉敕偕韩道政，冯承素、诸葛思桢诸人拓《兰亭序》分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昭陵碑版所书仅见《高士廉茔兆记》(图2－6.4)一道，许敬宗撰，永徽六年(655)立石，结衔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其书方整秀逸，《石墨镌华》卷二有“大类欧、虞”之评。至刘熙载《艺概》，以其精熟遒逸，比肩于王知敬，谓“知敬书《李靖碑》，模书《高士廉碑》，既已足征意法，而同时有书佳而不著书人之碑，潜鉴者每谓出此两家之手。”康有为更是肯定，其《广艺舟双楫》直谓《兰陵公主碑》《崔敦礼碑》出自赵模手笔。是说虽显误，亦可见康氏对其之推重。宋季内府收有其书《千字文》，《宣和书谱》有称：“合处不减怀仁。”

诸葛思桢，或作诸葛贞，内廷供奉拓书人，曾奉敕与赵模诸人拓《兰亭序》分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咸亨元年(670)见任许州临隶县令。昭陵碑版所书仅见《瑶台寺碑》一通，许敬宗撰，贞观十八年(644)立石。宋季已佚。参其《李孝同碑》，《石墨镌华》卷三评以为“笔法虬健，波拂处大类褚河南”云。其书盖出二王，亦属遒逸一路。

于立政(?—679)，字匡时，雍州高陵(今陕西高陵)人，贞观名臣于志宁之子，官至太仆少卿(乾封元年)，约卒于调露元年(679)，享年无考。有《类林》十卷行世。昭陵碑版所书仅《崔敦礼碑》一通，其父于志宁撰，显庆元年(656)十月立石，乃太常少卿任上所书，父撰子书，亦见墓主眷属对于氏的仰重。是碑，《石墨镌华》卷二称：“书法方整圆健，与王知敬书《李卫公碑》如出一手。”叶昌炽《语石》卷七以为与高正臣并侪，有“亦皆褚(遂良)之流亚”云，又称其“小楷遒媚，其结体似虞(世南)，其运笔似褚(遂良)。合观亦颇似王知敬《卫景武公碑》”。按是书颇似王知敬者，盖亦为贞观台阁之富贵字。

王行满，事迹无考，仅知永徽六年(655)至显庆三年(658)间，任职

2－6.4 赵模 《高士廉茔兆记》(局部)(655)



2－6.5 王行满 《韩仲良碑》(局部)(655)

门下录事，著名的招提寺《圣教序》即出其手，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二所称："观其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不在(褚)遂良之下。"当时，名书家殷令名以及供奉拓书人赵模、诸葛思桢并在，且前有慈恩寺《圣教序》，出自中书令褚遂良之手，而特请台省下僚书之，是可想见其书名声之显隆。昭陵碑版所书仅《周护碑》一通，许敬宗撰，显庆三年(658)立石。1964年发现，1974年出土。其缜密流动不减《圣教序》。王行满书迹，宋季著录尚有贞观十二年(638)《窦良碑》、永徽六年(655)《韩仲良碑》(图2-6.5)和显庆元年(656)《浮图铭》诸通。

李玄植，赵州(今河北赵县)人，贞观中，任职四门助教，曾奉敕偕国子祭酒孔颖达诸人刊定《尚书正义》二十卷。乾封元年(666)见任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知馆事、侍皇太子书，亦是东宫专职书法教师。其后因事连坐，左迁汜水令，卒于贬所，享年无考。《旧唐书》立传，见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中，有称"撰《三礼音义》行于代。"昭陵碑版所书仅见《李孟常碑》，李安期撰，乾封元年(666)十一月廿八日立石，盖书于侍书任上。是碑，1964年发现。书法严正劲拔，堪称昭陵佳品。李玄植书迹，尚有《刘德威碑》一通，许敬宗撰，永徽四年(653)立石，著录见《宝刻类编》卷二。

姜晞，上邽(今甘肃天水)人，贞观名臣姜行本之孙，永徽中袭封郧国公。永隆二年(681)登进士第，官至左散骑常侍，约卒于开元初年，享年无考。有诗名，曾与紫微令姚崇、吏部尚书崔日用、紫微侍郎苏颋、黄门侍郎卢怀慎和李乂、殿中监姜皎(从兄弟)、太府少卿沈佺期以及名士蔡孚、裴璀诸人作《享龙池乐章》凡十首，晞为第九章。昭陵碑版所书者仅《姜遐碑》一通。姜遐是他的叔父，天授二年(691)八月十四日卒，十月十日与夫人窦氏合葬于昭陵。先天二年(713)其子姜皎迁太常卿，追赠吏部尚书，赠窦氏□国夫人，因是，晞撰述称颂并正书铭之。此碑，明季仅见下截，故赵崡视作断碑。1974年发现其碑首及上截，终成全碑。上截出土不久，文字尚少损泐，书法亦清晰可观，《石墨镌华》卷二有谓"全法登善(褚遂良)而结小弱"。"结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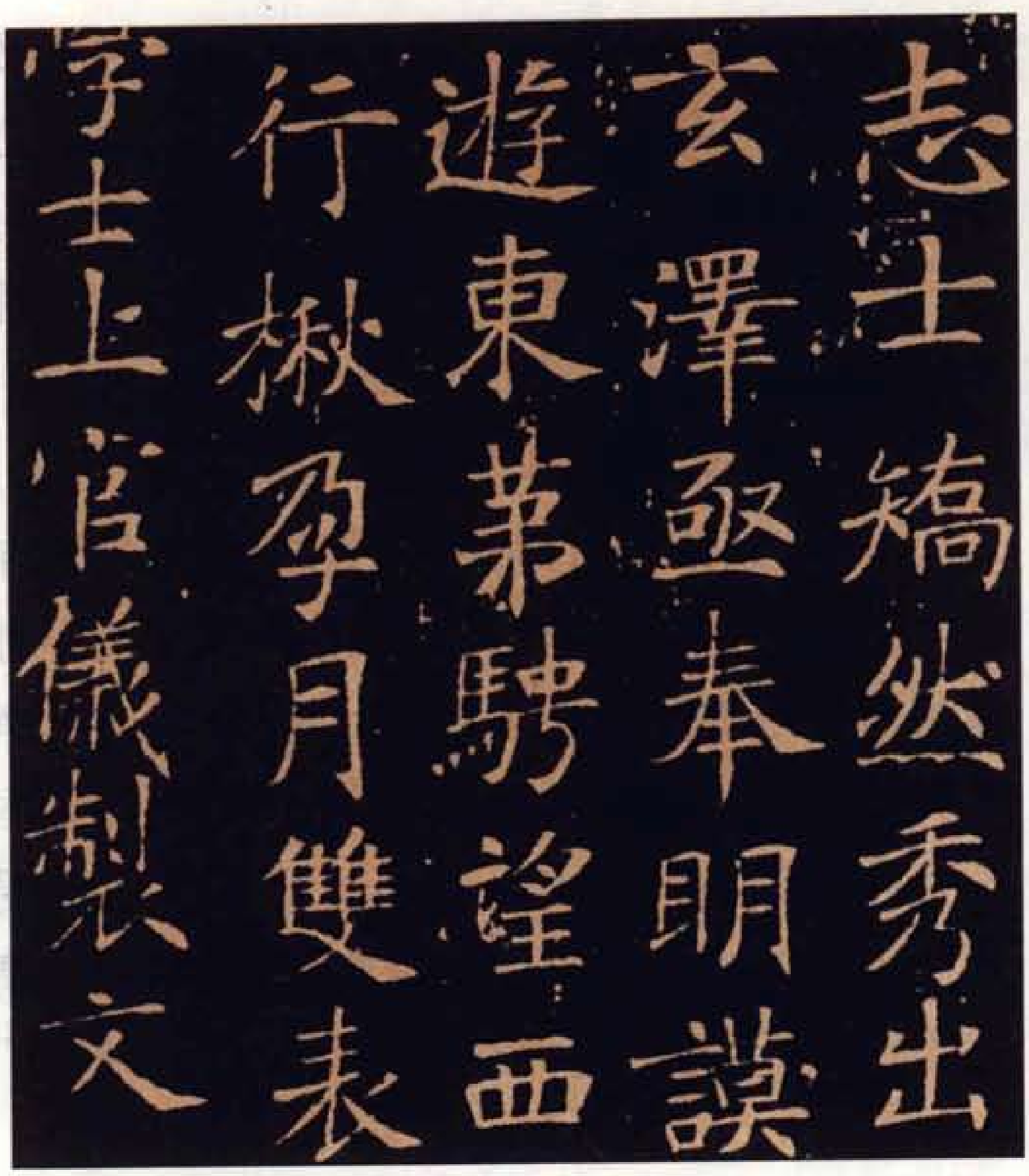
2-6.6 畅整 《清河长公主碑》(局部)(664)

甚是。盖其不谙铭石手段,全用书判功夫,终少夸饰,更无整修,以致结法散乱,全无铭石楷书之体势。若以风貌而言,或更近虞世南。姜晞书迹,仅见此碑,其他一无著录。

白羲晊,无考。开元十三年(725)隶书《乙速孤行俨碑》时署衔"朝议郎行秘书郎",盖此碑撰人秘书监刘宪之下僚,若出刘氏之请托,当系兰台一善书者。白羲晊书法,仅见昭陵此石,其他一无著录。赵崡甚重此碑,其书法,《石墨镌华》卷二有评"跳拔,宜居韩(择木)、蔡(有邻)之亚"云。

畅整,无考。以其《清河长公主碑》署衔"雍州长安县品子",乃一长安县内亲事官,即由雍州所举六、七品官子弟出身之流外官。参其书迹,著录始自贞观二十一年(647)《佛石迹图传碑》[58]迄至万岁登封元年(696)《梁师敬碑》[59],书名竟历太宗、高宗、武后三朝数十年而不衰,且《梁师敬碑》出自薛曜所撰,曜自善书,不自下笔,而以属畅整,其工书则可知。今观昭陵所书诸碑,如麟德元年(664)《清河长公主碑》(图2-6.6)、麟德二年(665)《程知节碑》(许敬宗撰),其劲峭奇伟,自可抗行褚遂良、薛稷诸人,惟其功名未隆,声望不出雍州。

窦怀哲,唐高祖太穆皇后族孙,右仆射窦德素之子,望出扶风,唐太宗第十九女兰陵长公主李淑之夫,时为庆州刺史。兰陵长公主陪葬昭陵,由阎立行、殷令名为监护副使料理丧事。殷令名以能书擅名当时,而属怀哲铭石,且墓主兰陵长公主"七岁学书,尽锺、张之妙迹",亦一善书



2－6.7　张玄靓　《张士贵志》（局部）

2－6.8　敬客师　《王大礼志》（局部）

者，所司允其夫书妇碑，盖有尊于窦氏之工书。此碑方整劲拔，见称于《石墨镌华》，其卷二有“欧（阳询）、虞（世南）之流亚”云。叶昌炽《语石》卷七更见推重，有云：“笔法在欧、虞之间，亦唐碑之至佳者。其结体绵密，而气则疏；其运笔严重，而神不滞。欧公《化度寺铭》，天然妍秀，不假修饰。此碑则稍露矜持之态耳。然视徐峤之父子，已有仙凡之别，况窦臮以下乎？”窦氏书迹，仅见此石。其妇兰陵长公主显庆四年（659）卒，享年三十二岁，其铭石时，正值中年，宜其鲜华如许。

其他书人，诸如梓州盐亭县尉张玄靓（《张士贵志》，图 2－6.7）、右威卫仓曹敬客师（《王大礼志》，图 2－6.8）、净□寺僧行满，以及苏敬和释智辨，大都与墓主、撰人并无关系可寻，即国子丞清河房琳为祖书碑，瑶台寺僧普昌就近铭石，皆出之于因工书而受人相托者。以其书法，或清或朗，或整或逸，堪称初唐典型。《语石》所谓“昭陵为唐碑渊薮，撰人、书人，皆极一时之选，学书者所当奉为楷模也”，诚为至言。

---

①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序。

② 《法书要录》卷三（唐）何延之《兰亭记》。

③ 《唐朝叙书录》引。

④ 《唐会要》卷三十五引。

⑤ 饶宗颐《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引《权德舆文集》卷三十一，并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条。

⑥ 《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引。

⑦ （唐）刘知幾《史通·正史》。

⑧ 《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

⑨ 《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序。

⑩ （唐）唐太宗《京帝篇序》。

⑪ （唐）魏徵《群书治要序》。

⑫ （唐）窦臮《述书赋·下》注。

⑬ 《贞观政要》第七卷《礼乐第二十九》。

⑭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引。

⑮ 《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引。

⑯㊷ 《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

⑰ 《唐六典》卷二十一。

⑱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⑲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

⑳ 《唐六典》卷六。

㉑ 《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五。

㉒ 《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掖庭局"记"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下注："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楷书二人……篆书……飞白书……各一人。"

㉓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所记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条为及第。

㉔ 《通典》卷十五。

㉕ 《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

㉖ (宋)桑世昌《兰亭考》卷八引。

㉗㉙ 《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

㉘ 《新唐书》卷一百二《褚亮传》。

㉚㊹ 《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

㉛ 《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引太宗语。

㉜㉞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㉝ 《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条引。

㊱ 《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

㊲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二年条引褚遂良《自陈表》。

㊳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条引裴行俭语。

㊴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条。

㊵ 《旧唐书》卷八十《史臣赞》。

㊶ 《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

㊸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㊺ (清)阮元《南北书派论》。

㊻ (唐)张怀瓘《书议》。

㊼ (唐)韩愈《石鼓歌》。

㊽㊿ (唐)窦臮《述书赋·下》。

㊾ (清)吕世宜《爱吾庐题跋》引王澍语。

⑩ 括号中的内容据[日]空海《书谱临本》补。

⑪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引。

⑫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引。

⑬ (唐)张说《唐故豫州刺史魏君(叔瑜)碑》。

⑮ 《唐大诏令集》卷七六贞观十一年二月二日诏。

⑯ (宋)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作 165,宋敏求《长安志》作 166。

⑰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引。

⑱ (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二。

⑲ (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七引《京兆金石录》。

第三章

盛 中 唐 书 法

第 一 节

盛中唐书法的演变

韩愈《平淮西碑》言："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宗)睿(宗)，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唐代自李渊武德七年(624)一统天下以来，历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五代 80 多年。至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685—762，图 3－1.1)励精图治，重振唐太宗遗风，不仅贤相名将辈出，彦才哲士亦济济于世，竞为其用，遂使内治外交，政绩显殊，经济繁荣，国威远扬，且"旁求宏硕，讲道艺文"①，超越贞观，终于形成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

当是时，诗歌创作继初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之后，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崔颢、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张继和李白、杜甫诸诗杰，以各自的艺术手法，开拓唐诗新境界，终于扫尽南朝以来迄至初唐的宫体诗纤弱之习，使之瑰丽多彩，蔚然而成鼎盛时期。其中李白、杜甫，双峰并峙，堪称绝顶；孟浩然、王维和高适、岑参，也各以田园山水、边塞风情

3-1.1 唐玄宗像

诗派的代表，历峣竦珰，争衡千古。诸诗人中，贺知章以书家称；王维亦有书名，且交游史惟则；其他大都为书家至友，尤以李白、杜甫、高適与李邕、张旭之交，堪称莫逆；而岑参之于颜真卿，也不失为知音。而唐初文章，自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以来，萧颖士、李华诸人，尚经重典，再宏雅正，终于变骈为散，成为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声。梁肃《补阙李君(华)前集序》评有唐三百年文章，其称："唐有天下凡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华)、萧功曹(颖士)、贾常侍(至)、独孤常州(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萧颖士、李华与颜真卿先后进士，座主并出于孙逖，且意气相投，脱略形迹，有"全交"之称[2]。颜真卿本人也是著名散文家，其宏词沉郁，甚有可称。萧颖士又与李邕为忘年交。邕眼高手随，独步天下四十年，至晚岁而属萧颖士代撰《进芝草表》，盖出志趣相投，藉之以相激励者也。李华亦知书，有《论书》(二字诀)一章，其"用笔在乎虚掌而实指，缓衄而急送，意在笔前，字居笔后，其势如舞凤翔鸾，则其妙也。大抵字不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华质相半可也"云，以及"截、拽"二字口诀，言简意赅，盖为深得笔法而能浅出者也。

与此同时，绘画一入盛唐，也是群星映照，璀璨夺目。当时壁画、卷轴画，除佛道人物尤见盛行外，山水、花鸟、鞍马等，开宗肇派，并见繁多。其间名画家吴道子，"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3]，最为卓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有称"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其"莼菜条"的线描和"吴带当风"的衣纹勾勒，承前启后，发扬广大，对释道人物画的发展影响甚大。其他

韩幹的鞍马，翘举雄杰；李思训重彩山水，富丽堂皇；王维水墨山水，平淡天真。皆能独张一军，自成格局。张萱、周昉的仕女画，也是别开生面，能为世重。至于姜皎之鹰，薛稷之鹤，韩滉、戴嵩之牛，声誉相埒，并称名家。书画同源，善画者无不兼擅书法。唐代绘事，以盛中唐尤盛，其书法境诣并高亦灿然可见。初唐殷令名、殷仲容父子和王绍宗以及薛稷，已为名书家，画名或为所掩。盛、中唐除吴道子、韩滉，出自张旭名下；卢鸿、郑虔、司马承祯、萧祐又卓然成家，并见诸史籍为书论家所重。此外，著名的尚有王维、张谔、张濛、李渐、顾况、张志和以及江都王李绪诸位。

3-1.2　唐高宗　《纪公颂》(局部)

至于雕塑，也同受影响，一变初唐清瘦风韵，渐入丰硕境界。以杨惠之最著名，时人有称："道子绘，惠之塑，夺得(张)僧繇神笔路。"④

开元、天宝年间文化的发展，是有唐一代文化通变的中枢，六艺九流由是而承绪初唐，启萌晚唐，遂成一代大业，诚如沈曾植《菌阁琐谈》所云，当时"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人才之盛关运会，抑不可不谓玄宗之精神志气所鼓舞也。贞元、元和之再盛，不过就开、天未竟之业。自后经晚唐以及宋初，并可谓元和绪胤。至元祐而后，复睹开、天之盛，诗与书其最显者已"⑤。

唐代帝王，大都善书，这对书法的繁荣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除唐太宗李世民上章已述之外，楚楚可观者有如高祖李渊，高宗李治(《纪功颂》，图 3-1.2)，睿宗李旦，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宣宗李忱，也并称于后世。而武后则天（624—705，图 3-

3－1.3 武则天像

1.3)，尤见英杰，其君临天下二十余年，“顺天经而永保先业”⑥，收集二王法书，摹拓把玩，又广揽能书才士，擢用激赏，并见贞观遗风，以致朝廷内外，雅好艺文，“固循遐久，浸以成风”。名书家诸如殷仲容、王知敬、欧阳通、锺绍京以及薛曜、薛稷兄弟无不侍从左右，或奉敕题额，或充使立石，时见恩宠。武后存世《昇仙太子碑》(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立在缑山)，行草书，婉约有章草遗意，气势开张而却无悍戾之气。飞白题额，更见飞举。其或出自勒碑使如薛稷，勒御书人锺绍京诸人之润饰，然此碑之博大清新，已萌盛唐气象，盖非仅止武后笔下意志之流露，当属一时代精神之浚发。唐玄宗为睿宗第三子，从小受其父影响，“规模尚古”，偏重隶书，内廷侍书供奉，多出隶书名家如韩择木、蔡有邻、顾诫奢诸人，杜甫有《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诗称：“昔在开元中，韩、蔡同𩰫屃。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御札早流传，揄扬非造次。三人并入直，恩泽各不二。”又诏作《字统》四十卷以为矜式。且多用隶书铭石，承肃括为丰劲，变方整为宽博，《述书赋》评以为“殊异英特”，且有称：“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宣和书谱》于唐玄宗也有“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之论。其实，玄宗之书，已经内廷侍书所润饰，如窦氏《述书赋》中所注：“开元中，八分书北京《义堂》、西岳《华山》、东岳《封禅碑》，虽有当时院中学士共相摹勒，然其风貌大体，皆出自圣心”云。唐隶新体，自卢藏用、张庭珪而至梁昇卿、郭谦光，几经努力，终藉玄宗之碑版，遂始见大行。

有唐隶书，唐初欧阳询、薛纯陀、孙师范、殷仲容等人并称名家，其古雅幽深，仍具汉魏遗意。至开元年间，经唐玄宗登高一呼，顿时兴盛，

丰碑大碣，几占一半。其结体运笔，规模虽仍出魏碑格局，严整警策，丰丽圆厚，则已一改初唐意趣。唐隶新体，以蔡有邻、韩择木、史惟则最著名，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记："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至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加上史惟则，韩、蔡、李、史遂称有唐"隶书四家"。朱长文《续书断》则取韩、蔡、史三家，韩入妙品，蔡、史能品，惟韩、史立传，蔡仅附列姓名。至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出，韩、史并称，不及其他，后之论书，便大抵本之。

其他如刘昇、徐浩、白羲晔、顾诫奢以及韩秀荣、秀实、秀弼兄弟亦并以隶书名天下，为唐新体之卓绝者。

宗派所变，流风陶染，开元、天宝年间，其他书体，无论行、楷、篆、草，也并趋适从，自精谨而茂逸，变清健而圆劲，不数年而形成盛唐气象。

盛唐行书，李邕最为典型。其欹侧之行书，所以能厕身于时，抗行隶书者，虽于豪笔凌厉，更见格力，然亦功在丰体，能适时趋变。其后，苏灵芝亦以行书写碑，兼真通草，南北朝铭石之书与行狎之笔，百余年来乃始见融合。

唐初楷书，用笔劲挺，大抵用二王行法。至盛唐，始参见篆隶笔势，渐见雄健。尤其徐浩、颜真卿一出，有唐气象遂臻完善。

篆书著名者，时人首推李阳冰。史惟则、瞿令问，亦作新体，惟其所出曹喜"悬针篆"，不及李斯"玉箸"之丰劲，且李阳冰又以小学著名，有"仓颉后身"之誉。舒元舆《玉箸篆志》所谓"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备，光大于秦相（李斯）有倍"者，直宜其独步天下，而为有唐一代之"字宝"。

草书则以张旭、怀素为代表。张旭，真、草并为绝伦，其楷书，简远精妙，出自虞世南、陆柬之而加丰逸。不仅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以为"楷法精深，特为真正"，韩方明《授笔要说》也谓有唐楷书，"至张旭始弘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则万字无不该于此，墨道之妙，无不由之以成也"。徐浩、颜真卿并出其门下，徐取其劲，颜得其逸，遂致超迈群贤，名高千古，晚唐楷书，大都受其影响。其草书，则"就王之内弥更减

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⑦。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盖视旭草如白诗而为有唐艺文之高且绝者也。怀素系其再传，先得邬彤传授，又经鲁公启悟，遂以狂继颠，并为草书大家。

唐代真、草之嬗变，自劲拔而趋厚硕者，启之于张旭。李阳冰之圆劲，或亦受张旭草书之影响。

第 二 节

李邕与行书名家

1. 李邕

李邕（675 — 747），字泰和，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汉），郡望出自赵郡。父李善（？— 689），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史称博学强识，贯通坟典，无与伦比。显应年间（656—661），曾任太子率府录事参军充崇贤馆直学士，后出任潞王府记室参军、沛王侍读，龙朔年间（661—663），改秘书郎、寻转泾城令。至咸亨二年（671）六月，因受到贺兰敏之的牵连流配姚州，上元元年（674）八月遇赦放还，随即隐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当时士子四方远至，竞为门生。著有《汉书辨惑》三十卷（已佚）。其所注《文选》六十卷，极为精善，不仅名高一时，视作经典，且延誉后代，引为师祖，直至今日尚为学者所重，莫不慕习引证以窥古籍之堂奥。

延载元年（694），李邕年才弱冠，始随少年同学博陵崔沔游学洛阳。长安四年（704）四月，内史李峤、监察御史张庭珪以邕“词高行直，堪为诤谏之臣”，荐引为左拾遗。李峤为当时名才士，文坛奉为泰斗，史称其“仕前与王勃、杨炯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而为文章宿

老，一时学者取法焉”。张庭珪则素以汲引贤能为己任，徐浩《唐故赠工部尚书张公（庭珪）墓志铭》有称：“其荐贤也，则达奚珣、苗晋卿、李邕、梁涉、孙逖……或为一时之俊，咸登庸焉。”由是，李邕犹如良骥得伯乐而驰千里之足，适足以施展王佐之才。其后，李邕的仕途虽坎坷抑蹶不能尽合李、张两位的初衷，然以其忠义凛节，为一代彦哲，终未负伯乐之厚望。其入仕伊始，即与名相宋璟共论武后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且雄词切切，不允回避。同僚卢藏用称：“邕如干将、莫邪，难以争锋，但虞伤缺耳！”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亦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面折二张势”即指此。“否臧太常议”，系在睿宗朝，杜工部误作武后。当时睿宗以韦巨源为先帝故宰相，追赠“特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阿意上旨提议谥曰“昭”。李邕时为户部员外郎，并无讽谏之责，但他仍然谠言直谏，以为不可。李处直固执己意，拒不从李邕驳议。于是，李邕列陈韦巨源罪状，再次上书，写下了著名的《驳韦巨源谥议》。文章锋芒刚棱，气势凌厉，有云：“人为邦本，财富聚人，夺其财，则人心自离；无其人，则国本何恃！”是亦可见李邕之政治立场。

李邕资性超悟，才气纵横，且刚毅忠烈，有称“文章、书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为一时之杰”。然而一生坎坷，蹉于仕途，始受沮于韦妃，中见忌于张说，最后被诛于李林甫。

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之后宠信术士郑普思，擢其为秘书监。李邕尚任拾遗，因与桓彦范、崔玄泩共同引经上书，剴切陈谏：

> 陛下诚以普思术可致长生，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臣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

忠直明智若此，而为中宗所忌。且韦氏自立皇后之后，勾结武后兄子三思，以外戚集团势力把握朝政，逐杀中宗复辟功臣敬晖、桓彦范、崔玄洸、张柬之、袁恕己五王。李邕因与张柬之友善，并预桓、崔谏阻郑普思事，乃为其所忌，遭贬出为南和令。适值黄门侍郎宋璟得罪三思，为其所恶，斥逐出京，而李邕又曾与之同折内宠，三思视作同党，中途改贬，降为常州司户。至景云元年（710）六月，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清除内难，诛除韦、武集团势力之后，遂特拜李邕为左台侍御史。其年八月，谯王李重福叛乱，自均州直趋洛阳，将至天津桥，群官闻声逃匿。时李邕为留台侍御史，见数百人执器仗随谯王重福鼓噪而至，意欲取左右屯营，即急驰左掖门，令关闭拒守，复诣左右屯营告急，并劝喻守军拒叛立功，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诚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果然不出所料，重福先夺左右屯营，见其坚壁固守，且营中又矢射如雨，乃还趋左掖门，拟取留守之兵。城中已闻谯王叛逆，故门紧闭不纳。重福大怒，乃纵火烧逼之，火未及燃，左右屯营兵马驰出反击，重福窘迫而遁。翌日，驻军追捕余孽，重福投河自尽，叛逆亦由此平定。李邕则以一日之功，擢为户部员外郎。

睿宗一如中宗，亦为昏庸之君。朝政全凭皇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处置，而太子、公主又各自积集力量，相互倾轧以谋取权势。太平公主死党，当时执掌户部的岑羲以及中书侍郎崔湜，因为李邕与崔隐甫、倪若水同受东宫礼遇，忌其或为所用，藉故将三人联袂贬逐，李邕谪迁崖州舍城县丞。延和元年（712）八月，睿宗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皇帝位。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和岑羲、崔湜合谋，期于四日以羽林兵作乱。事发，玄宗先发制人，尽行杀之，其党羽亦一一黜贬出朝。同时，凡睿宗朝被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摘伏的内外官吏，则一律加以平反昭雪，依次叙用。李邕因此即日起为江州别驾。开元三年（715）玄宗思及故旧，命苏颋起制，以为李邕"探学精奥，为文沉郁，謇谔之习，动必无挠，弥纶之用，行则有恒，故以高才逸群，懿声满听，宜膺极图之任，允光兰握之

选”，除户部郎中。时张庭珪为黄门侍郎，与太常卿姜皎为其谋取宪官，遂改任御史中丞。中书令姚崇忌疑李邕为人，乃藉口品性险躁，构成其罪，不日即出贬括州为司马。至开元六年(718)十一月，故旧宋璟奏请朝廷复加起用，初为渝州刺史，其后转海州，起陈州，数年之间从五品下阶司马升为从三品上州刺史。由是，李邕渐生骄姿之心，其好名使气、广纳贿谢的品行，益见自肆。开元十三年(725)十二月，玄宗东封泰山，返回东都途经汴州之时，李邕路左谒见，累献词赋，颇得赞赏，邕亦“然矜肆，自谓且宰相”⑧。然而，当其得意洋洋，忘乎所以，自诩当为宰相之时，监察御史薛自勤和外生库狄履温却联名告发李邕贪赃枉法事，终于千里传审，判为死罪。幸有许州人孔璋慕其名、感其义，上疏代死，方予减刑，改为贬谪，远守钦州遵化县尉九品职事。尔后，其妻温氏代为上表，愿成边自赎，表人不省。或以为系宰相张说所抑，是为了争逐文名而造成的历史悲剧。

开元十七年(729)春，岭南陈行范反。李邕以近道兵助内侍杨思勗诛贼坑党，因有功而徙为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735)，起为括州刺史，后历淄、滑两州刺史，从此参立高班，复为上州州牧。“于是闭户绝交，澄心去欲。下以安所部，上以报所天”⑨，兴利除害，竭尽公忠，深受玄宗器重。当他移官滑州之际，玄宗亲自撰诗为其壮行，其曰：“汉家重东郡，宛彼白马津。黎庶既蕃殖，临之劳近臣。远别初首路，今行方及春。课成应第一，良牧尔当仁。”事先，李邕在括州任上复坐诬枉，且得罪，玄宗识其名而特诏不劾。如今又委之重任，恩渥如许，劝勉有加，李邕真是惶惶然感戴铭骨，且由踬顿而趋顺当，眼前又青云是望，复萌荣升之冀，于是邀宠取幸，其心亟亟。当时所作诸如《贺新殿镫鸣表》《贺感梦圣祖表》《进文马表》等等，屡屡进奉，滥加称颂，尤见谄媚。天宝初年，当其上计京师，拟见重用之时，却又为人所阴中，傅以“谗媚”之罪，出为汲郡太守。寻改北海郡太守。

当时淄川太守裴敦复是李邕淄州后任，于齐州介绍左骁卫兵曹柳祎与邕相识，邕赠马一匹与之定交。而柳祎乃狂疏人，因与妻族不和，返

京散布流言，称其岳父赞善大夫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即议论朝廷，有大不敬之事。柳祎妻妹即太子良娣，事涉东宫，而权相李林甫正欲危害太子，遂起大狱。于是命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审理此案，结果柳氏乃为首谋。吉温与监察御史罗希奭并为李林甫爪牙，莫不随其所欲深浅，锻炼成狱，忍行枉滥，严毒深刻，凡网罗之人，莫能自况，时人称之谓“罗钳吉网”。李林甫久忌李邕，于是乘机将其牵连，揽入案中处置。吉温令柳祎供认李邕因为奸赃事发而“厚相赂遗”，还向他陈说朝廷之祸福，这样词状连引，铸成死罪，遂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和罗希奭驰往山东就郡杖杀之，死时七十三岁。

李邕，幼承门业，精熟《文选》，资性颖悟，自少便引以为李氏“兴器”。又蒙麟台少监李峤知遇，进入秘阁读书累年，由是学识并进，才能双用。未值中年即名高京华，特以文华之士参与修文馆宴集，偕名才士李峤、韦嗣立、宋之问、沈佺期、苏颋、邵昇、李乂诸学士出入禁内，陪从游幸。著名诗篇《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即作于是时。其后词赋又得玄宗睿赏，文名由是鹊起。

开元天宝之际，一代文宗张说、苏颋，先后谢世；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文名未盛，李邕而为文章宿老。李邕之文章，宗经尚典，宏辞沉郁，同辈诗人王翰曾标置为天下文章第一（同列者为张说及王翰本人）。后之文论家亦甚推重，尤其如皇甫湜《论业》，历论中盛唐文章，以为可视作“一时之豪杰，笔砚之麟凤”者，张说、苏颋之后，便是李邕。且谓“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有滉有虎，阗然鼓之，吁可畏也”。当时文人诸如孙逖、徐安贞、崔颢、郗纯、高適、萧诚、李白、杜甫、萧颖士、卢象以及释门中人，莫不奉邕为文坛前辈，行卷献诗，托以知己之分。诚如杜甫《八哀诗》所云：

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
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
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

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
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
萧萧白杨路，洞彻宝珠惠。
龙宫塔庙涌，浩劫浮云卫。
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计。
眄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
向来映当时，岂独劝后世。

天宝五载（746）夏季，邕从侄李之芳自尚书郎出为齐州司马，杜甫再游齐鲁首访之，并邀李邕来齐州相晤。邕时为北海太守，即自郡而至。杜甫盖其故旧，两人相见甚欢，日与宴游，时而历下新亭，时而鹊山湖上，杯酒相接，纵论古今，于当代文学，对杜甫祖父杜审言极表倾倒之意。此时，李白初至鲁郡，作《上李邕》诗谒见之。又因邕在北海任上，曾飞章救勇妇，即作《东海有勇妇》诗称述：

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
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
损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
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
十步两蹑跃，三呼一交兵。
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
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
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
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

高適适在汶阳，邕即驰书相召，请他来临淄相聚。入秋，李白赴江东，甫、適随邕返回本郡。十月至青州，与群公出猎海上，尽欢而别。

李邕与杜甫可谓忘年之交。当杜甫年少出游翰墨场中，与名公贵介

诸如岐王李范、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以及音乐家李龟年交游，即杜甫《壮游》所谓“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之际，“李邕求识面，王翰愿结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深得李邕赏识并引以为荣。现今又在历下酒楼、员外新亭谈论古今，引为知己。他们历数前辈名家诗文，崔融、苏味道以往，于杨炯则服其雄健，而嫌李峤的华丽。至于杜审言则钦佩备至，尤其称赞他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这首五言长律，以钟律言其声之和雅，鲲鲸喻其势之雄壮，最后藉“玉山桂”典故寓示其诗为天下第一篇。而杜甫对他的祖父亦甚为自豪，曾称“天下之人谓之才子”⑩，又有《赠蜀僧闾丘师兄》说，“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杨伦《杜诗镜诠》卷十四有称杜公：“于表扬先世处尤致低徊，见仁人孝子之用心。”且杜甫甚重五言排律，秉承乃祖能事，既多且长，自四十韵延至百韵，可谓变本加厉，青出于蓝。李邕眼高一世，极少许可，对杜审言却如此倾倒，或恐寓有深意。

高适是李邕故旧，甚有知己之分。天宝二年(743)高适尚在草泽，自长安出游，经洛阳，历相州，过淇上，至滑州曾与李邕结游，心赏契合，引以为知己。当他离开白马津，往来睢阳、陈留之间，邕即遣人送去新作《鹏赋》，以其不惮摧翼以示勇，不立垂枝以屈节的刚悍锬锋，豪杰气义，喻人喻己，一浇胸中块垒。高适即撰一赋以答之。

“鼋鸣而鳖应，兔死则狐悲”。当李邕卒遭惨害，冤死青州之际，时人莫不惶骇不已，为之悲愤。李白曾作长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浩叹英灵：“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斐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裴尚书即裴敦复，因与李邕并坐柳祎事同时被杖死，故与北海并列。大历初年，杜甫作《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哀其文章气节，遭诬而死，其感慨激烈，排荡变化，每每使人临卷叹息。其诗云：

呜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
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

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
衰俗凛生风，排荡秋旻霁。
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
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疠。
日斜鹏鸟入，魂断苍梧帝。
荣枯走不暇，星驾无安税。
几分汉庭竹，凤拥文侯彗。
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
祸阶初负谤，易力何深哜。
……
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
哀赠竟萧条，恩波延揭厉。
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

杜公赘言复句，不以其为累者，痛惜之深也。此公将李邕与名将王思礼、李光弼，名相张九龄，素交严武、汝阳王琎、苏源明、郑虔并记，一人一诗，合称《八哀诗》。其叹旧怀贤笔力雄健，人誉之为“诗传”，以为可以表里《雅》、《颂》，与太史公《史记》诸传并驾齐驱，流芳千古。郝敬说：“李江夏（邕）之文藻，郑司户（虔）之博综，必有少陵之隽笔，乃能曲尽其妙。”[11]若是，李邕之道德文章亦偕杜公此诗而播芳中外，馨香千古矣！

李邕不仅文名隆盛，“独步有唐四十年”，且以擅长行书而声高一代。

《旧唐书》本传称：“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宋代高似孙《纬略》据唐人之言确记邕曾撰碑八百余通。按此说或有夸饰，即使是，也未必全是李邕所撰并书之。李邕出身江左士族，其父李善虽为“《文选》学”师祖，博学强识，贯通坟典，但不见书名。当时，江南旧族、儒雅之家多承晋宋馀俗，游艺不废，其书契之作，莫不资于功用，务在简易，虽

缮写经籍，铭石书翰，其谨严精善处，亦是楷正是敬，多如《颜氏家训》之谆谆告诫者“慎勿以书自命”。唐代虽重书学，以能书拔擢、步入青云者，不乏其人，但凡腹具经纶、自负才略者，仍不屑以巧艺进取。柳公权所谓“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便是一例。李邕乃一代名士，萧散风流，未曾有意于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以书工自蔽。李邕一生碑版书迹，尽用行书，《李思训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散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静，《卢正道碑》之精丽，《法华寺碑》之洒脱，《灵岩寺碑》之清逸，莫不各造其妙，纯任天机且落落不涉作为，字体又大小参差不齐，直如缮写秘书，简易自处。其结体，王恽以为出自右军，有“一法《禊饮序》，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之说。放笔增豪，丰体益媚，确见如是，但结法全从怀仁《集王圣教序》来，诚如李后主所评“李邕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怀仁《圣教序》，号曰集王字，其实敷衍成章，敛入规矩，整饬处已显“行真”之变。李邕书出此序，且铭石记事，刻画华饰，宏廓丰茂，更少使转纠连之笔，尽管峭拗紧巧，仍不失怀仁结法，但其跌宕开拓之势，盖属盛唐气象。自开元初叶以来，唐玄宗崇尚丰丽，倡导隶书，时俗从风，习隶者几居泰半。其间隶书，结体运笔，规模大都出入魏碑，严整警策，丰丽圆厚，一改初唐意趣。宗派所变，流风陶染，其他书体无论真、行、篆、草，也并趋适从，自精谨而茂逸，变清健而圆劲，不数年，终于形成中晚唐门户。李邕不善隶书，所存碑版绝无一字可觅。其欹侧行书之所以能厕身于时而相抗行者，虽功在丰体，适时趋变，但豪笔凌厉，则更见诸格力。历代论书家评述李邕行书，亦多从用笔处着眼，著名如董其昌“右军如龙，北海如象”[12]，以象喻其笔力沉雄，而媲美于龙之矫健，可谓独具会心，契切深微。

唐初之风，崇尚王字，士人未能获观真迹，便藉《圣教序》而仰契右军。李邕用笔，笔俊度缓，势方韵圆，其坚劲含蓄处纯属王字一派，或先从《圣教序》悟出，复受盛唐书风陶染，积习所致，笔力一新。赵孟頫所谓“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者，盖其学书心得。以其临仿李邕行法而窥右军堂奥，或因规模魏晋制度而明李邕用笔，又不一一作优孟虎贲

之似者而视之，洵然不失为至言。

李邕乃唐代大手笔，惟生前不以书名世。《述书赋》始撰于乾元初年，距邕之卒，仅直一纪，其历评秦汉以下迄于有唐乾元年间之并世书家，不见记有李邕其人。观赋注中引有时人语，谓“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及预焉”，亦知窦氏兄弟不特以书家相许。而唐末吕总《续书评》虽喻之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然视其名位终不及欧、虞、褚、薛以及徐浩、张从申诸人。至五代释亚栖《论书》主张通变，遂将邕与有唐诸名家并称：“凡通则变。王（羲之）变白雲体，欧（阳询）变右军体，永禅师（智永）、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其后，李后主虽以为“李邕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但亦将李邕与欧、虞、褚、薛、颜、柳、徐浩及张旭并列，视为有唐一代大家。自此，李邕书名遂侪类欧、虞，始为论书家所重，且愈演愈烈，益见推崇。元之王恽视作右军嫡传，其《题雲麾帖后》有云：“李北海书，融液屈折，纡徐妍溢，一法《禊饮序》，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绚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三郎（玄宗）顾之，不觉叹美。”又称：“《兰亭》在古今为真行之祖，自太宗崇尚，一代学者争师宗之。然如徐季海（浩）辈，尚未免诰体之俗，况馀人乎？公于斯时，独能高视远步，造微入妙，临池策勋，固当为右军忠臣矣！”至明董其昌，则更见钦佩，自称平生最嗜李邕之书，且说：“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把李邕与右军相提并论，可谓推崇之至，无以复加了。

李邕书迹，存世著名的有《叶有道碑》《楚州娑罗树碑》《麓山寺碑》《李思训碑》《李秀碑》五通。

《叶有道碑》，开元五年（717）三月八日立在兖州金乡县，即著名的所谓《追魂碑》。宋绍兴十四年（1144）为雷击碎，明嘉靖间重刻于浙江松阳。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以为“书法秀逸闲雅，不见欹侧之态，蔡君谟（襄）谓是邕书最佳者，良然”。汪珂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二十亦谓是书“遒逸丰美，可冠李书诸碑”。蔡襄所见，或许是原石。顾、汪之说，盖承

袭蔡氏者。

《楚州娑罗树碑》，开元十一年（723）十月二日立在海州，元省已刻字。原石在淮阴，后遭兵燹早佚，明隆庆六年（1572）淮安令陈文烛据旧石重刻之。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记曾见原刻本，有谓："遒逸丰美而不伤佻卞，当是合作书也。""丰逸"之评，或出真鉴，惟重刻相距甚远，不复可睹本来面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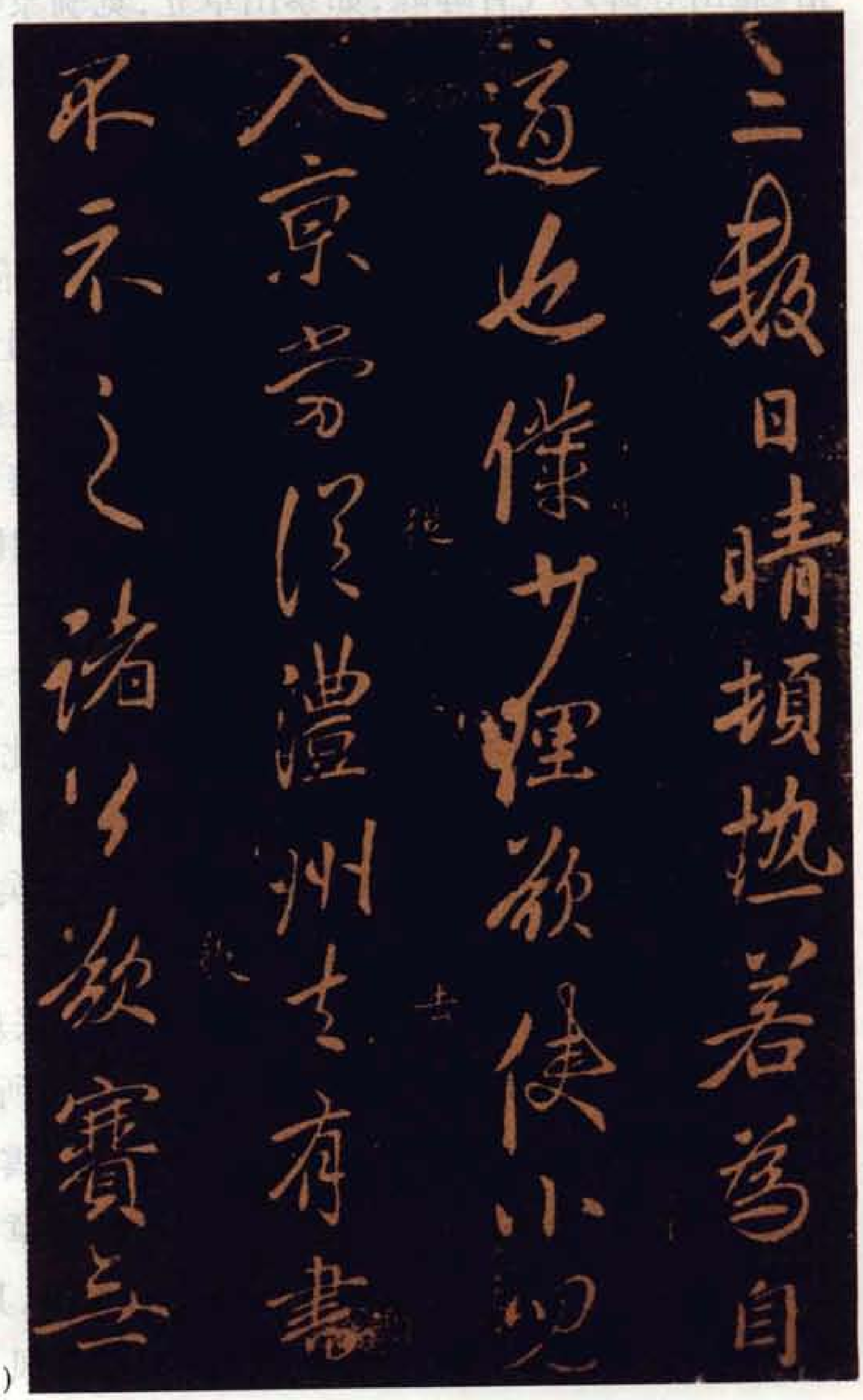
《麓山寺碑》（图3－2.1）又称《岳麓寺碑》，开元十八年（730）李邕应潭州司马窦彦澄之请所撰并行书之，九月十一日，黄仙鹤刻石立于潭州麓山。碑阴题名，亦出李邕所书。篆额"麓山寺碑"四字，不见书者姓名，或亦出邕之书。是碑乃李邕前期所书碑志最为著名者，且原石所存，虽见剜损，大概亦不失本来风貌，特为历代金石著录家所重，尤见称于明、清书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称："其钩磔波撇，虽不能复寻览其神情流放，天真烂漫，隐隐残楮断墨间，犹足倾倒眉山（苏轼）、吴兴（赵孟頫）也。"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

3－2.1 李邕 《麓山寺碑》（局部）（730）

稿》卷二以为笔势雄健，“能深入魏晋诸名家室”。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卷五则称：“北海书发源北朝，后以其干将、莫邪之气，决荡而出，与欧、虞规矩山阴者殊派，而奄有徐会稽（浩）、张司直（从申）之胜……其烜赫世间者，止陕《雲麾》与《麓山寺》而已。《雲麾》颇嫌多轻倪处，惟此碑沉着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卷三亦谓：“北海为有唐书家之冠，深得二王精髓，当日所谓碑版照四裔者，今多失之，惟《岳麓》《雲麾》最为烜赫……昔人谓北海如象，观此帖（宋拓《麓山寺碑》）气骨峥嵘，如泰山卓立，觉驯象巍然，宛在目前也。”李邕之书虽因风运而致，备受明、清书论家所景仰，然此碑瑰丽沉雄，实亦出自一家意气，堪称李邕前期之杰作。

《李思训碑》又称《雲麾将军碑》，开元二十八年（740）六月廿八日立在华州蒲城桥陵。篆额“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十二字，盖亦出邕所书（图 3－2.2）。此碑下截文字漫灭已久，上截亦见泐缺，不可卒读，然原石未见晦隐，历代并有著录。且是碑笔法瘦劲，妍丽之中寓有雄强之气，甚为识者所重而称美于世。赵崡《石墨镌华》卷三称：“北海书逸而遒，米元章谓其屈强生疏，似为未当。此碑是其得意者，虽剥蚀过半，而存者其慴铦凛然。”《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亦以为：“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之乃爱之，如蒋子文侥健好酒，骨青竟为神也。吴兴（赵孟頫）习之加媚，似犹未得其遒，此《雲麾将军碑》尤著名。”《快雨堂题跋》卷三题记曰：“昔人许李北海书，病在欹侧，似专指此碑而言。《李秀碑》已不甚欹侧，《岳麓》则不动如山矣。私谓唐太宗评右军书，以为凤翥鸾翔，势如斜而反正，正欹侧之谓也。子敬（王献之）妙传字法，而欹侧尤甚。北海全从子敬得笔，仰契右军，张从申之不及北海，正在不欹侧耳。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尤《雲麾》所独。”又说：“李北海书，全从宪侯（王献之）得笔，而《雲麾》尤为纵宕，其锋势欹侧处，皆有异处，后世深入其室者，宋有米元章，明有董元宰，皆借其径以达于宪侯，而仰企内史（王羲之）。书家关捩，其在兹欤？”马宗霍《书林藻鉴》曾引其绝句一首，云：“唐代何人绍晋风，括州象比右军龙。《雲

3-2.2 李邕《李思训碑》碑额(740)



3-2.3 李邕《晴热帖》(局部)

麾》墓道残碑在，万本临摹意未慵。”杨慎更以《云麾》为北海书第一，他移用王恽语而评此碑，以为一法《兰亭》，而风度闲雅，尽有蕴藉[13]。

《李思训碑》与《麓山寺碑》先后相距十年，后者正处于见弃之时，而前者乃居复宠之位，其纵宕有别于沉着者，正是其精神之写照，乃为李邕书之极则。斯两石历来为艺林之所重，亦正是李邕先后典型之所在。

《李秀碑》又称《云麾将军李秀碑》，天宝元年(742)正月十□日立在幽州，郭卓然摹勒并题额，张昂刻字。此碑原在直隶乡县，明万历初年始移至宛平，石久裂，被人制作柱础，清季仅存二柱，共193字。存世有宋拓全本，书法沈茂雄遒，元人顾观以为胜于《东林》《岳麓》诸碑。他说：“唐人大抵多能书，李北海尤为当时歆艳。论者以为《东林》《岳麓》诸帖皆不及《云麾碑》(《李秀碑》)，谓其沉着痛快中有含蓄浑融之妙也。”[14]李宗瀚亦称：“谛玩其笔法，倜傥沉雄，全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得神，开后来赵(孟頫)、董(其昌)支派，《云麾李思训碑》及《麓山》《东林》诸碑皆在其下。”[15]顾、李之说，或各随情性，独钟是碑，然其奇伟倜傥处正可比肩《李思训碑》，并名天下，洵为李邕晚岁风范之所出。若以李邕名品而言，则与《麓山寺》《李思训》为鼎立矣。

《淳化阁帖》所收《晴热帖》(图3－2.3)和《汝帖》中之《久别帖》，小行书，系平常手迹，亦甚可观。

2. 行书名家

盛中唐之行书，每每宣称临习王羲之，实则全从《圣教序》而来，或出自初唐诸贤所仿摹之《兰亭集序》，有所异歧的，仅是参写王献之、智永或晋人(包括名曰王帖者)之书而已，甚至有以李邕入手者，如顾瑶之辈。

行书铭石，不如隶楷之易，且二王行体，逸笔草草，更难见工，故怀仁一集，加以华饰，敛入规矩，而天下景从。以行书上石，且能见工者，李邕之外，尚有萧诚、张从申、苏灵芝、吴通微诸贤，盖并用二王行法。

萧诚，郡望出自兰陵（今江苏武进），梁武帝萧衍乃其叔高祖。历官恒州司马、幽州节度驱使、太子赞善大夫、荆府兵曹（开元二十年）、司勋员外郎（开元二十九年）、南阳郡长史、弘农别驾（天宝二年），以后不见记有他职，亦无所书碑志存录，或即卒于天宝初年别驾任上。为人“软美可喜”，受知于时相张九龄；荆府任上，交游李邕，尤见亲密。曾相与论书，因邕不甚重其书，有作伪相诳以折邕鉴之举[16]。诚能仿造右军之迹，而邕不识，亦见其临习之精。李邕善书，所撰碑记，而属诚书之，其推仰之重，是可想知。萧诚不仅知遇于李邕，亦见称于同时代书论家蔡希综，其《法书论》历数初唐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十一家，盛唐书家锺绍京、张庭珪等五家，萧诚名亦忝列其间，且偕宋令文、徐峤之引为“父子兄弟相继其能者”。吕总《续书评》亦有“舞鹤交影，腾猿在空”之喻。诚之行书，或以为出于薛稷，如《述书赋》记：“员外萧公，名成于薛。安西变体，光润愉悦。”其下又注：“开元初，时尚褚、薛，公为之最。”朱长文《续书断》本之。其实，其谙练王字结法，已不囿于褚、薛规模，宜米芾《海岳名言》有“极有锺（繇）、王（羲之）趣”之评。萧诚行书，见诸著录者九石，惟天宝二年（743）《玉真公主祥应记碑》（蔡玮撰，玄宗题额）尚有拓本留存，叶昌炽《语石》曾睹旧拓，其卷七有评：“其风格遒上，虽弹丸脱手，绝无哗嚣气，书品超出（窦）怀恽（《隆阐法师碑》）之上。开元以后，学王书者，当推诚为第一。”是说初嫌夸饰，然细览盛中唐行书，雄且逸处已非二王书法所可概括，学二王书不事加减而能名世者，诚如叶氏之所评，当推萧诚为第一人。

张从申，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会稽令张法（浤）之子，约生于开元中叶，与李阳冰相先后。进士出身，历官秘书省正字（上元二年）、检校礼部员外郎、大理评事（大历五年）、试大理司直（大历七年至十三年）、长史、检校礼部郎中（建中元年）。与李阳冰或有交谊，其所书碑石，大多由阳冰篆额，时称“二绝”（其《法慎律师碑》加李华文及碑主，为“四绝”；《李玄靖碑》加碑主，称“三绝”）。其兄从师、从约，弟从义（仪），亦以能书鸣，时称“张氏四龙”。张从申之书，虽出握笔，有违于时尚，深为韩方明

所不屑，但甚得书论家窦臮之推崇，《述书赋》有“张氏四龙，名扬海内。中有季弟，功夫少对。右军风规，下笔斯在”之评。其后或嫌其少风韵，又下注曰：“其于结密，近古所少，恨于历览不多，闻见遂寡，右军之外，一步不窥。意多拓书，阙其真迹妙也。”其实，“意多拓书，阙其真迹妙也”，盖境遇之所限。其时二王法书，并入御书，久不外出，即有少数流散于民间，亦非一般士人所可目睹，更何况能模写玩赏，心慕手追。如徐浩、窦臮久游翰苑者仅属少数。按从申久处掌刑机构，位仅止于从五品省台郎中，又非正授，其所见所闻，自然迥别于馆阁之书家，朝廷之供奉，实不允其多睹真迹，熟习名帖。然惟其凭藉拓本，而能一窥右军风规，且“下笔斯在”，亦诚属不易，此或即为窦氏所折服者也。从申书迹，见诸宋人著录者凡八石，存世可见者，惟《吴延陵季子庙记》（大历十四年八月廿七日）一通及《福兴寺碑》（大历五年六月一日）与《李玄靖碑》（图 3－2.4，又名《张茅山碑》，大历七年八月十四日刊）两石拓本。其中《李玄靖碑》见重于世，尤为著名。以善本视之，其书虽见抑扬低昂，雕饰太过，然仍不乏晋韵，可谓唐行书之卓绝者。

3－2.4　张从申　《李玄靖碑》（局部）(772)

苏灵芝，武功（今属陕西）人，开元中叶为易州录事，其后退隐山林，天宝末年复出，见任幽州经略军胄曹参军。因其曾为史思明所引置，遂终身不复起任唐职。其书以行法得二王规矩而见称于《宣和书谱》，以为“成就顿放，当与徐浩雁行”。书迹著录七通，存世可见者有《铁像颂》（王端撰，开元二十七年）、《田仁琬碑》（徐安贞撰，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梦

3-2.5 苏灵芝 《梦真容碑》(局部)(741)

真容碑》(图 3-2.5，唐玄宗撰，开元二十九年六月一日）三石，其圆劲舒畅者，盖出虞世南而加丰丽。同时有胡霈然者，安定(今甘肃泾川）人，上党佛寺中壁书多见其所题，宋季所存甚夥。又有碑志五石，并见称于欧阳修、苏轼。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有评“笔法虽未至而媚熟可喜”，而苏轼则以为开元、天宝间学二王笔法者，“胡霈然最为工妙”[97]。书论家朱长文《续书断》列入能品，且立传云：“书画遵妙，而格力不扬。时有苏灵芝者，颇好书石，迹与霈然相上下。”然不见记有苏氏之传。朱氏之论明谓比拟，实乃意存推迈，臧否如何，惟无一石可以评议。

吴通微，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人。其父道瓘，道士，大历中叶以善教童孺受召入宫，为太子(李适即后之德宗)、诸王讲经师，通微和弟通玄，因之常出入宫掖，侍太子游。太子即位后，便备受恩宠，建中四年(783)自寿安县令入为金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后除起居舍人(贞元三年见任)，转职方郎中、知制诰(贞元七年见任)，改礼部郎中，迁中书舍人(贞元十四年见任)，约卒于贞元末年舍人任上。《旧唐书》列传，附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其弟通玄传后，以博学、善文章名世。近世出土有其所撰墓志四通。因其善二王行法，中州士大夫甚为仰重。钱易《南部新书》“己”称：“中土人尚札翰，多为院体者。贞元年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常攻行书，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声名如是，惟其体格卑弱，后人则多加轻视，讽以为院体之鼻祖。其书迹，赵明诚《金石

录》收正书二石，行书三石。田慨《京兆金石录》又有志二通。存世可见，著名的有《楚金禅师碑》（图 3－2.6），贞元二十一年（805）七月廿五日立在西安，为其最晚之书，清圆婉逸，虽遒劲不足，然亦不失《圣教序》之风度。

还有王缙（700—781），字夏卿，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郡望出自太原祁县。名诗人王维之弟，官至肃宗相，新、旧《唐书》有传。工于文翰，与李邕并名，时议有云："论笔则曰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预焉。"以善书见称于《述书赋》，有"善草隶书，功超薛稷"之评。存世有行书《王忠嗣碑》，元载撰，赵栖篆额，大历十年（775）四月三日立在渭南县。其丰赡华美，远胜苏灵芝、吴通微辈，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称其"与李邕相伯仲"，云："评者谓其过薛少保（稷）。今其结法清婉老劲，不在《岳麓》《雲麾》下，览者自当得之。"《石墨镌华》卷三也以为"结体老劲，真可以与李邕伯仲"。此明人之所评也。自清以降，则多见微词，每每因其姿态婉媚，或以为"开松雪（赵孟頫）之门"⑱，或以为"宋初院体……无不自缙出"⑲。是说虽出臆断，然亦可见王缙之行书，其承前启后，一如吴通微，洵可为中唐之典型。

其他有如邠宁节度判官张谊，太子通事舍人孙藏器，亦并以行书名重一时（《慧坚禅师碑》，图 3－2.7）。张谊有《姜嫄新庙碑》（高郢撰，张琯篆额，贞元九年四月）存世，婉丽可喜；新出土的孙藏器《骆氏志》（并撰，元和三年十月十三日）、《秦朝俭志》（裴洵撰，元和十二年七月十日）两石，甚见清婉。至于缁流之辈，大都出自智永衣钵，著名的有实际寺主怀恽，其《隆阐法师碑》（天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顿挫浏漓，堪称杰构；圣善寺僧勤行和会善寺僧温古，亦各以能鸣，所书《灵运禅师塔铭》（崔琪撰，天宝九载四月十五日）、《景贤大师身塔记》（羊愉撰，开元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日）不愧为行书名品。

正覺寺建法華塔
御製敕寺額
天上福田斯文託
同習天台妙旨
雲飄風起如何弥
海中日出弥高
其德弥
其響弥
其德弥
其響弥
其德弥
其響弥

第三节

张旭与怀素

1. 张旭

张旭字伯高，郡望出自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史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上元二年（675），卒于乾元二年（759），享年八十五岁左右。初仕常熟县尉，后至左率府长史，世称“张长史”。因性情奇逸，多谑称“张颠”。其母陆氏，出生江南大族，是初唐名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不独陆柬之书学舅氏，有出蓝之誉，其子陆彦远，即旭之堂舅，因能秉承家学，尤精笔法，见称于时，有“小陆”之谓。张旭的表兄弟陆景融，他的楷书，既实且美，开元、天宝年间，也有“不失家声”之评。

张旭词科出身，开元年间与会稽贺知章、润州包融、扬州张若虚以诗文并名天下，时称“吴中四士”。四人之中，张、贺并擅七绝，张旭尤以清新俊逸见长。存世有诗六首，无论薄暮劳歌，清溪濯月；江上烟云，清尊春雨，抑或落日离居，边城春草；拂地烟柳，绵绵春思，还是云雾处处，山色春晖，莫不意识清远，极其描绘写景之能事。至于脍炙人口的名作《桃花溪》，其桃花流水，渔歌问答，更是春趣盎然，千古传诵。这些质朴无华、感情真挚浓郁的诗篇，不仅“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求”[20]，而且清逸遒劲，脱尽齐、梁浮艳余风，遂为盛唐崇尚建安风骨、追求万象玲珑的绝句名品。

“吴中四士”不仅以诗文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且多以善书名世。贺知章以草书驰名开元、天宝年间，或喻之为王献之。他是陆象先族姑之子，与张旭有姻亲关系。两人行谊也甚亲密，施宿《嘉泰会稽志》记“贺知章尝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幛，忽忘机兴发，落笔

数行如虫篆鸟飞，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包融则为开元书论家张怀瓘文友，张氏有《文字论》记其事。参阅其所谓苏晋、王翰作《书赋》，兼作《书断后序》，褚思光、万希庄并有赏析，独包融不作谀语，有“知音省文章，所贵言得失，其何为竞悦耳而谀面也已。赋虽能，岂得尽善，无今而乏古，论书道则妍华有馀，考赋体则风雅不足，才可共梁已来并辔，未得将宋以上齐驱”云者，其“论书道则妍华有馀”之评，道出盛唐书论之流弊，殆非精于书道者必不可言。世不见苏晋、王翰《书赋》，或因包融之议而弃之。

豪迈清逸之士，其交必广，结纳也多。张旭、贺知章曾与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適之、崔宗之、苏晋、李白、焦遂诸人结为“酒中八仙”，纵饮长歌，独行风雅。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云，极摹其“颠状”。李颀《赠张旭》：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
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
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
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
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
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
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

亟颂其平生秉性，直喻之为道家者流，可谓淋漓尽致，无与伦比。同时，又有高適《醉后赠张九旭》：“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

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写其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兴来作书，自可称圣；醉后出语，尤见狂逸。处下位而不卑，白发老于闲事，三二逸士，一壶清酒，散发开轩，酣醉自适，恬淡虚静之性情跃然纸上。张旭之状，并非虚拟。若细究其实，自有原因可寻。是时，奸臣李林甫专权朝政，《资治通鉴》称他：“媚事左右，迎合上事，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加上开元中叶，皇后王氏被废，武惠专宠，“宫中礼秩，一同皇后”。太子瑛并鄂王瑶、光王琚皆因生母失宠而惨遭杀害。太子瑛既死，林甫则谋立寿王瑁。瑁，武惠妃所生，系玄宗第十八子，所谓太真杨贵妃者，原便是此人的妃子，但是由于高力士的力劝，玄宗终以第三子忠王玙年长，而且仁孝恭谨，又好学为理由，立为皇太子。林甫拥立寿王瑁不果，且武惠妃病亡，失去后援，惟恐太子日后即位将不利于他，遂利用职权，频起大狱，数危太子以动摇东宫地位。贺知章曾为太子右庶子与太子宾客，属太子府亲近之官，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称：“贺知章为秘书监，累年不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贺知章传》亦记“时东宫官积年不迁”，或有“听自安者”，盖与权相之倾东宫有关。张旭其“不见抽擢，栖迟卑冗”[21]者，亦或出之于同为东宫府属之故。若贺知章晚年纵诞，无复规检，乃致入道回乡，其中寓有以自昏秽、避祸远害的政治用心。张旭耽酒清狂，亦自有垒块在胸。

张旭书名起于天宝年间，蔡希综《法书论》以草书相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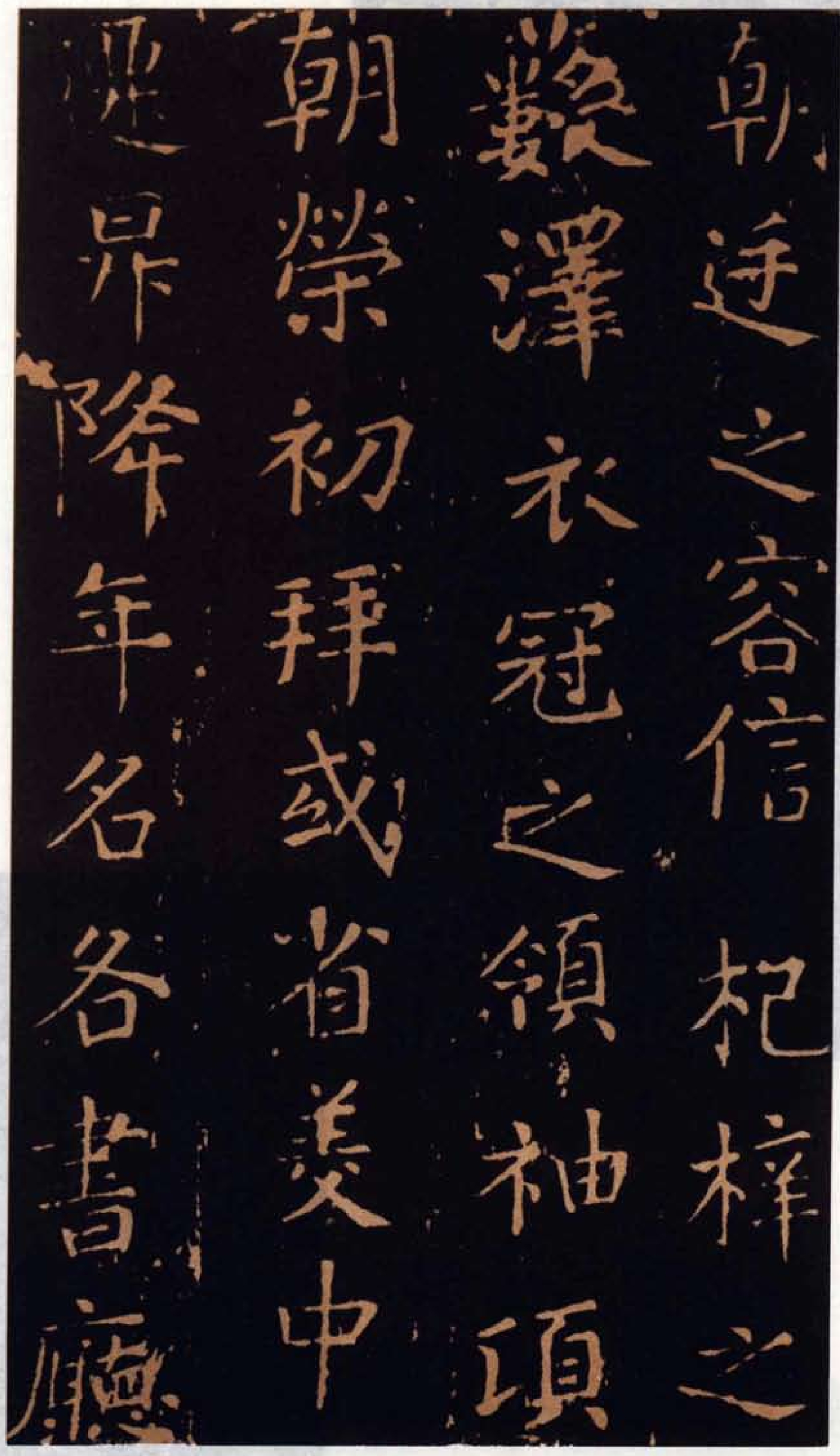
> 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王羲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王献之）之再出也。

其后，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有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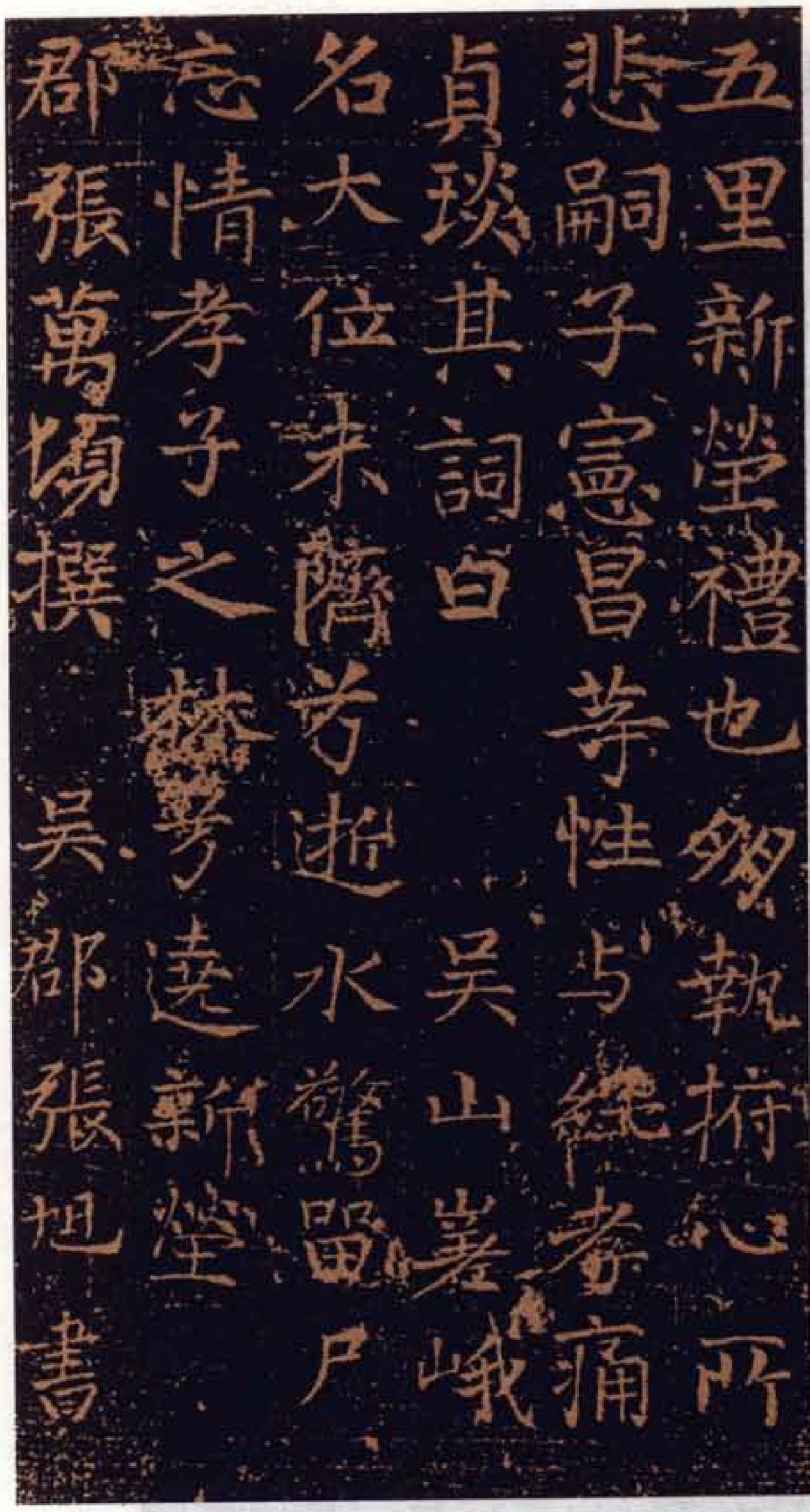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
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
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
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
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
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
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张芝、王羲之）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
杨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

皎然则更见重于狂逸，其《张伯高草书歌》："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锺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参阅其《陈氏童子草书歌》，以一少年而歌其自然、誉其狂逸云者，盖以诗人清狂之性，任凭直觉而意评之，甚至于隐其寻常清静之作，而独彰佯狂放醉之笔，复加以肆恣夸饰，以申所谓"不缚常律"之旨。至于唐文宗李昂将他的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舞剑，诏称有唐"三绝"，以及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谓"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云，其用意已显然远出论书之外。其实，张旭并非独以草书为善，其楷书，简远精妙，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评以为"楷法精深，特为真正"。又，蔡希综《法书论》有记：

旭常云："或问书法之妙，何以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



3－3.1　张旭　《郎官石记序》(局部)(741)



3－3.2 张旭 《严仁志》(局部)(742)

3－3.3 张旭 《肚痛帖》(局部)

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

盖其楷书心得，金针之度。韩方明《授笔要说》也说唐楷书，“至张旭始弘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则万字无不该于此，墨道之妙，无不由之以成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其“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存世的《郎官石记序》（图 3－3.1），精劲严重，亦有称于后世，不仅苏轼《东坡题跋》以为“作字简远，如晋宋人”，董逌《广川书跋》卷七也称“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1992 年元月，洛阳邙山发现张旭所书《严仁志》（图 3－3.2），张万顷撰，天宝元年（742）十二月一日入窆，后《郎官石记序》一年所书，作小楷书，其初出如新，虽不如前碑之深密，然端秀俊劲，亦稳正有法。李肇《国史补》所记“后辈言笔札者，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者，盖谓正、草两体。联想到旭之门人，多以楷书名世，是时张旭之正体，当不逊于草书，或有胜之。张旭草书，传有《肚痛帖》（图 3－3.3）及墨迹本《古诗四帖》二通，然颇具争议，尤其后帖，更见异词[22]，皆不如其楷书之确信可以评述之。

2. 怀素

怀素（737—?），字藏真，旧说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考功郎中钱起的外甥。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卒于贞元末年，年六十余[23]。自幼出家，经禅之余，从事艺文，尤好草书。相传其人甚好事，将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冢”。又尝广种芭蕉，用蕉叶加以挥洒，即颜其居曰“绿天庵”。好饮酒，及其酒酣兴发，寺壁屏幛、衣裳器具，靡不书之，时人谓之“醉僧”。自言得草书三昧，有“狂僧”之名。早年即以草书驰名乡里，李白《草书歌行》便有“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幛书题遍”之谓。其书，初学欧阳询，曾得以“五云体”著名的吏部侍郎韦陟赏识。其后，师从金吾兵曹邬彤学草书。邬彤是张旭的学生，乃告

以笔法。陆羽《僧怀素传》记:彤"谓怀素曰:'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宝应初年(762)为了学有门户,遂访寻名师,自零陵出游,历衡阳,走广州,客居潭州,然后经岳州,怀书入秦。因其善草书,江潭一路,名才士如李白、卢象、张谓、任华、苏涣、戴叔伦以及钱起诸人,皆有歌行称颂之,据《一统志》记载,所见诗歌有三十七首之多。近年敦煌出土写本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记之甚详,有云:

怀素才年三十馀,不出湖南学草书。
大夸羲、献将齐德,切(窃)比锺繇也不如。(王羲之、王献之)
畴昔阁梨名盖代,隐秀于今墨池在。
贺老遥闻怯后生,张颠不敢称先辈。(贺知章、张旭)
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徐浩)
含毫势若斩蛟龙,挫管还同断犀象。
兴来索笔纵横扫,满望词人皆道好。
一点三峰巨石悬,长画万岁枯松倒。
叫啖忙忙礼不拘,万字千行意转殊。
紫塞傍窥鸿雁翼,金盘乱撒水精珠。
直为功成岁月多,青草湖中起墨波。
醉来只爱山翁酒,书了宁论道士鹅?
醒前犹自记华章,醉后无论绢与墙。
眼看笔掉头还掉,只见文狂心不狂。
自倚能书堪入贡,一盏一回捻笔弄。
壁上飕飕风雨飞,行间屹屹龙蛇动。
在身文翰两相宜,还如明镜对西施。
三月月澹青江水,二月花开绿树枝。
闻到怀书西入秦,客中相送转相亲。

君王必是收狂客，寄语江潭一路人。

其前，还南下拜谒广州刺史名书家徐浩，苏涣有《怀素上人草书歌》记其事。

怀素杖锡远游，干谒名公，结交时贤，俨然如同俗流，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记其京华盛况：

狂僧前日动京华。
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
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
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
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
十杯五杯不解起，百杯已后始颠狂。
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
挥毫倏忽千万字……
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
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张谓）

任华是中唐名诗人，有耿介狷直之称。此诗乃其存世三诗之一，另两首为《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拾遗》。晚唐诗人裴说《怀素台歌》所谓“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盖本之于是。

大历七年(772)秋日，怀素持锡回乡，途出东都，适逢名书家颜真卿时客洛阳，曾趋谒拜访，僧儒论书，遂为书坛盛事。陆羽《僧怀素传》记其事：

至晚年，颜太师真卿以怀素为同学邬兵曹弟子，问之曰：“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张长史(旭)睹孤蓬惊沙之外，见公孙大娘剑器舞，始得低昂回翔之状，未知邬兵曹有之乎？”怀素对曰：“似古钗脚，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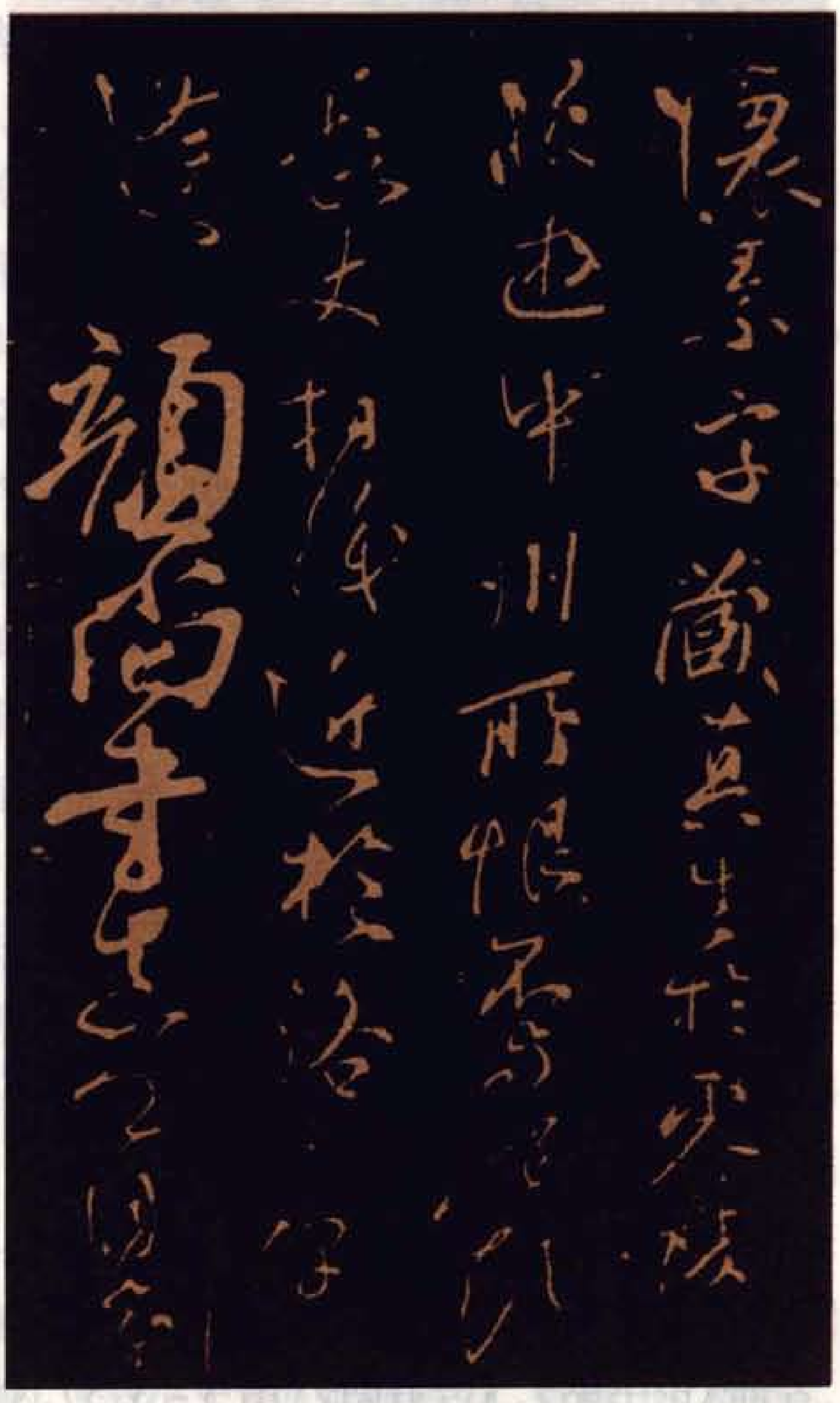
草书竖牵之极。”颜公于是倘佯而笑，经数月不言其书。怀素又辞之去。颜公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颜公脚唱“贼”。久之，颜公徐问之，曰：“师亦有自得之乎？”对曰：“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颜公曰：“噫，草书之渊妙，代不绝人，可谓闻所未闻之旨也。”[24]

同时，颜真卿也应邀为其所编的《怀素上人草书歌集》作序，有“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于伯英，尤擅其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兹降，虞（虞世南）、陆（陆柬之）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张旭）亲承善诱，亟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云。

当时，怀素作为一少年和尚，以书艺会友，当场表演，“粉壁长廊数十间”[25]，其场面之大，声势之浩，恐前无古人。且挥洒粉壁或素屏，悬空作业，饱墨淋漓处，疾运急送，其手笔之迅疾，心情之迫遽，加以略作俯视，稍加卖弄，狂姿逸态，层出不穷，并为好僧之俗客喝彩叫好。诗人又醉后兴会，随意抒写，留下诸多记述怀素早期书法艺术的诗篇。《宣和书谱》有称：“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臮（冀）、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状其势以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评者谓张长史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孰为不可。及其晚年益进，复评其与张芝逐鹿。兹亦有加无已。”传世的《自叙帖》墨迹本，旧说出自怀素的手笔[26]，其抄录的即是大历年间张谓、卢象、王邕、朱逵、李舟、许瑶、戴叔伦、窦臮、钱起诸人诗句，分形似、机格、疾速、愚劣等四项加以评述，有云：

其述形似，则有张礼部云：“奔蛇走虺势入坐，骤雨轻旋风声满堂。”卢员外云：“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王永州邕曰：“寒

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朱处士逵云：“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叙机格则有李御史舟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张公又云：“稽山贺志粗知名，吴郡张旭曾不易。”许御史瑶云：“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戴御史叔伦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语疾速则有窦御史冀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戴公又云：“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目愚劣则有从父司勋员外郎吴兴钱起诗云：“远锡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皆辞旨激切，理识玄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



3－3.4　怀素　《藏真帖》(局部)

怀素书法，似以大历七年（772）洛下论书之限。其后敛人规矩，用笔稳沉，不见有“迅疾骇人”之状，更不见好事者称狂言奇的应景论书诗篇。怀素《藏真帖》（图 3－3.4）自言：“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其或有领悟，一改旧习。当然，大历之前，怀素亦当“狂”“狷”并擅，适时

3－3.5 怀素 《苦笋帖》

相用，“或逢花笺与绢素，凝神执笔守恒度。别来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点长露。三秋月照丹凤楼，二月花开上林树”[27]。“在身文翰两相宜，还如明镜对西施。三秋月澹青江水，二月花开绿树枝。”[28]惟不见有书迹存世，其秀劲之品，或非早期书法之典型。

怀素住锡零陵，或客居长沙，并是禅宗南岳怀让(677—744）和青原行思（？—740）两派活动的地区。怀素归属何派，史无明记，但以颜真卿服膺行思，曾参拜其双泉灵迹，洛下又与其结缘投分如是，怀素大抵以出青原为近是。然而，禅宗虽张扬外学，允许并精翰墨，但仅视作“经禅之暇”中的余事，其逸笔草草，信手而书，已不当追逐形质，显示技巧为能事。怀素书迹，见诸著录者甚多，仅宋朝内府收藏，《宣和书谱》卷十九便记有 101 件，然存世可见者惟《论书帖》、《苦笋帖》(图 3－3.5)、《食鱼帖》墨迹诸种，堪近禅心，不愧为其晚期书法之代表作。

3. 张旭传人

张旭为一代书法宗师，门生甚众，李肇《国史补》明言崔邈。另据《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谓："旭传之李阳冰，李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按阳冰少徐浩二十岁、颜真卿十四岁，不当有传授之事。"李阳冰传"四字，盖衍。卢携《临池妙诀》："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滉、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又传蒋陆及从侄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传清河崔邈。"及郑杓《衍极》刘有定"五代"条下注"旭又得褚遂良馀论，以授颜真卿、李阳冰、徐浩、韩滉、邬彤、魏仲犀、韦玩、崔邈"。张旭之传人除徐浩、颜真卿、李阳冰已见专题；韦玩、蒋陆、卢野奴无考外，尚有崔邈、韩滉、邬彤、魏仲犀诸人以及画家吴道子。

崔邈，生平不详。蔡希综《法书论》称"崔长史"，或曾官长史。韩方明《授法要说》记其"贞元十五年，授法于东海徐公琦，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若是，盖韩方明之师，贞元十七年(801)尚在世。李肇《国史补》及《新唐书·李白传》、朱长文《续书断》所记，崔邈每每与颜真卿并列，两人年辈必当相近。颜真卿卒于贞元元年(785)，年七十七，或崔邈年少于鲁公。然以《法书论》所引唐人惟张旭、崔邈而不及鲁公，且记其语，有"其(张旭)为书也，推意结字以断天下之疑，垂萌示象以纪天下之德，山川草木翻覆于寸纸之间，日月星辰回环于尺牍之上"云云，崔邈书名，拟又早于鲁公。李肇、朱长文诸人崔、颜并称者，盖以书名闻达先后而论，惟其一无书迹存世。

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韩休传》附记：滉"好鼓琴，书得张旭笔法，画与宗人幹相埒。尝自言：'不能定笔，不可论书画。'以非急务，故自晦，不传于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也称其"书则师于张"，"合自然之理"。其少颜真卿十五岁，天宝初年及冠时师事张旭。陈思《宝刻丛编》卷十记有其天宝五载(746)同官主簿任上所书自撰《弥勒石像碑》一通(卫包题额)，《书小史》因是而称其"善隶书、章草"，谅其书法必非平庸粗劣之流。韩滉书迹甚少见，能见诸著录者亦仅此一

石，或其初自晦其能，后又为画名所掩，世人遂不知其善书，且得张旭之真传。

邬彤，为怀素姨表兄弟，并出刘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望出太原，官至金吾兵曹，曾客居零陵，授笔法于怀素。书法史上引以为巧喻的张旭名言“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即出其传。草书为世所重，吕总《续书评》列评唐人善草书者，自张旭至怀素十二人，彤列第六，且谓其书如“寒鸦栖林，平冈走兔”。朱长文《续书断》称其书“流便可喜”。陈思《书小史》评述尤高，以为“善草书，好（妙）得其法，时人比之张旭，盖亲得张公之旨”。然赵明诚《金石录》所收《金刚经》、《尊胜经》（乾元元年八月三十日立在湖州）二石，记作行书，以吕、朱所评彤书谓爽利疏闲者，盖不属狂獗之类，赵明诚之所以视同行书，盖其迹近，而非失误。大历七年（772）颜真卿洛下与怀素论书，以邬彤为同学，彤师事张旭，盖与鲁公同时，并在开元中叶。

魏仲犀、吴道子，并无书迹存世。

张旭正、草并擅，无愧世称，然其传人如颜真卿、徐浩、李阳冰皆以正书出，颜楷、徐隶、李篆，并名高一代，争衡千古；韩滉虽自晦其能，其书迹传世，亦仅以楷书和章草见称于宋贤。即使邬彤善草，出旭之亲传，其“流便可喜”，如寒鸦之栖，冈兔之走，实不能以大草所归指，更何况狂草更见奇怪者类。张旭草书，尤其减省二王形制之秘奥，惟有怀素以一方外之人而得传之。按怀素先从师邬彤，授受草书笔法，后遇颜真卿诱诲激劝，领悟用笔三昧，是为张旭再传弟子，特宜其释、道同归，正、草并参，“以狂继颠”，而为有唐一代草书之大家，诚如董逌《广川书跋》卷八题《怀素上帖》所云：

> 书法相传，至张颠后，则鲁公受法得尽于楷，怀素受法得尽于草，故鲁郡公谓以狂继颠，正以师承源流而论之也。然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严壁固垒，若不可犯，二人要之皆至其极地也。

其善学张旭者，洵可于晚岁书法如《论书》诸品中知之。

第四节

李阳冰与篆书名家

李阳冰，字少温，祖籍赵郡（今河北赵县），其后徙居云阳（今陕西泾阳），遂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29]。约生于开元九、十年（721、722）间，卒于贞元初年（785、787）。历任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将作少监、秘书少监，世称“李监”。早年以词学登科，为古文运动初倡人萧颖士的子弟，文章简洁雅健，有称“一代大作手”。弱冠至吴，初仕上元县尉。乾元二年（759）官至缙云令。是时七月，久旱无雨，阳冰躬祈于城隍神，与之约，五日不雨，将焚其庙。及期，甘雨沾足，乃撰记以志之。此虽谄道之举，亦可见阳冰政绩之一斑。上元二年（761）移官当涂，其年秋冬之际，诗人李白自金陵来，以叔事之，且临终呈稿，请求编次、作序。此后，阳冰便挂冠去郡，退居缙云，精研篆籀近十年。当时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涵采访至郡，令题简牍。阳冰得其知遇，遂作《上李大夫论古篆书》文，阐述篆籀之旨：

> 阳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模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制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礼；于鬓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者矣。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漫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丰同豐，李丞相将束为朿，鱼鲁一惑，泾渭同流，学者相承，靡所迁复。每一念至，未尝不废食雪泣，揽笔长叹焉。天将未丧斯文也，故

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圣运，逮兹八叶，天生克复之主，人乐惟新之令，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钦若典谟，畴兹故实，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

然是时，“草隶篆籀”，“斯道大丧”[30]，所书文字，若据《说文》，下笔有碍，阳冰虽有宏愿，终难克就。

大历七、八（772、773）年间，阳冰祇召出山，赴京出任京兆府佐吏之职。时诗人李嘉祐卸袁州刺史任，正赴吴越途中，相遇而作《送从叔阳冰祇召赴都》诗送行。阳冰在法曹任上，曾南游湖州与颜真卿、皎然诸名士周旋，皎然作《同颜使君真卿岘山送李法曹阳冰西上献书时会有诏征赴京》志其事，有“汉日中郎妙，周王太史才。云书捧日去，鹤版下天来。草见吴洲发，花思御苑开。羊公惜风景，欲别几迟回”云，颜真卿亦有诗送行，惟其已佚，不复见其交谊。颜氏诸碑版，题额多出其手（图 3－4.1）。

自魏晋以来迄至初唐，所写书体，以真、行、草为大宗，隶书绝少，篆书几成绝响，偶有几通碑额与志盖，也不见高明。贞观后，书科学生虽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精研小学，善写篆籀的也不乏其人，颜真卿一族即多以此而名世，但功夫在文字，并不以书法相重。至开元、天宝年间，正字学大盛，研习篆书者也随之日多。惟唐玄宗偏爱隶书，风骨丰丽，碑版峥嵘，且登高一呼，习隶之风盛炽，名家辈出，各以能鸣。善篆者诸如史惟则之流，虽甚称大手笔，然声名终不及隶书。“安史之乱”以后，

3－4.1 李阳冰 《颜氏家庙碑》碑额

时尚复古，更重正字之学。李阳冰一出，洞悉小学，补益文字，迎合时俗所趋，其书又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遂定为一尊，不独以“仓颉后身”名高一代，抗行真、行、隶、草之时贤，且骎骎然超越前人，直趋秦相李斯而代之。

李阳冰篆书，窦臮《述书赋》以为“初师李斯《峄山碑》，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使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其实李斯《峄山碑》，开元以前原石已佚。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拓，然尤止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敝，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或数片，置之县廨……今间有《峄山碑》者，皆新刻之碑也。”杜诗《李潮八分小篆歌》也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当时《峄山》刻本，无论石本抑或木本，既经他人加工，则已非李斯原迹，更何况归于孔子名下的《吴季札墓志》了！《江苏金石记》收有《张从申题记》一则，称孔子曾用篆书题吴季札之墓，凡十字，历代绵远，其文残缺，人劳应命，其石湮埋。在昔开元中，唐玄宗敕殷仲容摹拓，其本尚可得而传之者，至大历十四年己未岁（779）润州刺史兰陵萧定重刊于石，宪章遗范，以永将来云。又碑志始于东汉，孔子题字铭石已属荒诞，且后经殷仲容摹拓，萧定重刻，更非原来面目。观其字作籀文，如写简牍，不类后世题额风神，较之传世如郑文宝所临《峄山碑》，则更见淳朴。若是，李阳冰篆书乃从殷氏所摹《峄山》入手，参以籀文，综合运用，终于一变斯翁廓落之风，至晚年则更趋老练，美茂丰润，劲利豪爽，而为一代绝笔。加上研习篆籀文字三十年，深得其中三昧，“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随俗迁复，潜心改作，既重修字源，复增益文字，撰《说文刊正》三十卷，致使秦代篆体至中唐而复兴，诚如同时人舒元舆《玉箸篆志》所称“秦丞相斯变仓颉籀文为玉箸篆，体尚太古，谓古若无人……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历两汉、三国至隋代，更八姓，无有出其右者。呜呼！天意谓篆之道不可以终绝，故受以赵郡李氏子阳冰……当时议书者亦皆输伏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备，光大于秦相（李斯）有

倍矣”。由是阳冰之篆遂神绝中唐，尊以为“有唐字宝”。其碑版尤见称于时俗，如扬州龙兴寺《法慎律师碑》，李华文，张从申行书，阳冰篆额，时人称“四绝碑”（包括碑主）。无独有偶，《元德秀墓碣》，李华文，颜真卿楷书，阳冰题额，世谓“四绝”。同时武昌《怡亭》，裴虬文，李莒八分铭，阳冰篆序，亦誉之“三绝”。阳冰篆书，不独时人所评如是，阳冰亦自诩“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嘉（喜）、蔡邕，不足言也”[31]。至于论书家如窦臮、窦蒙兄弟，乃其世交，有通家之谊，其首加揄扬，归宗于秦斯，乃至孔老夫子，上揭《述古赋》之论虽囿于时代，不能视之为明识，然亦可见当时书论之所重。后之论书者评价更高，宋季朱长文作《续书断》，列评唐宋书家凡九十四人，分神、妙、能三品，“杰立特出，可谓之神；运用精美，可谓之妙；离俗不谬，可谓之能”，而特许阳冰与颜真卿、张旭三人为神品，并评之曰：“观其遗刻，如太阿、龙泉，横倚宝匣；华峰崧（嵩）极，新浴秋霞，不足为其威光峭拔也。”又曰，“自阳冰后，虽馀风所激，学者不坠，然未有能企及之者。”宣和朝，内府编《宣和书谱》，以“其字真不愧古作者”，列于《篆书》篇首，且称“议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论”，“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阳冰独步”。其后董逌《广川书跋》卷八，题记《新驿记》云：“阳冰在唐以篆学名世，自秦李斯后号能书者，不得伯仲间见也。今世壮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诣绝处更无蹊辙可索。”又跋《李阳冰篆千字》：“观阳冰此帖得书法三昧，虽规合矩应，不遁方圆，至其神明合离，殆无蹊径可蹈而循，因知与长史（张旭）异者，形迹之间也。”释适之《金壶记》又记时论，有“笔虎”之谓。至元郑杓《衍极》卷一《至朴篇》，取古今书家十三人，刘有定注为仓颉、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张芝、锺繇、王羲之、李阳冰、张旭、颜真卿、蔡襄十三人。郑氏推本六书，崇尚篆隶，以为阳冰之篆“独蹈孔轨”，“过于秦斯”。按李阳冰师于张旭，年龄又少于颜真卿，名位远逊之，而郑、刘两氏列名张、颜前，不具灼见卓识，其安能如是者乎！唐人碑版，宋、元时所见特多，欧阳修、赵明诚、董逌、朱长文、郑杓、刘有定辈又皆为博学精识之

士，所评阳冰，殆属不虚。

阳冰传世碑版，宋时尚多，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诸书均著录之。元、明之后，多见亡佚，虽有重立，但几经传刻，已失本来面目，且盛名之下，必多伪托，更有好事者，凡佚名篆书，或题记，或颜署，不辨真伪，皆归之阳冰名下，以致鱼龙相杂，难以确评。存世所见阳冰碑版，著名如《城隍神记》为宋宣和五年（1123）吴延年刻石；《捄先茔记》大中祥符三年（1010）安颀重开；《庾公德政碑》金贞元三年（1155）龚丘令宋祐之寻得旧纸本重刻之，今石中断，未断拓本也难以觅见。若以上引诸碑版论之，其淳古之风，邈焉不属，况且怯薄细瘦，多非古法。视《三公山》《开母》《少室》诸石阙之犹尚远，何敢企望秦相李斯哉！惟近世出土的《崔祐甫志》篆盖（图 3－4.2）十二字，原石之书，未经剥刻，其淳劲冲融，足当宋贤之评，堪称阳冰代表作。

3－4.2　李阳冰《崔祐甫志》篆盖

黄庭坚《游愚溪》诗云："下入朝阳岩，次山有铭镌。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瞿，瞿令问，山谷所颂元结《朝阳岩铭》即出其手书。袁，袁滋。"瞿、李、袁"，瞿令问、李阳冰、袁滋，三人并称，瞿令问、袁滋之篆书，亦当颉颃李监，为世所重。

瞿令问，一作令闻，生平无考。有人以为即武陵县令瞿令珪之弟，贞元书家瞿俪之叔，望出博陵（今河南蠡县），后迁南楚。永泰年间（765、766）见任江华县令，为元结道州刺史下属。大历七年（772）四月，元结卒时，曾以故吏身份竭资鬻石，送器终葬。与颜真卿亦有周旋。瞿令问以篆书有名当时，尤知遇于元结，其《朝阳岩铭》即有"县大夫瞿令问，

3-4.3 史惟则 《管元惠碑》碑额

艺兼篆籀”之说。存世书迹，可见知者，永泰二年（766）三月十五日，隶书《舜庙置守户状》附置庙户敕；五月十一日，三体《朝阳岩铭》；十二月廿日，篆书《窳尊铭》以及隶书《寒亭记》四通，皆写元结文，并出于其江华县令任上。隶书之外，《窳尊铭》结体遒劲，见称于瞿中溶，以为在袁滋之上，且“所用古文，皆有依据，无一字杜撰，以此见公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32]。《朝阳岩铭》，仿魏《三体石经》，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之。观其篆书，结法古朴，华饰有加，盖出曹喜“悬针篆”，与李阳冰玉箸篆者为别一体。有唐悬针篆，多见于碑额、志盖，如史惟则的《管元惠碑》额“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图 3-4.3）十二字，虽最见高明，然终不及其书写宏篇巨制者。有唐一代悬针之篆，当推瞿氏为第一。

袁滋（749—818），字德深，陈郡汝南（今河南汝南）人[33]。元结内弟，以荐引入仕，初试校书郎，后官至宪宗相，终于湖南观察使任上。《旧唐书》列传，有“工篆籀书，雅有古法”之称。曾充使赴南诏，至今云南昭通县尚存有其贞元十四年（798）开路置驿题名。存世书迹除此之外，尚有大历三年（768）闰八月九日篆书元结《唐颜铭》和贞元十七年（801）十一月九日篆书王颜《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两通。《唐颜铭》，书用古文体，结体颇似《碧落碑》。《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盖其晚年所书，亦参用古籀，且多别体。碑今在河南灵宝市，尚可见乾嘉拓本。

“不辨瞿、李、袁”云者，其“李”，或谓李庾，书有元结《浯溪铭》，篆

书，并立在永州祁阳浯溪，亦即元结浯溪三铭（《峿台》《唐颜》《浯溪》）之一。李庾，蒋王李恽后裔，宗正卿李齐运之子。是铭用笔圆劲，结体长方，近似李监玉箸，所异者惟竖画收笔作微尖状。

另有咸亨元年（670）《碧落碑》和垂拱四年（688）尹元凯《裕明子》《美原神泉诗碑》，并出中唐新体之前，亦为后人所重。李汉开成二年（837）曾撰《黄公记》记《碧落碑》谓："篆六百三十九字，踪迹奇古，妙绝世传。李监阳冰见□大叹异，服膺像下旬时，卒不得影响□热中以椎椎之。今有损处，若拳者□□也。然因是斯篆显于世，竞摹写所谓□落碑者。"[39]此即李肇《国史补》李阳冰"寝处其下，数日不能去"所自出。

至于李阳冰之先后以篆书名世者，尚有卫包、王遹诸人。卫包，《述书赋》与蔡有邻并称，有"功夫亦到，出于人意，乃近天造"之评；王遹亦见称于欧阳修，其《集古录跋尾》卷八评《虞城李令去思颂》，有谓"一时未有及者"，惜存世书迹已一无可见。

第五节

盛中唐的馆阁书家

1. 徐浩及集贤院善书者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望出东海，官至彭王傅，赠太子少师，谥曰"定"。新、旧《唐书》有传。父徐峤之，字惟岳，尝迎立中宗，为神龙复辟功臣。官至洺州刺史，以良吏闻，又系鉴识收藏大家。书法尤见称于当代，时人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有"自许笔精，人称草圣"之记。存世的《姚彝碑》（图 3－5.1）（开元五年四月立石，崔沔撰）方整疏秀，洵为善书老手笔。外祖张庭珪，字温玉，官至太子詹事，也是位明鉴善藏之人，以隶名世。史称："廷（庭）珪素与陈州刺史李

3－5.1 徐峤之 《姚彝碑》(局部)(717)

邕亲善……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庭)珪八分书之。廷珪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5]吕总评述有唐隶书，三百年间仅列五人，张氏赫然在内，且喻之为：“枯木崩沙，闲花映竹。”

徐浩，自开元十七年(729)以校书郎充任集贤院校理以来，历待诏、修撰，至二十四年(736)丁忧去职，担任院内行政事务官先后八年，曾知遇于上司学士、中书令张九龄，行谊有胜于郎舅。至肃宗朝，又以中书舍人充任学士、副知院事。是时，内居西掖，独掌诏敕，文笔赡精，宠极一时。后以吏部侍郎兼判院事，充任学士长达十五年之久。如是，先后两期任职二十馀年，成为集贤院中历两朝最为资深的学士。以善鉴名，曾数次充任图书搜访使搜集天下逸书，收获二王书迹达二百馀卷。同时，委派同僚直学士史惟则奉使晋州，追归乱后散佚书画。又荐引著名书论家窦蒙、窦臮兄弟入院襄助鉴别真伪。名声远播，文雅并称，当时文坛奉为宿儒，名公雅客，著名如刘长卿、独孤及、皇甫曾、常衮、钱起、卢纶、司空曙、包佶以及秦系等人，莫不以诗文酬劳，俯事交结。书家颜真卿、怀素与之亦有交往。

徐浩书法，出自家学，有三代嗣名之誉。大历年间与颜真卿齐名，有“颜徐”之称，见卢纶《敦颜鲁公送挺赞归翠微寺》诗。不独诗人苏涣《怀

素上人草书歌》有“亚相书翰凌献之”之评，书论家窦臮《述书赋》更有“娅姹锺门，逶迤王后”之论。至朱长文《续书断》更见推崇，以为：

> 少而清劲，随肩褚、薛；晚益老重，潜精羲、献。其正书可谓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尝论书云：“鹰隼乏彩而翰飞戾天者，骨劲而气猛也；翠翟备色而翱翔百步者，肉丰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书之凤皇矣。”故浩之为书，识锐于内，振华于外，有君子之器焉。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其“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草隶相参，皆为精绝。识者评云：“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尤为司空图所宝爱。

一物之评，总见仁智，《宣和书谱》不以为然，其引袁昂评语“如南冈士大夫，徒好尚风范，终不免寒气”云，讥其“殊乏天才，而窘于绳律故尔”。

纵观徐浩之书，参其议论，所谓疏密大小之经，疾徐平侧之较，乃积学所致，尽是书判写牍功夫，而且久处中书艺府，制诰书册，惟楷正是敬，直不容略差情性，有所加减。《宣和书谱》评以为“窘于绳律”，稍乏韵致者，盖为知言。返观陆羽论书，“徐吏部不授右军笔法，而体裁似右军；颜太保（师）授右军笔法，而点画不似，何也？有博识君子曰：‘盖以徐得右军皮肤眼鼻也，所以似之。颜得右军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云，其扬颜抑徐，当并非仅止于“先器识然后文艺”。陆子之论，洵知时评之严刻。徐浩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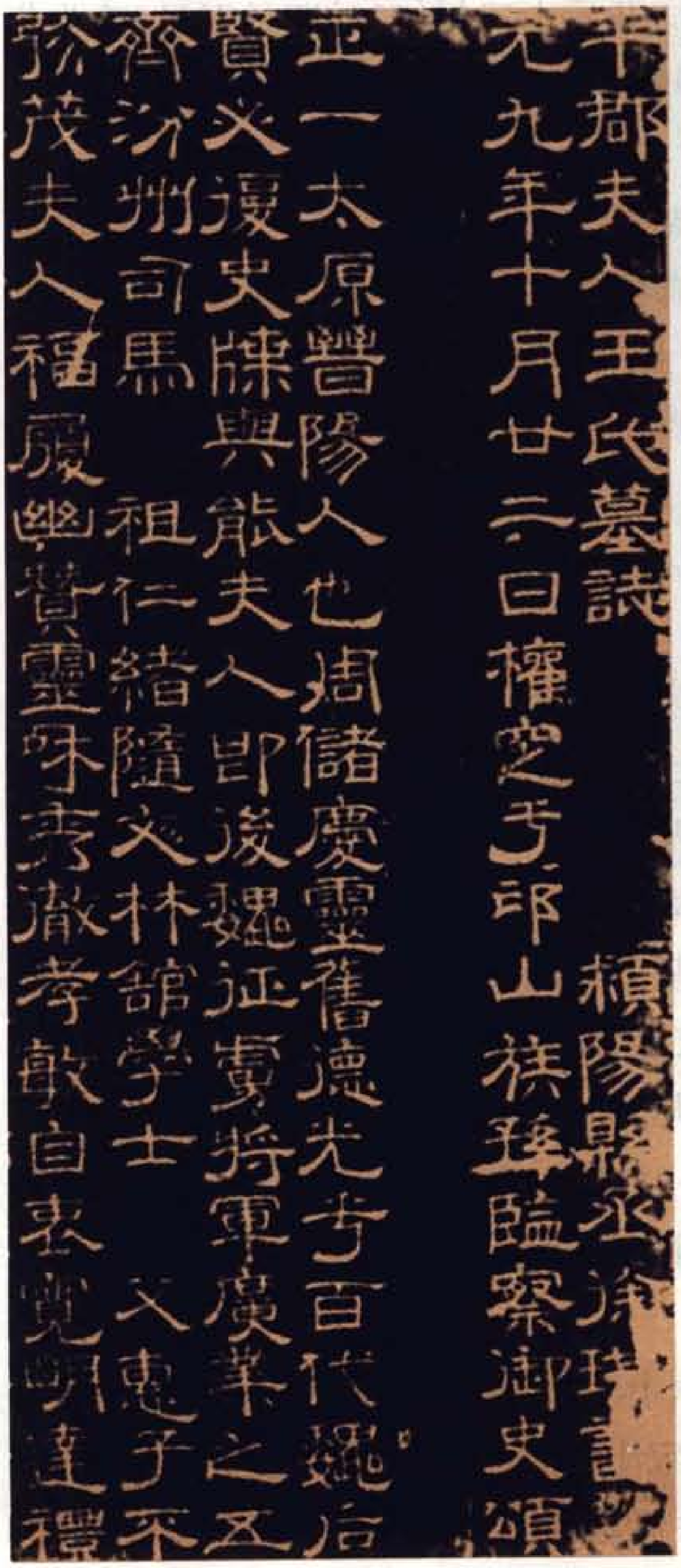
3－5.2　徐浩　《张庭珪志》(局部)(746)

3-5.3 徐浩 《不空和尚碑》(局部)(781)

书》一篇，或以为“不易之论”，其实，纯属平生写判书牍之心得，乃为院中书手之教义。

徐浩书迹，宋朝著录甚多，仅赵明诚《金石录》便收有三十八石（其中二石系题额）。现今存世且著名的，有天宝三载（744）二月五日隶书李林甫《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裴迥篆额)，建中二年（781）十一月十五日正书严郢《不空和尚碑》以及天宝五载（746）二月十四日入窆的隶书所撰《张庭珪志》。《张庭珪志》（图 3-5.2），1977 年在伊川发现，初出如新，瘦劲不失华润，有胜《嵩阳观碑》，其遒雅处尤可概见徐浩隶书早年风貌。而《不空和尚碑》（图 3-5.3），老劲平实，当为晚岁楷书之典型。中唐楷书，大都仿效之。

徐浩子侄，琇、现、珰、玫及顼、瑄、珙并能承继家学，以书名世。存世书迹可见者，徐现正书并篆额张式《徐浩碑》(图 3-5.4)(贞元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立石)，以及近世出土的徐顼正书并篆盖樊泽《李皋志》(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入窆)；徐珙隶书陈齐卿《慕容相暨妻唐氏志》(天宝元年十月十三日入



3－5.4　徐现　《徐浩碑》(局部)(799)

3－5.5　徐珙　《崔沔暨妻王方大志》(局部)(778)

窆)；隶书李邕《崔沔暨妻王方大志》(图 3－5.5，崔祐甫补叙，大历十三年四月八日入窆)；隶书王颂《王媛志》(大历十三年四月九日入窆)；隶书邵说《崔祐甫志》(李阳冰篆盖，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窆)，笔势圆劲，宜并为碑志珍品。琦，为中唐书论家韩方明之师，又以善鉴称。

集贤院为有唐诸文馆之最盛者，其初名乾元殿书院，始建于开元五年(717)。翌年十二月更名丽正院。开元十三年(725)四月五日，改为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唐会要》卷六十四有记：

> 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右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元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赵元默、校书郎孙季良，并直学士。太常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鹭，并侍讲学士。

“学士”之称，始于南北朝，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仅职掌著述。唐初文学馆，有十八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36]，其后地位日见崇重，至集贤院创立，更是显隆备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有记：“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唐玄宗还一如唐太宗，甚见礼遇学士，曾一而再地命画工反复画《开元十八学士图》，至善而藏，并亲写赞文，一一加以称颂。

集贤院前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引《集贤注记》称：“自贺知章至窦华，开元十三年(725)四月至天宝十四载(755)，集贤院学士、直学士三十三人。”其中以善书名世者，除贺知章已于第六章第四节专述之外，

尚有吕向其人。

吕向，字子回，泾州（今甘肃泾川）人，郡望出自东平（今属山东）。官至工部侍郎，《新唐书》卷二百二有传。出身翰林待诏，曾为赞喻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颖王、永王文章，亦一皇室书法教师。窦臮亲见其书，以为堪可著述，《述书赋》有称："欧、锺相杂，自是一调。虽则筋骨干枯，终是精神嶮峭。其于小楷，尤更巧妙。"尤其吕向自右补阙充任集贤院直学士后，曾数次奉敕充使建造并摹勒御碑，著名玄宗丰碑如《华岳庙碑》《庆唐观纪圣铭》便出自他的摹勒。徐安贞、孙逖并有诗称颂之。《述书赋》注称玄宗"开元中，八分书《北京义堂》《西岳华山》《东岳封禅碑》，虽有当时院中学士共相摹勒，然其风格大体，皆出自圣心"，其"院中学士"者，盖谓吕向。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以为玄宗《纪泰山铭》"相传燕、许修其辞，韩、史润其笔，以故文颇雅驯，不猥弱，隶法虽小变东京，最为秾劲，饶古意"者，后世影响很大，其实韩择木、史惟则当时尚未入院，其"不猥弱"，或所评"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者，乃出自吕向之摹勒与润饰。吕向所书碑志，仅存开元十三年（725）六月所立《述圣颂碑》（图3－5.6）一通（达奚珣序，吕向颂），正书，峭巧劲健，甚合窦氏所评，或可见吕向书

3－5.6　吕向　《述圣颂碑》(局部)(725)

法之典型。《新唐书》本传又记吕氏“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惟其笔札不得一见，难明其何为“环写”者。

其他学士如张说、陆坚，直学士如赵冬曦、韦述，亦有善书之名，并见书迹著录。张说论书，更见高明，“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初唐四家”之说，便首出于他。

集贤院中除了学士、直学士之外，尚有侍讲、待制、修撰、校理等行政事务方面的职官，地位虽低但待遇却是平等的。“学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员吏”[57]，院内官员是不以官职来分资历的。大凡宴集，学士们可同时举酒。开元十八学士中便有四位侍讲。著名书家蔡有邻、卫包、史惟则等都先后担任过院内行政职务，受到与其他登朝官乃至宰相一样的礼遇。

蔡有邻，广陵丹阳（今江苏丹阳）人，望出济阳（今河南兰考），是汉名书家蔡邕十七代孙，盛唐书论家蔡希综之从叔。官至左卫率府骑曹，约卒于天宝十二载（753）后，年寿无考。与颜真卿有世谊，为其父薛王友颜惟贞书写神道碑铭（陆据撰），又曾合作书写《尉迟迥庙碑》（图 3－5.7）（阎伯玙序，颜真卿铭）。天宝初年（742—744）以卫率兵曹充翰林学士，十载（751）改集贤院待制，成为院中专职书家。

3－5.7 蔡有邻 《尉迟迥庙碑》（局部）

卫包，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司虞员外郎。天宝中叶入院为修书，与蔡有邻同事。以小篆、隶书见称，约卒于

天宝末年出贬夜郎尉任上。

《述书赋》蔡、卫并称，有“卫包、蔡有邻，功夫亦到，出于人意，乃近天造”之评。参其注“卫包……通字学，兼象纬之术”，盖一学者；又称“蔡有邻……本拙弱，至天宝之间，遂之精妙，相、卫中多其迹”，蔡氏之相、卫碑版，多数出自天宝前任职外官时手笔。所谓“精妙”者，若出自晋京入院供奉之后所书，其书法自当有所改观。窦氏，蔡、卫之同时人，所见既多，其评又不见谀语，洵属可信。然卫包书法，绝无片石可见。蔡有邻书迹，天宝前惟有两石，即开元二十四年(736)二月八日隶书邵混之《庞履温碑》，立在赵州元氏；二十六年(738)二月二十五日隶书阎伯玙《尉迟迥庙碑》(颜真卿铭)暨阴，立在相州。天宝后也仅存天宝七载(748)十月廿□日所立隶书韦述《章仇元素碑》残石十四行(行十四字)，盖出集贤院中所书，然已磨泐不可辨，未能确知窦氏之所谓“精妙”者。

史惟则，字向，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望出杜陵(今陕西西安)。官至都水使者，约卒于大历初年，年寿无考。其自开元二十四年(736)以伊阙县尉入院充任待制兼校理始，历直学士，至学士，先后凡三十余年，是院中供奉最久的专职行政人员。安史之乱后，曾以明鉴善识奉使晋州，搜访散佚图籍，尝获《黄庭经》及扇书《告誓》等四卷、二王真迹四卷归奉朝廷，深受玄宗赏识，王维亦有诗颂述之。

史惟则善篆籀飞白，尤以隶书见称于史，《述书赋》有“阶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应变”之誉。吕总《续书评》列为唐隶五家之一，与梁昇卿、卢藏用、张庭珪、韩择木并名，且有“雁足印沙、深渊鱼跃”之喻。其后，有称唐隶书名家者，时有变易，而史氏始终未见弃汰。起初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为唐世隶书，惟“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及惟则也”。朱长文《续书断》则仅取韩、蔡、史三家，而弃李氏。韩入妙品，蔡、史能品，然韩、史立传，蔡仅附列姓名。至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出，韩、史并称，而未及蔡、李，其后之论书，便大抵本此仅涉韩、史两家矣。今观宋代金石经籍所载唐人隶书遗迹，史惟则存世特多，韩择木次之，蔡有邻甚少，李潮更无可见。即梁昇卿、卢藏用、张庭珪三家，碑版虽多，惟功力不及，风韵更

3－5.8 史惟则 《大智禅师碑》(局部)(736)

3－5.9 史惟则 《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篆额(771)

俗。韩、史之声名，不由其不广远矣！

史惟则存世书迹，著名的是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十八日所立隶书并篆额严挺之《大智禅师碑》（图 3－5.8）暨阴（阴记，阳伯成撰。阳、阴并史子华刻字）和 1980 年 7 月洛阳发现的隶书并篆额苏预《管元惠碑》（天宝元年二月十五日立石，张乾护、张仙乔刻字）二通及大历六年（771）七月十五日韩择木隶书韩雲卿《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篆额（图 3－5.9）“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十五字。《大智禅师碑》，老劲庄严，尤见称于王世贞，其《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有云“其行笔绝类《太山铭》，而缜密过之，知开元帝润泽所自耳”。《管元惠碑》虽出汉魏遗法，然已丰润有加，时见平满，洵为唐隶初貌。有唐新风或因是而肇启，宜允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有“惟则分隶为开元时第一”之评。至于篆书，《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额十五字，纯出玉箸，风韵不减李阳冰，且与《管元惠碑》额十二字所作悬针篆者，迥然二途，是知《述书赋》“折衷”“应变”之评，并非虚语。

2. 韩择木及翰林院善书者

集贤院之外，著名的馆阁便是翰林院，创建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其初并无名号，是“内参谋猷”，草拟诏命，临时性差遣的职务。自武德贞观以来，凡乘舆所在，必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38]，以备顾问。乾封（666—668）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年，置“翰林待诏”，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其后，选用日重，而礼遇益亲，时人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逐渐参与政治，演为皇帝近臣。翰林之名，虽因词学而称，然其善书者亦列为首要，以工书入翰林院为供奉者，不乏其人。诸学士中以书名声高一代者，韩择木尤殊。

韩择木，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望出昌黎。约生于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出身国子监太学生，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集贤院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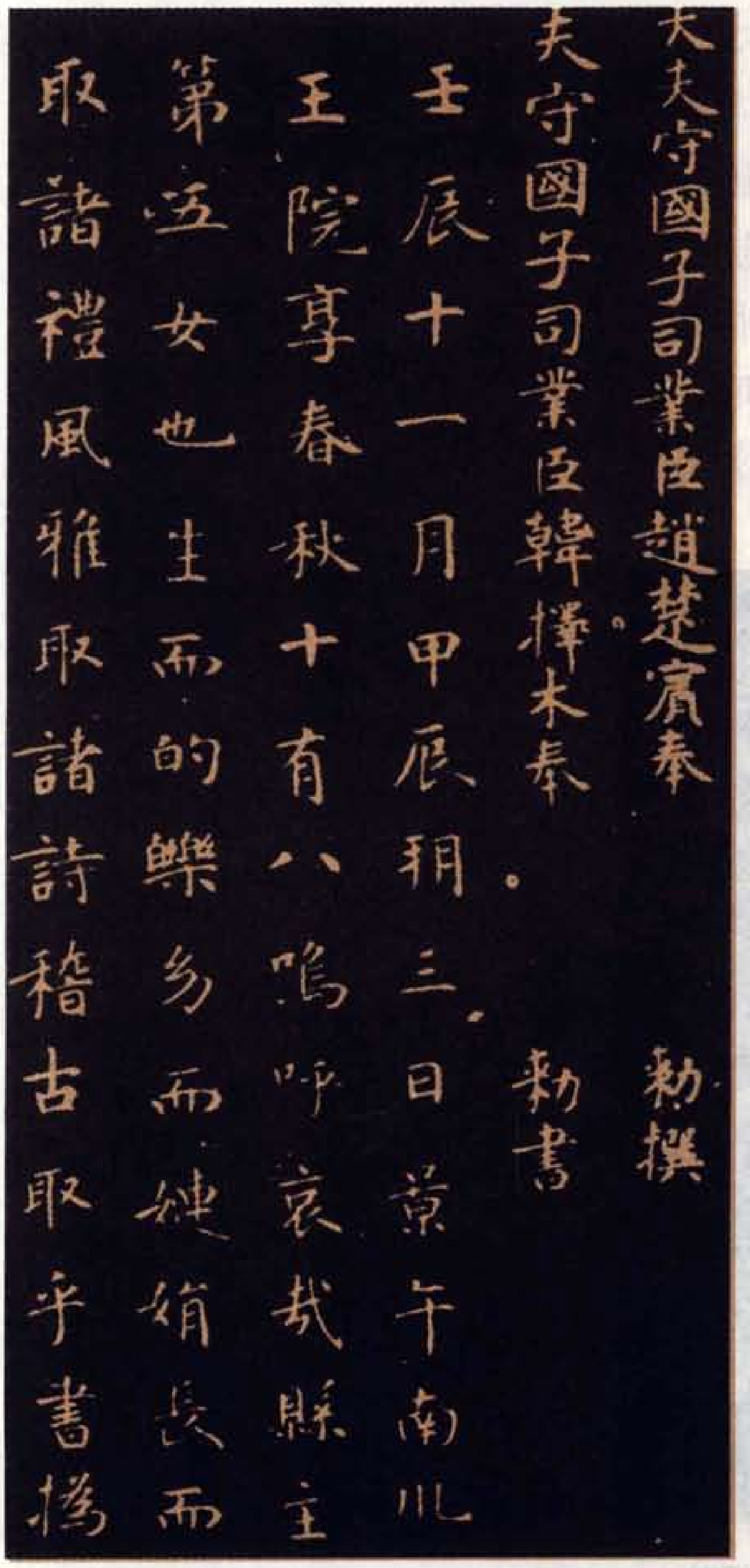
3-5.10 韩择木 《叶慧明碑》(局部)

副知院事,广德元年(763)致仕退隐田园,约卒于大历初年(766—768),享年七十馀岁。自天宝初年供职王府以来,迄至天宝末年出任鲁郡太守,先后担任太子、诸王侍书达十馀年之久,是皇室的一位资深专职书法教师。尝与颜真卿交游,共赏名相狄仁杰之文。宝应元年(762)与徐浩联袂掌判集贤院事。同时与史惟则也有往来。

韩择木以隶书驰名盛唐,与蔡有邻见称于杜甫。杜诗《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有云:“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昔在开元中,韩、蔡同翕赩。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御札早流传,揄扬非造次。三人(加顾文学诫奢)并入直,恩泽各不二。”《李潮八分小篆歌》亦称:“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窦臮论有唐隶书,首推韩氏,其《述书赋》有评“八分中兴,伯喈(蔡邕)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至朱长文更见崇重,不特视以为与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盛中唐徐峤之、徐浩、怀素,晚唐柳公权、沈传师诸人同侪,并于《续书断》立传颂述:“时韩雲卿以文显,李阳冰以篆显,择木以八分显。天下欲铭其先人功者,不得此三人,不称三服。”又评之谓,“观其迹,虽不及汉、魏之奇伟,要之庄重有古法,而首唱于天宝之间,宜置妙品。又如山东老儒,虽姿宇

不至峻茂，而严正可畏。”韩氏书迹，宋朝所见尚多，纵观存世诸迹，“老儒”之喻，堪见中肯。

韩择木存世名碑，有开元五年（717）七月七日立在金乡的隶书李邕《叶慧明碑》（图 3－5.10），天宝元年（742）四月十日题在华阴的《告华岳文》，并系翰林院中供奉时手笔。大历六年（771）七月十五日立在京师的隶书韩云卿《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史惟则篆额），其碑久晦新显，碑面文字无泐，精劲丰茂，一无翰苑陋习。以此碑观之，《述书赋》所谓“八分中兴，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其比类蔡邕而为异代并绝者，洵为知言。另《汝帖》收有至德二载（757）所书《狄公帖》一通，其兴致所起，即时留题，虽出刻拓，精神或损，然亦可见其平常书写之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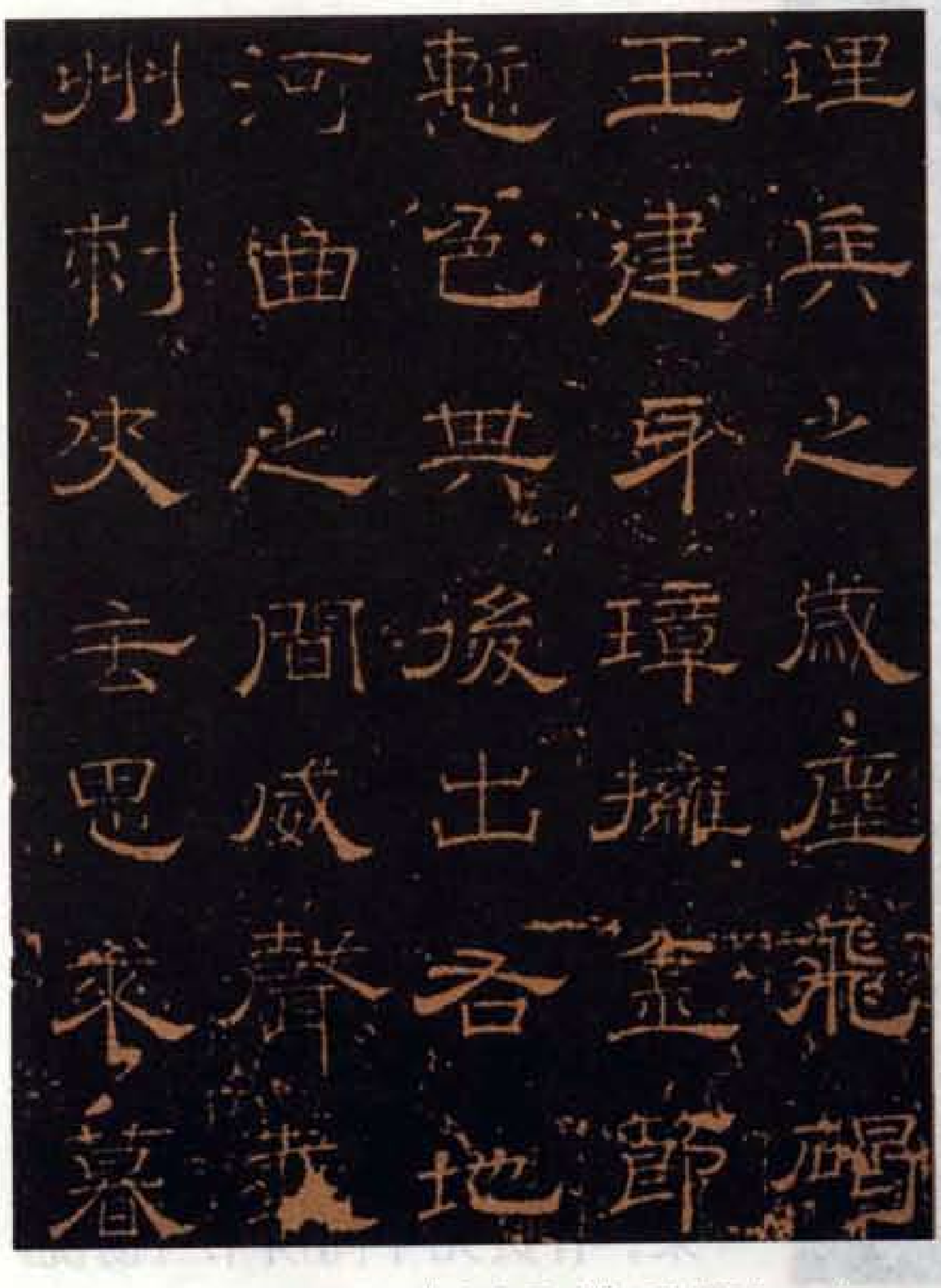


3－5.11　韩择木　《南川县主志》（局部）

韩择木不独隶书名世，其小楷如《荥阳王妣朱夫人志》、《南川县主志》（图 3－5.11），皆奉敕书，清劲端严，亦并高于同代书家。

大匠宗门，宜多异材。韩择木诸子秀荣、秀实、秀弼，皆能绍承家声，以书名世。秀荣，有贞元年间所书《畅悦》《辛京杲》《郑叔清》《王之咸》

《马炫》及《薛公》六碑，并隶书。惟其仅见宋人著录，一无流传；秀实，官至太子中允，充任翰林待诏，封爵武阳县男，著录可见有隶书《薛嵩》《郝玉》《李光进》三碑和《辛浩》一志。曾与李阳冰（篆额）合作书铭韩雲卿《鲜于氏里门记》《平蛮颂》《禹庙碑》三通。又题颜真卿所书《马璘新庙碑》隶额。然书迹甚少存世，即有数石，亦已漫漶难见形质。惟有近世出土的《李氏志》（独孤愐撰，大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入窆），虽作小隶书，其严整清劲，亦足可想见丰碑巨碣之风采；秀弼，官至国子司业，封爵淮阳县男。韩氏兄弟，书迹以秀弼见诸著录为最多，且有碑石流传，尤特盛称于后人。所书碑志可见者，有《臧希晏》、《李深》、《裴公》（李阳冰篆额）、《李自正》、《元待聘》、《李元谅》（李彝篆额）、《李晟》、《李齐物》八碑，《陈氏》一志和贞元七年（791）《同官》一记，又奉敕篆书题《李抱真碑》额一通（《臧希晏》《李自正》两碑篆额亦出秀弼所题），其中以《臧希晏碑》最为著名。



3－5.12 韩秀弼 《臧希晏碑》（局部）（770）

按《臧希晏碑》（图 3－5.12），张孚撰文，大历五年（770）十月十五日立在三原县长坳乡臧氏祖茔。臧氏为代宗朝显贵，父子两代碑志，多出名家之手，以书而言，怀亮、怀恪兄弟，出自李邕、颜真卿之手；其子希忱、希让，乃为韩择木、张璪所书。希晏为希忱弟、希让兄，秀弼为之铭石，以其一后生，而能偕父并书达官之碑，书名之显隆，自可想见。另外，《李元谅碑》也见称于赵崡，《石墨镌华》卷三有“固是家翁嫡传”之谓。

盛中唐翰苑善书且可称述者，尚有刘秦、顾诫奢诸人。

刘秦，京兆泾阳（今陕西泾阳）人，郡望出自彭城（今江苏徐州）。为翰苑书人，后官至秘书监。以行书著名，天宝年间曾行书李邕《陈文叔碑》、张渐《唐玄宗第五孙女志》（图 3－5.13）。近世出土的《刘奉芝暨妻赵氏志》，赵昂撰，上元二年（761）正月十一日入窆，其行书全出《圣教序》，而加丰腴。《述书赋》评同时书家，尤盛称其妹马氏妇，有“临效逼斥。《安西》《兰亭》，貌夺真迹。如宓妃遗形于巧素，再见如在之古昔”云，而不言刘秦，且直称书人，其书或仅为翰苑风貌，非“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也。其另有一妹名刘鸿，为中唐行书名家张少悌之夫人，或亦一善书人。

3－5.13 刘秦 《唐玄宗第五孙女志》（局部）

顾诫奢，天宝十五载（756）见任太子率更丞，上元年间（760、761）为太子文学。以隶书名世，《金石录》收有《郭慎微碑》（郭汭撰）、《郭英奇碑》（苏预铭，韦述序）、《吕谭庙碑》（卫密撰）和《吕谭表》（元结撰）四石。其乃杜甫之友，杜甫有《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志其事。后诗称：“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顾侯运炉锤，笔力破馀地。昔在开元中，韩、蔡同鼎贵。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御札早流传，揄扬非造次。三人并入直，恩泽各不二。顾于韩、蔡内，辨眼工小字。分日侍诸王，钩深法更秘。”以顾诫奢并侪于韩择木、蔡有邻，而云小字胜之，且杜甫自诩能书而委其题壁赠歌，可谓推崇之极。1984 年西安高楼村出土的《高元珪志》（苏预撰，天宝十五年正月二日入窆），隶书丰茂精劲，不在韩择木之下，杜公所云，盖非虚誉。篆盖“大唐故左威卫将军赠陈留郡太守高府君

墓志铭”二十字，作玉箸篆，圆健丰茂，有胜于史惟则，若其亦出自顾侯手笔，又当为篆书新体之一始作俑者。参证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记《吕諲碑》，“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云，其盖一如韩择木、蔡有邻、史惟则诸馆阁名家，亦为博涉多优，诸体并擅者也。

其他翰苑善书且有碑志存世者，尚有刘朝《慕容曦皓志》（孙成撰，大历四年二月十日入窆）、毛伯良《刘氏志》（王涚撰，元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入窆）、《贾雄志》（毛伯良并撰，开成元年十月十九日入窆）和郗从周《梁氏志》（郗从周并撰，长庆二年二月十一日入窆）诸石，并正书，皆近年新出，甚可观。

唐代馆阁，除了弘文、崇文两馆，集贤、翰林两院及史馆外，尚设有广文馆，置于天宝九载（750）七月十三日，郑虔为其首任博士。郑虔，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人，官至著作郎，后因受安禄山伪职，出贬为台州司户而卒。曾献诗篇及书、画，为唐玄宗所赏，题曰“郑虔三绝”。与杜甫友善。大历初年，杜甫追念名将王思礼、李光弼，名相张九龄，素交严武、汝阳王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一人一诗，合称《八哀诗》，其中郑虔篇，亟颂其书画，有称：“圭臬星经奥，虫篆丹青广。子云窥未遍，方朔谐太枉。神翰顾不一，体变锺兼两。文传天下口，大字犹在榜。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沧州动玉陛，寡鹤误一响。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不仅诗人作如是评，书论家吕总《续书评》历评有唐真行书薛稷以下 22 人，郑虔亦名忝其间，且喻之云：“如风送云收，霞催月上。”郑虔书名如此，惟著录可见仅《宝刻类编》卷三所记开元二十三年（735）《华山石阙题名》一通，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九记其六行，三十四字，隶书，史子华刻，已残缺不可句读。近闻俄罗斯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收有郑虔残札一枚，十一行半[39]，书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二月间。吉光片羽，或可补书史之缺。

此外，近年出土墓志，有宪宗朝广文馆进士习绎正书并篆盖所撰《董文萼志》（元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入窆），文宗朝广文馆博士裴居实正书《裴成志》（裴从实撰，开成元年四月三日入窆），一学二王，一出颜字，虽非雅或善，当亦属能书者类。

第六节

其他书家

盛中唐名书家，上章未能列，下篇不及见，而亟待补述者，首推隶书如梁昇卿、刘昇以及戴千龄诸人。

梁昇卿，开元二年（714）直言极谏科及第，初仕奉天县尉，后官至广州都督，太子右庶子，约卒于天宝初年。与张九龄友善，史称始终不渝。博学工书，尤以隶书名世，《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韦抗传》记其开元十四年（726）所书《东封朝觐碑》，“为时绝笔”。吕总《续书评》列论有唐隶书，梁昇卿名冠其首，且喻之谓“惊波往来，巨石前却”。朱长文《续书断》归之于能品。其书迹，宋代见诸著录者凡十八石，存世可见惟《御史台精舍碑》（图 3－6.1）（崔湜先天、开元之际撰，开元十一年追书立石）与《郑曾碑》（梁昇卿并撰，开元二十四年五月立石）二通，尤以《御史台精舍碑》著名。《御史台精舍碑》平整丰润，已初具唐隶规模，而一无胥吏习气如后之台省、翰苑书人之铭石者，更为

3－6.1　梁昇卿　《御史台精舍碑》（局部）（723）

论书家如王世贞、赵崡辈所推重。

刘昇(676—730),字陟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德功臣刘德威之孙。永昌年(689),年十余岁,因父彭州长史刘易从为酷吏诬陷冤死,坐之,流配岭南。至景云(710、711)中,特授右武卫骑曹参军。开元中,累迁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擅文工诗又善书,尤以隶书称。李翊《刘昇志》有称:"周流六籍,该览百氏,穷草隶之妙,擅词赋之工,江沱之人皆典于学。"其书迹,宋季见诸著录者四石,并隶书,尤以《华岳精享昭应碑》(咸廙撰,开元八年立石)最为著名。赵崡《石墨镌华》卷三称其"隶古,遒逸有汉人遗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批法,不可得矣"。吴玉搢《金石存》卷十三亦谓:"昇书法颇瘦劲,当开元间隶体极盛日,绝无一笔羼入韩、史门庭。其用笔用字全类魏、齐时碑版,亦唐刻中之仅见者。"唐代隶书,规模出自魏、齐。刘昇之书,严整警策,且杂用诸体,多见变体别构之字,盖唐隶新体之始作俑者,为韩、史诸人之先进。

戴千龄,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盖一处士。赵明诚《金石录》收有两石,以隶书《北岳安天王碑》名世。按《北岳安天王碑》,李筌撰,戴千龄并篆额,天宝七载(748)五月廿五日立石。有碑阴,康杰撰序,司仓参军马克广以下三十人及道士刘处一题名,并戴千龄隶书,韩休烈刻字。是时安禄山反形未著而权势颇盛,故碑文极其歌颂之辞。此碑书法,雄峻遒美,不见唐隶格局,朱彝尊甚为推重,其《曝书亭集》卷四十九以为:"笔法淳古,远在韩择木、蔡有邻、梁昇卿、张庭珪、史惟则诸家之上。"斯或可见未趋时尚的盛唐闾阎风貌。

正书之名家或名碑,不出台省书人,又亟可称述者,尚有韦纵、郑馀庆以及《少林寺碑》《兖公颂》《李宝臣碑》《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和《南海神庙碑》诸石。

韦纵,即叶昌炽《语石》以为"颜鲁公同时得笔法者",出自彭城公房,为陈王府长史友谦之子,官至左金吾卫兵曹参军。赵明诚《金石录》收有《盐池灵庆公碑》《崔淙碑》两石,皆正书并篆额。又有《王卓碑》正书,王颜撰,袁滋篆额。以《盐池灵庆公碑》最著名。此碑,崔敖撰,贞元十

三年(797)八月廿日立石，盖书于专知度支安邑县盐池将仕郎任上。是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为“有龙跳虎卧之气”；叶昌炽《语石》谓“用拨灯法，蛟螭郁律，得鲁公之筋骨”。其实当时颜真卿书名未起，家族之外，未见得有人私淑。《语石》又称：“颜鲁公同时得笔法者，有二家。曰韦纵、曰胡证。”甚或以为两人并写颜字，斯者，盖属臆评。按胡证(758—828)，字启中，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官至京兆尹，有令声，以坚正称，所书碑版著录多见隶书，即使正书《重修狄梁公祠堂颂》(冯宿撰，元和七年十月立石)，亦未见有人言其书如颜体。反观《广艺舟双楫》以柳公权所书《高元裕碑》误归韦纵者，韦纵正书盖近柳书，乃为中唐新体，或特多翰苑之时习。后世每每以近徐浩、颜真卿风貌者归之于学颜，盖不明颜书亦出于中唐新体，尤与翰苑书人之铭石书形质几同。

郑馀庆(746—820)，字居业，一作展业，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人。大历十二年(777)登进士科，后官至宪宗相，封爵荥阳郡公。卒，谥曰贞。书法以“遒熟可喜”见称于朱长文《续书断》，列入能品，排名邬彤、韩愈间，且立传云：“宪宗时能书者几希，如馀庆者已为精笔矣。”宋代著录有其书迹凡十一石，以《樊泽碑》最著名。

盛唐名石《少林寺碑》，全称《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裴漼撰并正书，开元十六年（728）七月十五日立石，初见称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其卷一百三十五有谓：“裴少时负文笔，号霹雳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辞至沓拖，不可读，而书颇秀劲多媚态，得非时代为之耶？”复延誉于赵崡，其《石墨镌华》卷二以为“书法秀劲，其得意处渐升伯施(虞世南)之堂矣”。按裴漼(？—736)，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万岁通天元年(696)，应大礼举，授陈留主簿，后官至太子宾客，封爵正平县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卒，年七十余，谥曰懿，为唐骨骾清廉之士。此碑，书于吏部尚书任上。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其《上党宫述圣颂》，亦正书，张说撰，先《少林寺碑》五年立石，惜今不传。

《兖公颂》，全称《兖公之颂》，曲阜县令张之宏奉都督李庭诲之命为兖公颜回作颂，州中处士包文该正书，隶额。天宝元年(742)四月廿三日

立石。此碑遒劲有法，俨然北碑气概，与时风迥然有异，故亟见称于包世臣，有评“峻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并作诗云：“三唐试判俗书胚，习气原从褚氏（遂良）开。《兖颂》只今留片石，独无尘染笔端来。”[40]其后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又嗣声相和，有“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云。书者事迹无考。

《李宝臣碑》，全称《成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支度营田使清河郡王李公（宝臣）纪功载政颂》，判官王佑撰，推勾官王士则正书并篆额。永泰二年（766）七月一日立石。书者王士则，出自契丹怒皆部落，其父武俊，为安禄山旧部，因劝主将李宝臣归唐，授恒冀观察使，后偕通议郡王朱滔叛，自称王，国号赵。寻经人劝说，遂去伪号，诏拜检校工部尚书、恒冀深赵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卒，谥曰忠烈。王士则乃其季子，元和十年（815）见任邢州刺史。此碑，盖书于其父归唐不久，时以太子司仪郎为成德军节度使属员，乃其早期手笔。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称其“书法遒劲潇洒，有李北海（邕）、张从申之笔”。陈奕禧《隐绿轩题识》以为“笔法遒逸，有汉人遗意，绝似孟頫赵公所作，因知吴兴源远流长，所本不独二王也”。此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谓“吴兴用意结体，全以王士则《李宝成（臣）碑》为枕中秘”云者之所本。至叶昌炽尤见叹赏，《语石》卷七有谓“士则为武俊之子，其先契丹奴，皆部落人。武俊出燕骄将安史遗孽，而其子乃工于染翰，不可谓非犁牛骍角。然书笔纵横跳荡，使笔如剑剑气出，犹有健儿身手。其魄力雄，故媚而不失之纤；其气机横，故熟而不流于滑”。《金石录》收有其隶书《尊胜石幢铭》一石，崔恁撰，天宝九载（750）六月立，较《李宝臣碑》早十七年，应当更年少鲜华，惜不得见。参《李宝臣碑》之额乃其篆书所题，亦当一诸体兼善者。以契丹族人而善书如是，洵宜见重于世矣。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大秦寺僧景净撰，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正书。建中二年（781）正月七日立石。明崇祯年间发现，现存陕西博物馆西安碑林。书者事迹无考，惟其碑秀逸遒劲，且晚出甚少损泐，不失为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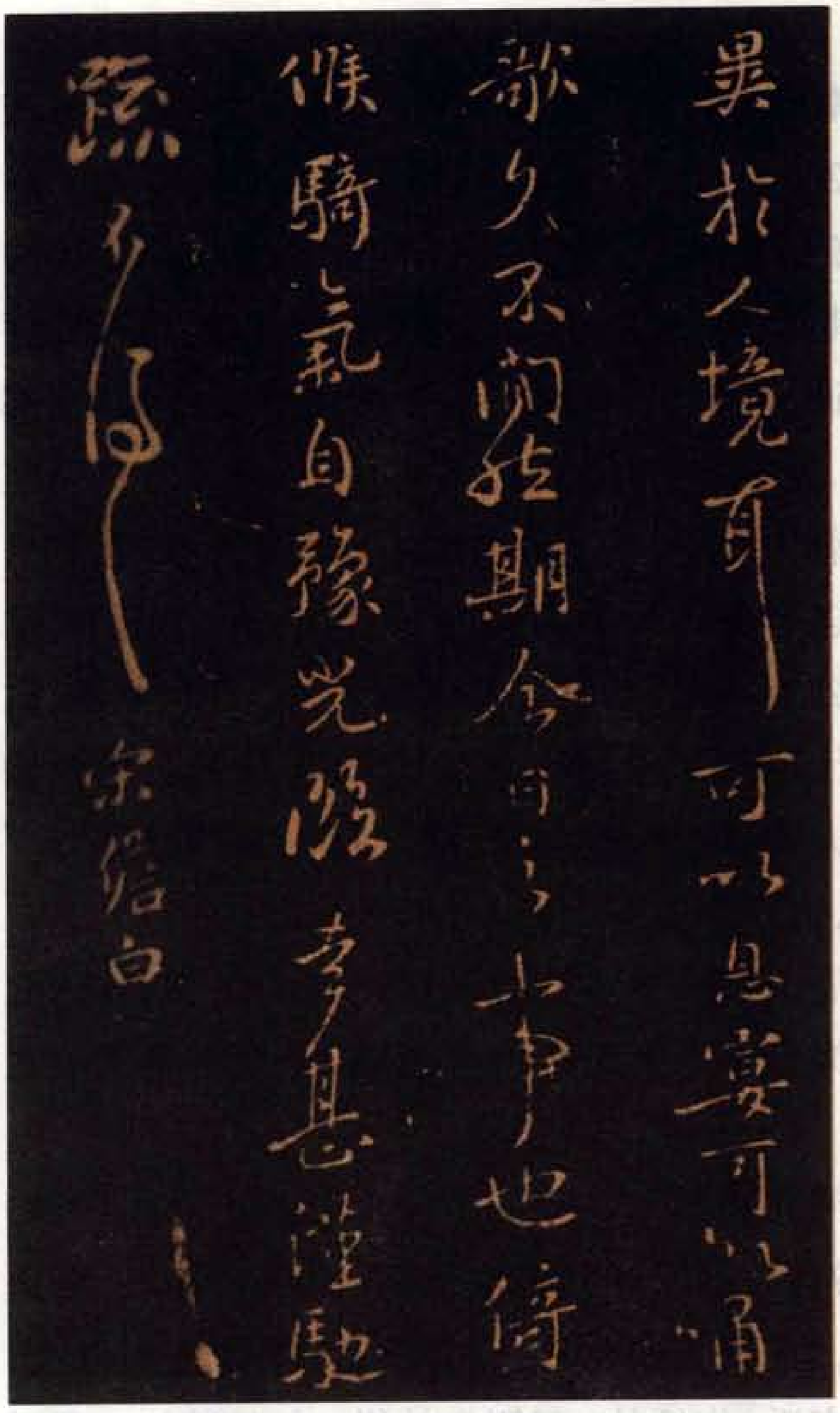
存世之佳刻名石。

《南海神庙碑》，全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韩愈撰，循州刺史陈谏正书并篆额。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一日立石。书法疏朗圆劲，见重于翁方纲。覃溪选有唐一代正书五十种，又择其最上选者，编为《苏斋唐碑选》凡三十六种，是碑忝列其间，亦视之为“仰承晋法，为圭臬”者，且评之谓“亚于虞、褚”。书者陈谏，郡望出自颍州，与王叔文等友善，以仓部郎中、判度支参与永贞革新。宪宗即位后，贬台州司马，乃著名八司马之一者。其后历封州、循州两刺史，至长庆元年(821)三月改为道州刺史，卒于任上。《金石录》又收其《辛秘碑》，牛僧孺撰，元和中立，亦正书，惟其宋季已佚。八司马多善书，刘禹锡、柳宗元和韩泰之外，尚有王伾，杭州(今属浙江)人，以能书入仕。《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本传称：“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诵，即后之顺宗)侍书。”有行书《董晋碑》(权德舆撰，贞元十五年立石)存世。

行书之名家宋儋、段季展、林藻、郑雲逵以及房璘妻高氏和名碑《北岳府君碑》，亦皆不同平常，为盛中唐书坛所不可或缺者。至于集王羲之书诸碑亦当一叙。

宋儋，字藏诸，广平(今河北鸡泽)人，高尚不仕。开元十六年(728)因户部侍郎宇文融荐授秘书省校书郎。其名位未高，而书名甚显，窦氏《述书赋》以宋儋、李璆并称，有“擅美中州”之誉。又称“李师王而意浅，宋祖锺而体流”，并注云：“(宋氏)作锺体，而侧戾放纵，迹不副名。开元末，举场中后辈多师之。”而吕总《续书评》评其楷、行之书，有“暮春(春秋)花发，夏柳低枝”之喻，所见或非“侧戾放纵”者也。书迹宋季著录凡二石一纸，即《道安禅师碑》(隶书题额，开元十五年十月廿日立石)、《珪禅师碑》(开元二十三年四月立石)和《淳化阁帖》所收之《接拜帖》(图3－6.2)，皆儋撰，并行书。以《道安禅师碑》最著名，笔墨精劲，风致超逸，盖出同时行书诸家之上。以是碑视之，《述书赋》之评，有见偏颇。

段季展，米芾自言书学其人，见《群玉堂帖》所收米帖。《宣和书谱》卷四有称大历名诗人戎昱作字有楷法，用笔类似其人。朱长文《续书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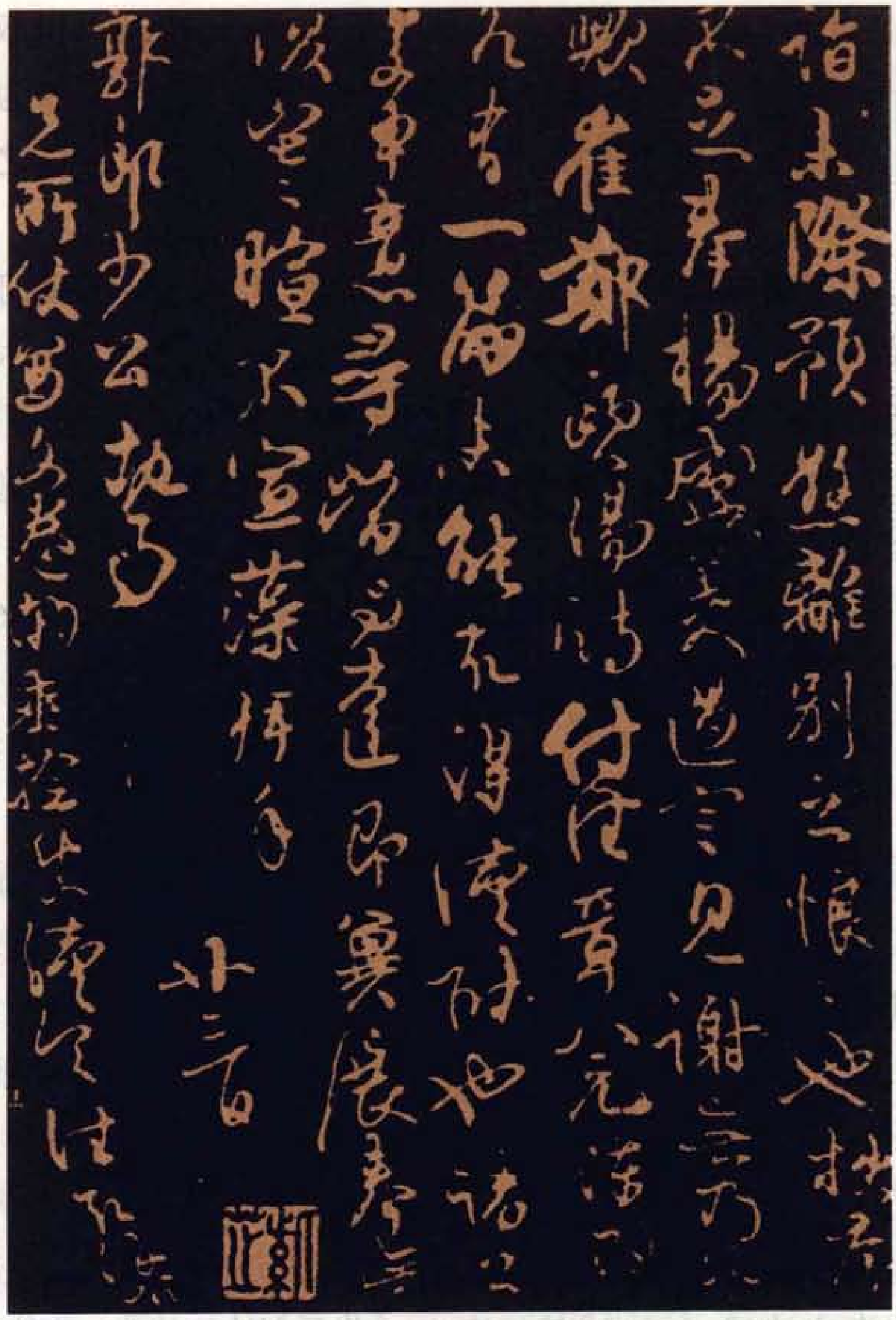


3-6.2 宋儋 《接拜帖》(局部)

列入能品，且立传称："段季展与刘晏同时，晏领财赋，有大功，其所与，多天下贤士，季展盖其徒也，独以《禹庙碑》见知于周子发，遂为时人所称，其运笔流美，亦足贵尚云。"按《禹庙碑》，崔巨撰，大历三年（768）十一月立石，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曾经收录。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称其"笔势劲拔，极可尚也"。沈曾植尤重其书，其《海日楼札丛》卷八引《护德瓶斋涉笔》，特立一条目，谓"《宣和书谱》称戎昱书学段季展。盖季展亦沈传师之流"。

林藻，字纬乾，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郡望出自济南（今山东邹平）。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科，官至岭南节度副使，与弟林蕴[40]及欧阳詹（行周）并为闽中名士，时人有"欧阳独步，藻、蕴横行"之语[42]。以善书见称于《宣和书谱》，其卷十有评："作行书，其婉约丰妍处，得智永笔法为多。"存世惟《深慰帖》（图3-6.3）一通，曾入宣和内府，《宣和书谱》之论述，盖出于是。

郑雲逵（？—806），荥阳（今属河南）人，大历元年（766）登进士科，以善画为幽州节度使朱泚所善，表为节度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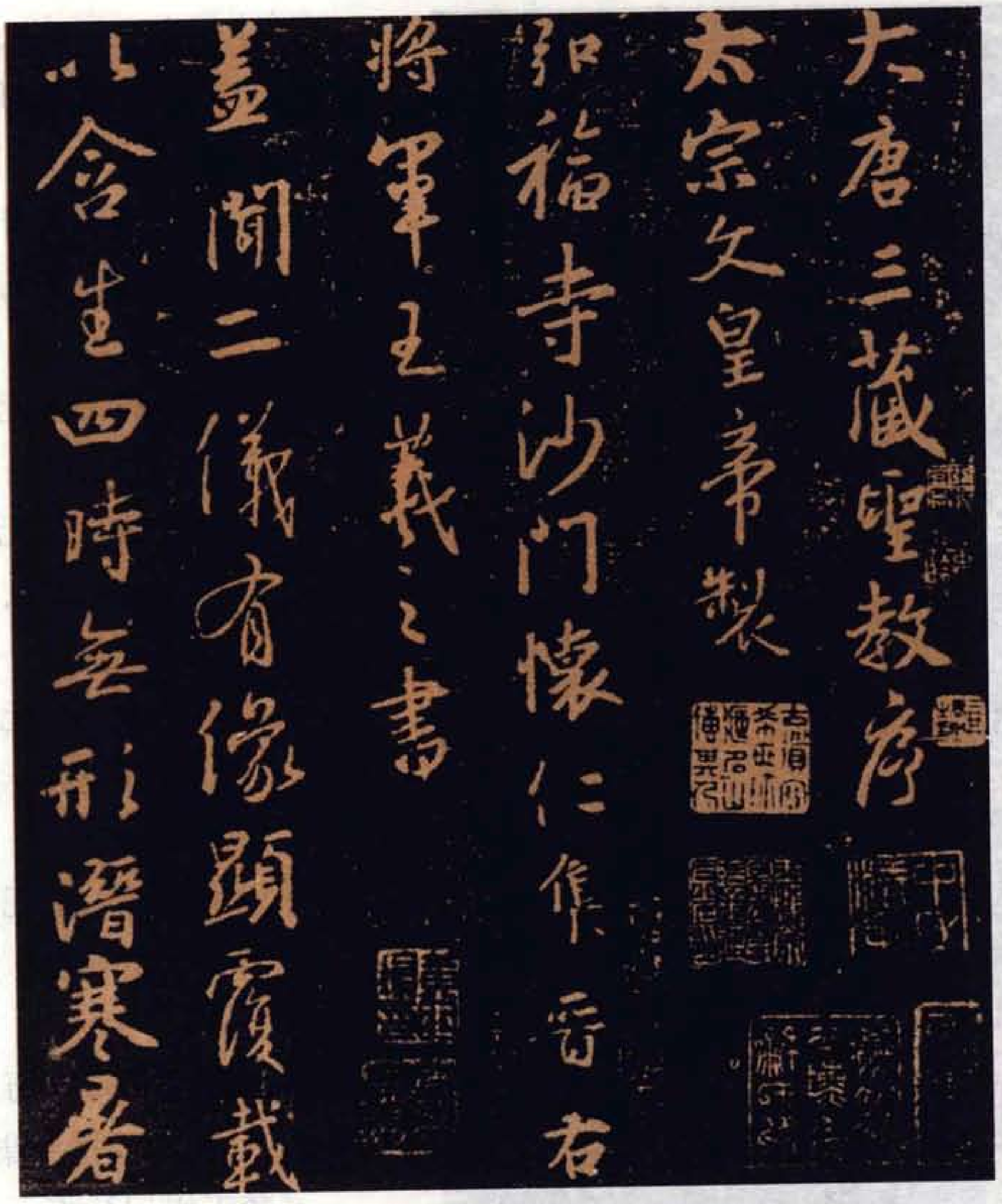
3－6.3　林藻　《深慰帖》(局部)

弟滔女妻之。朱滔于建中元年(780)叛，称冀王，雲逵弃妻遗子归赴长安，超拜谏议大夫。其后官至京兆尹，元和元年(806)五月卒于任上。《旧唐书》以徐浩、赵涓、刘太真、李纾、邵说、于邵、吕谓、郑雲逵并列一传，且赞之曰："名以才显，才兼德尊。徐、赵、刘、李，厥声远闻。邵、于、吕、郑，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后人。"传世书迹三石：《尚可孤碑》《郑楚相碑》《李广业碑》，并行书，以《李广业碑》尤著名。此碑为郑雲逵所撰，

袁滋篆额。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十三日立石,距其下世仅二年,盖为晚年之书。其沉雄激宕见称于赵崡,《石墨镌华》卷三以为"直是徐浩敌手"。叶昌炽则更见推重,《语石》卷七以为"直在徐浩之上,李邕之下"。

高氏,郡望出自渤海,太原府参军房璘之妻,以善书见称于欧阳修,其《集古录跋尾》卷六有"笔画遒丽,不类妇人所书"之评。朱长文《续书断》列入能品,称"字书紧媚"。传世书迹有《安公(庭坚)美政颂》(撰人无考,开元二十九年三月立石)和《铁弥勒像颂》(林谔撰,苏琬题额,开元二十九年六月立石)二石,并行书。前石早佚;后石,宋季元祐五年(1090)毁于火,政和间寺主道修重刻,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复毁于火,泰和四年(1204)寺主元钊又重刻,明季再遭焚。今尚可见泰和四年(1204)刻石拓本。以其出自妇人之手,且遒劲简古,尤为治书史者所重。

行书名碑《北岳府君碑》,全称《大唐北岳府君之碑》,韦虚心撰,陈怀志所书。开元九年(721)三月廿六日立石。此碑遒劲宏厚,较之李邕,如《苍润轩帖跋》所评,以为在"李北海《云麾》之下,《法华》之上。盖以其筋骨有馀,而丰度微涩尔"。按叶昌炽《语石》称:"李北海碑版照四裔,自云学我者死。然陈怀志《北岳府君碑》、陆长源《灵泉寺元林禅师碑》、李绅《龙宫寺碑》,即皆得其一体……陈碑遒健得其骨,陆碑排奡得其貌,李绅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兼得其神与气,其最优乎。此三碑异流同源,皆为北海之津逮,《灵泉》其门庭也,《北岳》则登其堂。若能探龙宫之宝藏,则几几入其室,《灵岩》《麓山》《端溪》诸碑,一以贯之矣。"《灵泉寺元林禅师碑》《龙宫寺碑》是否出自陆长源、李绅之书,姑且不论,即以此碑而言,开元初年,李邕书名未起,所撰碑版如开元五年(717)《叶慧明碑》,韩择木隶书;七年(719)《孔子庙碑》,十年(722)《狄仁杰生祠碑》,并张庭珪隶书;十三年(725)《杨历碑》,锺绍京补铭并正书;《薛元允碑》,白羲晔隶书。其书名陈怀志尚不得闻,何以尊而学之?以此碑书法,或未必肯让李邕出一头地?其牵强附会者如此,盖出臆断渊源自作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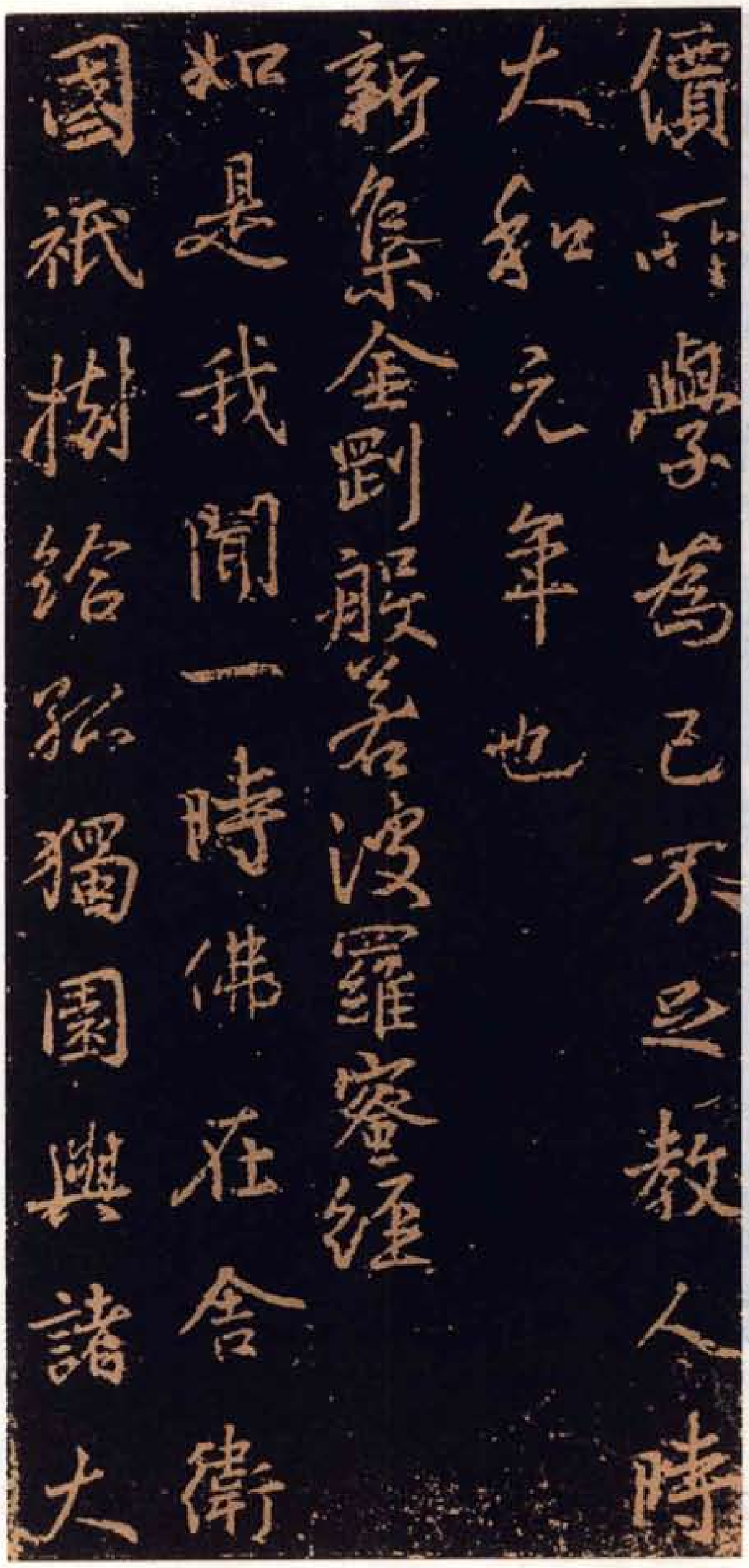


3－6.4　怀仁集王羲之书　《圣教序》(局部)

之所致。陈怀志，开元九年（721）见任宣义郎、前邠王府参军、直秘书省。其他事迹无考。

唐代行书，多追摹王羲之。自怀仁《圣教序》(图 3－6.4)出，号称集王羲之书，天下景从。步其后尘，继集者甚众，杨宾《铁函斋书跋》卷一记有十八家，“皆从《圣教序》出”。其中有唐一代庶几乎全见诸盛中唐。有唐一代集王羲之书者，怀仁《圣教序》后，著录可见，约有：

《舍利塔碑》，仪凤四年(679)三月，越王贞撰，李君惠集；



3-6.5 唐玄序集王羲之书《六译金刚经》(局部)

《建福寺三门碑》,开元五年(717)正月,卢藏用撰,吴光璧集;

《怀素律师碑》,开元六年(718)二月,崔融撰,僧行敦集;

《兴福寺碑》,开元九年(721)十月,僧大雅集;

《令长新诫》,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撰,王良辅集;

《嵩岳寺碑》,开元二十七年(739),李邕撰,胡英集;

《梁思楚碑》,上元元年(760)十月,郭翥撰,卫秀集;

《永仙观碑》,大历六年(771)三月,萧森撰并集;

《楚王堤记》,贞元十三年(797)三月,卢虔撰,张仲严集;

《僧道源发愿文》,贞元十四年(798)正月,王洽撰,王承规集;

《周孝侯碑》,元和六年(811)十一月十五日,陆机撰,黄□集;

《李藏用碑》,大和四年(830),王源中撰,唐玄序集;

《六译金刚经》(图 3-6.5),大和六年(832)春日,唐玄序集。

以上诸石，以僧大雅《兴福寺碑》（又名《吴文碑》，徐思忠等刻字，开元九年十月廿三日立石）和唐玄序《六译金刚经》（唐玄度篆额，邵建□刻字，大和六年春立石）最著名。前碑尚存下半截，现在陕西博物馆西安碑林；后碑尚有宋拓本可见。

① 《全唐诗》卷三《明皇帝传》。

② （唐）李华《三贤论》有“尚书颜公重名节，敦故旧，与茂挺（萧颖士）少相知……天下谓之颜萧之交”。《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亦记“时人语曰‘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李（华）、萧（颖士）、邵（轸）、赵（骅）’以能全其交也”。

③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五《书吴道子画后》。

④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引。

⑤ （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七引。

⑥ （唐）窦臮《述书赋·下》。

⑦ （唐）蔡希综《法书论》。

⑧ 《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本传。

⑨ （唐）李邕《谢恩慰谕表》。

⑩ （唐）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

⑪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六引。

⑫ （明）董其昌《容台别集·题大照禅师碑》。

⑬ （明）杨慎《升庵全集》卷一百六十八。

⑭ 故宫博物院《李宗瀚藏李秀碑》龙凤五年十月旦日题记。

⑮ 故宫博物院《李宗瀚藏李秀碑》道光元年题记。

⑯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所引。

⑰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跋胡霈然书匣后》。

⑱ （清）梁巘《评书帖》。

⑲ （清）叶昌炽《语石》卷七。

⑳ （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六。

㉑ （宋）朱长文《续书断》。

㉒ 墨迹本《古诗四帖》即旧题张旭草书庾信《步虚词》二首并谢灵运《王子晋赞》、《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二首合一卷，今藏辽宁博物馆。今人徐邦达以为赝品，详见《古书画伪讹考辨》十六《张旭》。甚是，今从之。

㉓ 怀素生年，詹锳《李白诗论丛》定为开元十三年（725），是以怀素《清静经》署款

"贞元元年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时年六十一"为依据推算所得。而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以为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是停雲馆《千字文》署款"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今以怀素大历二、三年间南游广州,其后怀素西上,途经岳州,马雲奇客中相送,时"才年三十馀"计,当生于开元末期。若依詹氏之说,生于开元十三年(725),这时已有四十余岁,马诗不当称"才年三十馀"。再逆计宝应年间怀素初离零陵客次衡阳的年纪,年仅二十余,与朱逵诗"于今年少当如此"相合,上推至乾元二年(759),怀素年逾弱冠,李白称之为"少年上人"。因此可见,詹、瞿两氏之说,以瞿氏较为审慎。

㉔ 是记,曾慥《类说》卷五十八引《书法苑》目作"古钗脚屋漏痕"。字句或异,且稍见简洁。同卷又引《书法苑》有"师夏雲"条,重复怀素"观夏雲"之说,且前记有《国史补》所谓怀素"自言得草圣三昧"句。

㉕ (唐)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

㉖ 传世《自叙帖》墨迹本,启功先生以为出宋之重摹本,见《文物》1983 年第 12 期《论怀素〈自叙〉墨迹本》。笔者以为即使《自叙帖》其文,亦系后之好事者,根据当时流传的《怀素上人草书歌》集本而演绎成的,全与怀素无涉,详见《怀素〈自叙〉考》,《书法研究》1986 年第四期发表。并见《唐代书法考评》。

㉗ (唐)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

㉘ (唐)马雲奇《怀素师草书歌》。

㉙ 详见拙著《李阳冰散考》,下同。

㉚ (唐)颜真卿《草篆帖》。

㉛ (唐)李肇《国史补》卷上。

㉜ (清)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二。

㉝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本传作"蔡州郎山人",林宝《元和姓纂》卷四记出"华阴房",今从《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良吏下》。

㉞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三引。

㉟ 《旧唐书》卷一百一《张庭珪传》。

㊱ 《唐会要》卷六十四《文学馆》。

㊲ (宋)王谠《唐语林》卷七马植引张说语。

㊳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翰林院》。

㊴ 饶宗颐《澄心论萃》一百二十《郑虔书画》。

㊵ (清)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之十》。

㊶ 林蕴,字復梦,贞元四年(788)登明经科,官至邵州刺史,即得卢肇传授拨灯法者。

㊷ (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一引。

第四章

雄秀独出的颜真卿

第一节

生平事迹

颜真卿(709 — 785,图 4 - 1.1),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师,因爵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郡望出自琅邪临沂。颜氏从 13 世祖颜含随晋元帝渡江侨居建康上元(今江苏江宁)始,历七世而为江左望族。至北齐,五世祖颜之推入周,举族徙居雍州万年。尔后,高祖颜思鲁因奉迎李渊入关,授秦王府记室,其子颜师古官至秘书监,擢为有唐新贵,遂移居京兆长安县(今陕西西安)敦化坊,至颜真卿,业已四代。

颜真卿,开元二十二年(734)举进士第。翌年,擢拔萃科,授校书郎。任职两年,因母亡去职。至天宝元年(742)秋日应“博学文词秀逸科”,以甲等登科,依资授醴泉尉,秩满迁长安县尉,改监察御史。当时,左率府长史张旭正在京与贺知章及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適之、崔宗之、苏晋、焦遂作“酒中八仙”之游,天宝五载(746)杜甫自鲁郡经洛阳至长安,有《饮中八仙歌》称述

4-1.1 颜真卿像

之。颜真卿喜交游，大凡名流、文采斐然之士，诸如高適、岑参、徐浩、郗纯辈并与之周旋游处，引以为同志。其他如陈郡殷寅、河东柳芳、河南陆据、兰陵萧颖士、赵郡李华、汝南邵軫、邓州赵骅更是意气相投，脱略形迹，成为莫逆之交。《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记“时人语曰：‘殷、颜、柳、陆、李、萧、邵、赵’以能全其交也”。李华《三贤论》也称：“尚书颜公重名节、敦故旧，与茂挺（萧颖士）少相知。颜与陆据、柳芳最善……天下谓之颜、萧之交。”其后，历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使判官，再入御史台为侍御史。百馀日，迁兵部员外郎，天宝十二载（753）出任平原郡太守。两年后，因守城抵御安禄山之叛，名重朝野，有“颜平原”之称。肃宗朝，初为刑部尚书，历同州、蒲州、饶州、升州四州刺史，入为刑部侍郎，上元元年（760）谪守蓬州为长史。代宗朝，历户、吏两部侍郎，尚书右丞，官至刑部尚书。永泰二年（766）遭受权相元载的排斥，坐以诽谤朝政罪，出贬峡州别驾，未至任，改吉州别驾。大历三年（768）起为抚州刺史，迁湖州刺史，至十二年（777）八月再入为刑部尚书，除吏部尚书。

德宗朝充任礼仪使，后改太子少师，除太子太保。建中四年（783）奉使宣慰淮宁节度使李希烈，遭扣囚，至贞元元年（785）遇难，享年七十七岁。诏赠司徒，谥曰文忠。颜真卿生平大抵如是。

颜真卿自永泰初年遽遭贬谪以来，在公务之暇，已一改常态，开始寄情山水，沉湎诗文，依托佛道，以求解脱。著名的《咏陶渊明》诗：

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

狙击不肯就，含生悲搢绅。
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
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
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
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
兴逐孤云外，心随飞鸟泯。

其所表现出来的陶渊明式遁世思想，虽然是暂时的，但已经与当年叨念宠命阶位，事事处处含恩戴德，且以精励尽职、克效忠勤为崇高责任的颜鲁公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颜真卿崇重浮屠之说，本出自家教。“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①]乃为颜氏传统。其交游皎然，相契严峻，友善上恒，褒异沈真乘之出家，敦慕谢灵运之释经，而且以“深于禅味”[②]为湖州佛川寺慧明法师“菩萨戒弟子”。至于探胜访迹，撰文纪颂，写经书赞，刊石传布诸多佞佛之举，更是集中反映在此后十数年的贬谪时期。

颜真卿的佞佛，加上他与隐逸之辈如陆羽、张志和交游，其情好款洽，意味相契，不仅影响了他的处世态度，使之通脱清逸，而且也因此影响他的艺术境界。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在湖州的“燂鹏煠鲲餐未休”（《大言联句》）、“欲炙侍立涎交流”（《馋语联句》）、“覆车坠马皆不醒”（《醉语联句》）等诗句中所表现出来与颜真卿平日庄严作风判若天壤、近乎滑稽的腔调并非是故作姿态。

颜真卿存世不见论书之作，惟有文论一篇，或可从中窥见其艺术观点。《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作于谪贬外郡之前，即永泰元年（765），其云：

> 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乎《雅》《颂》。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然而文胜质则绣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质胜文则野于礼乐，而木纳不

华，历代相因，莫能适中。故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此其效也。汉魏以还，雅道微缺，梁陈斯降，宫体聿兴。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学。是以沈隐侯（约）之论谢康乐（灵运）也，乃云“灵运已来，此未及睹”；卢黄门（藏用）之序陈拾遗（子昂）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何则？《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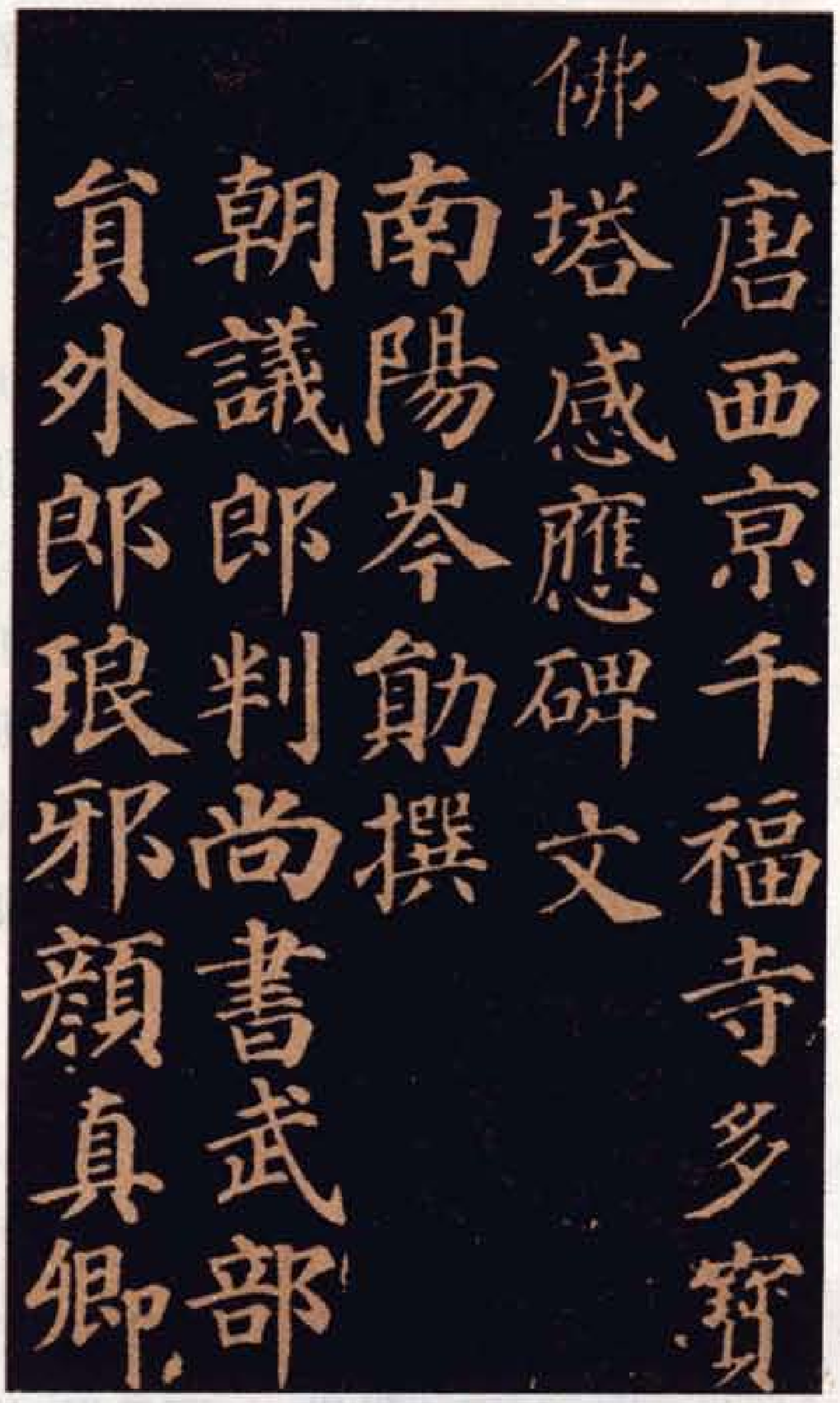
文章有三层意思：其一，文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于《雅》《颂》”，换句话说便是文始于言志，而终于载道；其二，历来文章或重文轻质，或重质轻文，各有偏颇，不能适中；其三，《雅》《郑》之文，历代兼有，而前贤鄙薄宫体，以为繁缛，实失之于厚诬。因此可说，颜真卿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主张重视形式的文采，使之能更好地发挥言志抒情的功能。这个观点也出自《颜氏家训》。颜之推曾根据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的准则，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但务去泰去甚耳。”又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③。

简言之，文章当以典正为上，也就是以思想性为第一，艺术性为第二，在此基础上，发挥才气的作用，尽量地使文章的文采和实质能配合适宜。究其实，这种理论观点也是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具体阐述。其后，皎然作《诗式》多采其说。

第二节

书法艺术

颜氏世代以儒雅传家，偏重书记。其探讨小学，留意翰墨，为立家明训，莫不克遵是守，步趋惟谨。虽然如其《草篆帖》所说“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著名如九世祖颜腾之，因草书有风格，见称于梁武帝；六世祖颜协以工草隶，有名荆、楚间，但五世祖颜之推却视为杂艺，其《颜氏家训》明言“此艺不须过精”，又谆谆告诫“慎勿以书自命”④。颜真卿秉承家教，起初亦慎勿以书自命，其书契之作，意在适用记事而已。惟其性之爱重，所见亦多，玩习趋变，随意自娱，不求其名而反显其名。



4－2.1　颜真卿　《多宝塔感应碑》(局部)(752)

颜真卿书迹，见诸著录的最早是《雁塔题名》(《宝刻类编》卷二)，而存世可见，最早且著名者是《多宝塔感应碑》(图 4－2.1，天宝十一年)。此碑用笔清劲腴润，结体匀稳谨严，明代以往论书者有“近世掾吏家鼻祖”之谓。不独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

稿》有称“小远大雅”，盛时泰《润苍轩碑跋》也评颜书为“最窘束”者。然而其胜处亦正在于端庄谨密，寓驰骤于规矩之中，自始至终，一无懈笔，诚如王澍《虚舟题跋》所称：“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是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其后所书《东方朔画赞》（天宝十三载），苏轼以为鲁公诸碑之中“最为清雄”者。他说，此碑“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⑤。《竹雲题跋》也称其为颜公中年得意之书，有“神明焕发而时出姿态，不失清远”之评。这两碑并为鲁公中年时所书，相隔仅两年。《多宝塔感应碑》，岑勋撰文，文章多夸饰之辞，其叙沙门建塔之事，光怪梦寐，云物感应，大多不可致诘；《东方朔画赞》，夏侯湛所撰，其生平极其恢谲而寓壶公蓟子之意，然而鲁公一一以方整之笔书之，几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实类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一笔一画，意在文字，楷正为善。其方整腴劲、秀媚多姿者，实乃平常时书判写牍之功夫。

颜真卿幼承门业，并重真草。大抵唐代行草书，以二王为正格，自欧、虞以下，莫不善加摹习，惟《圣教序》一出，敛入规矩，李邕以行作楷，趋于平实。开元、天宝间崇尚隶书，其丰茂硕厚，一改初唐行草笔势，且张旭晚年，通变适意，除繁就省，由正复草，用笔亦由清健演为圆劲。颜真卿真草兼通，用笔大凡三变，初则清健，源于母族殷氏，而得力于张旭，上引两碑及《金天王朝庙题名》《离堆记》约可见其梗概；广德以后，趋于圆劲，楷书以《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为代表，行草书则推《祭侄季明文》《争座位帖》为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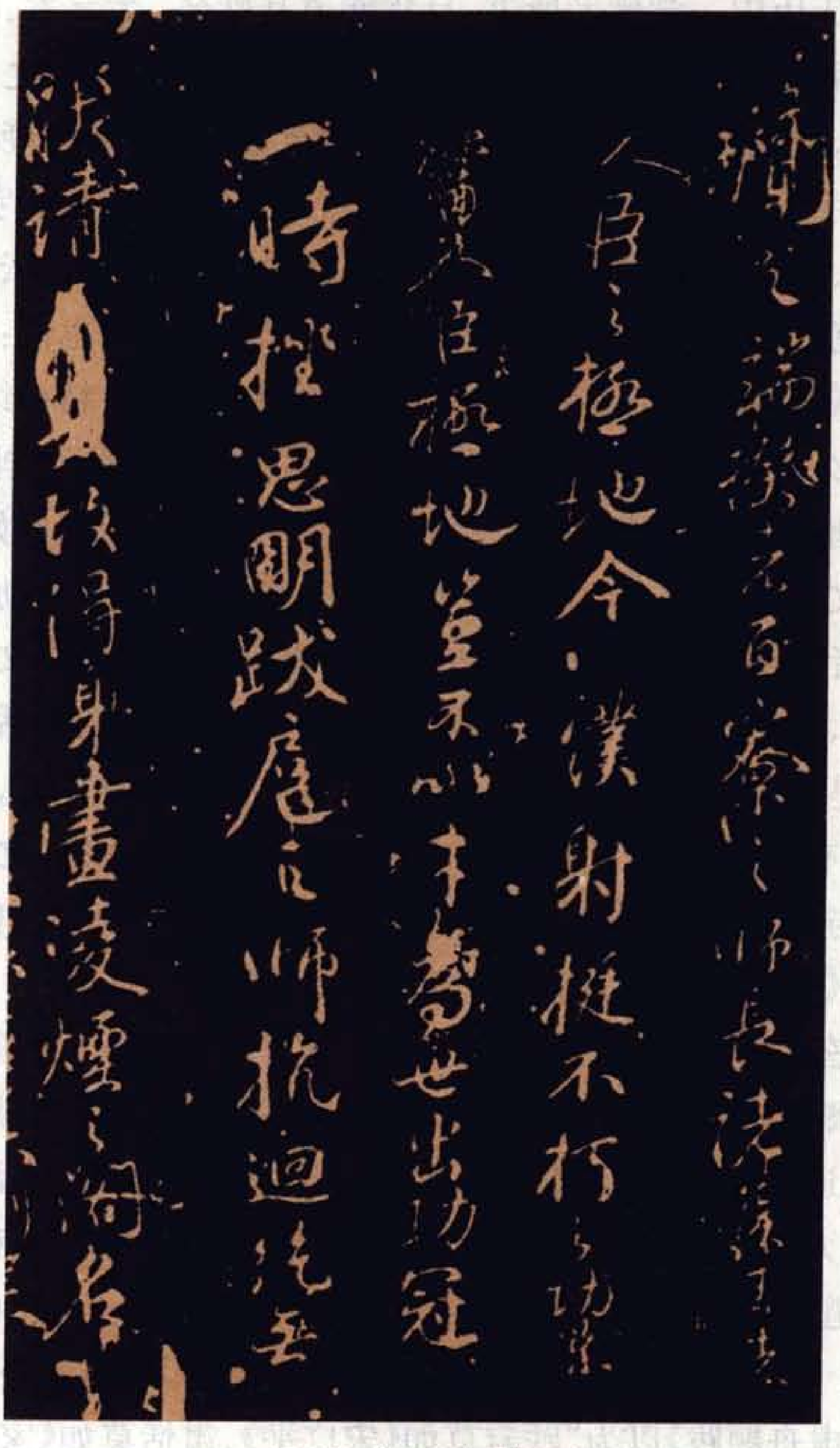
《祭侄季明文》（图 4－2.2），亦称《祭侄文稿》，作于乾元元年（758），为祭其侄颜季明而书。季明横遭杀戮，正当英年，且归葬时已失身躯，仅存头颅。抚今追昔，不由得颜真卿疾痛惨怛，哀思郁勃。故其援笔作文之际，萦于忿激，血泪并迸，悲愤交加，情不能自禁，其意固不在文字之间，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终为千古绝调。此书之奇绝，论者以为《兰亭序》之后惟此为高，故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广川书跋》称：

4－2.2　颜真卿　《祭侄季明文》(局部)(758)

“峻拔一角，潜虚半股，此于书法，其体裁当如此矣。至于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侧映斜，以斜附曲，然后成书，而古人如此，盖尽之也。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陈深《停雲阁帖题记》也说：“此帖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如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

《争座位帖》(图 4－2.3)，书于广德二年(764)，因其为维护朝廷纲纪，秉义直谏，既斥郭英乂之佞，复夺鱼朝恩之骄，忠义之气，粲然横溢于字里行间。书法亦随意自如，天真烂漫，其淋漓挥洒处，如挟风雨而行云空，横斜曲直妙韵叠出者，尤见瑰异，米芾评之为鲁公行书第一，《宝章待访录》说：“字字意相联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世之颜行书第一书也。”《书史》又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黄庭坚《山谷题跋》更见推重，直谓二王后嗣，他说：“观鲁公其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徐(浩)、沈(传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旭)与鲁公二人。”米芾、黄庭坚是宋代书坛巨擘，犹推崇赞叹如此，朱长文《续书断》首列颜真卿为神品，盖不无原由。

颜真卿自肃宗朝始，仕途偃蹇，不能尽信于君，尤其永泰二年(766)因忤权相出贬外郡，心灰意懒，不复有功名羁绊，其俯结隐逸，广交文学，雅好摄生，尤佞佛理，且抚、湖之任，政简务闲，既不外张，亦无自贬，悠然而具王谢之风，于诗文之外，多寄情翰墨，以书自娱。是故常常自采乐石，命吏干磨砻，然后擘窠大书，由家童镌刻之。综观鲁公存世书迹，十有八九出于斯时。颜真卿于书遂始见矜练，力求文质并重，以臻适宜。所以《续书断》有称鲁公大历年间书法千变万化，各具风韵，“观《中兴颂》则宏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



4－2.3　颜真卿　《争座位帖》(局部)(764)

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朱长文之说，虽别具会心，然于鲁公晚年之笔，不失笃论。

《麻姑山仙坛记》，颜鲁公撰书于大历六年(771)。宋时所见凡大、中、小三本。小字本，即孙承泽所谓“蝇头小书”者，前人已断为伪迹，黄

鲁直言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且犹能道其姓名。大字本，即临川旧碑断其一角者，王澍《虚舟题跋》认为“盖已退笔，因势而用之，转益劲健，进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宣和书谱》卷三及《续书断》所评秀颖者，也是指大字本而论。中字本，即留元刚忠义堂刻本，文与大字本略同，字则介乎大、小本之间。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卷六中评之云：“字形大如指顶，笔笔带有隶意，鲁公最得意书也。”《虚舟题跋》也说：“颜鲁公书，大者无过《中兴颂》，小者无过《麻姑坛》，然大小虽殊，精神结构，无毫发异。熟玩久之，知《中兴》非大，《麻姑》非小，则于颜书思过半矣。”

《大唐中兴颂》，鲁公书于大历六年（771）六月，后《麻姑山仙坛记》两个月。文为唐代古文运动先行者元结所撰。文辞古雅遒劲，不愧为“老于文学”者的手笔。颜真卿为老友铭石恭书其颂国中兴之文，方正平稳，大书深刻，用笔也浏漓顿挫，雄厚端严，诚如王恽《玉堂嘉话》称之谓“雄伟如驱千里骏马，倚丘山而立”。是故，后人论书并见仰重，不特钱邦芑《浯溪记》有谓，是书“为平原第一得意书，亦次山（元结）之文有以助其笔力，故与山水相映发耳”。郝经《陵川集》也说：“书至于颜鲁公，鲁公之书又至于《中兴颂》，故为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匠。”

《李玄靖碑》，撰书于大历十二年（777）。“玄靖”为道士李含光道号。颜真卿自乾元二年（759）升州刺史任上与他结交以来，恩眷绸缪，神思往注几近十年，且其亲属殷淑、韦渠牟并为玄靖门人，在湖州时，鲁公又与其二人“曾接采真之游，绪闻含一之德”。鲁公于文亟称其德行，谓之“天下道学所宗”。此碑大书深刻，已见晚年气象，《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称：“结体与《家庙》同，遒劲郁勃，故是诚悬（柳公权）鼻祖。”而《虚舟题跋》以为“跌宕莫如《宋广平》，肃恬莫如《家庙碑》。此碑风格正在《广平》《家庙》之间，信是鲁公极笔”。

《宋璟碑》，书于大历十三年（778），方整虚和，后之论者大多以为出于褚遂良。其实斯碑乃健笔书写，且多用腕力，不同于鲁公平常之粗锋饱墨。众所周知，楷书结字，在初唐以斜画紧结为主体，欧阳询父子脱胎于北魏，显得峻严方饬；虞世南、殷令名则平正和美，与隋代智永、丁道

护一脉相承，出自二王。至褚遂良出，一改欧、虞旧习，由《龙藏寺》上溯北齐，变为“平画宽结”。颜真卿楷书结法出自家学，其平画宽结于晋代已露端倪，《琅邪颜谦妇刘氏志》即是颜氏先祖遗则。殊途同归，与褚氏同一法门，只是颜真卿平常用笔圆劲，别有一番浑厚意趣。所以当他一改细挺，便似褚氏风韵，并非是他有意仿写去追求褚家异趣的。

大历年间，颜真卿楷书出神入化，包罗篆隶，一变古法，行草书亦真、行相间，放拘并遣，篆笔隶格，提挈顿挫，沉雄奇古，诚如苏东坡所谓“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其间《送刘太冲序》《裴将军诗》，堪称典型。

《送刘太冲序》，作于大历七年(772)。刘太冲，萧颖士子弟刘太真之兄，颜真卿平原首举义旗之时，曾邀请他共拒胡羯，立下汗马之功。大历六年(771)颜真卿卸任抚州，南游吴越时，又相遇于江宁，并得其资助，解除困境。这篇文章即记其事。此序书法历来为论书者所重视，认为腴润秀劲，是颜书之冠。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另有异趣，米元章谓‘如龙蛇生动，见者目惊’，不虚也。”《竹雲题跋》也说：“颜书多遒古，钗脚、屋漏之趣，时时流露于行墨之间。此叙独秀润有姿态，为颜书最宜人之作”，“此叙碧笺书。碧笺宜墨，故在颜书中独为腴润”。

《裴将军诗》(图 4－2.4)，或疑非颜所书。但观《忠义堂帖》所收该书，大气磅礴，正非鲁公莫属。参阅《忠义堂帖》行草诸帖，尤其《刘中使帖》，笔力雄健，其纵横遒古，一如是帖。是诗，盖书于湖州任上，与《刘中使帖》相先后。明清论书家如王世贞、王澍甚重此帖。《弇州山人四部稿》说：“颜鲁公《送裴将军诗》多感慨踔厉，是公合作语……书兼正行体，有若篆籀者，其笔势雄强劲逸，有一掣万钧之力，拙古处几若不可识。然所谓印印泥、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者，盖兼得之矣。”⑥而王澍以为有胜于《争座位帖》，其《虚舟题跋》直称：“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米海岳论《争座稿》，谓‘其字相联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最为杰思。’黄山谷云：‘奇杰秀拔，奄有

4－2.4 颜真卿 《裴将军诗》(局部)

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皆为法度所掩，岂若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二公推许《论座》如此，余谓特未见此书耳。此书诡异飞动出《论座》外，盖自右军来未开此境，其心目中不复欲存右军一笔，盖所谓善学柳下惠，莫如鲁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义郁勃之气发于笔墨之外，未由臻此”。高论如是，自寓深意。存世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低劣不堪，疑伪之说，或由是而生。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德宗即位，颜鲁公执掌吏部，兼任礼仪使，阶高二品，权势并重，且“太后(沈氏)崇徽，外家相属”⑦，身为皇帝远房亲戚，恩荣并殊于常人。所以鲁公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自撰《颜氏家谱》敷衍家声，改敦化坊祖宅为颜氏祠堂，又为父立庙，并撰书神道碑铭颂扬之。此即后世所称道的《颜氏家庙碑》。建中元年(780)八月，鲁公蒙恩升任太子少师，子侄八人又同时封爵，兴奋之馀，复撰《碑后记》。此碑李阳冰题额，楷碑篆额，世称“双璧”。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七曾评之说：“今隶中之有玉箸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其书家至宝。”王澍《虚舟题跋》也说：“评者议鲁公书，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严为鲁公病，岂知宁朴无华，宁拙无

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庙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又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岩岩气象，加以俎豆肃穆之意，故其为书庄严端悫，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视。”其实，此碑鲁公最晚所书，年事高迈，精力殚竭，且称述祖德，意绪肃敬，二乖并遣，终难奇绝。后人论鲁公书法，也大抵以《颜氏家庙碑》为其极限。其后之书，由盛入衰，已不见有鲁公佳品。

第三节

颜书的影响

颜真卿的书法，尤其楷书稳实端庄，尽合字学，不独可以陶冶性情，适合于官场文书的应用，而且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所以，颜书一出，学者不绝。士大夫祖述鲁公书法者，除颜颛等颜氏子孙外，著名者始见于李德裕。李德裕(787—849)，武宗朝宰相，曾有《追和太师颜鲁公刻清远道士游虎丘诗》。其后柳公权(778—865)，出入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峭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以方拓峭险，别开生面。

柳书出之于颜鲁公的论点，始于宋苏轼。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题记说：“柳少师(公权)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⑧朱长文《续书断》也说公权之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范仲淹《祭石学士文》称颂石延年书法，有“曼卿之笔，颜筋柳骨”之句，“颜筋柳骨”遂为定论。后人则多以“颜柳”并称，且以此视颜、柳为一路，至解缙《春雨杂述》则直记柳公权为鲁公嫡系，有“(颜)真卿传柳公权”之说。斯说是否确论，似可研究，然颜、柳形质差近，风韵几同者，亦系事实。按柳公权身处晚唐书法衰败之时，虽耿介独立，卓然而起，希图转益多师，力挽颓势，风骨亦见峭峻，

然终因时代局限，未能尽脱颜字之樊篱。自此也可见颜真卿这种提挈时代的书体是不易突破的。

五代之世，干戈频仍，国家几无宁日。当是时，书坛凋零，文采风流扫地。然而由于时代衔接，三唐流风所渐，积习未能尽忘，所以尚有一二枭雄间出，其中杨凝式书学颜真卿，尤其行草，得力最多，天真烂漫，纵逸类似鲁公，尤见称于北宋诸家。欧阳修尝有称自唐亡至宋兴，一百五十余年间惟杨凝式为“一时之绝”⑨。苏轼认为自颜、柳殁没，笔法衰落，五代之季，独杨凝式，“有二王、颜、柳之馀，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⑩。

宋初帖学兴起，行草书规模二王，惟其大都临拓转刻或即出赝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书法为之凌迟。至庆历、元丰间（1041—1085），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始摒弃阁帖，师法唐碑，且上溯晋魏，遂使书学复兴。米芾《书史》称：当时“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由此，颜书在宋最为珍重，流行之广，摹习之众，可说空前未有。杨慎《墨池璅录》说：“若夫宋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群公交作，极一家之盛，其构势虽各不侔，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颜、柳他求者也。”冯班《钝吟书要》也认为“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大概流俗好尚，逐时异趋，如韩琦学颜就是一例。韩琦（1008—1075）书法，如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所称“师颜鲁公而颇露芒角”，虽非上乘，但影响所及，石延年、苏舜钦、蔡襄、蔡卞以至朱长文辈，一代文士莫不效颦，竞仿颜氏。尤其蔡襄，端庄秾艳，卓冠一代，苏轼以为宋季书法卓然追配前人者，惟其一人，有谓“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⑪。《忠义堂帖》所收至和二年（1055）十月廿三日题记七行三十字，纯见颜氏风韵，不愧苏氏所评。

颜书在宋最为显赫，一代书家无不受其影响。编次鲁公文集之风也随其而起。起初吴兴沈氏采掇鲁公遗佚，编成十五卷，由刘敞作序。嘉祐年间（1056—1063），又有宋敏求编次《颜鲁公文集》十五卷。其后宋室南渡，沈、宋之集，多漫漶不全，留元刚于嘉定七、八年（1214、1215）复加编

集，“乃以史传诸书，碑迹杂志，铨次年谱，系以见闻，参异订疑，搜亡补失”⑫，分为十五卷，以符合北宋沈、宋二家的卷数。后之编次鲁公文集者，如明都穆十五卷本，清黄本骥三十卷本，莫不因其增辑而广大之。留氏不独有功于鲁公文章，鲁公遗迹也赖其收录。永嘉（今浙江温州）忠义堂所刻汇帖其中有不少精本、稀见本，即使所收平常之帖，以其刻工精善，较之他刻也神采奕奕，传真程度很高，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研习颜书者，具有重大的影响。后二年（1217）巩嵘续刻颜书七种，合为四十五通，终于成为我国辑录颜书最早最完善的一部专帖——《忠义堂帖》⑬。

元初，沿袭两宋余风，也多宗法颜氏，但大都刻鹄类鹜，无一人能出类拔萃，趋变适时。明代以往，帖学复兴，书学大抵不出赵孟頫范围，其间二百余年，学颜而能独树一帜者，惟李东阳（1447—1516）行书，用笔矫健，不失规矩。

至清朝嘉庆、道光之后，帖学由盛入衰，且宣宗整理文字，崇尚唐之字法，鲁公乃偕欧阳询、褚遂良复为世俗所重，习颜之人也随之日益增多。综观清一代书家，学颜书而能入其堂奥者，有刘墉（1719—1804）、钱沣（1740—1795）、伊秉绶（1754—1815）、何绍基（1799—1873）、翁同龢（1830—1904）数人。刘墉学颜，参用北碑笔法，虽然结体森严，但得和宛通灵之气。钱沣学颜，旁涉褚氏，其得颜书“神密”之气，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书学》说：“寻常学颜字的，只知聚，不知散，只知含，不知拓，他可是能散能拓的了。”伊秉绶虽然以隶书擅名天下，但他从李东阳上溯颜真卿，且用隶笔书写，气浑韵厚，深得鲁公三昧。以学颜著名，何绍基为尤，杨翰《息柯杂著》说：“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他写的颜字，寓有隶意，尤其运笔空虚洒脱，与其隶书笔法一致，十分高明。其后，翁同龢由钱沣上攀颜氏，结体参北碑体势，用笔又多取隶法，所以气度浑厚，堂宇宽博，亦不愧为颜氏嫡系。

---

①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五《归心第十六》。

②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湖州佛川寺慧明传》。

③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文章第九》。

④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杂艺第十九》。

⑤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颜公书画赞》。

⑥ (清)黄本骥《颜鲁公集》卷三十《书评十》引。

⑦ 《颜鲁公文集》卷十七《授颜真卿太子少师告》。

⑧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跋。

⑨ 《宣和书谱》卷十九引。

⑩⑪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⑫ (宋)留元刚《颜鲁公文集后序》。

⑬ 今有宋刻宋拓《忠义堂帖》,凡八册,藏浙江省博物馆。可参阅拙著《唐代书法考评·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

第五章

晚　唐　书　法

第一节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父柳子温,官至丹州刺史,卒后赠尚书右仆射。兄柳公绰(768—832),字起之,后官至检校左仆射、太原尹、河东节度观察使。柳公权少公绰十岁,唐元和三年(808)登进士科,又登博学宏词科。初仕校书郎,久滞未迁。十四年(819)夏州刺史李听辟为掌书记。翌年,入京奏事,穆宗知其善书,即日召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敬宗朝,官至兵部郎中,曾知制诰,充任弘文、翰林学士,仍侍书内廷。文宗朝,历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工部侍郎、右散骑常侍。曾充任知制诰、翰林院学士承旨。柳公权以书入仕,位至皇室侍书即朝廷专职书法教师,受到皇上的敬重,文宗有"锺、王复生,无以加焉"之誉;宣宗朝,曾御前书写,军容使西门季玄为之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恩宠胜过当年翰林学士李白之作乐府新词。礼遇如此,然耻以善书致用,其兄公绰大和四年(830)致宰相书云:"家弟苦

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柳公权自幼嗜学，十二岁便能辞赋，及长，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其博贯经术，意在政治，亦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入仕之初，即有“笔谏”，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起居郎任上，偕谏议大夫独孤朗等人谏阻淮南节度使王播求领盐铁转运使。中书舍人任上，独以为“服浣濯之衣为小节”。史记：

（文宗）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惟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辞气不可夺。帝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彩，却授卿谏议大夫。”翌日降旨，以谏议知制诰，学士如故。①

其后，工部侍郎任上又以“瓜李之嫌”相谏：

尝入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何？”公权对曰：“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郭子敬）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公权曰：“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旼。②

正因为柳公权匡益时政，正直敢言，遂得朝野敬重。

武宗朝，初任集贤殿学士、兼判院事，封爵河东县伯。后历太子詹事、宾客，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又晋爵为公，遂不见有侍书之记。然因其年迈，大中十二年（858）元日含元殿朝贺，误称尊号，为御史所劾，罚一季俸料。时议以为其不能克遵典礼，及时退休，乃致老而受

辱。这也是柳公权留恋职官的结果。咸通初，以太子少傅致仕。六年(865)卒于家，年八十八。赠太子太师。

柳公权志耽书学之外，又工诗。联句诗“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为文宗所激赏，有“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之评；应制诗《贺边军支春衣》，脱口而成，婉约清丽，亦为文宗所叹息：“子建七步，尔乃三焉。”存诗凡六首。与名诗人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白居易，名书家丁居晦、唐玄度、裴休等人并有交游，其中白居易尤见友善，白居易有《和柳公权登齐云楼》诗，称：“向此高吟谁得意，偶来闲客独多情。”

柳公权历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担任宫廷最高级专职书法教师长达二十年之久，名声极其显隆，史有记：

> 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贷贝，曰：“此购柳书。”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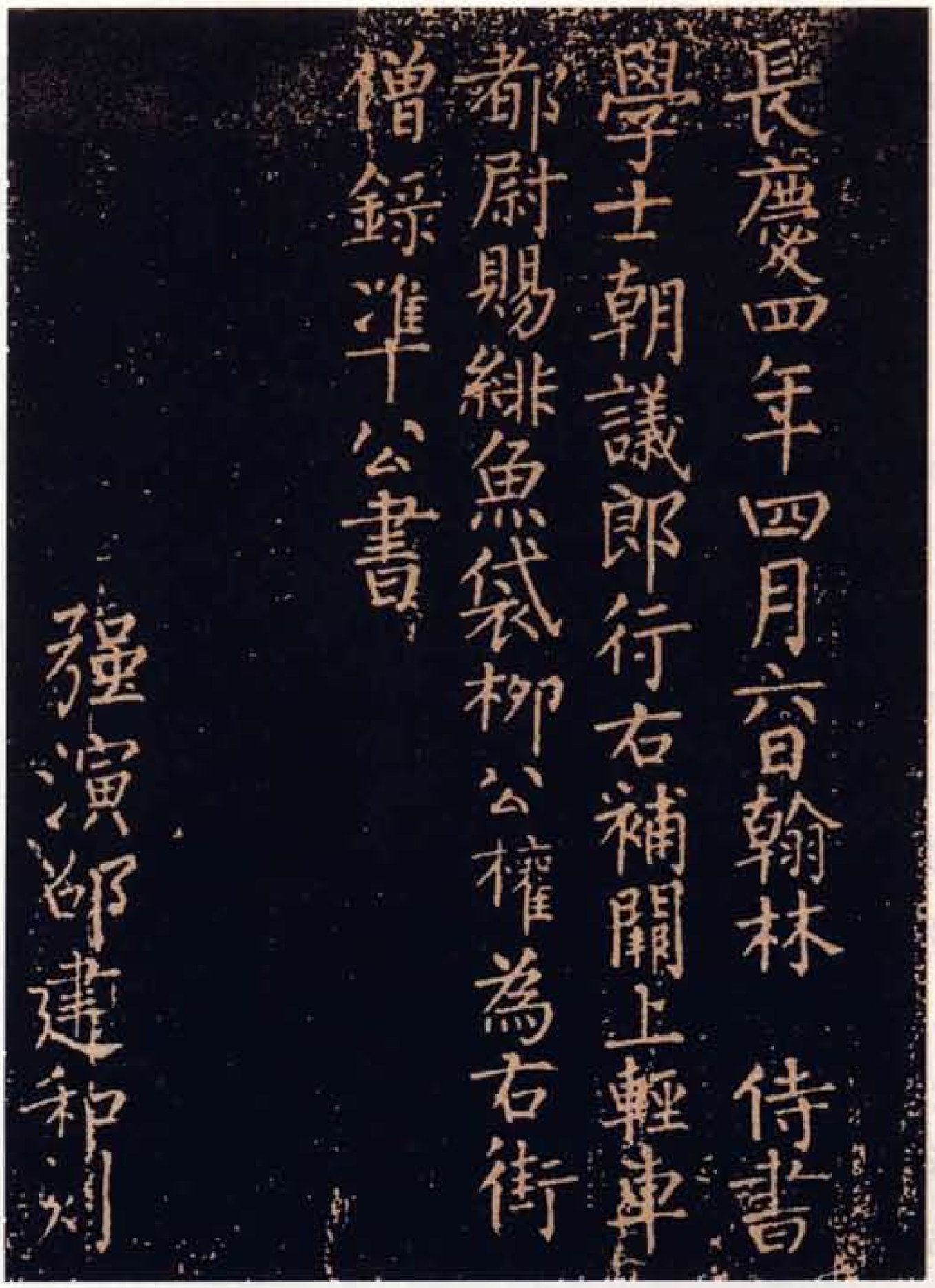
同时，又有人称：

> 艺奋神工，时推妙翰。凤鸾异态，龙虎殊姿……若非思与神凝，韵无俗累，则安能致兹遒逸，超彼等夷。穷锺(繇)蔡(邕)之楷模，入王(羲之)羊(欣)之阃域。往者事相公尝谓侍郎能以书谏者，今则行执陶钧，坐登台辅，终提一笔，以绝百僚，后之来者，延颈而俟。④

当时，徐浩、颜真卿没已多年，声势渐息；柳宗元书法虽名高湖湘，终为文章所掩，正宜柳公权独张鼓旗，称雄书坛。刘禹锡谓之“柳家新样”。《旧唐书》也称“体势劲媚，自成一家”⑤。惟其所称“初学王氏，遍阅近代笔法”者，似嫌简陋。柳公权书法乃出自柳氏家学，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之“柳家新样元和脚”即以为其书出自同房族兄柳宗元而胜之者，甚是。柳氏之书，乃本于是，而出入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峭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取精用弘，神明变化，遂以方拓峭险，而别

开生面。他少颜真卿七十岁，是否学过颜真卿书法，他未曾明言。所书京兆西明寺《金刚经碑》，柳公权甚为得意，史记也只记备有锺、王、欧、虞、褚、陆诸体书法，而未说到有颜的影响。柳书出之于颜鲁公的论点，始于宋苏轼，有谓“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⑥。至范仲淹《祭石学士文》以“曼卿之笔，颜筋柳骨”称颂石延年书法，“颜筋柳骨”遂为定论。后人则多本是“颜柳”并称，且以此视颜、柳为一路，如解缙《春雨杂述》之直记柳公权为鲁公嫡系。

柳公权为三朝侍书，名声显赫，卓然独尊，不可一世，且书多出奉敕所为，矜持干练，楷正是敬。且传摹上石，刻手又多出内府名师或中书省刻字之官，如邵建和、邵建初兄弟即为内廷刻玉册官，体会既深，传真程度亦高，惟其盛名之下，程式易定，程式一定，便不容稍加随意，略见增省，即使偶有疏忽，有一二逸笔，摹人刻工，亦依旧运作，此即米芾《海岳名言》之讽颜真卿也。其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似亦可移之而言公权。柳公权书法，多凭碑版存世，虽并见风骨



5－1.1 柳公权 《金刚经》(局部)(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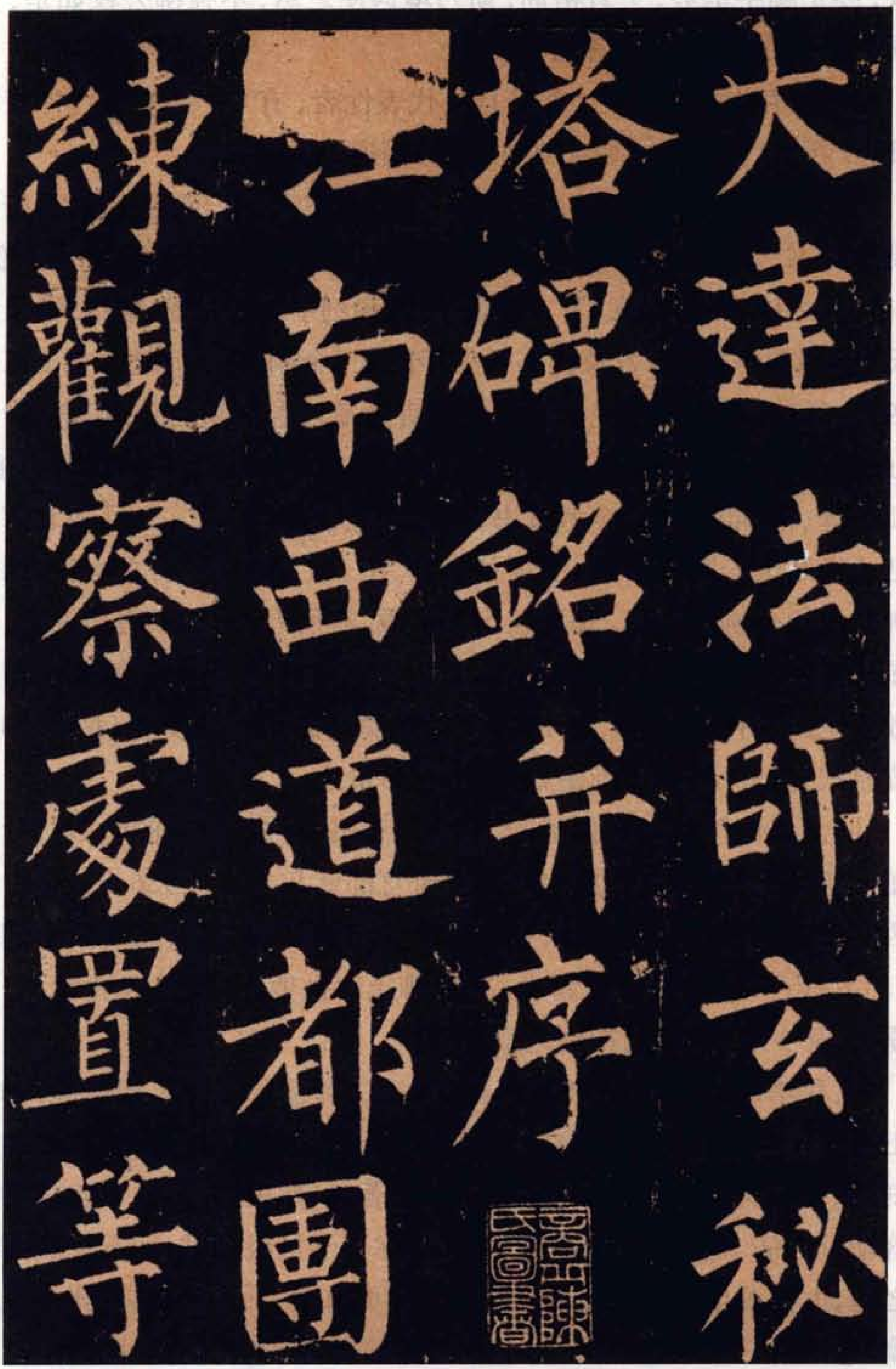
峻极，终是颜字笔势、吏胥格局，斯乃境遇使之然，不独柳公权如是，凡馆阁书家如徐浩、韩择木辈亦如是。

柳公权存世书迹可见，著名且具代表性者，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以及新出《金刚经》《回元观钟楼铭》四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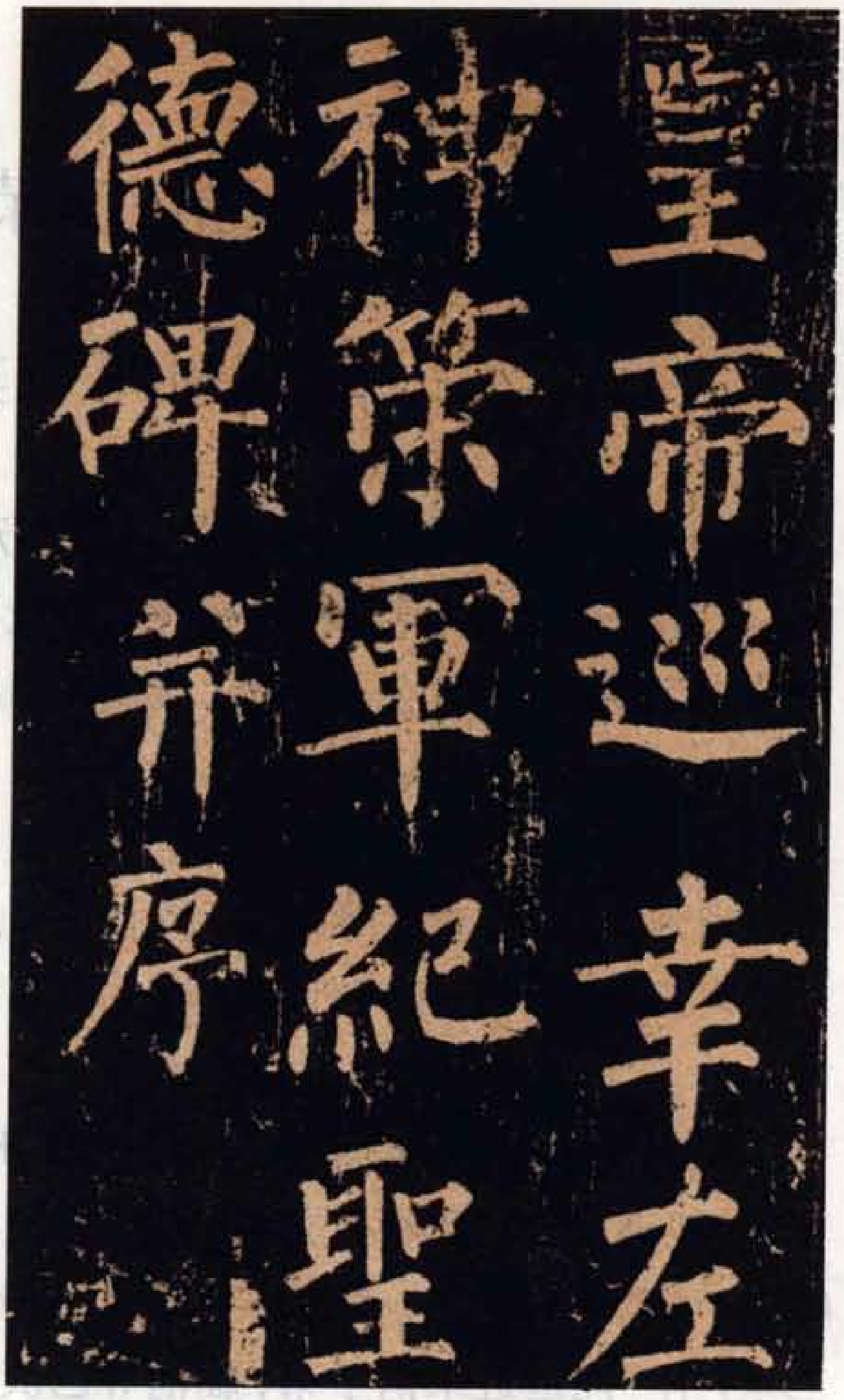
《金刚经》（图 5－1.1），长庆四年（824）四月六日柳公权为右街僧录灵准所书，立在西京西明寺后，即《旧唐书》本传所谓“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者。强演、邵建和刻字。赵明诚《金石录》及无名氏《宝刻类编》并未言及柳书长庆年间之《金刚经》，所记大中十三年（859）六月《西明寺金刚经》，乃为安国寺所摹。参阅董逌《广川书跋》卷八“此经本书于西明寺后，亦屡改矣。经石幸存，不坠兵火，柳玭谓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今考其书，诚谓绝艺，尤可贵也”云，可知北宋时所见此经乃出安国寺摹本，所评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者，则出自柳公权侄孙柳玭之口。是评盖出于名教，有所夸饰，然以唐拓视之，其劲媚相宜、筋骨相称、闲逸生趣处，洵为壮岁得意书，宜史家特加引用以示敬重也。现存唐拓本，系 1908 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伯 4503），硬黄原裱，且首尾完整，纸墨如新，弥足珍贵之。

《回元观钟楼铭》，令狐楚撰，柳公权正书，开成元年（836）四月廿日立在万年县回元观内，亦出内廷刻玉册官邵建和之手。1986 年 11 月 15 日西安东郊出土。铭为横石，字体略小。书法严峻刚劲，虽时见丰润雍容，然其锋芒凌厉，筋骨显露者，尤胜柳氏存世他石，盖其久埋地下，未经捶拓，甚少磨损，属离初刻之最近者也。

《玄秘塔碑》（图 5－1.2），全称《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休撰，柳公权正书并篆额，会昌元年（841）十二月廿八日立在西京。邵建和、建初兄弟刻字。此碑为柳公权最矜练之作，亦最著名，然最露筋骨，不善学者极易落硬直之病。赵崡《石墨镌华》卷三有称：“书虽极劲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鲁公而多疏。此碑是其尤甚者。”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也以为“柳书中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一大变耳”。晋法之变云，甚是。



5－1.2 柳公权 《玄秘塔碑》(局部)(841)



5－1.3　柳公权　《神策军碑》(局部)(843)

《神策军碑》（图 5－1.3），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徐方平篆额，柳公权奉敕正书，会昌三年（843）四月立在西京禁中。此碑早佚，存世惟见南宋贾似道重精装本前册，现藏北京图书馆。清初曾归北平孙承泽，其《庚子销夏记》卷七有记："予所收乃贾似道家物，上有秋壑图书及长字印。元入内府，上有官书条记。后在晋王府中。卷首手书云：'怪君何处得此本，犹有恒玄寒具油。'乃鲜于伯几笔也。"其书法较见温润，已无《回元观钟楼铭》之极峻风貌，遒媚处亦胜《玄秘塔碑》，或以为晚年得意之笔。其实是碑，虽亦奉敕书，但不复见有矜持之色，盖是时已解脱内廷侍书之职，且外放为闲散之官，无须兢兢业业恭诚供奉，是宜其书法渐入通会之境，而有所嬗变。惟其后之碑石，一无善拓可见，不能明其晚年格局，亦终难佐证"体势劲媚，自成一家"之说。宋季朱长文编《墨池篇》时所见柳书尚多，《续书断》所评"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者，当有所据。若谓柳公权书法会昌后渐见丰润，则是碑已显趋势矣。

第二节

“元和脚”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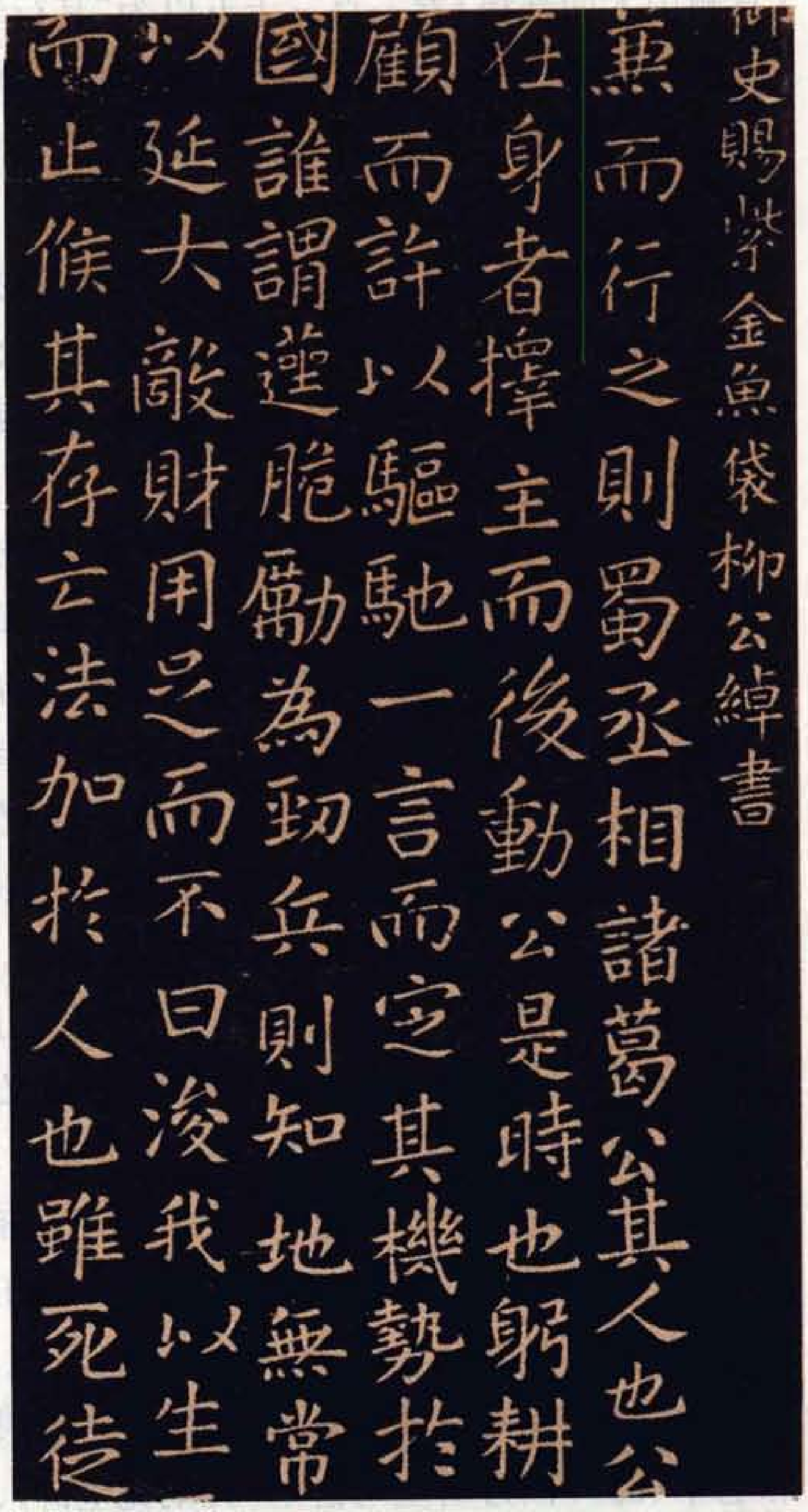
“元和脚”，盖谓柳宗元书法也。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之名士，与古文家韩愈齐名，时称“韩柳”。大柳公权五岁，与之同房习近，以章草书名世，且先于公权一朝。赵璘《因话录》卷三《商部下》云：

>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珍。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以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⑦

刘禹锡称子厚为“草圣”，有《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云：“篋盈草隶，架满之篇，锺(繇)、索(靖)继美，班(固)、扬(雄)差肩。”其以锺、索喻之，可谓景仰之致。子厚亦甚自负，《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有“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云，以庾翼“小儿辈贱家鸡”，而戏言刘家子弟趋学其书。又曾教示从弟柳宗直笔法，且有称其“善操觚牍，得师法甚严，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⑧云，是者，章士钊《柳文指要》以为“所谓师法，殆指自教之也”。日本留学生橘逸势来唐亦慕名人谒而得笔法于子厚，号称“橘秀才”。

柳宗元虽以章草名高湖湘，然见诸著录者，一无所见。可知者惟有楷书《祷雨碑记》(贞元十二年立石)、《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立石)和《弥陀和尚碑》(元和五年立石)三通，并自撰，亦无片石存世⑨。存世有《永字八法颂》⑩：“勒不愧(贵)卧，勒常(侧尝)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宜峻(当蹲)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右)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磔玼(趯)以开撑”云，或可扪心意会，概见子厚风格。乾符年间书论家卢携

《临池诀》称:“徐吏部(浩)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按 1920 年河南洛阳龙门出土有皇甫阅《安国寺澄空塔铭》,梁宁撰,正书于贞元九年(793)校书郎任上,书法本于徐浩而加丰逸。是或可见子厚楷书之所出。刘禹锡有《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云“常时同砚席”,其为皇甫阅之及门、柳宗元之“同砚席”,亦乃徐浩之再传,且“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答后篇》),名高一代,甚见自重,书迹著录可见者九石,又多于柳宗元。存世有《乘广禅师碑》(元和二年五月廿七日立石),丰润婉劲,宜省参子厚楷书,盖与章草峭丽者或不尽同。刘禹锡与柳公权亦有交游,所撰《山南西道驿路记》(开成四年)、《赠太师崔陲碑》(会昌元年)二石并出诚悬正书。其先在屯田员外郎任上,又曾以柳公权兄公绰“流辈间号为端士”,而举其“自代”。刘、柳行谊,自可想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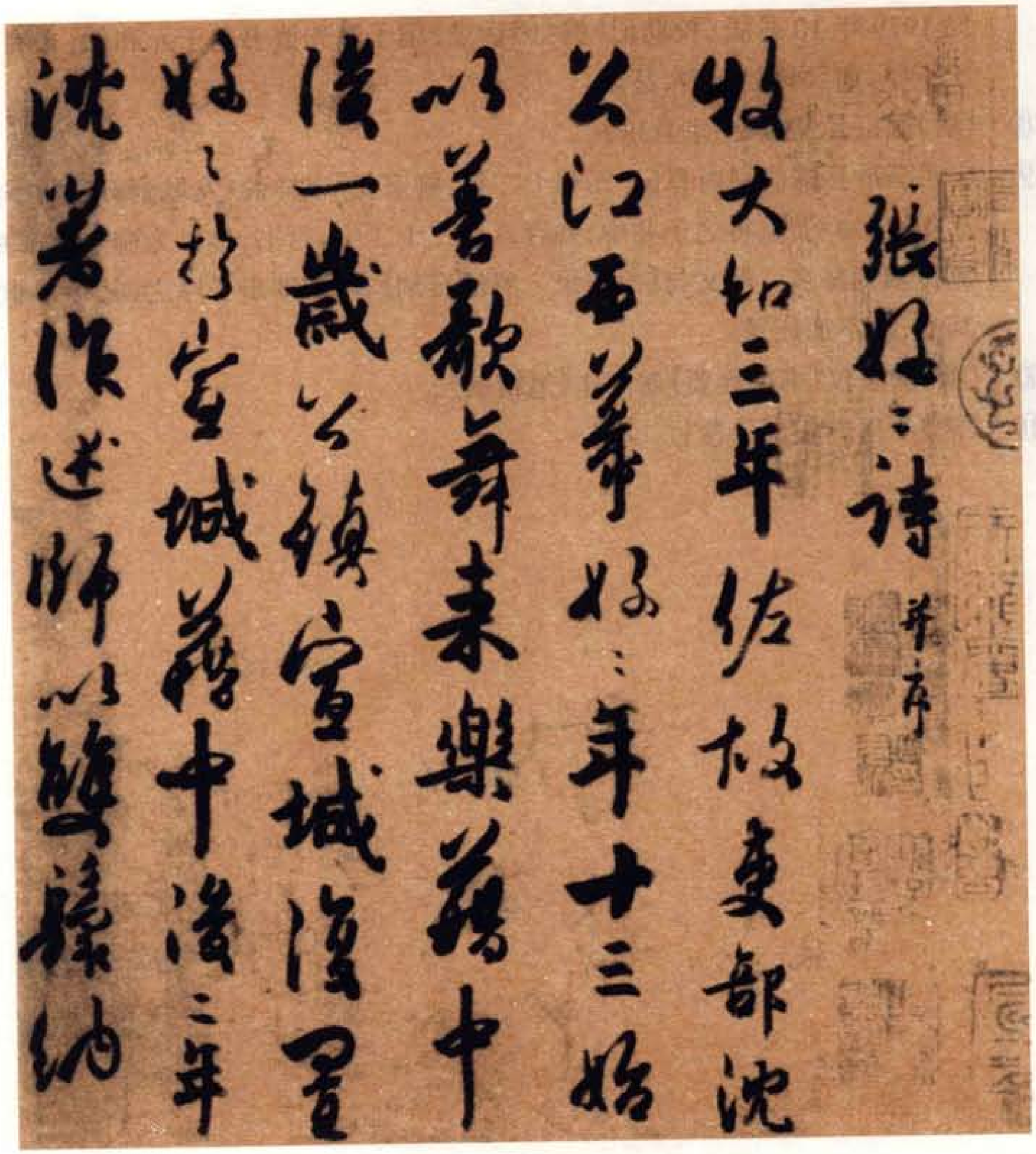
5-2.1 柳公绰 《诸葛武侯祠堂碑》(局部)(788)

柳公权之兄公绰

(768—832),字宽,小字起之,贞元元年(785),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四年(788)再登是科,授渭南尉,其后官至河东节度使。亦工于书法,米芾《海岳名言》有称不俗于弟。所书《诸葛武侯祠堂碑》(图 5-2.1,裴度撰,元和四年二月廿九日立在成都),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以为"其行笔飘洒雄逸,无拘迫寒俭之态,真足埙篪。第结构小疏,不能运铁腕捺磔间耳"。其实,其书严重如人,典正处乃出之家学,与公权弟兄同轨。元章之谓有胜者,乃恶诚悬之筋骨太露、甚见支离。

柳家群从子弟,并能传其家学,且著名的如柳仲郢、柳知微诸人,亦为晚唐书坛之杰出者。至于柳怀素(知白),公绰之曾孙,光化二年(899)书有李巨川《济安侯庙记》,楷则严整,为柳家肖子,直宜其重振家范峣然而名世也。

书入晚唐,便见寂寞,柳氏兄弟之外,虽有牛僧孺师法锺繇,落落不俗;李德裕祖述鲁公,毅然有法,以及温庭筠遒媚有态,郑馀庆劲熟可喜,且并见称于宋明诸贤,惟其碑志无存,知音难觅,庶几乎不能见鸣之于后世。晚唐名迹,可观者惟杜牧《张好好诗》(图 5-2.2),大和八年(834)所书,气格清健,深得六朝遗意;范的《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大和七年(833)十二月一日重立,万齐融撰,原系徐峤之书,范氏乃重书,其遒媚茂密,见称于包世臣、康有为清朝诸贤,尤为叶昌炽所推崇,以为"范之视徐(峤之),非买王得羊,直是积薪居上。徐书《姚懿碑》尚存,虽妩媚有俗韵,见此碑正当如尹、邢之相避"。又称范的"书笔遒丽",为"萧诚以后,学王书者第一"[11]。以其一江东隐士,生前知遇于州牧,争妍名贤,而又能见重于后世如是者,盖属不易;还有翰林待诏唐玄度篆书《李溶志》盖"大唐故安王墓志之铭"九字,开成五年(840)八月二十九日入窆,近年西安灞桥出土,作玉箸篆,亦奉敕书,圆健有法,洵属晚唐所罕见者。当时柳公权书名盖世,且善作篆字,所书诸多碑额并出自题,然大和七年(833)四月所立冯宿《昇元刘先生碑》,尤其开成五年(840)正月《何进滔碑》,撰、书并出其手,而额却留属于唐玄度题写,唐氏篆书之声



5－2.2 杜牧 《张好好诗》(局部)(834)

名，自在柳氏之上，当属无疑。其弟唐玄序，行右卫仓曹，以集王羲之行书著名，著录所见有《李藏用碑》及《金刚经》二通。《金刚经》，尚可见宋代拓本。

---

①②③⑤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柳公绰传》附。

④ 《唐文拾遗》卷六十一佚名《上柳侍郎书》。

⑥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跋。

⑦ 刘禹锡“柳家新样元和脚”句，旧注：“元和脚”者，指柳公权。《柳宗元集》中华书

局 1979 年 10 月版《校勘记》据《因话录》谓子厚先擅书名于元和，且未有乞书于子厚，而反称公权者，甚是。

⑧ （唐）柳宗元《志从弟宗直殡》。

⑨ 广西马平县柳侯祠内有记“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字样的《龙城刻石》，明季天启三年（1623）龚重得之于井中，残存八行三十二字，行书，传以为柳宗元撰并书，流传翻刻甚多。然文与《龙城录·罗池石刻》有异，即出子厚之词，亦并非定为其书，故不加征录。

⑩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作《笔精赋》。

⑪ （清）叶昌炽《语石》卷七。

第六章

唐代文化与书法

第一节

书法藏庋、鉴赏及其他

唐贞观、开元年间，书画收藏之风特盛。其自搜求而蓄聚、而鉴识、而阅玩、而装褫、而铨次，渐成规模，时出新构。

内府所藏书法，大抵来自进献、搜访两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谓“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赍”云。其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下注：

> 国初左仆射萧瑀，及许善心、杨素、褚安福家，并进图画，兼隋代所有，乃成林薮。贞观六年(632)，虞世南、褚遂良等奉敕简阅。开元十年(722)十二月，太子中允张悱，充知搜访书画使。天宝中，徐浩充采访图画使，前后不可具载名代也。
>
> 开元中有商胡穆聿，别识图书，遂直集贤，告讦搜求，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详。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辽东人王昌，括州人叶丰，长安人

田颖，洛阳人杜福、刘翌，河内人齐光，皆别识贩卖。此辈虽怜业好事，而迹类藩身。又有侍御史集贤直学士史维(惟)则，充使，博访图书，悬以爵赏，所获不少……贞元初有卖书画人孙方颙，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

又，《唐朝叙书录》有记神功元年(697)五月凤阁侍郎王方庆进王羲之书一卷并其“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

《历代名画记》序又称元和十三年(818)张弘靖进献书画，“锺、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

至于内府所藏历代书法真迹的数量，唐时有两种说法：一、《唐朝叙书录》：“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十一卷。”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相引用；二、徐浩《古迹记》：“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后。”参阅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正书都五卷”，“行书都五十八卷”，及韦述《叙书录》：“帝(太宗)令魏少师(徵)、虞永兴(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唐朝叙书录》所记“古今工书”者，包括梁隋官本在内。内府所藏书法即锺、张、二王和历代名家真迹，当以《古迹记》所记为近是。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唐一代私人藏家甚多，当时称为图书之府。著名的藏家，除《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记：窦蒭、席巽、潘履慎、蔡希寂、窦绍、滕昇、陆曜、释朏(良朏)、

高至(志直)、晁温(温晁)、崔曼倩、陈闳、薛邕、郭晖、张从申、惟素父子、萧祐、李仿古、归登、卢元卿、韩愈、裴潾、段成式、裴度、李德裕等人之外，见诸史传者，还有韩王元嘉、岐王范和魏徵、颜师古、王方庆、锺绍京、张弘靖、韦述、杨凭等人。其中以张弘靖最为著名。

张弘靖(760—824)，初名调，字元理，河中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官至太子少师，曾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封高平县侯。祖嘉贞、父延赏，并位至宰相，旧第在洛阳思顺里，时号“三相张家”。家藏经籍与书画，史称侔于秘府。其孙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两书，即取资于家藏。《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有称：

> 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嘉贞)，曾祖魏国公(延赏)，相继鸠集名迹……大父高平公(弘靖)，与爱弟主客员外郎(彦远叔祖名谂)及洊公(李勉)爱子缵(祠部郎中)，缵弟约(兵部员外郎字存博)，更叙通旧，遂契忘言，远同庄惠之交，近得荀陈之会。大门(大父)请缵为判官，约与主客，皆高谢荣宦，琴尊自乐，终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繇是万卷之书，尽归王粲；一厨之画，惟寄桓玄。李兵部又于江南得萧子云壁书飞白萧字，匣之以归洛阳，授余叔祖，致之修善里，构一亭，号曰萧斋。

其他，张庭瓘、徐浩亦家多法书，为时所称。至于张易之、太平公主、薛稷以及薛崇胤、崇简兄弟，其巧取豪夺者，一败则散，自不能与“图书之府”同科而视之。

有聚蓄，必有鉴识。唐代善识明鉴者，除了“科简”二王书迹的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王知敬；充任书画采访使的张悱、徐浩、史惟则；“辨伪知真，无出其右”的窦臮、窦蒙兄弟；“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的张彦远和“使定古迹，亦胜常人”的徐铉之外，《述书赋》尚记有锺绍京、窦蘩、李造、席巽、张怀瓘怀瓌兄弟、潘履慎、蔡希寂、窦绍、韩驷、滕昇、陆曜、释良朏、高志直(至)、温晁、崔曼倩、陈闳、赵微(徵)明、徐守行、薛邕、关

镠、郭晖、潘淑(淑善)、袁明、穆聿(详)、王昌、叶丰、田颖、杜福、刘翌、齐光、赵晏和张揖诸人。其中穆聿、王昌、叶丰、田颖、杜福、刘翌、齐光、赵晏等八人,出身商贾,为士大夫所不屑,《述书赋》之称,盖为典型。其云:

长安则穆聿(聿,咸阳陇右人,少以贩书为业,后至德中,因告讦征搜古迹,并强括石泉公王方庆家则天后所还书功,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祥[详]。乘危射利)、王昌(辽东人,词谎智狡)导其源,叶丰(括州人,貌恭性僻)、田颖(长安人,志凡识滞)委其躯。必拾遗市骏,怀宝飞鸢。洛阳则杜福(河南人,论熟行巧)、刘翌(洛阳人,节苦心廉)穷弥固,齐光(河南人,道寡业微)、赵晏(河内人,智专别识)乐忘劬。(此四人者,洛阳贩书者。)皆夸目动利,实繁有若无(一作夸自动利,实有若无)。《诗》不云乎"匪斧",《语》有之曰"反隅"。若或徵数子之运用,甘千里之殊途,则我鸡犬而无来无往;子衣裳而不曳不裾(娄),成一家之憬彼,睽四海之友于(言通贷利)。

李绰《尚书故实》还记有孙仲容(《历代名画记》作孙方蓥)、孙盈父子,"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

阅玩,即观览、玩索,大抵不外于传写、赏赐、题赞和仿古四途。

一、传写,弘文馆、集贤院均设有专职,名曰"拓书手"。其分真迹、石刻二种,真迹谓之摹拓,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思桢)、汤普彻诸人皆是以传写《兰亭序》出名的"拓书手"。石刻则曰打本,唐玄宗《华岳碑》,"天宝九载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赐朝臣"①。李齐古也"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为上下两卷"②。韦应物《石鼓歌》:"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埽白黑分。"韩愈《石鼓歌》:"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既击既埽",是其制作;"白黑分","毫发尽备",乃其质量。其"今人濡纸"及"纸本"云云,可知打本当时已经用纸。敦煌发现的李世民《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即为唐代打本。《温泉铭》末题:"永徽四年八月卅日围(圉)谷府果毅见",当出唐初打本。

二、赏赐，分赏览与赐予。赏览，即出内府名迹，供近臣传阅，如武则天“内出二王真迹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诸宰相，看讫表谢，登时将入”③。

赐予，摹本如《兰亭序》《乐毅论》赐重臣；打本《华岳碑》赐朝臣，颜真卿与兄允南曾各得一本。内府真迹也时见相赠，《古迹记》记：

> 至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敕赐二十卷（一作十二卷），大小各十轴，楚客遂装作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闲居赋》《枯树赋》为脚，因大会贵要，张以示之。时薛稷、崔湜、卢藏用废食叹美，不复宴乐。安乐公主婿武延秀在坐，归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为富贵，适过宗令，别得赐书，一席观之，辍餐忘食。”及明谒见，颇有怨言，帝令开缄，倾库悉与之。

《旧唐书》亦记唐太宗赐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赐萧瑀，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参其赐李大亮时所云：“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④其功利甚显。

君王之赏赐，亦有关其政治之昏与明。

三、题赞，即有关书法的题记和赞颂。题记，短笺如上引阖谷府果毅都尉之经眼；那罗延“建尊胜碑，打本散施，同愿受持”⑤之申明；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之记事。长跋，则有司空图《书屏记》之感愤追述：

> 元和、长庆间，先大夫初以诗师友兵部卢公载从事于商於，因题纪唱和，乃以书受知于裴公休，辟倅钟陵。及征拜侍御史，退居中条，时李忻州戎亦以草隶著称，为计吏在满，因辍所宝徐公（浩）真迹一屏以为贶，凡四十二幅，八体皆备，所题多《文选》五言诗，其“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或缀小简于其下，记云：“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可以视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玩，殆废寝食，常属诫云：

"正长诗英,吏部笔力,逸气相资,奇功无迹,儒家之宝,莫逾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窥,必当夺璧于中流,飞铓于烈火也。殆非子孙之所可存耳。"庚子(戌)岁(大和四年)遇乱,自虞邑居负之置于王城别业,丙辰(开成元年)春正月,陕军复入,则前后所藏及佛道图记,共七千四百卷,与是屏皆为灰烬,痛哉!今旅寓华下,于进士姚颉所居,获览《书品》及徐公评论,因感愤追述,贻信后学,且冀精于赏览者,必将继有诠次。

至于巨篇大论者,则有韦述《叙书录》、徐浩《古迹记》、武平一《徐氏法书录》、张怀瓘《二王书录》以及卢玄卿《法书录》等著述,其中叙述二王书迹之聚散,尤以徐浩《古迹记》为最详,且可征信。

赞颂者,多记观赏法书名迹之感,虽仍以叙述为主,然已兼见评论,散篇诸如杜甫之记《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舒元舆之作《玉箸篆志》,温庭筠之写《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此有作》,韩愈之撰《石鼓歌》以及褚遂良之题《八骏图》等等,并为后之论书家所重,多加引述。至于崔备《壁书飞白萧字记》,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及张弘靖《高平公萧斋记》三篇,虽然出自张彦远的偏爱,但其珍重萧子云之书迹,至诚至笃,亦多为后之收藏家所仰止。

四、仿古,一为售奸,一是逞能,虽功利有异,然于古迹,其摹似之专精可谓一矣。售奸者以李怀琳昭著,著名的《嵇康绝交书》即出自他的手笔。其他托名王羲之《大急就》、卫夫人《七贤书》和《竹林叙事》以及薛道衡书迹,窦臮亲见之,据说咄咄逼人,难辨真伪。贞观中曾献别本,因之召入内廷待诏于文林馆。《述书赋》评其书"疏壮",有"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吠声之辈,或浸馀波"之讽。

至于逞能,无论孙虔礼"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抑或张绍先之换高正臣五纸,还是颜元孙代舅殷仲容书,诸如此类,并不若萧诚之戏李邕为之典型。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记:

萧诚自矜札翰，李邕恒自言别书。二人俱在南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李邕，邕辄不许。萧疾其掩己，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曰："许而不了，得非诳乎？"萧于是令家童归见取，不得。惊曰："前某客来见之，当被窃去！"李诚以为信矣。萧良久曰："吾置在某处，遂忘之。"遽令走取。既至，李寻绎久之，不疑其诈，云是真物，平生未见。在坐者咸以为然。数日，萧往侯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故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装褫，自刘宋以来，甚见重视，并设专职负责之。唐制秘书省设装潢匠十人，弘文馆设熟纸装潢匠九人，崇文馆设装潢匠五人、司经局二人，史馆设装潢直一人，集贤院设装书直十四人。《历代名画记》卷三《论装背裱轴》有记唐太宗曾"使典仪王行真等装褫，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监领"。大凡书画跋尾押署，装裱者名列其首，其可见者，略有兵曹樊行整，将仕郎直弘文馆王行直（疑即王行真），将仕郎直弘文馆张龙树，陪戎副尉王思忠，王府大农李仙舟，装潢手辅文开（贞观二十二年《善见律》，藏故宫博物院）、许芝（显庆元年《太玄经》）、解善集（咸亨二至五年《妙法莲华经》，以上两经藏北京图书馆）以及蔡锷等人。

唐代书画装裱与经籍装帧尚未分道，初期因承旧制，作卷轴装，中期始见旋风装即页子装如吴彩鸾《唐韵》，渐向蝴蝶装即册页装过渡，开宋、元书籍装订之先河，与书画装裱遂分成两途。其卷轴，尤其集贤院四部库书，甚见瑰致，《唐六典》卷九记："四库之书，两京各一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历代名画记》又记书轴以"白檀身为上，香洁去虫；小轴，白玉为上，水精为次，琥珀为下；大轴

杉木漆头，轻圆最妙……故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缥织成带，以为官画之裱”。张彦远既记“官画之裱”，亦当另有坊间所裱，惟唐代卷轴，今已无觅。其装背之法，惟见存于《历代名画记》，其卷三《论装背褾轴》之记，或可参考：

凡图书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不在辄议割截改移之限。若要错综次第，或三纸、五纸，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糅杂。本亡铨次者，必宜与好处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何以然？凡人观画必锐于开卷，懈怠将半，次遇中品，不觉留连，以至卷终。此虞龢装书画之例，于理甚畅。凡煮糊，必去筋，稀缓得所，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研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汧国公（李勉）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原注：赵国公李吉甫家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阴阳之气以调适，秋为上时，春为中时，夏为下时，暑湿之时不可用。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纸缝先避人面及要节处。若缝缝相当，则强急，卷舒有损。要令参差其缝，则气力均平。太硬则强急，太薄则失力。绢素彩色不可捣，理纸上白画可以砧石妥帖之，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古画必有积年尘埃，须用皂荚清水数宿渍之，平案扞去其尘垢，画复鲜明，色亦不落。补缀抬策，油绢衬之，直其边际，密其隙缝，端其经纬，就其形制，拾其遗脱，厚薄均调，润洁平稳，然后乃以镂沉檀为轴首，或裹鼧束金为饰。

有唐装褫，盖钤印记，此乃后世收藏印记之滥觞。公藏印记，可知者有唐太宗自书贞观两字，作“贞”“观”二小印；唐玄宗自书开元两字，制成一印“开元”。又有集贤印、秘阁印、翰林院印（“翰林之印”）、弘文馆印（“弘文之印”）等印记。私人印记，并出识鉴宝玩之家，著名的有魏王李泰，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和徐峤之、徐浩、徐钬祖孙三代，窦臮、窦蒙和张怀瓘、张怀瓌兄弟，李勉、李约父子以及李造、窦永、刘绎、李泌、周

昉、刘知章、锺绍京、李吉甫、黎幹、萧祐、韩驷、王涯、马总、王朏、张敦简诸人。是亦可知唐时书法收藏之盛、鉴赏之重也。

铨次，即考量次第，虽为“识鉴宝玩”之家所重，然存世著录甚少，可见者，目录惟有褚遂良《右军书目》和无名氏《右军书记》两通；品第亦仅李嗣真《书品后》，张怀瓘《书断》两通。至于张怀瓘《书估》，立三估，置五等，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以为“意在推翼子敬而稍薄右军”，然亦可明唐代天宝年间书法之比况。《书估》云：

> 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他皆仿此。近日有锺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崔、张之迹，固乃寂寥矣。

联系到张彦远所记的画价，“顾、陆、张、吴为正经，杨、郑、董、展为三史，其诸杂迹为百家（吴虽近，可为正经），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货。要藏篋笥，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隋以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幛，故以屏风为准也）。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间谙悉者，推此而言，可见流品”⑥云，时尚如此，张怀瓘三估、五等之评，并非空穴来风，纯为游戏之作。

“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⑦。法书名画，以厚货、官爵相交换，虽说王涯之贪婪，然亦是李唐一代之风气。具体如何，唐人著述中甚少谈涉，但从《述书赋》所记穆聿“强括石泉公王方庆家则天后所还书功，白身受金吾长史”云，“强括”两字，明言王方庆家属献书乃出于被逼。徐浩《古迹记》记赵城仓督有献扇书《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赐绢百匹，擢授本县尉”，可谓厚货、

官爵并致之，然其法书，本为内库之物，为安禄山所盗窃者，“推案承伏”，是为隐没，“欲请赎罪”，方将呈进，更是出之于无奈。至于《兰亭》一序，众所周知，是为唐太宗所“赚”得。因是联想到元和年间张弘靖的进献书画和潘淑善的“献书画拜官”，或许也出于王涯、穆聿辈所“强括”，是极不情愿的。然而，对于同时人的书画，即使作为一般的书写，还是有代价的，尽管不及名家名品之万一。唐代书法已有称润笔，如洪迈《容斋续笔》卷六：“柳玭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柳玭虽不受润笔，然润笔，盖早已通行。近世敦煌发现的《秦妇吟》（斯 692），系安友盛所抄，末题：“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禅安心义》（京宿 99）题诗：“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两相参阅，唐时书法润笔，殆分为物与钱两种。

论述至此，顺便介绍一下唐代书坛最基本、最低层的书法人材抄书手的概况。有唐抄书手，又称书手，或称楷书手，是省台中专职抄书人员，据有关史籍记载，编制上便明文规定：弘文馆三十人，崇贤馆十人，司经局、史馆各二十五人，集贤馆百人。这些抄书手，随着各馆抄写事务的轻重变化，相互间还可以随时调拨。抄书手的选用，自唐太宗以来，一直非常严格。贞观年间规定，“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⑧。书法史上津津乐道的贞观元年（627）招收京官子弟之事，便是训练诸馆书手，凡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观摩之法书即由秘阁提供，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当年便有二十四人入馆学书。至于贞观二年（628）国子监恢复书学，其目的起初或许也是为了培养书法专门人材，为诸馆提供书手。唐玄宗对于书手，更是十分重视，史记：“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⑨按《宣和书谱》有称明皇“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云，若是，其御简书手，并非出于好事。

书手，既然是定员的流外官，他们的待遇，参考《唐六典》卷八“先置楷书手，今改为令史”；卷十九“中书、门下令史，诸楷书手，写书课，皆有

炭料”云，俸料和月粮，当例同令史，“食贮米，菜料日四十钱，给三口粮”⑩，“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⑪。贮米，唐制日二升，年七石二斗，三口粮，则年米二十一石六斗。参阅上述“诸楷书手，写书课，皆有炭料”云者，其“写书课”，或是一种临时派遣的抄书差役。《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崔行功传》有记：“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⑫此或即为“写书课”者，出于临时雇佣，不占编制，纳书取直，待遇当优于专职楷书手。是职，楷书手时或亦兼任之。又《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省”引贞元三年（787）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续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书功粮钱，已有到日，见欲就功……又当司准格，楷书八年试优，今所补召，皆不情愿。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诸道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今缘召补楷书，未得解书人，元写经书，其历代史所有欠阙。写经书毕日，馀钱请添写史书”云，诸道所供给的写书功粮钱，当是用于“写书课”的开支，或者作为楷书手俸料、月粮外的补助。楷书手其“写书课”之“修写经书”，若亦如高宗朝“计直酬佣”，反观它的条件，太宗朝选五品以上京官子孙工书者召为书手；玄宗朝“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⑬。其要求之高、择用之严，礼遇例当不菲。由是可知，楷书手虽然属于技术官，职位低卑，但经济收入仅俸料、月粮、炭料以及功粮钱诸项，已高于胥吏包括外职掌的州县录事，若加上润笔，其物或钱，则更是可观，盖非其他流外官之所可企及者。斯亦可明唐代社会对书法的重视。

第二节

儒家与书法

有唐一代，一切经籍几乎全凭手工抄写。国家藏书，有专职书手从事缮写；私人藏书，主要来自文人的抄录。至于著述，“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则大都凭藉作者自己的手笔。所以顾炎武有言称：“唐以前书卷，必事传写，甚者编韦续竹，裁蒲葺柳，而浮屠之言亦堆山花贝竹，缀集成文。学者于时，穷年笔札，不能聚其一，难矣！”⑭

唐代文士抄书者可以分作两类，一抄书收藏，二佣书自给。先者以韦述、柳仲郢最著名，后者以吴彩鸾为代表。韦述（？—757），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著名史学家，颜真卿岳丈之兄，史称：“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尝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⑮柳仲郢，字谕蒙，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名臣柳公绰之子，即柳公权之侄，“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类所抄它书凡三十篇，号《柳氏自备》，旁录仙佛书甚众，皆小楷精真，无行字”⑯。其他文士也大抵以抄书为乐事，不独名儒张参手抄《九经》，有“读书不如写书”⑰之称，诗人李商隐见韩愈文，也有“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⑱之祈。对于所抄之书，更见宝重，以豪侈著称的杜兼，聚书万卷，也甚见爱惜，有诫子孙语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⑲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二，曾记当时士人对自己著述的重视：

古人著述诗文，一生心力所寄，必有所托，以思传于后世。如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陆鲁望诗文手稿尽置白莲寺佛像腹中，唐求诗草置大瓢中投诸岷江之流，皆名心未忘故也。如来自言四十九年来未曾说着一字，乃亦以身后结集属大迦叶，岂名心亦未尽忘耶！

文人家贫，佣书自给，自古有之，此乃我国传统，远自东汉班超，近至隋代虞世基，以及孙棨《北里志》“张住住”故事中的庞佛奴莫不因其家贫，为人佣书。唐代文人佣书者，除了“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20]的唐初书家王绍宗之外，吴彩鸾便是一个代表。《宣和书谱》卷五记大和进士文萧之妻吴彩鸾，因夫不治生计，家贫，“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馆口计”。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称其《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馀，全不类世人笔。”

至于出自读书的需要而充当抄书手的，如高士阳城“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21]者，虽为少数，但亦见其文人之善于书。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唐代士大夫莫不遵循孔子的教导，重视六艺的修养。颜之推《颜氏家训》所立的明训，或可以引作儒家对待书法的一种典型态度，其《杂艺第十九》称：

>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馀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雲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惟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

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其实，儒家之于书，甚重功利，"书契之作，适以记言"，其留心真、草，玩习法书，临摹追仿，字画楷正者，非求其工，一笔一画，而意在文字；一字一句，乃为达意，即使平常书判写牍，铭石题记，以及籍账、券契、文案、药方，莫不义在致用，岂容飘扬放纵，而且儒者多居敬，尤检点及乎书法，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曾记席豫"性尤谨，虽与子弟书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22]。由是，儒者之书，多见行、楷，且每每为不求其名而反显其名者，其中除前述如欧如询、虞世南、王知敬、褚遂良、钟绍京、卢藏用、张庭珪、吕向、梁昇卿、张旭、贺知章、韩滉、颜真卿、徐浩、柳公权以及唐睿宗、唐玄宗、唐顺宗和窦后之外，见称于史传而卓然名世者，尚有以下多人。

汉王李元昌，唐高祖第七子，《旧唐书》卷六十四本传称："少好学，善隶书。"唐宋书论家也甚见注重，李嗣真《书品后》乃与陆柬之并称，且记与唐太宗、褚遂良等"皆授之于史陵"，"汉王作献之气势，或如舞剑，往往邻几"。张怀瓘《书断》视作孙过庭、王知敬、高正臣、薛稷同品，有称："尤善行书，金玉其姿，挺生天骨，襟怀宣畅，洒落可观。艺叶未精，过于奔放，若吕布之飞将，或轻于去就也。"窦臮《述书赋》以为其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王羲之）献（王献之），守法不二"。朱长文《续书断》列入能品，且立传谓："祖述羲、献，尤善行书，虽在童年，已精笔意，盖夙成之智，有不待久而能者矣。"

鲁王李灵夔，唐高祖第十九子，《旧唐书》卷六十四本传称："好学，工草隶。"亦见称于《书断》。

岐王李范，睿宗第四子，本名隆范，后避玄宗连名，改单称范。卒后追册惠文太子。《旧唐书》卷九十五本传称："好学工书。"《述书赋》记："惠文靡倦，博好敦劝。恨夫有始无终，灰烬成空。苟惧存而投阁，徒荣殁

而升宫。尚可谓梁园笔壮，乐府文雄。累圣重光之盛业，六书一艺之精工。非所以抑至人之徇己，服勇士以雕虫。责繁声于《韶》《濩》，征艳色于苍穹者也。”近年陕西乾县乾陵和西安韩森寨分别出土李范所书《李贤志》（卢粲撰，景云二年十月十九日入窆）、《李嗣庄志》（并撰，开元九年十一月六日入窆），其小楷清健精雅，自不在盛唐诸子之下。

临川公主（624—682），字孟姜，唐太宗第十一女，韦贵妃所生。《新唐书》卷八十三本传称：“主工籀隶，能属文。”郭正一《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亦记：“公主讳字孟姜……乃□□表起居，兼于缮写。圣皇览之欣然，以示元舅长孙无忌曰：‘朕女年小，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慰人。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踪。’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唐太宗女，临川公主之妹，文德皇后所生。《新唐书》卷八十三本传称：“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

魏叔瑜，字思瑾，巨鹿曲阳（今河北曲阳）人，初唐名臣魏徵之子。年五十一卒于豫州刺史任上。《新唐书》卷九十七本传称：“善草隶，以笔意传其子华及甥薛稷。世称善书者，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唐初书法四家，首留意于叔瑜，亦可见其声名之隆。

房乔（579—648），字玄龄，以字行（一作名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有唐一代名相，《旧唐书》卷六十六本传记：“工草隶。”李嗣真《书品后》列入中中品并同智永、陆柬之，尤与王知敬同列，有称：“房司空雕文抱质，王家令（知敬）碎玉残金，房如海上双鸂，王比云间孤鹤。”《书断》也以为“房仆射玄龄与此公（王知敬）同品。房行草亦风流秀颖，可与亚能”。《述书赋》见其书迹，有评：“雅而能和，稳而不讹。精神正气，胸臆馀波。若苹萍异品，共泛中河。”

杨师道（？—647），字景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官至中书令。《旧唐书》卷六十二本传称：“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其书出自虞世南，《书断》以为能“立师法”。蔡希综《法书论》名忝初唐欧、虞诸家之列，且有称“亦深有意”者。《续书断》列入能

品。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其贞观十二年(638)二月行书唐太宗《登逍遥楼诗》一通。

陆景融,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陆彦远堂侄。《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本传:"博学,工笔札。"《书史会要》卷五称:"以博学工书,擅名一时。行楷既实且美。"

王方翼(623—685),字仲翔,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称:"善书,与魏叔琬(魏叔瑜之兄)齐名。"

裴行俭(619—682),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徐浩之祖书家师道(太真)曾为其幕僚。为褚遂良友人,曾与之非议废皇后王氏事。《旧唐书》卷八十四本传记:"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有集二十卷,撰《草书杂体》㉓数万言,并传于代。"《书断》称:"工草、行及章草,并入能。有若缙绅之士,其貌伟然,华衮金章,从容省闼。"《法书论》视同于欧阳询、虞世南初唐诸家,以为于书法"亦深有意"者。北宋宣和朝内府收有其草书《千字文》一通。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巩县(今属河南)人,杜甫之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本传记:"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原)、宋(玉)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

宋令文,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名诗人宋之问之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宋之问传》记:"父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书断》称:"奇姿伟丽,身有三绝,曰书、画、力,尤于书备兼诸体,偏意在草,甚欲究能,翰简翩翩,甚得书之媚趣,若与高卿(正臣)比权量力,则驺忌之类徐公(峤之)也。"其子之逊亦善书,《法书论》列为父子"相继其能者"。《金石录》收有其《封公碑》(垂拱元年十月立石),有称"字画颇佳"。又说:"之愁奴事武三思,'三思五狗',之逊乃其一。以此知书特小技,苟非其人,亦何足贵哉!"

韦陟(697—761),字殷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旧唐书》卷

九十二本传称："有文彩，善隶书。"其即当年见怀素书法"睹其笔力，勗以有成"[24]者。陆羽《僧怀素传》记："吏部尚书韦陟见而赏之，曰'此沙门札翰，当振宇宙大名。'"按韦陟以"郇公五云体"名世，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下"记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每令侍婢主尺牍……陟惟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然后之论书者多不言及，而以真、行书称述之，如吕总《续书评》，以为"如虫穿古木，鸟踏花枝"。《续书断》列入能品，且立传称"书有楷法"。

张嘉贞（666—729），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名书论家张彦远之高祖，颜真卿伯父颜元孙曾得其器重，当年中书令任上，特引荐颜元孙为知制诰。颜真卿本人也因其弟相州刺史嘉祐之请托，为相州周太师尉迟迥祠庙撰写碑铭。《旧唐书》卷九十九本传记："（开元中出任定州刺史）至州，于恒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乃书于石。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张彦远《法书要录》序亦称："河东公（嘉贞）书迹俊异，尤能大书，本传云：'不因师法，而天姿雄劲。'[25]"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名诗人，与书画家张谔友善，又曾结交于名书家史惟则。《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本传记："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本传亦记："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述书赋》评之曰："诗人《国风》，笔超神迹。李将军世称高绝，渊微已过；薛少保时许美润，英粹合极。"下注："诗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胜于李思训。弟太原少尹缙，文笔泉薮，善草隶书，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时。"

归登（754—820），字冲之，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本传称："登有文学，工草隶。"《续书断》列入能品，且立传云："登书前人未尝称道，余近得《径山禅师碑》于钱唐，乃登骑省时书也，字皆真行，纵横变动，笔意尤精，盖其当时不以书自名，而唐人亦罕称之尔。"《宝刻类编》收有其贞元、元和间所书碑版凡十四通，明记有行书

三、篆额四[26]，其工书当不仅止以隶书擅长也。归登之隶书以《张延赏碑》最著名。

沈传师(777—835)，字子言，著名史学家沈既济之子，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本传记："工书，有楷法。"《续书断》列入妙品，有"欧(阳询)、虞(世南)、徐(浩)、沈(传师)"之称。其立传云："正、行书皆至妙品，存于翠琰，爽快骞举，如许迈学仙，骨轻神健，飘飘然欲腾霄云。"米芾《海岳名言》称："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所书韩愈柳州罗池与黄陵两庙碑，并称于后世。按《柳州罗池庙碑》(图 6－2.1)，沈传师正书，陈曾篆额，长庆元年(821)正月十一日立石，王铎题称："沈书寡觌，本虞永兴(世南)、柳诚悬(公权)、欧率更(欧阳询)合为一。"[27]《黄陵庙碑》，长庆元年(821)立石，董逌《广川书跋》卷九称："《黄陵碑》，世以其书为重。石久缺剥，字灭几半矣。近人(北宋)以其完本售至数万，谓传师此书特谨重有法，不与他石并也。"又有行书《游道林岳麓寺诗》，亟见称于北宋诸论书家，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谓："传师书，非一体，此尤放逸可爱也。"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亦以为逸宕可奇，有评"《道林岳麓寺诗》，字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平，使子敬(王献之)复生不过如此"云。

6－2.1 沈传师 《柳州罗池庙碑》(局部)(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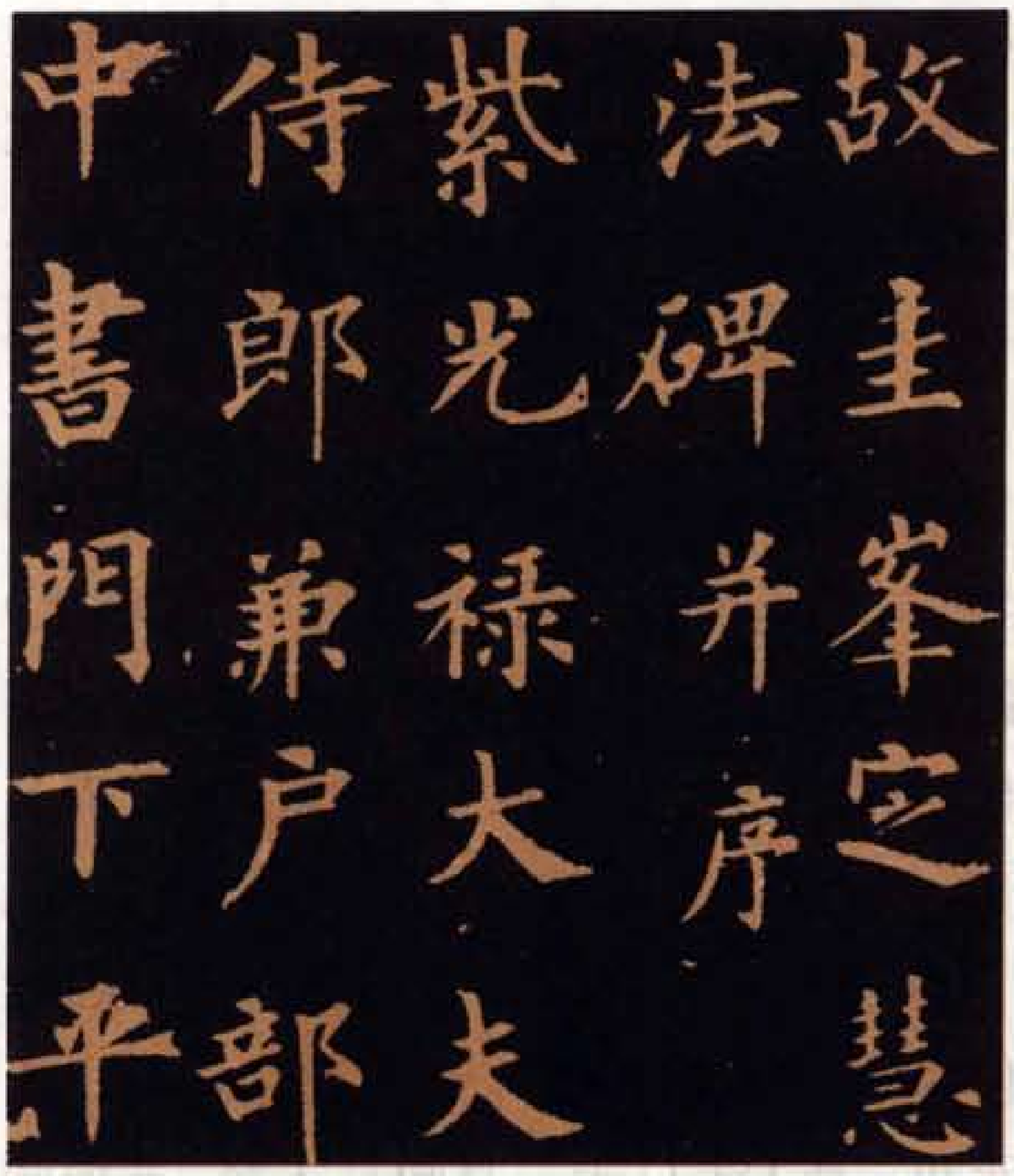
裴潾(？—838)，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本传称："少笃学，善隶书。"北宋宣和朝内府收有其行书《大司寇帖》一通，《宣和书谱》卷九有称："史复载

其隶书，为时推右。晚岁行草尤胜，当是其耿耿流于毫端者，故笔不病而韵自高耳。昔人以书传于时，未必以字得名，盖或以忠义称，或以文章称。况身兼数器而字画又佳如潾者，诚不可多得也。”《续书断》列入能品。《宝刻类编》记有裴潾元和、长庆间所书碑版凡十一通及华岳题名一款。

萧祜(?—828)，一作萧祐，字祐之，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本传记：“祜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前代锺(繇)、王(羲之)遗法，萧(子云)、张(芝)笔势，编序真伪，为二十卷。元和末进御，优诏嘉之……祐闲澹贞退，善鼓琴赋诗，书画尽妙，游心林壑，啸咏终日，而名人高士，多与之游。”《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本传记：“精画及书，自锺、王、萧、张以来，皆能识其真謦。”《续书断》书入能品。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其长庆三年(823)八月所立正书李宗闵《郭公碑》。近年北京通县出土其正书郑宗经《高行晖墓志》，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朔日入窆，宽博清劲，风貌不俗，盖有谙于书之三昧者。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郡望出自陇西。《新唐书》卷二百三《文艺下》本传称：“能疾书。”

裴休(791—864)，字公美，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人。其即首称李邕《东林寺碑》所谓“览北海词翰，想见风采”者。《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本传记：“善为文，长于书翰，自成笔法。”《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本传：“能文章，书楷遒媚有体法。”《续书断》列入能品，且立传云：“休能文章，楷遒劲，有体法……休镇太原，寺僧粉额陈笔砚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揾墨书之，极遒健，逮归，侍妾见其沾渥，休曰：‘吾适以代笔也。’”米芾《海岳名言》称：“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书史》又云：“江南庐山多裴休题，寺塔诸额，皆真率可爱。”宣和内府收有其行书《判疏言状》一通，《宣和书谱》卷九称其：“刻意翰墨，真楷遒媚，作行书尤有体法。”王谠《唐语林》卷三亦记：“休好释氏，善隶书，所在寺额多书之。”存世的《圭峰定慧禅师碑》(图 6－2.2)，立在大中九年(855)十月十三日，乃出裴休所撰并楷书(柳公权篆额，邵建初刻字)。王世贞《弇州山人



6-2.2 裴休 《圭峰定慧禅师碑》(局部)(855)

续稿》卷一百六十七称:“是时柳诚悬(柳公权)铭书名天下,仅以之篆额,而自书文者,深欲有效于密(密教)也。书法亦清劲潇洒,大得率更(欧阳询)笔意。”郭宗昌《金石史》卷下谓“柳书名噪一时,视公美,固在雁行”。

卢知猷,字子谟,蒲州(今山西永济)人,《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本传:“尤工书,落简措翰,人争模仿。”《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本传称:“善书,有楷法。”《续书断》列入能品。宣和内府收有其行书《送翌光序》,《宣和书谱》卷十称:“作字有楷法,时颇称之。盖昔之为论者,以楷为上,行次之,章草又次之,草书最下,以其难工者楷法,而易工者草书耳。故前人定书,以王羲之楷法为第一,锺繇次之,自繇而下无人,则知其楷法者不可多得。知猷之书有此者,是岂不学而能?乃其注意于此,非一日也。然知猷虽以楷法称,而此所得惟其行书耳。”

唐世名才士,有书迹存世收纳于宣和内府,为后人津津乐道者,则有元稹(正书《寄蜀人诗》)、李商隐(正书《月赋》)、萧遘(正书《景公帖》、行书《幽公帖》)、陆扆(正书《赠翌光草书歌》)、李磎(正书《送翌光诗》)、陆希声(正书《赠翌光诗》)、杨钜(正书《赠翌光草书序》)、崔远(正书《送翌光诗》)、张颉(正书《赠翌光诗》)、戎昱(正书《早梅诗》)、许浑(正书《今体诗》上下)、景审(正书《黄庭经》)、李白(行书《太华峰》《乘兴帖》,草书《岁时文》《咏酒诗》)、张籍(行书《希深帖》)、杜牧(行书《张好好诗》)、李景让(行书《再拜郎中帖》)、崔龟从(行书《宛陵帖》)、白居易(行

书《丰年帖》《洛下帖》《生涯帖》《刘郎中帖》《送敏中归邠宁幕等诗》)、司空图(行书《赠謇光草书歌》《赠謇光草书诗》)、吴融(行书《博士帖》、草书《付虬帖》、正书《赠謇光送别诗》《赠謇光草书歌》二)、韩渥(行书《仆射帖》《芝兰帖》)、任涛(行书《郎中帖》)、林藻(行书《深慰帖》)、徐凝(行书《黄鹤楼诗》《荆巫梦思等诗》)、韦荣宗(行书《有德帖》《传教帖》《临锺繇中郎帖》《长风帖》《下笔帖》、正书《执笔帖》)等人。至于散见于唐、宋书论，其书迹为后人所宝重的诸如杜如晦、高士廉、李百药、上官仪、颜元孙、贾膺福、牛僧孺、李绅等风雅之辈，更是不计其数，已不容赘述矣。

唐代士人游艺于书法，不独陶冶性情，或锻炼技艺，且多见于观赏与品评，更何况唐代自开元后，以书艺会友，始成风尚，存世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便是当年诸文士品赏怀素当场书法表演而撰作的应景诗篇。至于柳宗元、刘禹锡戏以书法为内容，往返唱酬，更是文坛佳话。

柳、刘唱酬，首诗由柳宗元发起，其《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云：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
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

题下有注："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尝观。"

刘禹锡作《酬柳柳州家鸡之赠》答曰：

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
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柳宗元回赠二首：

闻道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
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
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

刘禹锡又有《答前篇》《答后篇》二诗：

小儿弄笔不能嗔，浣壁书窗且赏勤。
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

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
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

柳宗元再以二诗答之：

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
左家弄玉惟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叠前》）

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官起草旧连名。
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叠后》）

柳诗初以庾翼子弟贱家鸡而恣嘘刘家后辈，刘诗则直讽柳家新样，字式不佳，乃出其家尊。最后由儿郎揽入自身，刘诗以锺繇况柳，欲作抗行，柳则以一台二妙而激劝之。其中“柳家新样元和脚”句，涉及对柳公权书法的批评，颇见争议，注者释者往往不一。正因为文人好议论，能参与书法的批评，遂使唐代的书法理论有所发展，当然其中有的书论家本身也便是名才士。

名才士论书散篇存世而著名的诸如裴行俭“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惟余及虞世南”[28]；沈亚之“昔张旭善草书，出见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而旭归为之书，则非常矣。斯意气之感欤”[29]；司空图“人之格状或峻，其心必劲。心之劲，则视其笔迹，亦足见其人矣”[30]，以及李磎“太宗文皇帝论学书骨力，喻政化根源”[31]和韩愈“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32]，诸如此类，莫不脍炙人口，千古以传，然最具典型者乃杜甫其人。

杜甫(712—770)，唐之名诗人，自九岁习大字始，终身游艺不倦，于书法颇具心得。一生结交名书家甚多，诸如开元末年游京师，结交张旭、贺知章，有《饮中八仙歌》志述之；天宝初年赴鲁郡，邀李邕相晤于历下亭，并随之返北海郡任所，出猎海上；上元、宝应年间(760—763)客居成都，喜识虞世南玄孙虞十五司马，作歌以赠之；大历初年在夔州与甥李潮相逢，亟谈其隶书、小篆；大历三年(768)移住公安，有诗请老友顾诫奢题之于壁，当其辞去他适之时，又作诗送行，有称“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33]云，“追随二十年”，交谊可见其深且诚。

杜甫于书法，亟颂褚遂良、薛稷，其《发潭州》称“褚公书绝伦”；《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记：“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又谓刘伯华“书偕褚、薛能”，以其书侪褚、薛为荣事。风格又崇尚瘦硬，有“书贵瘦硬方通神”[34]之名言。参阅《赠虞十五司马》：“远师虞秘监，今喜识玄孙”云，杜甫书或出虞世南，与褚、薛同科。然杜公书论未曾受到后世的推许，米芾《海岳名言》以为“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又说，“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杜甫“瘦硬”论，也受到苏轼的非议，“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

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㉟至于杜甫评李潮书，“快剑长戟森相向（篆书）……蛟龙盘拿肉屈强（隶书）”㊱，即“书贵瘦硬方通神”之所出者，赵明诚亦不以为然，其《金石录》卷二十七谓：“右《唐慧义寺弥勒像碑》，李潮八分书。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甫诗盛称之，以比蔡有邻、韩择木。今石刻在者绝少，惟此与《彭元曜墓志》耳。今皆得之，其笔法亦不绝工，非韩、蔡比也。”

杜甫论书，往往随兴所发，未见有一定的标准，也是事实，如其评张旭草书：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
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
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
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
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
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
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张芝、王羲之）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
杨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

此大历元年（766）所撰之《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翌年十月所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也是备加称颂：“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邬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然而，同样于张旭，不数年作《李潮八分小篆歌》却大加菲薄：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李潮）不流宕，丞相（李斯）、中郎（蔡邕）丈人行。

自是返观杜甫所称述的如李邕、韩择木、蔡有邻诸人书法亦未尝瘦硬。联想到颜真卿，其友婿杜济是杜甫从侄，曾襄助过他；本师张旭和世叔贺知章是杜甫之友朋，往返甚见亲密。杜甫之诗，又堪称诗史，其记述“安史之乱”更是细详，惟对颜真卿平原之功，一无涉及，此或与政见有关。按杜甫在左拾遗任上，因时相房琯罢官，曾上表切谏，肃宗见其疏文迂慢，诏吏部尚书韦陟、礼部尚书崔光远和刑部尚书颜真卿三司鞫讯，欲加其罪，后因人劝解，遂免罪出贬为华州司功。杜甫于此，终身愧耻。史有记韦陟缓颊事，而不言及鲁公，或无恩于杜甫。其论书贵瘦硬，非特蔽于所见，盖偏袒笔法之类已，而又不尽知赏异量之美者也。古语云：“善书不鉴，善鉴不书。”不善书又好谈书法者，莫不缘情而生，任意所适。名才士之论书，亦多如此者类。

第三节

佛教与书法

《四分律》称：“佛听学书，不得为好，而废道业。”佛教为了弘布佛法，尤其在印刷术未曾发明，或尚未普遍使用的时期，它也与儒学一样，十分重视书法的修养，《楞伽经》卷二即有“佛告大慧，辟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云。

书法作为佛教的外学，在初、盛唐，除了日常应用之外，主要用于缮写传译的经卷和佛家所撰述的经文，包括注疏、论著、纂集、史地编著、目录。此外，便是抄写以做功德的经卷。

传译经卷，隋僧彦琮称译才必须八备，其中“薄阅《苍》《雅》，粗谙篆、隶”，即擅长书法，乃其一备。译场又置“正字字学”[37]。顾名思义，“正

字字学”，当负责译经的文字和书法。加上译经笔受缀文之后，必经善书者缮写，敦煌所存《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即出自“延和元年六月廿日大兴善寺翻译经沙门师利检校写”。同时，抄写经卷，为大功德，《妙法莲经》卷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有称：“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持经功德分第十五》亦谓：“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脱。”《华严经》卷八十一《普贤行愿品》说得更多：“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军、夜叉、罗刹、若鸠般荼、若毗舍阇，若部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正是诸如此类的说教，引导着僧侣和居士们，抄写经卷，布施极大功德。唐时写经有顿、渐二式。渐式，即数日书写，谓渐书，或称渐写；顿写，又名顿经，即一日书，往往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所见草书经，多出顿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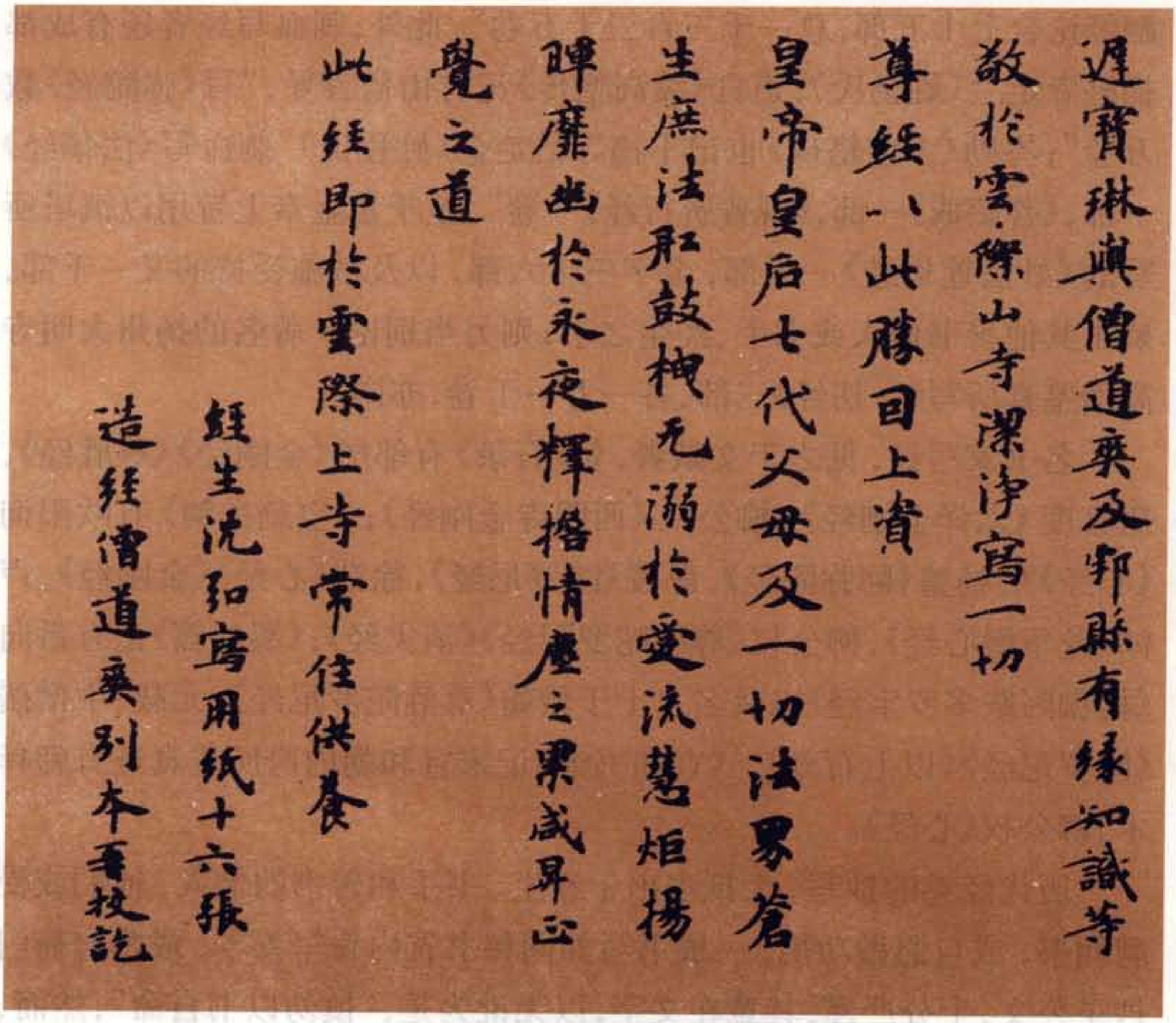
唐代高僧写经甚多，其自书经卷见诸文献者，如赞宁《宋高僧传》有温州大云寺僧鸿楚（字方外，姓唐氏）“刺血写《法华经》一部”；杭州华严寺玄览（姓褚氏）“写经二千馀轴，金字《涅般经》为首”；湖州大云寺子瑀（字真瑛，姓沈氏）“前后写经三藏，凡一万六千卷”；灵武龙兴寺增忍（姓史氏）“刺血写诸经，总二百八十三卷”；京师崇圣寺文纲（姓孔氏）“刺血书经，向六百卷”；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及三藏（玄奘）有疾，命尚具录所

翻经论合七十五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此外，刺血写经者还有成都福感寺定兰（姓杨氏）；道宣《续高僧传》记有山僧善导，“写《弥陀经》数万卷”；岑勋《多宝塔碑》也记千福寺僧楚金（姓程氏）“刺血写《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部，《观普贤行经》一卷”。至于楚金奉上旨用以镇塔所写的《妙法莲华经》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以及散施受持的又一千部，疑出其他善书僧人或书手、经生之手，则另当别论。著名的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所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亦同。

名书家写经，见之于文献者，《金石录》有邬彤《金刚经》《尊胜经》，唐玄度《六译金刚经》，柳公权《西明寺金刚经》；《宝刻类编》有欧阳询《心经》㊀，畅整《阿弥陀经》，薛稷《陀罗尼经》，徐浩《心经》《金刚经》，卢鸿《龙华殿心经》，柳公权《尊胜陀罗尼经》《消灾经》；《墨池篇》记有吕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以及名才士于僧翰《尊胜陀罗尼经》，元载、牛僧孺《陀罗尼经》（以上石刻）。《宣和书谱》记宋宣和朝内府所藏真迹有韩择木、柳公权《心经》。

历代经卷的抄写，大抵多出于经生、书手和善书的僧人，他们或受聘佣书，或自愿做功德，一般书写如同秘书省内誊写善本，或州府衙门抄录公文，十分严谨，其意在文字，以无讹为是，“慎勿以书自命”，然而，书法自成一路。《宣和书谱》卷五评昙林书法，称其“有金书经目曰《金刚上味陀罗尼》，累数千字，始终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但恨拘窘法度，无飘然自得之态。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作小楷，下笔有力，一点画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类经生之品格高者”。其书法“便于疾读”，“修整自持”，而“拘窘法度”者，正是渐式写经体的一般特点（图 6－3.1）。

经生，即以写经为职业的人员，一般都是善书的士人，如敦煌明记为经生者郭德、彭楷、王谦、王思谦诸人；也有先为经生，后出家为僧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所记释智命者，俗姓郑名颋，开皇十三年（593）明题经生，见敦煌所存“禅数杂事下”题记。经生书法，或有可观者，亦为后人所重，《宣和书谱》卷五便记有经生杨庭，“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



6-3.1 沈弘 《阿毗昙毗婆沙卷》(局部)

为辈流推许”。又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

书手,有出自台省的专业抄书人,如敦煌存经中明言左书坊楷书手萧敬,门下省书手袁元哲,秘书省楷书手孙玄奭,弘文馆楷书手成公道、任道、王智菀,门下省书手赵文审、刘大慈。但大多数未署名的则是出自临时雇佣的善书士人,如台州刺史陆淳送给日僧最澄数百卷经疏和日僧圆仁来华访得的584部802卷经论章疏和传记,并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至于僧人抄经,“剔皮刺血诚何苦,为写灵山九会文。十指沥干终七轴,后来求法更无君”[39],大都出自寺院中低层的僧众。这些抄经僧人大都不见署名,存世可见署名的遗迹,除了上引担任“正字字学”职

务的庄严寺玄应[40]和“检校写”的大兴善寺师利外，见之于著录的仅有《金石录》中的道秀、法昭《观无量寿佛经》;《宝刻类编》的道秀、智岩、修证《尊胜陀罗尼经》,法昭《千手眼大悲论罗尼经》,智藏《华严经》,永修《心经》(以上石刻),以及《宣和书谱》所记宣和朝御府收藏之昙林《金刚经》墨迹一通。近世敦煌发现的还有灵晖《大乘起信论》、道斌《金光明经》、普遵《金刚般若经旨赞》、明照《瑜伽师地论》诸手迹。

唐僧写经最见称于士人者，当推长安楚国寺璋上人，岑参有《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歌述之：

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
誓写一切经,欲向万卷馀。
挥毫散林鹊,研墨惊池鱼。
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

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称：“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在儒释交游十分盛行的隋唐时期,高僧与名书家的结交,尤见相得。据《高僧传》记：

五台山清凉寺澄观(738—?),俗姓夏侯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即颜真卿《华严》帖主澄师大德。“兵部侍郎归登……咸慕高风,或从戒训。”

越州雲门寺道亮，俗姓朱氏，越州（今浙江绍兴）人，“秘书监贺知章……同心慕仰,请问禅心,多结师资,或传香火”。

扬州龙兴寺法慎(717—749),俗姓郭氏,江都(今江苏扬州)人,“黄门侍郎卢藏用才高名重,罕于推挹,一见于慎,慕味循环,不能离坐。退而叹曰:‘宇宙之内,信有高人!’”

润州幽栖寺玄素(668—752),字道清,俗姓马氏,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受菩萨戒弟子……广州都督梁卿（梁昇卿)、润州刺史徐峤(峤之)……并道流人望,咸款师资,亦尝问道于径山,犹乐正子春于夫

子，洗心瞻仰，天汉弥高”。

越州法华寺玄俨（675—742），俗姓徐氏，诸暨（今属浙江）人，“故洛（洺）州刺史徐峤（峤之），工部尚书徐安贞，咸以宗室设道友之礼……太子宾客贺知章……亦以乡曲具法朋之契。”

洪州大明寺严峻（711—769），俗姓樊氏，潍州（今山东潍坊）人，“大历元年（766），思往清凉山，未达庐陵，见颜鲁公（真卿）一言相契，胶漆如也”。

会稽开元寺昙一（717—771），俗姓张氏，韩（今山西襄垣）人，“时……秘书监贺知章……皆以同声并为师友，虽支许之会虚嘉，宗雷之集庐岳，未云多也”。“时会稽徐公浩，素敦乡里之日，为碑颂德焉。大历十一年（776）也”。

越州称心寺大义（691—779），字元贞，俗姓徐氏，会稽萧山（今属浙江）人，“前后朝贵归心者……洺州刺史徐峤（峤之）、次徐浩，皆宗人也”。

湖州八圣道寺真乘（？—820），俗姓沈氏，德清（今属浙江）人，“父观其宿习，果请出家。属颜鲁公（真卿）许试经得度，时已暗诵五百纸，比令口讽，一无差跌，大见褒异”。

抚州景云寺上恒（739—815），俗姓饶氏，临川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法付王臣，故与姜相国公辅、颜鲁公真卿、杨凭、韦丹四君友善”。

湖州佛川寺慧明（697—780），俗姓陈氏，兰陵（今江苏武进）人，“菩萨戒弟子，刺史……颜真卿……深于禅味”。

洛阳中滩浴院智晖，俗姓高氏，咸秦（今陕西咸阳）人，“时杨侍郎凝式致政佯狂，号杨风子者，而笃重晖，为作碑颂德焉”。

鄂州开元寺玄晏（743—800），俗姓李氏，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人，李邕之侄，“晏房舍在寺之北隅，颇为湫陋，凡当时名士共营草堂，有若陈郡袁滋……偕檀舍同缔构也”。

至于虞世南为陈法师《破邪论》作序，称“法师与仆，情敦淡水，义等金兰，虽服制异仪而风期是笃”。裴休为释希运《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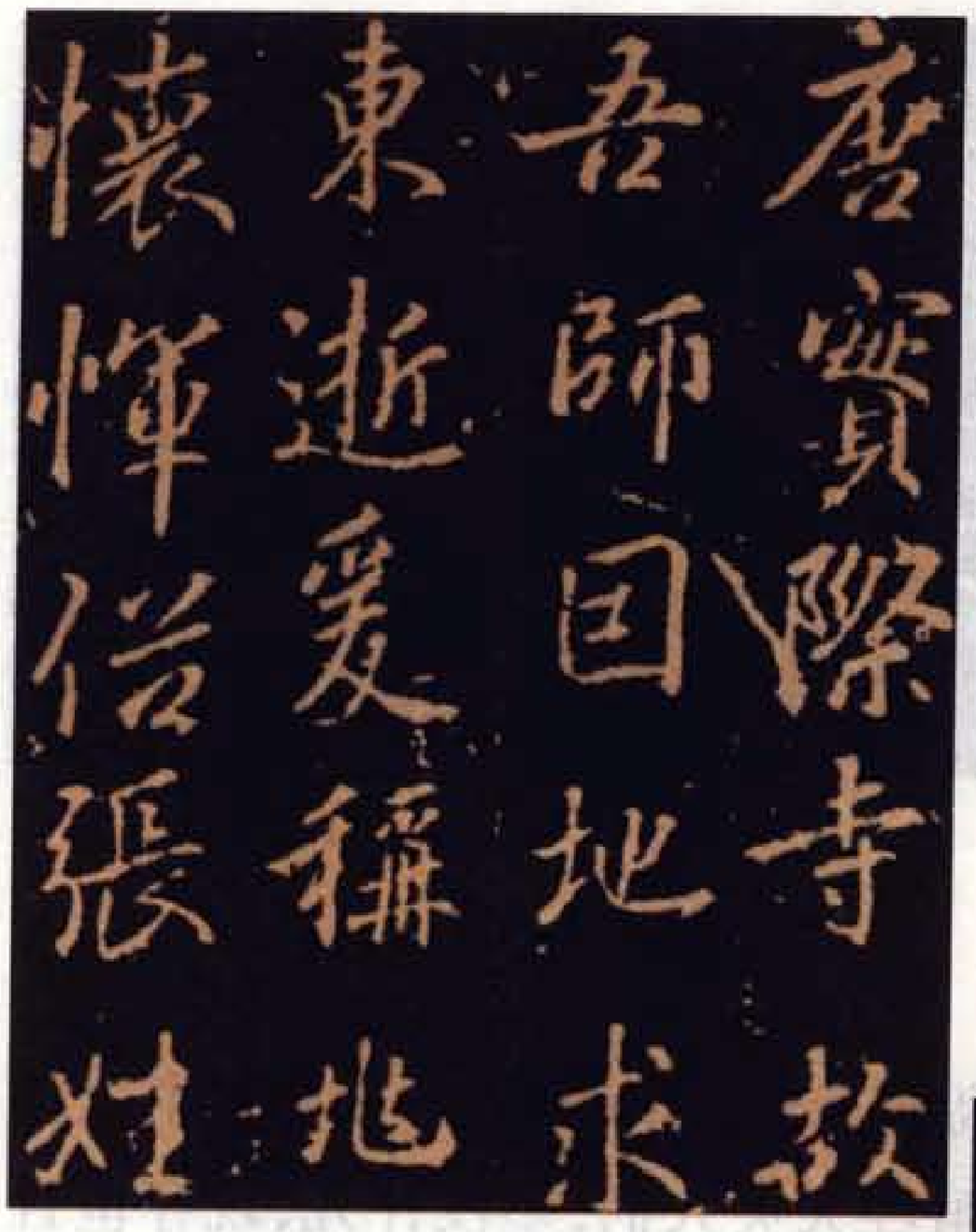
心法要》记“有大禅师，法讳希运……乃曹溪六祖之嫡孙，西堂百丈之法嗣……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自山迎至州，憩龙兴寺，旦夕问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复去礼迎至所部，安居开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纪之。十得一二，佩为心印，不敢发扬”云，更是深自结纳，投分托意。

6－3.2　褚遂良　《伊阙佛龛碑》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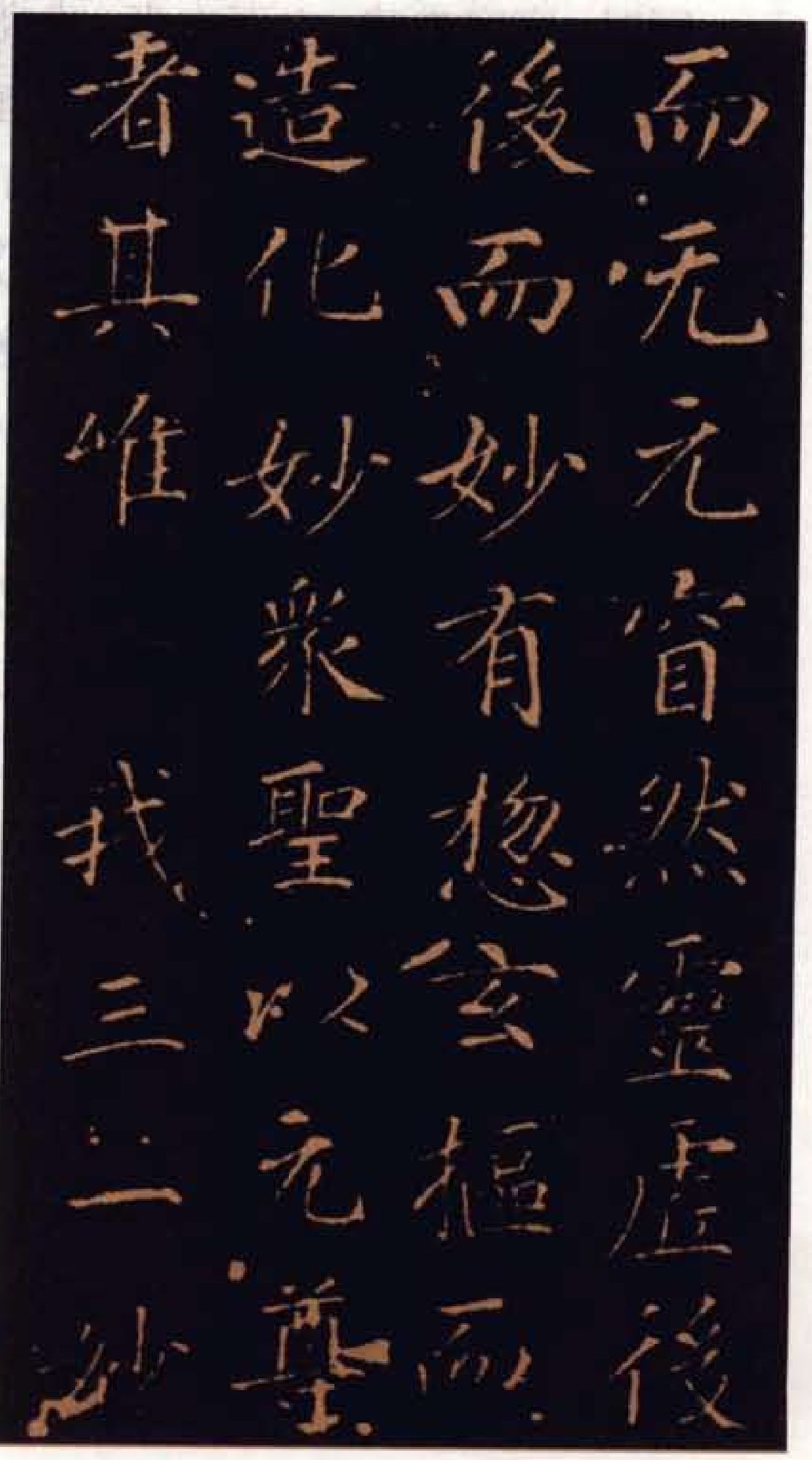
同时，庙宇甫建，立石志事，或高僧云逝，树碑颂德，其求名书家铭之，殆成传统。千年以来，碑志累累，虽经天灾人祸，坠没什九，现存世且知名者，尚有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褚遂良《伊阙佛龛碑》（碑额见图 6－3.2）、《三藏圣教序记》，王行满《三藏圣教序记》，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薛稷《信行禅师碑》，魏栖梧《文荡律师碑》，宋儋《道安禅师碑》，李邕《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灵岩寺碑》，怀恽《隆阐法师碑》（图 6－3.3），韩择木《荐福寺临坛大德戒律师碑》，徐浩《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张从申《福兴寺碑》，吕秀岩《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图 6－3.4），吴通微《楚金禅师碑》，刘禹锡《乘广禅师碑》，柳公权《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唐代书学之盛，其为佛教所用，或有胜于儒、道。

“岂是今投分，多疑宿结缘”[40]。高僧与名书家交游，相知而相亲者，最具典型的是皎然与颜真卿两人。

皎然（720—793），字清昼，姓谢氏，晚年以字行，简称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驻锡妙喜寺。先祖谢灵运，与颜真卿先祖颜延之，在刘宋元嘉年间（424—453）以文学齐名，有“颜谢”之称。皎然对谢灵运甚为仰重，其《述祖德赠湖上诸沈》有“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之称。颜真卿对他更是敬慕，其《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不独推崇之谓“文



6-3.3 怀恽 《隆阐法师碑》(局部)



6-3.4 吕秀岩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局部)

章之美，江左莫逮”，而且颂其所翻《大涅般经》三十六卷“义理昭畅，质文相宜”。两人意见不谋而甚见合拍。况且皎然，诵念参禅之余，留心篇什，子史经书，各臻其极，且文章俊丽，号为释门伟器，历年湖州刺史莫不倾心结纳，“宴息与游乐，不将衣褐乖”[42]，高吟乐道，萧散股肱守，自为尘外侣。颜真卿自大历八年(773)至郡与之交结以来，“不将簪艾隔，知与道情俱”[43]，声气相适，形影不离，上凤翅山，望太湖水，泛舟东溪，饯宴诸生，观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游开元寺经藏院立文殊之碑，以及登杼山，攀上峰，次寺院，坐水楼，骆驼桥下玩月，苕溪水滨雅集，莫不从容酬唱，心赏契合。《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唐湖州杼山皎然传》有称颜真卿“早事交游而加崇重”。皎然诗兴闲适，“掇六义之清英，首冠方外”[44]，又喜评藻古今人物，著有《诗品》五卷，议论精当，或以为“整顿狂澜，出色《骚》《雅》”[45]，其中有许多观点即采纳于颜真卿《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中的文论。

皎然书翰，绝少可见。存世有论书诗二首，或可见其对书法的态度。其一为《张伯高草书歌》：

伯英死后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张芝、张旭）
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锺、王。（锺繇、王羲之）
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
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
更睹邓林花落朝，狂风乱搅何飘飘。
有时凝然笔空握，情在寥天独飞鹤。
有时取势气更高，忆得春江千里涛。
张生奇绝难再遇[46]，草罢临风展轻素。
阴惨阳舒如有道，鬼状魑容若可惧。
黄公酒垆兴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顾。（嵇康）
长安酒榜醉后书，此日骋君千里步。

其二为《陈氏童子草书歌》：

书家孺子有奇名，天然大草令人惊。
僧虔老时把笔法，孺子如今皆暗合。（王僧虔）
飓挥电洒眼不及，但觉毫端鸣飒飒。
有时作点险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
偶然长掣浓入燥，少室枯松欹不倒。
夏室炎炎少人欢，山轩日色在阑干。
桐花飞尽子规思，主人高歌兴不至。
浊醪不饮嫌昏沈，欲玩草书开我襟。
龙爪状奇鼠须锐，水笺白皙越人惠。
王家小令草最狂，为予洒出惊腾势。（王献之）

皎然又与篆书家李阳冰有交游，有《同颜使君真卿岘山送李法曹阳冰西上献书时会有诏征赴京》诗记其事。

诗僧论书，虽随兴所致，一无新意，然亦可管见中唐僧人尤钟情于草体。

唐僧书法，大抵分成两期，初则以行、楷书为主，主要用之于写经，其间善书者多以行、楷名世，如集王羲之行书为《圣教序》、《兴福寺碑》的怀仁、大雅；以书《乙速孤昭祐碑》劲健有法而名高一代的行满；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称之谓“墨妙称古绝”、吕总《续书评》以为“子雲（萧子雲）之后，难与比肩”的湛然，存世尚有天宝元年（742）正书《李氏志》和十三年（754）正书《郑炅志》；以追仿右军书迹而见称于《宣和书谱》的行敦，以及名相张说亟为推崇所谓“擅锺、王品格”[47]的知至。至中唐禅宗勃起，允许张扬外学，吟咏、翰墨，并为僧人所重。《高僧传》有记澄观“篇颂笔语书迹，一皆博综”；天台山佛窟岩遗则，姓长孙，京兆长安人，“始从张怀瓘学草书，独尽笔妙”；魏州观音院智佺“克意学欧（阳询）、王（羲之）书体，仅人能妙，或问之，曰：‘吾习来生字耳。’”沙门戒律严重，凡稍

具情性者莫不藉外学抒发之，而草书尤可自得，故其间以能书名世者多兼善草书。怀素之外（见上章），见诸诗篇者，不独孟郊之称献上人："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将书云霞片，直至清明巅。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聚书云霰霄，洗砚山晴鲜。忽怒画蛇虺，喷然生风烟。江人愿停笔，惊浪恐倾船。"[48]吴融也有诗赠广利法师："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崩云落日千万状，随手变化生空虚。海北天南几回别，每见书踪转奇绝。"从中或可窥见中唐以后沙门风气之嬗变。

中晚唐以书名世，且具代表性者，为道秀（正书），玄应、建初（行书），高闲、谨光（草书）和亚栖（草书兼论书）诸人。

道秀，唐代宗朝章敬寺僧，书迹除上引抄经石刻外，存世可见的尚有大历十二年（777）有则《第五玄昱志》和十四年（779）令名《曹惠琳志》，并正书，书法精能不俗。

玄应即曾担任"正字字学"之职的西京庄严寺僧，书迹存世有其元和十三年（818）行书所撰《兴国寺宪超塔铭》。

建初，唐文宗朝西京安国寺讲论僧，存世有开成四年（839）行书刘轲《玄奘塔铭》和李弘庆《基公塔铭》，赵崡《石墨镌华》卷四所称"行草秀劲有法"，甚是。

高闲，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为湖州开元寺僧，《宋高僧传》有传，附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后，有称："克精讲贯。宣宗重兴佛法，召入对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又说："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名诗人张祜、陈陶与之友善。张祜《高闲上人》诗谓："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饯，书函内库收。"陈陶亦有《题赠高闲上人》赠诗称述之："龙蛇惊粉署，花雨对金轮。"又得当时文坛盟主韩愈赏识，有《送高闲上人序》评述之：

>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

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是序《宣和书谱》卷十九以为："大抵愈所论，言其书法出张颠（旭），流离颠沛，必于草书发之，故其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学者当求颠之心，而不当逐其迹也。已而要其归正，而语若诋毁。盖知愈者必谓愈深知闲，而不知愈者以谓愈之黜闲也。"然而，近人钱锺书并不以为然，他说："退之《送高闲上人序》实谓禅之与艺，扞格不入，故倘书迹能工，必禅心未定；讽诘高闲，词意章然。宋人曲解，适得其反。"[49]

高闲书法，北宋宣和朝内府仅收草书《五原帖》，行书《中丞帖》、《雨雪帖》三通。董逌《广川书跋》卷八曾收《千字文》（图 6－3.5）[50]一通，有

6－3.5 高闲 《千字文》(局部)

称："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陈思《书小史》卷十以为其草书，乃"师怀素，深穷体势"。

晉光，字登封，俗姓吴氏，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著名史学家吴兢后裔。《宋高僧传》列传，并称："长于草隶，闻陆希声谪宦于豫章，光往谒之。陆恬静而傲气，居于舟中，凡多回投刺，且不之许接。一日设方计干谒，与语数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拨灯诀。光书体当见酋（遒）健，转腕回笔，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有文

集，知音者所赏。出笔法弟子从瓌、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诀。有朝贤赠歌诗，吴内翰融、罗江东隐等五十家，仅成一集。”[51]《宣和书谱》收有其《赠登第等诗》和《千字文》二通，且评之谓：“潜心草字，名重一时……观謦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方驾，然亦自是一家法，为时所称，岂一朝夕之力欤！”[52]存世歌颂謦光草书的诗篇，有吴融《赠謦光上人草书歌》、罗隐《送謦光大师》（题下有注：“师以草书应制。”）、陆希声《寄謦光上人》、司空图《謦光大师草书歌》以及张颠赠句。

亚栖，洛阳（今属河南）人，《宣和书谱》卷十九立传记：“经律之馀，喜作字，得张颠笔意。昭宗光化（898—901）中，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一时为之荣。每论张颠（旭）云：‘世徒知张之颠，而不知实非颠也。’观其自谓‘吾书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则果颠也耶？’此亚栖所以独得而世俗未必知也。”宋季内府收有其草书《对御草书歌》等十五通。存世有《论书》一篇：

> 凡书通即变，王（羲之）变白雲体。欧（阳询）变右军体。柳（公权）变欧体。永（智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

唐代书家大都热衷佛事，但也有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加以反对的，如张庭珪，长安年间（701—704）曾力谏武则天在洛阳白马寺建立大像和营造佛祠。

第四节

道家与书法

道教自汉末创建以来，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大盛，尤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世系出自陇西，谬托老子（李耳，字伯阳）为始祖。高宗朝册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朝尊为万教之祖，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士庶各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减《尚书》《论语》两策，加《老子》策。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追赠道教列祖庄子（庄周）为南华真人，文子（辛妸，一名计然）为通玄真人，列子（列御寇）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人所著书改为《真经》。并置崇玄学，设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又自开元二十九年（741）起设道举科，为常科，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登第后，亦偕进士、明经诸科“据书判资荫，量定冬集授散”[53]，中唐之相元载便是登四子科入仕的一位善书者。天宝二年（743），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升西京亳州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州称紫极宫。又御注《老子》并义疏颁行天下。道教之盛遂至绝顶，乃为国教。

儒道合一，亦儒亦道，无论“以儒合道”，或者“以道合儒”，“讽味黄老，致息心于真妙；抑扬游夏，涤烦想于诗书”[54]，至是遂演成中国文化的传统，更何况大多道士本身便是由儒而入道的。隐逸之士，其实也是道家者流。由此，道教重视书法，庶几乎类似儒家，除了日常应用（包括法箓传授）之外，更多的是出于抄写经卷和游艺的需要。

道教为了传道布教，甚重著述。唐代道藏经卷，玄宗朝开元时的《三洞琼纲》，以三洞十二部编目，著录有 3740 卷[55]。肃宗朝上元年（760—761）见有六千余卷。至代宗朝大历年（766—779）间，又海内搜访，京师

缮写，达到7000卷之多。其中最常见的有《道德经》(《老子》)、《太平经》、《皇帝四经》(即《经法》《十大经》《称》《原道》四书)、《抱朴子》《黄庭经》《参同契》《真诰》《清静经》诸种。在印刷术未曾发明，或尚未广泛使用的唐初、盛、中时期，浩博如海的经卷，全凭着手工抄写。史不记道观中曾设置专职抄书手，参考《传受经戒仪注诀书经法第四》云：

> 受法之后徐觅能书清严道士敬信之人，别住静密，触物精新。自就师请经卷，卷皆拜受。竟又拜送，恭肃兢兢。所受部属悉应写之，皆用缣素抄之，则纸充乃应。师手书一通以授弟子，弟子手书一通以奉师宗。功既难就，或拙秉毫，许得雇借。精校分明，慎勿漏误。误则夺年算，遭灾祸，其罚深重。[56]

又陶弘景《真诰》卷十九《翼真检第一》：

> 三君(杨君羲，许长史谧，许掾勋)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郄(郗愔)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书乃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殆非人功所逮。长史章草乃绝，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

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七《三洞经教部·符字》：

> 符者通取云物星辰之势，书者别析音句铨量之旨，图者画取灵变之状，然符中有书，参似图象，书中有图，形声并用，故有八体六文更相发显。

颜真卿《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碑铭》：

山中有上清真人许长史(谧)、杨君(羲)、陶隐居(弘景)自写经法，历代传宝……玄宗诏山人王旻强请先生楷书上经一十三纸，以补杨、许之缺。

可知道教的经卷和画符，大抵出自道士自己的手笔。只有拙于书者，或虽善书，但限于时间，抄写不及才允许雇请他人代劳。从敦煌发现的道经，其书法工整精美，可想而知当年“能书清严道士敬信之人”之修养与技能，当不在台阁书手或译场经生之下。

道教虽不重书名，唐代善书者见称于史传者亦不少，著名的有道士司马承祯，隐逸卢藏用、卢鸿(先道后儒)和贺知章、顾况(由儒入道)诸人。

司马承祯(647—735，图 6－4.1)，字子微，号白雲子，谥曰真一先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先居天台山，后奉诏移居王屋山，为上清派陶弘景三传弟子。著述丰富，影响很大。曾与名书家薛曜交游，曜有《送道士入天台》诗志其事。《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陆馀庆传》所记其与名才士陆馀庆、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以及高僧怀一相友善，时称“方外十友”。叶適珪《海录碎事》记有“仙宗十友”，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毕构之外，名才士尚有王適、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诸人。书法以篆隶著名。《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本传记：“承祯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崔尚《天台上桐柏观碑》称：“其通才练识，赡学多闻，翰墨之工，文章之类，皆忘其所能也。”《太平广记》卷二十一也称他“攻篆

6－4.1 司马承祯像

迴为一体，号金剪刀书”。徐灵府《天台山记》曾记他传授笔法事，其记：“先生初入花(华)顶峰，遇王义之入山学业，先生过笔法付义之。子欲学书，好听言语：夫受笔法，与俗不同，须静其心，后澄其心思，暮(谋)在功书，筋骨附近，气力又须均停，握管与握玉无殊，下笔与投峰不别。莫夸端正，但取坚强。筋力若成，自然端正。”[57]其“莫夸端正，但取坚强”者，盖本之于唐太宗“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论。所书碑版有隶书王适《潘尊师碣》(圣历二年二月八日立石)，叶昌炽《语石》卷八称“排奡略得《夏承碑》笔法，在唐隶中不多得。篆额尤奇伟”云。另有开元十二年(724)九月篆书所撰《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二十三年(735)四月立石，今已不得见。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成语“终南捷径”，典出其人。初举进士，不调，与兄徵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长安(701—704)中征召为左拾遗，后官至尚书右丞、修文馆学士，先天二年(713)因附太平公主，流配岭南。改昭州司户，开元初起为黔州长史，兼判都督事，未至任而卒，年五十余。以翰墨见称于史，《旧唐书》卷九十四本传有记：“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本传记述更为详尽：“藏用善蓍龟九宫术，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远，士贵其多能。”而尤以善书为中晚唐书论家所推崇，张怀瓘《书断》列其隶、行、草为能品，且称：“书则幼尚孙草(孙虔礼)，晚师逸少(王羲之)，虽阙于工，稍闲体范，八分之制，颇伤疏野，若况之前列，则有奔驰之劳，如传之后昆，亦有规矩之法。”吕总《续书评》评有唐隶书，列名五人，卢藏用位居第二，且评之谓“露润花妍，烟凝竹暗”。存世有长安二年(702)七月所立《汉纪信碑》和景云元年(710)《苏瓌碑》(张说撰铭)两通，并隶书，文亦出其手，书法不揆吕总之评，后碑尤存汉魏遗意。

卢鸿，一作卢鸿一，字颢然(浩然)，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本传称：“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于嵩山。”《续书断》书入能品。《金石录》第九七六收有其开元十二年(724)正月隶书所撰《普寂禅师碑》一通。《宝刻类编》又有其隶书《心

经》(并篆额)和《大辨禅师碑》两通。

贺知章(659—744,图6-4.2),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更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他排行第八,张旭呼作"贺八"。官至秘书监,史称"贺秘监",简谓"贺监"。唐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少以文词知名天下,证圣元年(695)擢进士第,举超拔群类科。神龙年间(705—707)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润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上京。开元初年与包融、张旭、张若虚以诗文齐名,又因四人俱系吴越之士,世称"吴中四士"(或为"吴中四友""吴中四杰")。天宝三载(744)辞官还乡,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史称贺知章性放旷,善谈笑,清鉴风流宛如神仙,族姑子陆象先尝对人说:"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58]友朋如孙逖亦说贺监"恬淡风流,独擅东南之美;清贞介特,足称江汉之英"[59]。张旭则直称"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60]。至叶適珪《海录碎事》则以司马承祯、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適、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

6-4.2 贺知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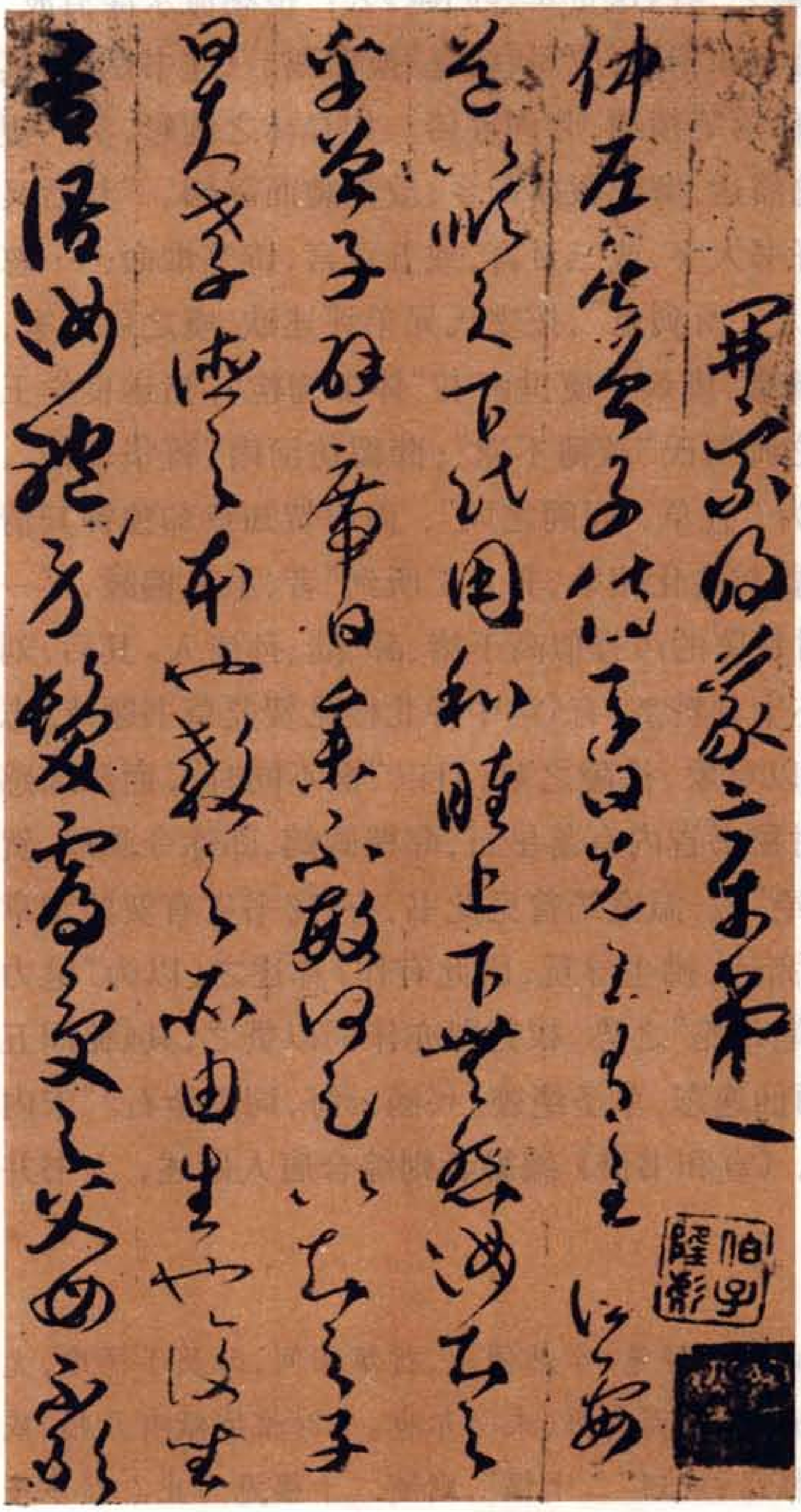
张旭与贺监是姻亲,交往密切,甚见投合,时人往往"贺张"并称。《全唐诗》录存张谓残句:"稽山贺老粗知名,吴郡张颠曾不易。"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亦记张、贺每每共游,"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幛,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笺翰,共传宝之。"两人诗书并精绝,奇逸清健,是有契合之处。

贺知章以草书擅名,卢象喻为王献之,其《送贺监归会稽应制》诗称:"青门抗行谢客儿,健笔违羁王献之。长安素绢书欲偏,主人爱惜常

保持。”李白则喻之以王羲之，有《送贺宾客归越》云：“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述书赋》评其书：“湖山降礼，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词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其后又注：贺监“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按窦氏兄弟评述欧、虞之后书家，多有讥贬之词，如其评虞纂、虞焕学虞世南书“体多拘检”；褚遂良学王羲之“类乎效颦”；陆柬之师舅氏“疏薄不逮”；薛稷仿河南“菁华却倍”，尤轻视孙过庭之书，以为“凡草，闾阎之风”，而对贺知章却独钟其清真。推崇如是，尤有所谓“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者，虽见偏颇，不一为是，但由此亦可知当时贺监的声誉似高于褚、薛、陆、孙诸人。其后，刘禹锡曾见贺监的书翰，亦十分赞赏，有《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志其事，不仅将其书、文喻以皇象、徐陵之辈，且以“恨不同时”，而深加感叹。赵璘《因话录》记当时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稷画鹤，郎馀令画凤，贺知章草书，时人称为“四绝”[61]。温庭筠曾见此书，有《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此有作》称述之，以为“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有“落笔龙蛇”之势。权德舆亦作词以赞之，其《秘阁五绝图贺知章赞》有云：“酒仙逸态，草圣绝迹。兴涵云海，词韵金石。”宋内府收有贺监草书十二件，《宣和书谱》编纂者则综合唐人所述，人书并论，有谓其人：

> 每醉必作，为文词初不经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尤见真率。往往自以为奇，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书时惟问纸有几幅，或曰“十幅”，则词随十幅尽；或曰“二十幅”，则随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办，不见笔力之衰；忽有佳处，人谓其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盖胸中所养不凡，源深流长，自然之道。[62]

贺知章书法存世极少，可见的惟有《龙瑞宫记》（楷书）和流落日本



6-4.3 贺知章 《孝经》(局部)

的《孝经》(草书，图6-4.3)墨迹两通，然而疑窦甚多。近世出土的贺知章所撰《戴令言志》(开元二年)，隶书，因其有“故人识之，敢作铭”云，或以为即出自其手，然书甚平俗，唐志又无此例，恐亦未必然。

顾况，字逋翁，自号华阳山人，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人。至德二载(757)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著作佐郎。贞元九年(793)弃官隐居于茅山，受道箓。“炼金拜斗，身巧如羽”[63]，俨然如道家者流。《旧唐书》立传，附见卷一百三十《李泌传》后。曾受知于韩滉，为其浙江东西观察使判官。工书善画，皎然《送顾处士歌》有称“醉书在篋称绝伦，神画开厨怕飞出”。《历代名画记》卷十有传，称：“不修检操，颇好诗咏，善画山水。”有《画评》一篇。贯休曾见其所书碑碣，有“庾翼未伏王右军”[64]之说。按庾翼字雅恭，颍川鄢陵人，东晋书家，与王羲之

齐名，“贱家鸡”之典，即出其人。虞龢《论书表》有记：“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云，《述书赋》称庾“善草则鹰搏隼击，工正则剑锷刀锋”。贯休喻之于顾况，其书或属猛利一路。

其他，如茅山紫阳观道士李含光(683—769)，颜真卿《李玄靖碑》以为“颇工篆籀，而隶书尤妙”。太清宫道士卢玄卿，权德舆《太宗飞白书答诏记》有称“工为篆隶八分诸书，具其家法”。鱼又玄、梁元一，《宣和书谱》卷十赞之谓“工行书，得王羲之笔意，而清劲不堕世俗之习，飘然有仙风道骨，可以想见其人。《与崇道大师书》……宜笔端得晋人之高风”；卷五评之曰：“尤喜翰墨，初慕锺、王楷法，久而出入规矩之外。然其法严，其气逸，其格清……观其书《太上内景经》，作小楷法而体兼众善，乃知游方之外者，非世习之所能及也。”李、卢、鱼、梁四人，虽名高千载，深得后昆敬仰，然无一纸片石留世，终令人扼腕。存世可见的道士书迹，根据陈垣《道家金石略》所记，略约有周道赐《寻仙观仙坛山铭》(圣历三年三月十八日立石)，侯焕《天尊像铭》(赵隐仕撰，开元七年十一月十日立石)，甘遗荣《青城山常道观敕碑阴》(开元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立石)，张弘明《白雲先生坐忘论》(大和三年建申月立石)，诸葛鉴元《道士邢令闻等题名》(开成五年六月十八日)，以及岱岳观碑二十七通。叶昌炽《语石》卷八称：“道流之书，以周道赐《仙坛山铭》为第一。自唐以下，无与抗手。《岱岳观斋醮记》，自叶法善、马元贞、麻慈力以下，逾三十通(同刻一面，世所称鸳鸯碑也)，书法皆工秀，兼有褚(遂良)、薛(稷)之胜，但未必尽为道流笔。”参考韩崇《宝铁斋金石跋尾》之评《寻仙观仙坛山铭》：“字体方正古厚，为古唐精品。”《语石》之论，盖非偏曲之言。

近世咸阳市底张湾出土的长乐观主裴炫隶书吕向《豆卢建志》(天宝三载四月十二日入窆)和西安市出土的太清宫道士郗玄表正书宋若宪《田元素志》(大和三年七月七日入窆)以及蒲城县三合乡出土的玉真公主未入道前所正书的徐峤《金仙长公主志》(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四日入窆，卫灵鹤篆额)，皆秀健不俗，侪于名家之列而不见逊色。

有唐一代，自唐太宗为秦王时与房玄龄趋谒道士王远知，且拜受道

篆始，历代君王莫不崇道，且大多记述神灵，立碑颂圣，或传写经疏，铭石布教。存世可见者，著名的有武则天《昇仙太子碑》（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立石）和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开元十七年九月三日立石）、《注道德经》（开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立石）三碑。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名书家传道布教，更见热烈。行世之名碑于道教者唐代特多，今检现存诸碑以明之。

欧阳询隶书《宗圣观记》，陈叔达碑，欧阳询序。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十五日立石；

褚遂良正书《孟法师碑》，岑文本撰，万文韶刻字，贞观十六年（642）五月四日立石；

王玄宗正书《华阳观王先生碑》，于敬之撰，乾封二年（667）十一月十七日立石；

传陈惟玉篆书《碧落碑》，咸亨元年（670）立石；

高正臣正书《明徵君碑》，李治撰，王知敬篆额，上元三年（676）四月廿五日立石；

张德言正书《魏法师碑》，胡楚宾撰，徐秀勗刻字，仪凤二年（677）十一月十五日立石；

沮渠智烈正书《奉仙观老君像碑》，李审幾撰，赵文素刻字，垂拱元年（685）十二月四日立石；

王绍宗正书《王徵君临终口授铭》，王徵君玄宗，绍宗六兄，垂拱二年（686）四月四日卒于中岳中顶石室；

薛稷正书所撰《杳冥君铭》，神功元年（697）十月一日立石；

薛曜正书《游仙篇》，武则天撰诗，薛稷正书题御制及建辰并梁王武三思已下名；锺绍京正书题诸□等名，又奉敕勒御书。□伯□刻字。韩神惑、朱罗门刻御字，神龙二年（706）八月二十七日立石；

李邕行书所撰《叶国重碑》，开元五年（717）三月七日立石；

韩择木隶书《叶慧明碑》，李邕撰，开元五年（717）七月七日立石；

苏灵芝行书《梦真容敕》，唐玄宗敕，开元二十九年（741）六月一日

立石，解□光刻字；

韩择木隶书《桐柏观碑》，崔尚撰，天宝元年(742)三月二日立石；

戴伋隶书《玄元灵应颂》，戴璇撰序，刘同昇撰颂，史荣刻字。天宝元年(742)七月十五日立石；

史惟则隶书《庆唐观金篆斋颂》，崔明允撰，天宝二年(743)十一月十五日立石；

萧诚行书《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蔡玮撰，张琼、张爱刻字，天宝二年(743)立石；

徐浩隶书《嵩阳观碑》，李林甫撰、裴迥篆额，天宝三载(744)二月五日立石；

薛希昌隶书篆额《贞一先生庙碣》，卫凭撰文，天宝六载(747)七月九日立石；

颜真卿撰并正书《麻姑山仙坛记》，大历六年(771)四月立石；

张从申行书《玄靖先生碑》，柳识撰，李阳冰篆额，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立石；

颜真卿撰并正书《玄靖先生碑》，吴崇休刻字，大历十二年(777)五月立石；

窦臮正书篆额《景昭法师碑》，陆长源撰，张伯伦刻字，贞元三年(787)正月十五日立石。

大凡名书家多出身于士大夫，亦莫不奉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行为准则，盖得意时用儒，失意时用道，尤其不遇之士、吏隐之辈，或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儒道融之于一身，诸如孙虔礼“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生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65]；张旭“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66]者，俨然如同道家者流。即使李阳冰，在缙云令任上，仕途未见滞碍，也是淫祀城隍，迎神求雨，信道之诚，洵然可敬。至于陆希声，位至宰相，明哲保身，无所轻重，然注《老子》，援儒译老，可谓用心良苦。

6-4.4 颜真卿 《麻姑山仙坛记》(局部)

综观有唐一代名书家，其崇道信道，则尤以颜真卿最具典型。

颜真卿乃一儒家，恪守君臣大义，惟其永泰以后，受权相元载排抑，谪守外郡，又缘才高事闲，失意不平，加上亲属加道士的殷淑、韦渠牟耳鬓厮磨，颇受影响；交游如道士景昭、刘明素、谭仙岩、吴筠及高士道家者流如张志和、陆羽、强蒙的声气相投，互为陶染，身在魏阙，心系江湖，“吴兴太守道家流”[67]，恬然如同隐逸之士。其不仅撰书《桥仙观碑记》《魏夫人仙坛碑》《华姑仙坛碑》《麻姑山仙坛记》(图 6-4.4)以及《刻清远道士诗因而继作》诗，亟颂道教灵迹和上清派道士王、郭二真君与紫虚元君魏华以及黄令微、黎琼仙、清远道士诸人，而且为谭仙岩书写马伏波语，为韦渠牟题“遗名先生三教会宗堂”，又为玄妙观写唐玄宗《玄妙观老君像赞》(吴道子画)，更有甚者在《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含光)碑铭》记道：

> 大历六年(771)，真卿罢刺临川，旋舟建业，将宅心小岭，长庇高踪……真卿与先生(李含光)门人中林子殷淑、遗名子韦渠牟尝接采真之游，绪闻含一之德。

“宅心小岭，长庇高踪”者，似有随道士李含光隐逸之意。此即朱熹《跋程沙随帖》所云：“学之不纯而谄道佞佛”之“谄道”者也。

颜真卿之于道教，宋人笔记更是恣意渲染，王谠《唐语林》卷六引

《戎幕闲谈》：

颜鲁公尝得方士名药服之，虽老，气力壮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临行，告人曰："吾之死，固为贼所杀必矣。且元载所得药方，亦与吾同，但载贪甚，等是死，而载不如吾，吾得死于忠耶？"……至蔡州……翌日，贼令官翌来缢之。鲁公曰："老夫受箓及服药，皆有所得。若断吭，道家所忌。今赠使人一黄金带。吾死之后，但割吾他支节为吾吭血以绐之，死无所恨。"……官翌从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帅陈仙奇奉鲁公丧归京……咸遵遗旨，启棺如生。

李昉《太平广记》卷三十二《颜真卿》条，盖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谈》、《玉堂闲话》：

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吭血以绐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瘗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梓渐劲，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

《永乐大典》卷七七五六·十九庚《形·死后全形》又有《柳常侍言旨》：

蔡帅陈仙奇奉鲁公丧归京师，犹于颜岘启棺，瞋目如生，两手拳握，十指掐掌，爪出手背，肌体完全，悉无败坏。时隐士唐若山闻言曰："道流中以形全为上，气全次之。颜公能全其形，此后三二十年，纵藏于铁石中，必能擘裂飞腾而去，被羽衣裘于山门间，所为地仙也。"

至于米芾之《鲁公仙迹记》，更是仙家之说。其云：

（颜真卿奉使许州）亲族饯于长乐坡，公既饮，乃跃上梁跳踯，谓饯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饵之，自此不衰，尝云七十后有大厄，当会我于罗浮山，此行几是欤？"次汜水，恍遇陶，笑谓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后公死于贼，贼平，家人启瘗，状有金色，爪发皆长，如生人。归葬偃师北山先茔。后有贾人至罗浮山，遇二道士弈，即而观之。问曰："子何所来？"贾人曰："洛阳。"其一笑谓曰："幸托书达吾家。"许诺，即札书付之，其题曰："至洛都偃师县北小颜家。"及往访之，则茔也。守冢苍头识公书，大惊问状，皆公也。因与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开圹，发棺，已空矣。

其实，颜真卿信奉道教，始初乃出自家族传统，意在养生，并非服食以求神仙之事。先祖颜之推《颜氏家训》早有明训。只是由于仕途受阻，别有情性，聊以寄托而已。当其奉诏返京，执掌吏部，兼任礼仪之使，且"太后（沈氏）崇徽，外家相属"（《授颜真卿太子少师告》），身为皇帝姻亲，恩荣并殊于常人，又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忠直刚正，复为儒雅重臣。而其奉使许州，宣慰骄将悍兵，更是立身为国，见危效忠，显出士大夫忠诚本色[68]。颜真卿殉难之事，或称"地仙"，或谓"尸解"，盖出道教立场。由此亦可见道教对于名书家的仰重。

唐代道教及其道教中人，不见有论书之诗文，惟见卢玄卿《法书记》，记王廙、王羲之法书装裱印记及跋尾事，属于记事类，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收录。

第五节

文房用具

文房用具，主要是纸、笔、墨和砚四事，即后之所谓的文房四宝[69]。唐王朝大力提倡儒学，兼及佛、道，著述典藏，蔚然成风，而全凭着人手书写。纸、笔、墨、砚等应用工具的供给数量是十分巨大的，以集贤书院之例，史记“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70]。其院内配有造笔直四人，专司制笔之务，以供应院内学士和书直及抄书手抄书所用。按当时秘书省置有笔匠六人，楷书手八十人；弘文馆笔匠三人，楷书手三十人；崇文馆笔匠三人，楷书手十人。以笔匠的比例，有人推算“秘书省年给纸九万番，墨2013丸；弘文、崇文馆年给纸各四五万番，墨1007丸”[71]。院内抄书之笔，史无明记，但其以兔毫为主，则是无疑的。

有唐用纸，分生、熟两类，“熟者妍妙辉光；生者不经洗治，粗涩碍指，非丧中不敢用”[72]。以集贤院内置有熟纸匠（弘文馆内置有熟纸装潢匠）而言，抄写文字一般都用经过加工的熟纸。

朝廷书写工具的制作原料，是出自各州县的杂贡，《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右藏署令”条下注：

> 杂物州土……绛、易（上谷）等州之墨……益府之大小黄白麻纸……杭、婺、衢、越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均州之大模纸，宣、衢等州之案纸、次纸，蒲州之百日油细薄白纸，河南府、许、卫、怀、汝、泽、潞等州之兔皮。

唐代用纸甚为讲究，公文所用，各有制度。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曰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曰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黄白麻纸出自益州（今四川成都），顾名思义即以麻为原料所制的纸，是唐代名纸。当时御府秘籍“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73]。《唐会要》卷七十五亦记天宝十三载（754）三月敕：“授官取蜀郡大麻纸一张写告身。”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即染黄的麻纸，白麻乃其本色。藤纸产于浙江嵊县剡溪，以剡藤为原料。顾况《剡纸歌》称：

云门路上山阴雪，中有玉人持玉节。
宛委山里禹馀粮，石中黄子黄金屑。
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后为蕉叶。
欲写金人金口经，寄与山阴山里僧。
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
政是垂头蹋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

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亦有“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事者，皆以剡纸相夸”云。据李肇《翰林志》所记，当时翰苑有白、青两色藤纸：“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剡溪藤纸除岁贡朝廷之外，主要还是供文人抄写经籍之用。皮日休《二游诗·徐诗》：“惟写坟籍多，必云清俸绝。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于月。”“宣毫剡纸”并称，其应用及声名，不可谓不广大。

当时由于造纸业的兴旺，产地也很多，益州、剡溪之外，其他产品，李肇《国史补》卷下所记约略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积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

书画家用纸，也大都是熟纸。杜牧《张好好诗》、杨凝式《神仙起居

法》是白麻即原色纸。李调元《诸家藏书簿》卷三所谓“唐代欧阳询黄麻纸草书《孝经》”和“五代杨凝式小字黄麻纸一幅”，以及敦煌唐人写经，几乎全用熟纸。颜真卿《争座位帖》，米芾《书史》记“是唐畿县狱状捶熟纸”，则也是熟纸的一种。至于著名的硬黄纸，无论用于装潢还是摹写，都是一种经过蜡加工的黄纸。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74]。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卷三又记，“汧国公（李勉）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75]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翰墨真迹辨》：“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辟蠹。以其纸加浆，泽莹而滑，故善书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敦煌唐人写经《无上秘要》及存世的《万岁通天帖》，所用便是硬黄纸。

唐代还有一种金花纸，见李肇《翰林志》：“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杨妃外传》记载李白曾用金花笺题写牡丹诗。米芾《书史》记曾见王羲之《玉润帖》，“是唐人冷金纸上双勾摹”。

至于一代名纸“薛涛笺”，或称“浣花笺”，也是一种染色的熟纸，韦庄《乞彩笺歌》有称：“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记：“元和之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之，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裁）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此乃是一种红色小幅的诗笺。

五代以南唐澄心堂纸最著名，《文房四谱》卷四：“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曾慥《类说》卷五十九引《砚谱》亦称：“李后主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此纸纯坚莹腻，至北宋甚见贵重，刘敞有《去年得澄心堂纸甚惜之，辄为一轴，邀永叔诸君各赋一篇，仍各自书藏以为玩，故先以七言题其首》诗云：

六朝文物江南多，江南君臣玉树歌。

擘笺弄翰春风时，斩冰析玉作官纸。
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
摛辞欲卷东海波，乘兴未尽南山竹。
楼船夜济降幡出，龙骧将军数军实。
舳舻衔尾献天子，流落人间万无一。
我从故府得百枚，忆昔繁丽今尘埃。
秘藏箧笥自矜玩，亦恐岁久空成灰。
后人闻名宁复得，就令得之当不识。
君能赋此哀江南，写示千秋永无极。

梅尧臣《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亦记："昨朝人自东郡来，古纸两轴缄滕开。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蜀笺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还可酺。书言寄去当宝惜，慎勿乱与人剪裁。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

唐代秘书省、集贤院和弘文、崇文两馆的笔匠，当是制笔高手，待遇想来也是不菲的，只是其笔史无记述，更不见有所称颂，他们的影响远不如宣州民间的笔作坊师傅来得深远。《文房四谱》卷一记：

> 世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尤能作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不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为不入用，别求，遂与常笔。陈云："先与者二笔，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矣。"

此即柳公权不能用羲之笔的故事。柳公权乃一代名书家，陈氏矜持如此，可见自重之甚。此或出小说家言，然陈氏笔之不易得，自可想见。陈氏之外，还有诸葛氏，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记："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欧阳修《圣俞惠宣州笔戏书》诗也详言诸葛氏之笔，谓："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守

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装管拓，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岂如宣城笔，耐久仍可乞。”陶谷《清异录》卷下记南唐王从谦“学晋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号为翘轩宝帚”。宣州之笔并不始于陈与诸葛两氏，它早在代宗朝大历年间已驰名天下。颜真卿友人耿沣即有《咏宣州笔》诗称述之：

寒竹渐虚受，纤毫任几重。
影端缘守直，心劲懒藏锋。
落纸惊风起，摇空见露浓。
丹青与文事，舍此复何从。

其后白居易亦有《紫毫笔》歌颂之：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
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
毫虽轻，功甚重。
管勒工名充岁贡……
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

唐代之笔，多从旧制，每每以鹿毛、兔毫作柱，被之以羊毫。至会昌年间，江西新淦出散卓笔[76]，一改兼毫常式，纯用羊毫长锋。其“老羝拔颖，霜竹斩竿。双钩虚指，八法回腕。张子束笔，无心为朴”[77]，既无柱，羊毫又软且长，大凡提笔作书，尤其草书，漫漫之落笔时，可人意处自当远胜宣州名笔，如《山谷题跋》卷一《书吴无至笔》有称：

有吴无至者……作无心散卓笔，小大皆可人意。然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著臂就案，倚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试提笔，去纸数寸书，当左右如意，所欲肥瘠直曲皆无憾然，则诸葛笔败矣。

书家用笔，虽然以欧阳询、虞世南不择纸笔，皆能如志者为上，但也因习惯不同，各有所宜，如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78]，欧阳通“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79]。至柳公权，对笔的要求更具体，他在《谢人惠笔书》中提出：“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80]；“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灵性。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一，即为妙矣。”这虽与柳氏写大字有关，联想到陈氏之笔，“非右军不能用”，亦可见唐笔之发展。

至于利用举子赴考，志在必得的心理，“嗜利者争卖健毫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则诣门求阿堵，俗称谢笔”[81]的情境，这固然出于商业行为，但亦可见当时社会对毛笔品性的基本要求即毫健锋圆已经很高且广了。

毛笔在当时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应用，韩愈《毛颖传》称：“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李斯）、中车府高（赵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返观庄子名言“舐笔和墨”，笔之功德，当偕墨而成就之。

墨在古代，分石墨、松烟两种。自晋、魏以来，崇尚松烟，唐时盖不见石墨。唐墨主要产于绛、易、潞诸州。《唐六典》所记州县杂贡“绛、易等州之墨”。《晁氏墨经》记“松烟之制尚矣，汉贵扶风隃麋、终南山之松……晋贵九江庐山之松……唐则易州、潞州之松，上党松心尤先见贵”，上党即潞州。李白有《酬张司马赠墨》诗云：

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
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
黄头奴子双鸦鬟，锦囊养之怀袖间。
今日赠予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

“锦囊养之怀袖间”，参《晁氏墨经》“凡蓄故墨，亦利频风日时，以手润泽之，时置于衣袖中弥善”云，盛中唐时期，墨在士大夫间已成养蓄之风。据冯贽《雲仙杂记》[82]所引《成老相墨经》，“墨纹如履皮，磨之有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墨染纸，三年字不昏暗者为上”；“凡墨日用之一岁，磨灭半寸者，万金不换，然至难得”云，当时品墨盖已见有专书，且相当精审。

唐时易州置有墨官，陆友《墨史》记：“祖敏，本易定（水）人，唐时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大约易水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易州即上谷郡，大府配给集贤院的上谷墨，盖出是州墨官之手。何薳《墨记》记有唐高宗时代的镇库墨：“一笏，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姓氏。”或即出当年易州之杂贡。

唐代之墨，除州县进贡之外，多见文人自制，米芾曾见李阳冰墨于京师相国寺罗汉院，其《墨史》卷上记“供御墨一巨锭，其制如碑，高愈尺而厚二寸，面蹙犀文坚泽如玉，有篆款曰‘文华阁’，中穴一窍，下画泰卦于麒麟之上，幕（摹）篆六字曰‘翠霞’，曰‘臣李阳冰’。左行书‘大历二年二月造，得旨降入翻经院’。右行书‘董作内府臣车辅，都监臣赵忠嗣”。《墨记》又记有李惴古墨一笏，“背铭曰唐水部员外郎李惴制”。至于铭有巧匠名工姓氏者，始于晚唐，著名的易水有奚鼐、奚鼎兄弟；歙县有李超、李廷珪父子。《墨史》卷上其记：“奚鼐、奚鼎，已上二人，唐末匠民。鼐墨面曰‘光庆’。又印曰‘奚鼐墨’。又印曰‘庚申’。”庚申乃唐昭宗光化三年（900），时为唐末。

李超，本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唐末避难渡江而居歙州（今安徽休宁）。陆友曾见其墨二品，《墨史》卷上记“其面或为特龙者，或曰新安香墨者，其幕（摹）曰‘歙州李超造’。一上曰‘李超’。其号虽异，亦互有精粗”。《墨史》又记其质量，谓“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盖胶败而墨调也。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常侍徐公铉为太简言，幼年尝得李超墨，一锭，长不过尺，细裁如箸，与其弟锴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其旧墨而磨处边际有刃如刀，坚如玉者，参唐时墨模出自铜质，杵之坚健，是说或非虚语。其子廷珪，为南唐墨官。其墨，蔡君谟评以为“天下第一品”。《墨史》称：“其墨能削木，误坠沟中，数月不坏。”如此云云，唐墨之质量自可想见。

李超、李廷珪之墨，至北宋尤见珍贵，宣和年有称“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83]。

唐墨配药，相传始于唐玄宗，王象晋《群芳谱》记其“以芙蓉花汁调香粉作御墨”。《墨经》也记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胆矾三物；又用栲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黄、犀角、珍珠、巴豆等十二物配制之。

唐代已见有色墨，如韦述之黄墨，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本传：“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王徽之朱墨，见《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本传：“转考功员外。时考簿上中下字朱书，吏缘为奸，多有楷改。徽白仆射，请以墨书，遂绝奸吏之弊。”参《文房四谱》“造朱墨法”，“朱书”盖出朱砂之墨。碑志书丹，或亦出朱墨。《云仙杂记》所记楚王灵夔“使人造红白二墨为戏”事，出《大唐龙髓记》，其红墨，即朱墨。若是，当时还有白墨。

李尤《砚铭》曰“书契既造，砚墨乃陈”。唐代砚石主要出自青州、绛州、歙州和端州，以端州紫砚最著名。李贺有《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称述之：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佣刓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
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
乾膩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
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顽何足云。

笔、墨、纸、砚为文事所需，不可或缺，故为士大夫所重，渐起赏玩之风，《雲仙杂记》记薛稷曾各封以九锡之事[94]，虽出小说者流，不可尽信，然亦见时俗之宝重。又引《文房宝饰》记其护养之法：

养笔以硫磺酒舒其毫，养纸以芙蓉粉借其色，养砚以文绫，盖贵乎隔尘，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

至于李肇《国史补》卷中所记怀素“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张怀瓘《书断》智永“取笔头瘗之，为退笔冢，自制铭志”。以及《雲仙杂记》所引《大唐龙髓记》“许芝有妙墨八厨，巢贼（黄巢）乱，瘗于善和时第”云，尤见其爱重之深。

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惟砚则终身享用，为四宝之首，尤特宜为书家所钟爱，如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95]。黄易简《文房四谱》卷三亦录有李阳冰对砚的研究，谓：“夫砚用则贮水，毕则干之，若久浸不干，墨乃不发，墨既不发，书乃多渍。水在清净，宜取新水密护尘埃，忌用煎煮之水也。”《墨池篇》卷二十也记李阳冰有关纸、笔保管的经验，如：“纸常宜深藏箧笥，勿令风日所侵，若少露埃尘，则枯燥难用矣。攻书者宜谨之。”卷十九又引其《笔法诀》云：“夫笔大小硬软长短或纸绢卓等，即各从人所好。欲作，法匠须良哲，物料精详。入墨之时，则毫副诸勿斜曲，每因用了则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传他手。至于时或命书，兴来不过百字，更有执捉之势，用笔紧慢即出于当

人,至理确定矣。”这亦可见唐时对文房四宝已有专门的研究,而李阳冰的心得尤为后人见重。

① (唐)颜真卿《正议大夫行国子司业上柱国金乡县开国男颜府君神道碑铭》。

② (唐)李齐古《进御注孝经表》。

③ (唐)徐浩《古迹记》。

④ 《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引。

⑤ 元和八年(813)八月五日《尊胜陀罗尼经幢》题识。

⑥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

⑦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王涯传》。

⑧ 《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

⑨ 《唐六典》卷九。

⑩ 《唐六典》卷一《尚书都令史书令史》条下注。

⑪ 《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

⑫ 《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作“罢雠正员,听书工写于家,送官取直”。

⑬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院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条下注。

⑭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二十八。

⑮ 《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

⑯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柳仲郢传》。

⑰ (宋)罗大纲《鹤林玉露·补遗》引。

⑱ (唐)李商隐《韩碑》。

⑲ (唐)杜兼《题书卷后语》。

⑳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下》。

㉑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隐逸传》。

㉒ 《新唐书》卷一百二《褚亮传》附李玄道传,记其贞观初“出为幽州长史,佐都督王君廓,专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义裁纠之。尝遗玄道婢,乃良家子为所掠,遣去不纳,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书房玄龄,玄龄本甥也。君廓发其书,不识草字,疑以谋己,遂反。(玄道)坐是流嶲州。”

㉓ 《书断》作《谱草字杂体》,《宣和书谱》作《选谱草字体》。

㉔ (唐)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

㉕ 原注有“定州《北岳碑》为好事所传”云。

㉖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记郑馀庆所书权德舆《怀晖禅师碑》亦其篆额。

㉗ （清）魏锡曾《绩语堂碑录》庚引。

㉘㊽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引。

㉙ （唐）沈亚之《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㉚ （唐）司空图《书屏记》。

㉛ （唐）李磎《授宋郁广都尉黄去惑临安县尉主簿颜温凤翔文学等制》。

㉜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㉝ （唐）杜甫《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㉞㊱ （唐）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㉟ （宋）苏轼《苏东坡集》前集卷三《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㊲㊵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论》。

㊳ 《心经》由玄奘传译，乃在贞观二十三年（649），是时欧阳询已卒多年，所记盖误。

㊴ （唐）贯休《赠写经僧楚雲》。

㊶ （唐）白居易《醉后重赠晦叔》。

㊷ （唐）皎然《赠李中丞洪》。

㊸ （唐）皎然《春日陪颜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会韵海诸生》。

㊹ （唐）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

㊺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皎然上人》。

㊻ 原注：王小令草书，古今称草绝。

㊼ （唐）张说《蓝田法池寺二法堂赞》。

㊽ （唐）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

㊾ 《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三卷《三、灵感论·以禅喻诗》。

㊿ （宋）米芾《宝章待访录》有草书《千字文》真迹，或即是本。

(51)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十。

(52) 《宣和书谱》卷十九。

(53) 《唐会要》卷七十五《冬集》引大历十一年五月敕。

(54) （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序。

(55) 三洞是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十二部是每洞又分十二类，即：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章表。又四辅，即太玄辅洞真、太平辅洞玄、太清辅洞神、正一贯通六部即三洞与三太。道士传授初亦依三洞次第。

(56) 《道藏》正乙部九八九册。

(57) 此王义之即后讹以为得白雲先生《书诀》之王羲之，首见郑杓《衍极》刘有定注，而亚栖《论节》"王变白雲体"者为其滥觞。

⑸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贺知章传》引。

⑸ 张寿镛《四明丛书·贺秘监集》引。

⑹ (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之《跋张长史帖后》引。

⑹ 元和中,韩公武抉弹中鹤一眼,便演为"五绝"。

⑹ 《宣和书谱》卷十八。

⑹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

⑹ (五代)贯休《读顾况歌行》。

⑹ (唐)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

⑹ (唐)李颀《赠张旭》。

⑹ (唐)皎然《奉同颜使君真卿清风楼赋得洞庭歌送吴炼师归林屋洞》。

⑹ 诚臣徇主,也是颜氏家族对子弟的明训。

⑹ 文房四宝始称于北宋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和潘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⑺ 《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

⑺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三编第一章《六 教育、图书、修史费用(二)》。

⑺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卷四。

⑺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殿书院》。

⑺ 原注:顾恺之有摹拓妙法。

⑺ 原注:赵国公李吉甫家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

⑺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或得悬蒸之要,或传痛颉之方……前寄笔出自新铨(淦)散卓尤精,能用青(羊)毫之长,似学铁头之短。"

⑺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试张耕老羊毛笔》。

⑺ (唐)张鹭《朝野佥载》卷三。

⑻ (唐)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引其后有"管不在大,副切须齐。齐则波切有凭,管小则运动有力"数字。

⑻ (宋)陶谷《清异录》卷下。

⑻ 亦名《雲仙散录》。

⑻ (元)陆友《墨史》卷上引。

⑻ 笔封九锡,拜墨曹都统,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出《龙须志》;墨封九锡,拜松燕督护、玄香太守兼亳州诸郡平章事,出《纂异记》;纸封九锡,拜楮国公、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出《事略》;砚封九锡,拜离石乡侯、使持节即墨军事长史,兼铁面尚书,出《凤翔退耕录》。

⑻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柳公权传》。

第七章

唐代墓志

魏晋之世，铭石与书翰分作两途。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锺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铭石之书，其与章程、行狎两书载体不同，后者多施用简牍，或帛与纸，草法行势，未见掩失，而铭石之书，先必正书上石，然后镌刻，其形质便加华饰，即使高手名匠专心勾摹，亦能称心如意，已下真迹一等。何况刻石此道，代有传习，著名如万文韶、邵建初，堪称世家，其手法各异，又自成规矩。米芾之"石刻不可学"①及近年来碑版刻手之议，自可见刻石对书法影响之甚大。然而，简牍易散佚，留存不便；帛、纸又无千年之寿，秦篆、汉隶、唐楷以及历代名家书迹，大都只能凭借铭石之书而流传至今。

近年来，地不爱宝，各时代之简牍、帛书、纸卷和碑版时有发现，然以隋唐而论，墓志包括释之塔铭，可谓大宗，其出土如新，诸体皆备，又有未刻之朱书，且

形制小，石质细，铭石刊石，并见便捷，精善者，其较之丰碑巨碣，距真迹尤近。

唐代墓志，向来为研究唐史者所重，不仅墓主之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官职履历和谱系以及撰、书、刻、立者之署衔，可征信以证史，而且撰文者有如上官仪（《张士贵志》）、狄仁杰（《袁公瑜志》）、崔沔（《崔泰之志》、《王方大志》）、郑虔（《郑承光志》、《郑仁颖志》）、李华（《田仙寮志》）、张楚金（《张景阳志序》、《左光胤志》）、柳芳（《源光乘志》）、萧颖士（《贾钦惠志》）、陆据（《源衍志》）、韦应物（《李璀志》）、崔祐甫（《卢招志》《崔缊志》《崔众甫志》《崔夷甫志》《寇锡志》）、樊宗师（《樊涚志》）、裴垍（《孙君暨妻卢氏志》）、富嘉谟（《崔皓志》）、邵说（《李湍志》、《崔祐甫志》）、钱徽（《杨□志》《杨宁志》）、于公异（《于申志》）和梁肃（《李涛志》《李涛妻独孤氏志》），皆为有唐一代著名文人学者，其文洵足以补充存世文学史料之或缺。其中，又有名书家之文，既具文采之风流，又见史料之信值，且并为新出，尤宜珍重。诸如：

薛稷《王德表志》，圣历二年（699）三月二十九日入窆，王景正书；卢藏用《薛氏志》，景云元年（710）十一月二十五日入窆，豆卢欣期正书，《甘元柬志》（中书舍人任上撰）；

徐安贞《萧谦志》，开元二十三年（735）九月八日入窆；《张九龄志》，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三日入窆；

王知敬《哥舒季道葬马铭》（武德中，或以为赝品）；

贺知章《戴令言志》，开元二年（714）十二月七日入窆；《封祯志》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六日入窆；《杨执一志》，开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入窆，杨汲正书；《王氏志》，开元二十年（732）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窆；

吕向《豆卢建志》，天宝三载（744）四月十二日入窆，裴炫隶书；

李邕《崔沔志》，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二月廿九日入窆前撰。大历十三年（778）四月八日迁葬，崔祐甫识，徐珙隶书；

刘昇《魏靖志》，开元十五年（727）正月二十四日入窆，魏少游正书；

徐浩《陈希望志》，天宝八载（749）十月九日入窆；《张庭珪志》，天宝

十载(751)十月入窆；

颜真卿《臧怀亮志》，天宝十载(751)四月二十一日入窆，疑伪；

吴通微《韩氏志》，永泰元年(765)九月十三日入窆；《李氏志》，大历三年(768)六月二十九日入窆；《冯氏志》，贞元三年(787)十月四日入窆，雷迅正书；《俱慈顺志》，贞元七年(791)正月十二日入窆；

张少悌《刘鸿志》，建中二年(781)十一月三十日入窆；

杨凝式《李德休志》，长兴三年(932)正月三日入窆，李光愿正书；

《张季澄志》，清泰三年(936)二月十三日入窆，郭兴正书，张季鸾篆盖；

《张继昇志》，天福四年(939)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窆，刘珙正书。

尤其张庭珪、刘昇、李邕诸志的出土，更是有助唐代书法史的研究，填补了书家无志的空白。

第一节

初　　唐

墓志自南北朝定型以来，其方形石(或砖)质，边长一般为五十厘米至一百厘米，常附有衲顶形志盖，并成一盒，为圹中重要附葬品，其性质虽与墓前碑石包括墓阙、神道、墓表一样，但刻制工艺日趋细巧，至隋益见精善，入唐更是焕然有文明气象。大凡刻石工师，门户既立，世代传袭，手法不允稍改，况且唐初书志人，多出技术人员，并为无名之辈。加上当时无论台省楷书手，抑或州、县书令史，也和工师一样，大都是杨隋乃至周、陈的遗民，其书法积习未改，入唐后依旧故我，即使从贞观初年起，设书馆受徒，置书科取士；唐太宗又力倡右军风骨；欧阳询、虞世南秉承睿旨敛入规矩，且教示楷法，其后，褚遂良又集欧、虞之长，高扬通变精神，终以瘦润华逸启开李唐门户，然而其影响之所及，教化之所致，

时在武后朝，或更后，贞观年间尚未能及见东风之化雨，更遑论武德之书势，此也便是墓志书法每每附骥于社会书势而不克趋前之原由所在。综观唐初墓志书法，虽渐见端严俊朗，精密有加，贞观末年，也间有遒媚可观者出，然终是隋日格局，拙重或出北朝遗俗，秀劲或绍江左流风，其典型可称且著名者惟其昭陵八石，即：

《杨恭仁志》，贞观十四年（640）三月十二日入窆，1979 年秋日出土；

《长乐公主志》，贞观十七年（643）九月二十一日入窆，1962 年出土；

《刘娘子志》，贞观十八年（644）二月五日入窆，1972 年 3 月出土；

《王君愕志》，贞观十九年（645）十一月十四日入窆，1972 年 11 月出土；

《薛頔志》，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十四日入窆，1974 年 4 月出土；

《李思摩志》，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二十八日入窆，1992 年 2 月出土；

《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志》，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十一日卒，合葬于其夫李思摩之茔，1992 年 10 月与夫志同时出土；

《文安县主志》，贞观廿二年（648）三月廿二日入窆，嘉庆年间出土。

其中《文安县主志》出土较早，其典丽华美之文章，工整有法之书品，尤著名于近世，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四以为是志“书法在欧、褚之间”。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卷二称“笔意极似《十三行》”，且有“唐志当以此石为最善，虽以《砖塔》之见称当世，予以为远不及”之谓。

至于署名欧阳询之《温彦博志》，赵明诚《金石录目》第五七七不记撰书者姓名，《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第一册《北京卷》收有该志拓本，末题：“银青光禄大夫，贞观十年六月，欧阳询撰”，不见并书两字，且与《唐代墓志汇编》贞观第五二据周绍良所藏拓本录文有异。周氏之拓有“东北道招慰大使十年六月贞观检校太子右庶子”一行插入序后铭前，即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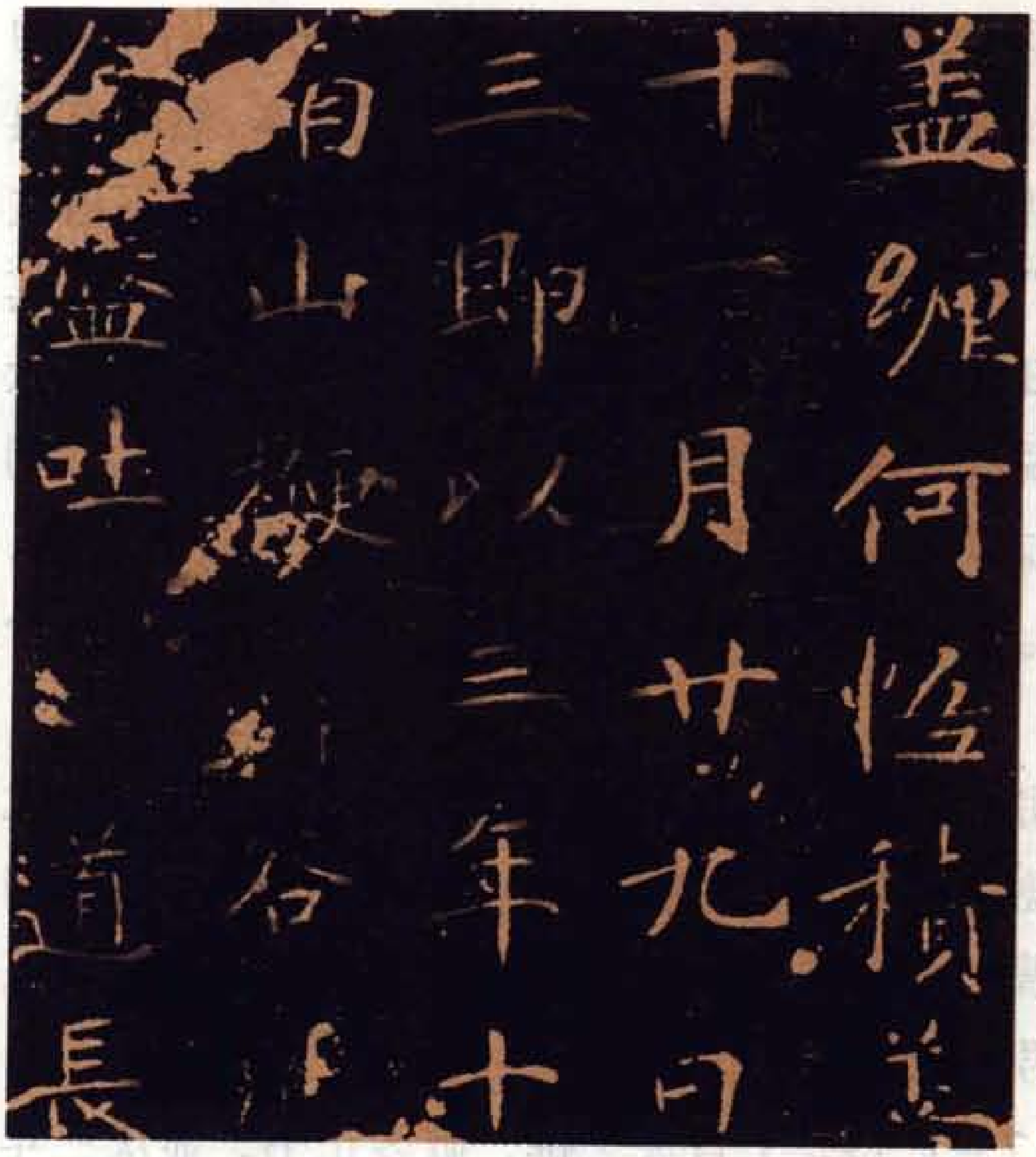
接“其词曰”后作同一行。末又题“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字样，为一行。是或即觉罗崇恩《香南精舍金石契》所谓“此亦复刻本，然尚有典型，较前与近世之生造伪品远矣。其脱落处，或就空格补刊，当是不谙文义人据剪本、旧本入石也”者。按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637)六月，其年十月廿二日陪葬，新、旧《唐书》记之确凿分明，两引上石所书“十年六月”者，显讹。其实两石“脱落处，或就空格补刊”者，全如《萧胜志》之“刺史褚遂良书”六字，《刘智志》之“武功苏灵芝书”六字者，出自近人增添，盖画蛇之作，不足以征信。然此石不失为佳刻，楷书谨严有法，盖出自台省老手，亦堪可记述。

墓志书法一入高宗朝，渐见妍逸，至武周长安(701—704)年间，尤趋畅朗，有唐一代新风，融入其间，秀劲宽博，已是华润有加，尽脱陈隋遗制。名书家始见参与，署书人姓氏者也并见增多，著名的便有敬客《王公砖塔铭》和欧阳通《泉男生志》两通。

《王公砖塔铭》（图 7－1.1），上官灵芝撰，敬客正书，显庆三年(658)十月十二日入窆，明万历年间出土。敬客，出自河东右族，事迹无考。此碑以秀雅见称于明清诸论书家如王澍、毛凤枝，至叶昌炽《语石》尤见推重，有“今世所珍者，莫如《砖塔铭》”之评。

《泉男生志》，王德真撰，欧阳通书于司勋郎中任上，唐调露元年(679)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窆，1922 年 1 月 20 日出土。该志书法精整，较《道因法师碑》后十六年，更见成熟，尤胜前碑，或以为即小欧之代表作。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卷二曾与《道因碑》比较，以为“《道因》实步趋《皇甫》，此志则脱胎《化度》，兰台晚年书如有出世者，必可颉颃率更，与《醴泉》《温彦博碑》相出入矣”。又题诗称：“大欧《化度》小《泉君》，前者《黄庭》后《洛神》。想象母徐铭志美，幽光犹作九原春。”是志由险峻而趋入淳蓄，不独为欧阳通书入通会之典型，亦乃初唐书势善学欧体者风范之所在。

署名为武周朝名相狄仁杰所撰并正书的《袁公瑜暨妻孟氏志》，久视元年(700)十月二十八日入窆，1929 年 12 月出土。狄氏虽无书名，其



7-1.1 敬客 《王公砖塔铭》(局部)(658)

7-1.2 无名氏 《李文志》(局部)(664)

书法精整遒劲，俊气逼人，也足可窥见武周时代士大夫间的书法造诣。

其他不署名的墓志书法，著名的有《李文志》（麟德元年二月十八日入窆，图 7－1.2）、《梁师亮志》（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入窆。又有其弟师暕志即《梁寺志》，朱宾撰，郑庄正书，垂拱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入窆，甚见称于《语石》）以及萧瑀两女《法乐志》《法灯志》二石（永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同时入窆）其峻利秀逸，或精严雅劲与端庄华丽，也堪称一代佳刻，为初唐名品。

至于昭陵陪葬墓志，尤其近年出土的诸石，精整可喜，除署名张玄靓正书上官仪《张士贵志》，敬客师正书崔行功《王大礼志》二石外，其他亦不愧出自台省书人之大手笔，信然如叶昌炽之言“唐碑渊薮”者。初唐墓志书法之典型，毕见具备，洵足以供后世之研究，谨录新出者如下：

《牛秀志》，正书并篆盖，永徽二年（651）四月十日入窆，1976 年 4 月出土；

《段简璧志》，正书并篆盖，永徽二年（651）八月二十三日入窆，1978 年出土；

《张廉穆志》，正书，永徽六年（655）二月九日入窆，1972 年 11 月出土；

《韦氏志》，正书并篆盖，显庆元年（656）十月十八日入窆，1974 年 8 月出土；

《唐俭志》，正书并篆盖，显庆元年（656）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窆，1978 年 3 月出土；

《五品宫女志》，正书并篆盖，显庆二年（657）二月十四日入窆，1974 年出土；

《尉迟敬德志》，正书并飞白盖，显庆四年（659）四月十四日入窆，1971 年冬日出土（其碑文出自许敬宗）；

《苏娍志》，正书并篆盖，与其夫尉迟敬德志同时入窆，又同时出土；

《宇文修多罗志》，正书并篆盖，显庆五年（660）三月三日后入窆，

1972 年 5 月出土；

《郑仁泰志》，正书并篆盖，麟德元年（664）十月二十二日入窆，1971 年出土；

《程知节志》，正书并篆盖，麟德二年（665）入窆，1986 年 4 月出土（其碑文出自许敬宗，畅整正书）；

《李震志》，正书并篆盖，麟德二年（665）十一月入窆，1973 年 5 月出土；

《王氏志》，正书并篆盖，与夫李震志同时入窆，又同时出土；

《三品亡尼（安）志》，正书并篆盖，麟德二年（665）十二月入窆，1974 年 9 月出土；

《韦珪志》，令狐德棻撰，正书并篆盖，乾封元年（666）十二月二十九日入窆，1991 年出土；

《李勣志》，刘祎之撰，正书并篆盖，总章三年（670）二月六日入窆，1971 年出土（其碑文出自高宗撰并行书）；

《斛斯政则志》，正书并篆盖，咸亨元年（670）十一月十日入窆，1979 年 4 月出土；

《赵王李福志》，正书并篆盖，咸亨二年（671）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1972 年 5 月出土；

《燕氏志》，正书并篆盖，咸亨二年（671）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1990 年 5 月出土（其碑文出自许敬宗，高正臣正书，万宝哲刻字）；

《阿史那忠志》，崔行功撰，正书并篆盖，上元二年（675）十月十五日入窆，1972 年 6 月出土；

《典灯志》，正书并篆盖，仪凤二年（677）十二月廿六日入窆，1975 年出土；

《元万子志》，正书并篆盖，仪凤三年（678）二月十四日入窆，1978 年 1 月出土；

《唐嘉会志》，正书并篆盖，与夫人元万子志同时入窆，又同时出土；

《优昙禅师塔铭》，正书，仪凤三年（678）六月八日后入窆，近年

出土；

《昭仪志》，正书并篆盖，永淳元年（682）十月十一日入窆，1979 年出土；

《临川公主志》，郭正一撰，正书并篆盖，永淳元年（682）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窆，1972 年春日出土；

《安元寿志》，郭正一撰，正书，光宅元年（684）十月二十四日入窆，1972 年出土；

《金氏志》，正书并篆盖，永昌元年（689）正月十三日入窆，1986 年元月出土；

《三品亡尼志》，正书并篆盖，长安三年（703）九月廿二日入窆，1986 年 3 月出土。

其中《尉迟敬德志》盖为飞白书，初唐之绝少见者，尤足以矜重之。

第二节

盛　　唐

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唐代书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文学、绘画诸艺术同声同气，互为影响，由沿袭陈隋而自开新境，因百花齐放而高峰竞起，至开元、天宝年间乃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墓志书法步趋其间，亦并同演进。

大凡朱书铭石，有提腕、悬腕、枕腕三法。丰碑巨碣，悬空作业，多用提、悬二法；而志铭仄小，多用枕法，即空海和尚所记左手置右手下的所谓枕腕法。且南朝以来，志铭书法多近写经抄书，兼用指法，后经士大夫铭志，又多依平常书写积习，不独有行书上石，其指法、草意也渐见留露。若遇工师名匠，更是形具神生，尤近简牍帛纸者。铭石华饰之手法，

经初唐而至是，已见精善。

开元、天宝年间，名才士与名书家所书的志石益多，存世可见者有如韩筠《陈泰暨妻房氏志》，岐王李范《李贤志》《李嗣庄志》，姚崇《石映志》，刘怀信《静泰塔铭》，魏少游《魏靖志》，李志暕《法澄塔铭》，阳伯成《薛璿志》《李肃邕志》，张若芬《张休光志》，元光济《郑湛志》，僧温古《景贤塔记》，玉真公主《金仙公主志》，李守礼《高淑嫕志》，萧定《惠源和尚志》，杜昱《优婆夷未曾有志》，褚庭诲《程伯献志》《李氏志》，崔宗之《王冰志》，僧湛然《郑德曜志》《李氏志》《郑昱志》，裴朏《裴稹志》，卢肃《赵琼琰志》，张旭《严仁志》，赵骅《李符瑞志》，徐珙《慕容相暨妻唐氏志》《□教志》，裴炫《豆卢建志》，张少悌《王四娘塔铭》《屈元寿志》，蔡希寂《蔡希周志》《李琚暨妻薛氏志》，史惟则《王铁志》，徐浩《玄隐塔铭》《张庭珪志》，李思诠《荣王第八女志》，韩择木《棣王琰志》《南川县主志》《朱氏志》，薛邕《魏氏志》，席彬《刘感志》，胡霈然《周献志》，田颖《刘元尚志》《张希古志》，顾诫奢《高元珪志》，刘秦《唐玄宗第五孙女志》，苏灵芝《刘奉智暨妻孙氏志》以及书手王玄贞、李九皋、陈璟和画家李凑诸石，不仅在盛唐不失为名书佳石，且大都是中国书法史上仅见而具信值的珍贵资料，尤其近世出土的，除了前面诸章已见引述外，褚庭诲、张少悌之行书，蔡希寂、李凑之正书，韩筠、释湛然之隶书诸石，尚可补叙之。

褚庭诲行书《程伯献志》，刘彤撰，开元二十七年（739）正月二十七日入窆，盖书于给事中任上。庭诲，唐初名儒褚无量之子，开元五年（717）登文儒异等科，与徐浩同年，官至给事中。其名或作廷珪，廷，盖庭之讹。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有称："时人谓之小褚……李邕之差肩也。"此志出自《圣教》而加遒逸，风神并见丰茂，盖一盛唐行书之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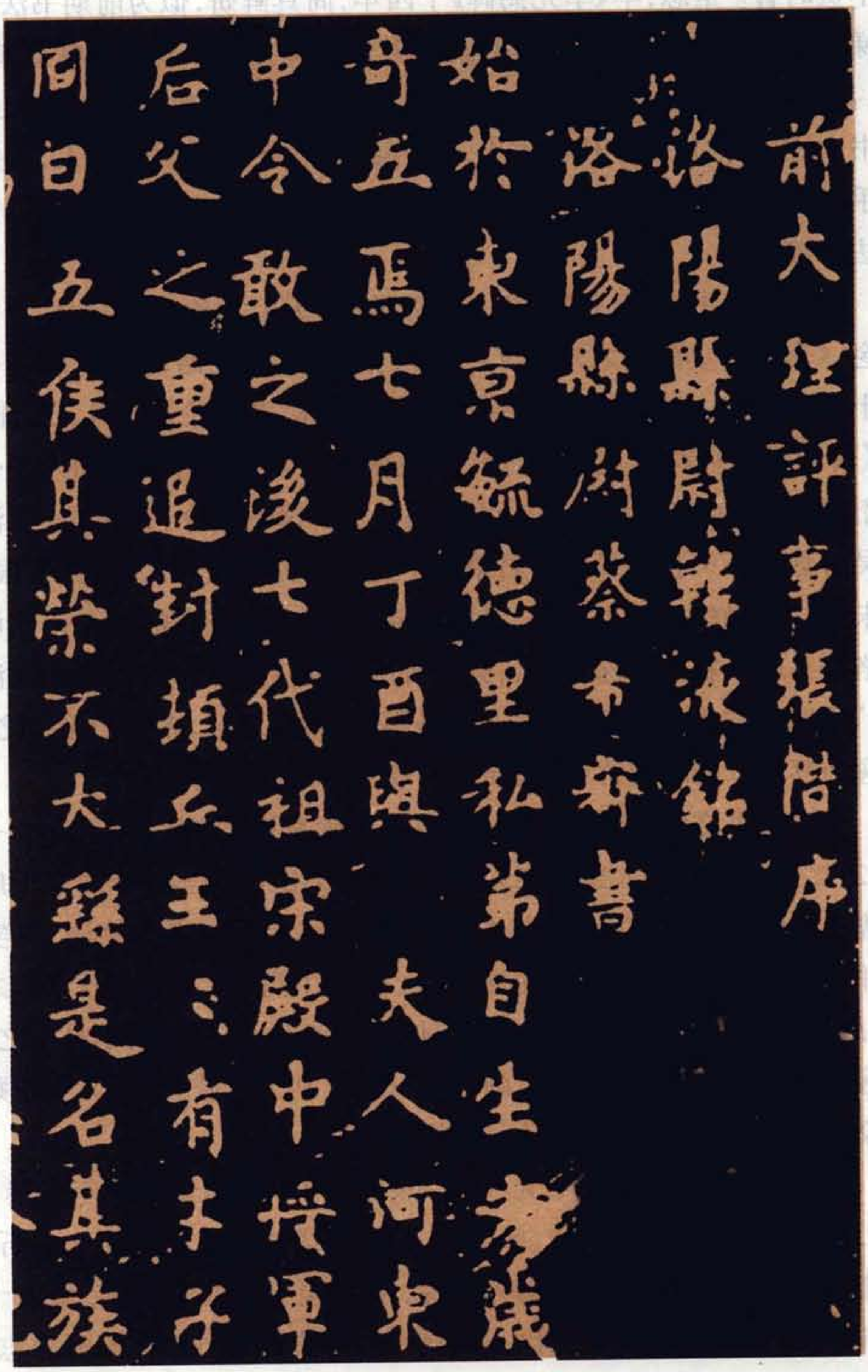
张少悌行书《屈元寿志》，申屠洮撰，天宝九载（750）三月十五日入窆。张少悌官至将作少监，以善书知名当代，颜真卿撰《李光弼碑》，而属其铭石，赵崡《石墨镌华》卷二有评"殊劲拔清圆，深得右军行草遗意"，

盖不负时誉。是志，早《李光弼碑》十四年，尚具鲜妍，似为前期书法。张少悌又撰有《刘氏(鸿)权宁志》，志述其妻即翰苑书人刘秦之妹刘鸿，正书，甚精善，建中二年(781)十一月三十日入窆，亦近世出土。是志虽不署书人姓氏，然以其一代善书人，书铭妻石，当不宜另委于他人，或并出其手，属最晚之书迹。若是，张少悌两石，一行一正，一早一晚，洵可知其书法之嬗变。

蔡希寂正书两石，《蔡希周志》，张阶撰，天宝六载(747)十月十九日入窆；《李琚暨妻薛氏志》(图 7－2.1)，张阶序，韩液铭，七载(748)七月二十九日入窆，并端庄劲拔，不愧其弟蔡希综《法书论》"深工"之誉，尤其《蔡希周志》有称："公讳希周，字良傅……公其先陈留济阳人……曾祖衍，隋晋王府东祭酒；王父元凯，皇清河郡漳南县令；列考勗之，汝南郡吴房县令……公即吴房府君第四子也……公同气九人，羁孤不振，诸兄未遇，群弟好书，生事废落，日阙无储。"又，其前有题"第七弟朝议郎行洛阳县尉希寂字季深书"云，弥可补史之阙。希寂同气九人，参《法书论》"第四兄缑氏主属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之记，希周乃希综之兄，希逸乃其弟。希综所称"第四兄者"，或包括诸姐在内。

李凑正书之《李氏志》，乃左补阙张之绪为其亡妻所撰，天宝十一载(752)二月二十四日入窆，1925 年 6 月 22 日出土。是志，李凑书于广陵仓曹参军任上，或以为有唐墓志风格特殊者，独存魏晋人笔法，其实此书并不工，乃书者平常写判书牍手段，惟刻手高明，不见铭石华饰之陋习，故其书指法、草意，殆无一失，与他志迥然有别。李凑，李林甫之侄，以擅画见称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据其"初为广陵仓曹，天宝中贬明州象山县尉，年二十八"云，是书盖早年之作。

唐代墓志，以楷、行书为大宗，隶书甚少，叶昌炽光绪年间撰《语石》，所见仅五石，且其中初、盛唐三志，皆不署书人。近世出土志石，隶书渐见增多，现今可见，署书人名者，神龙至天宝五十年间，竟有十二石，谅可裨益书史之研究。其中徐浩《张庭珪志》和顾诫奢《高元珪志》已见前章引述外，其他尤可称述者，当推韩筠《陈泰暨妻房氏志》和释湛然



7－2.1 蔡希寂 《李琚暨妻薛氏志》(局部)(748)

《郑德曜志》两石。

韩筠《陈泰暨妻房氏志》，志文亦出其手，神龙二年（706）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隶书古逸，虽入楷法，然尚未见唐隶陋习。韩筠，事迹无考，以其署“敕选”，盖得唐中宗李显之御简，为当时一善书者。隶书入志而署书人名者，以此石为初见，盖可记述。

释湛然《郑德曜志》，郑僎撰，开元二十八年（740）十一月十九日入窆。湛然（711—782），时为大福光寺僧，俗姓戚氏，常州（今属江苏）人，为天台宗智者法师五代传人，左溪朗公之法子，时称“荆溪尊者”，赞宁《宋高僧传》为之立传。以真、行书名世，吕总《续书评》有“子雲（萧子雲）之后，难与比肩”之评。近世河南偃师出土有其撰并正书《李氏志》（天宝元年正月三日入窆），书法出自锺繇而加丰逸，盖缁流善书而别具一格者。是志隶书风神不及楷书，而精能不在其下，适可见当时虽高僧亦不免俗，每每寄情书法，一专多擅，且并效新体，不见落伍。

至于隶书名石《戴令言志》，贺知章撰于太常博士任上。开元二年（714）十二月七日入窆，近世洛阳出土。志盖亦隶书。书作方体，出自北朝而见唐人气象。叶昌炽《语石》以为出自贺知章并书，盖属臆断，恐难征信。

第三节

中 唐

“安史之乱”后，中原周遭破坏，郭子仪曾记当年情境：“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②刘晏致书权相元载亦言：“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馀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③永泰年间(765—766)，颜真卿官居二品，而举家食粥，这也是事实。“戊申之年，葬者通岁”④，戊申即大历三年(768)，值代宗即位初年，时趋升平，诸多乱世权厝之柩，迁神崇邙，归葬先茔，孝子贤孙，亦莫不竭力丧事，然撰文铭石，多出简陋，刻工亦见草率，已不复可睹盛唐景象，即如一代名书家李邕，生前碑版照四裔，其文、其书，天下景仰，千古流传，而死后墓志，族子著作郎李昂之撰述，已见平平；书手铭石之生涩、刻工镌字之粗劣，尤可扼腕，为之叹惜。其后，有唐王朝经历大历之苟安、贞元之休息、永贞之革新、至元和削藩六十五年来，遂渐具兴复气象，“不图贞观、开元之化，复睹于今日矣”⑤！文学艺术亦随着元和之治而繁荣发展。其间书法，人才荟萃，复显昌盛。

李肇《国史补》记当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云，谀鬼之风甚炽且盛。名书家如刘秦、徐浩、张少悌、吴通微、韩秀实、皇甫阅、徐珙、沈传师、归登、柳公权诸人莫不应人所请，伏案铭石。近世出土，以徐珙为尤多，凡四石，并隶书，特近徐浩气格⑥。徐浩名高一代，碑版四裔，存世尤以隶书为多，王澍

《虚舟题跋》直谓“唐人隶书之盛，无如季海，隶书之工，亦无如季海”。其子侄如琦、现、璲、珰、玫和珽、珙、瑒以及珙等群从兄弟多善书，惟隶书之外，楷书可见者甚少，参阅近世出土的徐珙《李皋志》，劲雄古拙，亦全出其叔季海之法，其家学传统之久盛，自可概见。无独有偶，近世出土之中唐志石，书者以孙氏为多，且并出盛唐名才士、颜真卿座师孙逖一族，如其侄公辅（弟遘之子）贞元五年（789）有撰并正书《孙君暨妻李氏志》。其孙即桂州刺史孙成之子保衡，永贞元年（805）有正书裴垍《孙君暨妻卢氏志》；审象，元和二年（807）有正书孙保衡《郑炼暨妻孙氏志》。侄孙景商（弟遘之孙），开成五年（840）有正书所撰《李氏志》，大中六年（852）正书旧铭《孙廿九女志》。同时，又有行书名家孙藏器，或为其群从兄弟。此第三代也。第四代则有孙备、孙储（景商之子）和孙珙（景商之侄）。第五代又有孙纾、孙徽、孙铢、孙纲、孙縈（逖之后）和孙郑九、孙阿陀（遹之后）以及孙郢等群从兄弟诸人，书法并见不俗，盖出自孙氏家学之渊源。是亦可知唐代士族书法教育之传承。

中唐志石出自非名书家手笔，而精善可喜，堪称上品者，有刘钧《大德演公塔铭》（杨叶撰，贞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入穸）、崔巨雅《李辅光志》（崔元略撰，元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入穸）、寇立《窦氏志》（王众仲撰，元和十二年闰五月十三日入穸）和崔倬《崔洧志》（崔耽撰，开成元年二月十四日入穸）四石，并正书。其中崔倬，即大中五年（851）宋州刺史任上摹刻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者，其有叙称：“倬自幼学慕习鲁公书法，才不能窥涉其门宇”云，《崔洧志》下距仅十五年，盖可见其慕习颜书之不诳。

至于名才士吕恭《吕渭暨妻柳氏志》及《柳氏志》（并吕温撰，贞元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入穸）；符载《李氏志》（并撰，篆盖，元和七年八月七日入穸）；名刻工屈贲《张惟暨妻王氏志》（并撰，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入穸，清光绪二十三年出土）、《张曛志》（并篆盖，崔归美撰，元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穸）以及以重金求得萧子雲飞白书“萧”字者皇室李约之《杨珽志》（魏则之撰，大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入穸）和以奸邪著名，恶

颜真卿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者权相卢杞之《卢涛志》(并撰,大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入窆)并正书工雅,且近世出土,未经泐损,也洵足珍贵,宜加称述者也。

第四节

晚 唐

唐代书法教育,自贞观二年(628)于国子监内设置书学以来,殆成制度。后经"安史之乱",间有破坏,至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加以整顿,确定西京书馆生徒十员,东都三员,其虽少于贞观、开元年间,然反正拨乱,尤于培养专门人材,中兴书法事业,以致追仿唐太宗、唐玄宗之风,则厥功至伟,诚如路隋《上宪宗实录表》所言"今之举盛烈者,贞观、开元、元和而已"。树之前因,报以后果,晚唐志石书法一变中唐流风,自圆厚紧密而趋峻秀疏朗者,正是元和年间"葺国学以振儒风"⑦,艺文一变者影响之所及。

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敕准国子监所奏翰林待诏、覆定《石经》字体官唐玄度有关九经字体之报告,即依大历年间国子司业张参《五经字样》为准绳,诸经之中别有疑阙,旧字样未载者,乃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附于《五经字样》之末,用证纰误。九经字体之刊石(后称《开成石经》)于国子监内,不但对书馆学生、在学生徒,就是对士林中人尤其台省书者以及社会文化的厘正文字,也是有着很大规范作用的。按"书契之作,适以记言",其记言者,无论铭石,抑或书判,都必须字形正确规范。张参《五经字样》与著名的颜元孙《干禄字书》,其注重字形,讲究正体,历来视以为有唐正字学的经典著作。适在同时,杨汉公又于湖州重摹颜真卿所书《干禄字书》(开成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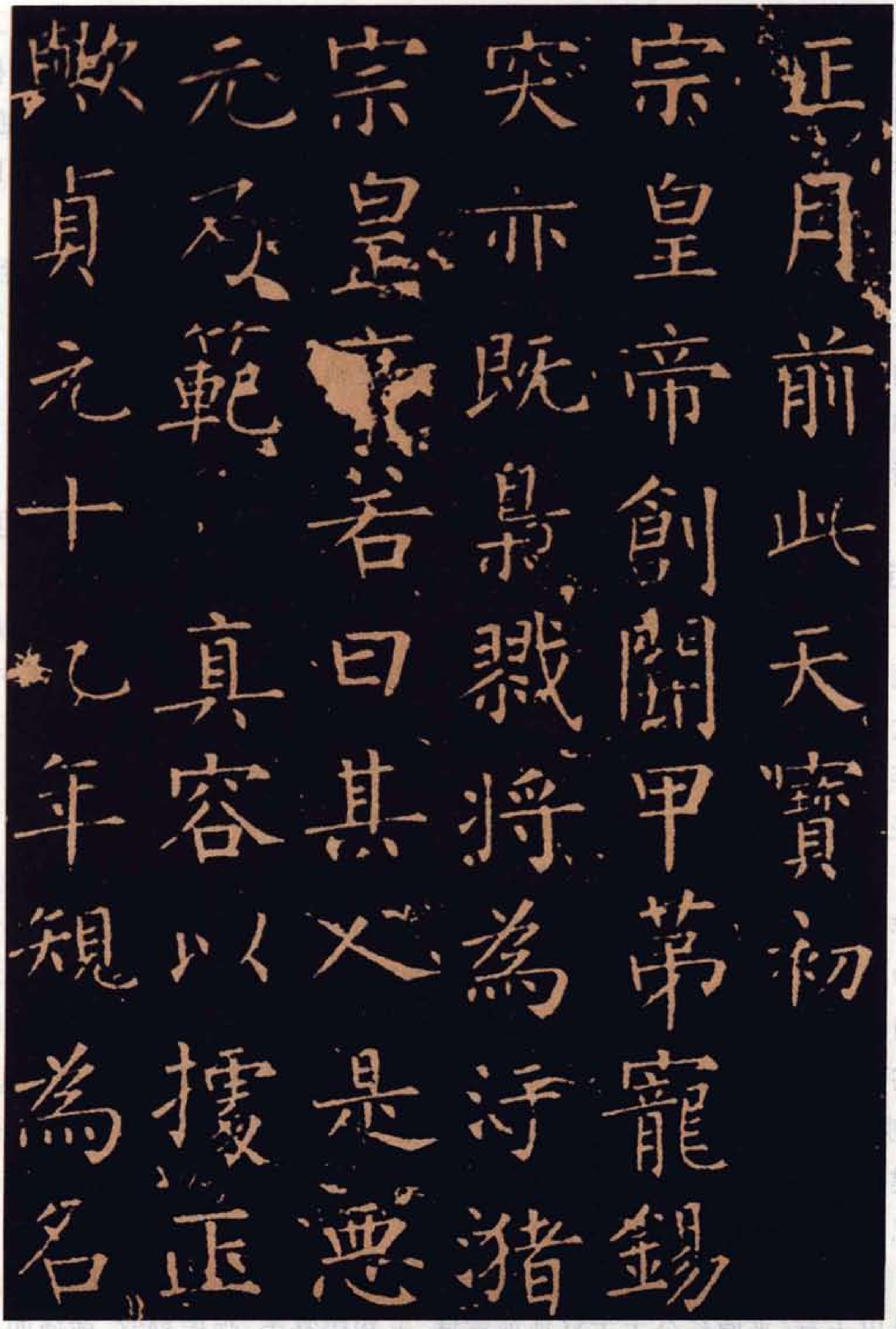
年），影响甚大。“夫筮仕观光，惟人所急。循名责实，有国恒规。既考文辞，兼评翰墨，升沈是系，安可忽诸”⑧。其立石树典，功名是用，有助于楷书字体趋向统一而更具规范。晚唐志石较之初、盛唐乃至中唐文字，通、俗之骤减，正体字之渐增，盖归功于唐文宗刊立《石经》（图 7－4.1）以正文字者。

晚唐志石，多出经生、书手以至刻工如韩师复辈手笔，其素质平俗，不堪入流，故书坛寂然，已入每况愈下之境，从中稍可称述者，惟有出自翰苑中人如毛伯贞、朱玘、唐远、张宗厚、史颀、毛知俦、董咸、郭弘范、毛知微、那希言、张元龟、王谦逢、董璹、姜仁表、阎湘、王正已诸人之所书诸石（包括志盖），其中以毛伯贞、朱玘、张宗厚为最著名。

毛伯贞，大中中叶以舒州、襄州长史充任翰林待诏，以篆书名世，《宝刻类编》收有其篆额七石，其中有柳公权《韦元素碑》一通，柳公权乃一代名书家，且亦善篆，又喜篆额，著录所见甚多，而《韦元素碑》独留属毛伯贞篆额之，参阅近世出土的《吕氏志盖》（毛伯贞并撰，吕文广正书，大中五年七月十二日入窆）和《闾知诚志盖》（郑晦撰并行书，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窆）两石篆书，并作玉箸篆，圆劲朴厚，诚不失晚唐名篆手笔，柳公权自宜退避三舍，虚左允属其题写额款矣。

朱玘，《宝刻类编》记其碑版七石，大都行书铭石，今已无片石见存。近世出土有《仇氏志》，唐宣宗撰，系奉敕行书，唐远篆盖（已佚），大中五年（851）八月四日入窆。书出《圣教序》，雅劲有法度，几无当时翰苑习气。刻工强琮，与刻玉册官强琼，其名并出玉字，或为兄弟辈，其署中书省刻字官，当亦为玉册宫内老工师，翰苑奉敕所书如《平原长公主志》《贵妃杨氏志》《崔氏志》，并出其手，手法精善，不下刻字名匠邵建和、邵建初兄弟，故尤宜是志书法形质并精，最见传神之特佳者也。是时，朱玘以中散大夫守茂王（愔）傅，充翰林待诏。

张宗厚，亦当时名家，《类编》记有碑版五石，惟存世已不可得见。近世出土有《平原长公主志》（独孤霖撰，毛知俦篆盖，强琮刻字，咸通四年四月十七日入窆），《贵妃杨氏志》（刘允章撰，董咸篆盖，强琮刻字，咸通



7-4.1 《石经》(局部)

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入窆），《晋康公主志》（卢深撰，毛知俦篆刻，咸通七年七月三十日入窆）三石，并奉敕书，前二石为楷书，后一石为行书。行书无足观，院体风貌殊多，惟其楷书健劲峻险，为晚唐书风之典型，或出自柳公权之影响⑨。

至于名石《柳老师志》，又名《柳氏长殇女志》，柳仲郢所撰（会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入窆），书法遒劲疏朗，纯出柳氏家法。又有《陈兰英志》，柳知微所撰，大中四年（850）十二月十一日书，亦具柳氏规矩。以上两石，一兄以志其妹，一夫以记其妇，或以为即撰者所自书。其果若如是，盖亦可见柳公权家学之后劲。

晚唐志石可称述的，还有《程修己志》一石，温宪撰，程进思正书，程再思篆盖。咸通四年（863）四月十七日入窆。程修己（804—863），晚唐著名书画家，志记称其书画事二则：一，“公于草隶亦精绝，章陵（唐文宗）玉册及懿安太后（郭氏）谥册，皆公之书也。丞相卫国公（李德裕）闻有客藏右军书帖三幅，卫公购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修己绐彼而为，非真也。’”李德裕多蓄古物，时称图书之府，记述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程修己所临右军帖，竟误以为真迹而购以千金。是亦可见程氏学王字之善精；二，“公尝云：‘周侩伤其峻（□□□昉），张鲜忝其淡（张太府萱），尽之其为韩乎！’又曰：‘吴怪逸玄通，陈象似幽恚，杨若痿人强起（庭光），许若市中鬻食（琨）。’”周昉、张萱、韩幹、吴道子、陈闳、杨庭光、许琨皆中唐一代名画家，其微词如此，足见程氏之自诩，是或可供研习美术史者参考。此志楷书，清劲秀雅；篆书，古淡遒健，为晚唐别具一帜者，殊可称美。进思为程修己长男，再思乃第三子，其兄弟书出家学，而不受翰苑流风所陶染者，亦当为一时杰也。

---

① （宋）米芾《海岳名言》。

②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引。

③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引。

④ （唐）李昂《李邕志》。

⑤ (唐)崔群《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册文》。

⑥ (清)叶昌炽《语石》记珙为浩之子,然珙天宝元年(742)已书陈齐卿《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志》,三载(744)撰书《□君夫人□教志》又署洛阳进士,而浩生于长安三年(703),天宝元年(742)仅为不惑,且《古迹记》明言勣为长男,其珙者不当为浩之子。按浩子琦、现、璲、珰、玫及兄浚子珽、顼、瑒并从玉,珙,盖其群从兄弟。

⑦ 《元和三年试制举人策问》,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六。

⑧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序》。

⑨ 张宗厚,生平未详,据出土志石可知,咸通四年(863)见任右威卫长史,六年(865)泗州司马,七年(866)凉王府谘议参军。史有记张宗厚者,幽州节度使张弘靖从事,为一轻悦之人,《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张弘靖传》有记长庆元年(821)七月甲寅,因幽州军乱,囚张弘靖,"执韦雍、张宗厚辈数人,皆杀之"。咸通上距长庆有四十年之多,其非同一人者,盖甚明矣。

第八章

唐代书法的域外传播

第一节

日　本

唐代书法，随着李唐王朝邦交活动和民间往来的开展，渐播域外。其中日本得其“遣唐使”之助，三百年间书法发展尤见迅疾，范围亦十分广大。

日本，唐时称倭国，史记：“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①。其“遣唐使”始于贞观四年即舒明天皇二年（630）八月犬上三田耜，迄于乾宁元年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九月菅原道真，前后凡二十次②，入唐人数包括押使、执节使和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以及史生、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东师、画师等各色人物，还有随团而来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人统计总共有五千余人③。

遣唐使团中除了专职配置善书的史生，“掌缮写公文、行署文案”④负责文书抄写工作外，其四等官如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也大都通晓经史、擅长文艺、更

有善书如石上宅嗣、布势清真之类，尤其后者，唐人称作真人兴能，以善书见称于《新唐书》，材料出自《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七《外臣·技术》条："倭国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兴能自明州路奉表献方物，风调甚高，善书翰。"陶谷《清异录》卷下记得更为具体，其云：

> 建中元年(780)日本使真人兴能来朝，善书札，有译者乞得章草两幅，皆《文选》中诗。沙苑杨履，显德中(954—960)为翰林编排官，言译者乃远祖，出两幅示予，笔法有晋人标韵。

遣唐使团在唐备受中土士人包括皇帝的礼遇，其移植汉文化也甚注重，且颇见贡献，如多治比县守将所得赏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⑤。惟遣唐使团居留时间短暂，一般只有一年左右，不及留学生和学问僧往往一住数年，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老死客地，魂留唐土。所以，大凡汉文化的移植，尤其书法艺术的吸收或东渡，则全凭藉着留学生和学问僧的努力。

入国问俗，随乡入乡。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着逗留时间的长短，其生活起居，不同程度地有所改变，有的还直仿中土，一改旧习，著名的阿倍仲麻吕，便是一例。

阿倍仲麻吕（约 698—770），汉名晁衡，一作朝衡，字巨卿，开元五年(717)三月随多治比县守来唐，入国子监太学读书，学成，留唐任东宫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其后"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⑥。在唐时知遇于京兆尹崔日用，又与名才士李白、王维、包佶、储光羲、魏万、赵骅等人相友善，并有歌行志其事。大历五年(770)正月卒于长安，享年七十三岁，赠潞州大都督。

当年与阿倍仲麻吕同船来唐的留学生还有吉备真备（约 693—775），后来也是声名卓著，为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源光国《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三称："学生播名于唐者，惟真备与阿倍仲麻

吕二人而已。”天宝十一载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闰三月当其以副使身份随遣唐使藤原清河再次来唐时，便受到唐玄宗的隆重款待，为日本使者取得极高的荣誉。唐玄宗在元旦日召见于大明宫含元殿，并盛加称赞，有云：“闻日本国有贤君，今见使者趋揖自异，礼义国之称，洵不诬也。”⑦还特命其旧友当时留唐任秘书监的晁卿导游大明宫的府库和三教殿，又令宫廷画师画藤原清河、吉备真备之像，纳于“蓄藏”。其著名的《送日本使》五言诗：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即是在吉备真备偕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归国辞别之时唐玄宗为之所写的壮行诗。同时，唐玄宗还御派了鸿胪寺卿蒋桃椀陪送到扬州，而这次遣唐使的扬州之行，尤其对延光寺的访谒，促成了唐僧鉴真和尚的顺利东渡；又正是鉴真和尚的东渡，遂为日本首次引进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以及王献之的法书（三通）。

留学生中以研习书法而著名的当首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即日桓武延历二十三年（804）随遣唐使藤原高野麻吕来唐而且与学问僧空海同船的橘逸势(？—842)。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日本书法》引《杂家言》有记：

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

橘秀才在唐留居近二年，偕空海交游于唐士儒、佛人士，归国后以书法名世，与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为“三笔”。

至于学问僧，以日本平安朝的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

8-1.1 最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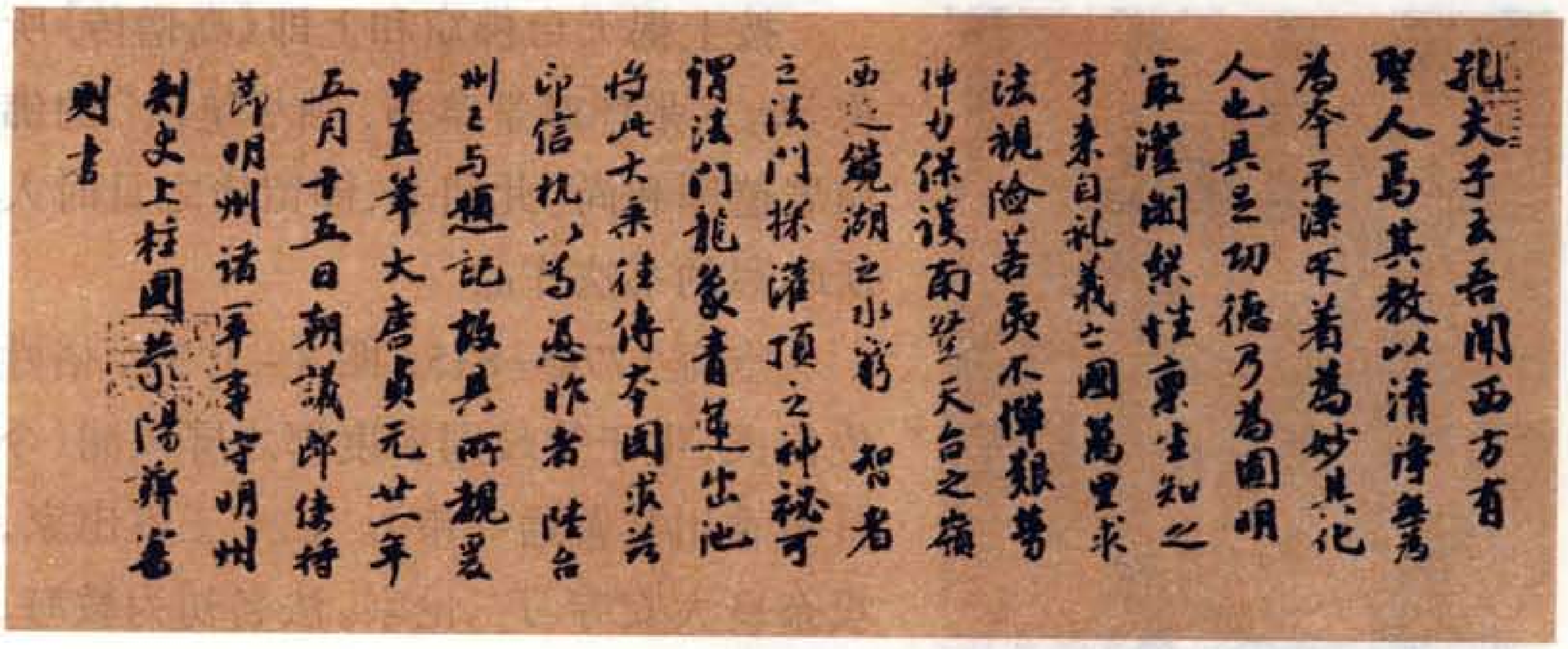
仁、惠运、圆珍、空睿最为著名，而传播唐土书法则数最澄、空海贡献最大。

最澄(767—822，图 8-1.1)，生于近江国（今日本滋贺郡古市乡），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年十二，入近江国分寺，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出家，法名最澄。十九岁受戒于东大寺。后入比睿山寺，抄写鉴真和尚带来的经典，研习天台教义，三十八岁即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日桓武延历二十三年(804)以学问僧的身份，随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渡海而来，七月九日自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习天台宗(见郑审则《印记》，图 8-1.2)。后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密教。回国后上表请增设天台宗以及在比睿山设戒坛院，未及果，于弘仁十三年即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去世。其后嵯峨天皇赐延历寺敕额，清和天皇敕许设戒坛院，并追赐传教大师谥号。

最澄在华，善结良缘，广事交游，当其归国之际，天台儒释如行满、吴顗等人莫不“酌新茗以饯行，对春风以送远”，作诗以壮行，吴顗有《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诗序》志其天台交游事：

> 日本沙门最澄……以贞元二十年（804）九月二十六日臻于海郡，谒太守陆公(淳)，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锭……陆公精孔门之奥旨……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师译言请贷金贸纸，用以书天台止观。陆公从之，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愈月而毕。邃公亦开宗指审焉[8]。

最澄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即日桓武延历二十四年(805)六月归国时，



8－1.2 郑审则《印记》

不仅携去经疏等230部、460卷及佛画、佛具等物，同时还收有书法名品拓本和名僧墨迹17件：

《赵模千字文》(大唐石拓)；

《真草千字文》(大唐石拓)；

《台州龙兴寺碑》(大唐石拓)；

《王羲之十八帖》(大唐石拓)；

《欧阳询书法》(大唐石拓二枚)；

《褚遂良集》一枚(大唐石拓)；

《梁武帝评书》(此间书)；

《两书本》一卷(此间书)；

《古文千字文》(此间书)；

《大唐圣教序》(大唐石拓)；

《天后圣教序》(大唐石拓)；

《润州牛头山第六祖师碑》(大唐石拓)；

《开元神武皇帝书法》(《鹡鸰颂》,大唐石拓)；

《王献之书法》(大唐石拓)；

《安西内出碑》(大唐石拓)；

《天台佛窟和上书法》一枚(真迹)；

《真草文》一卷(此间书)。

8－1.3 空海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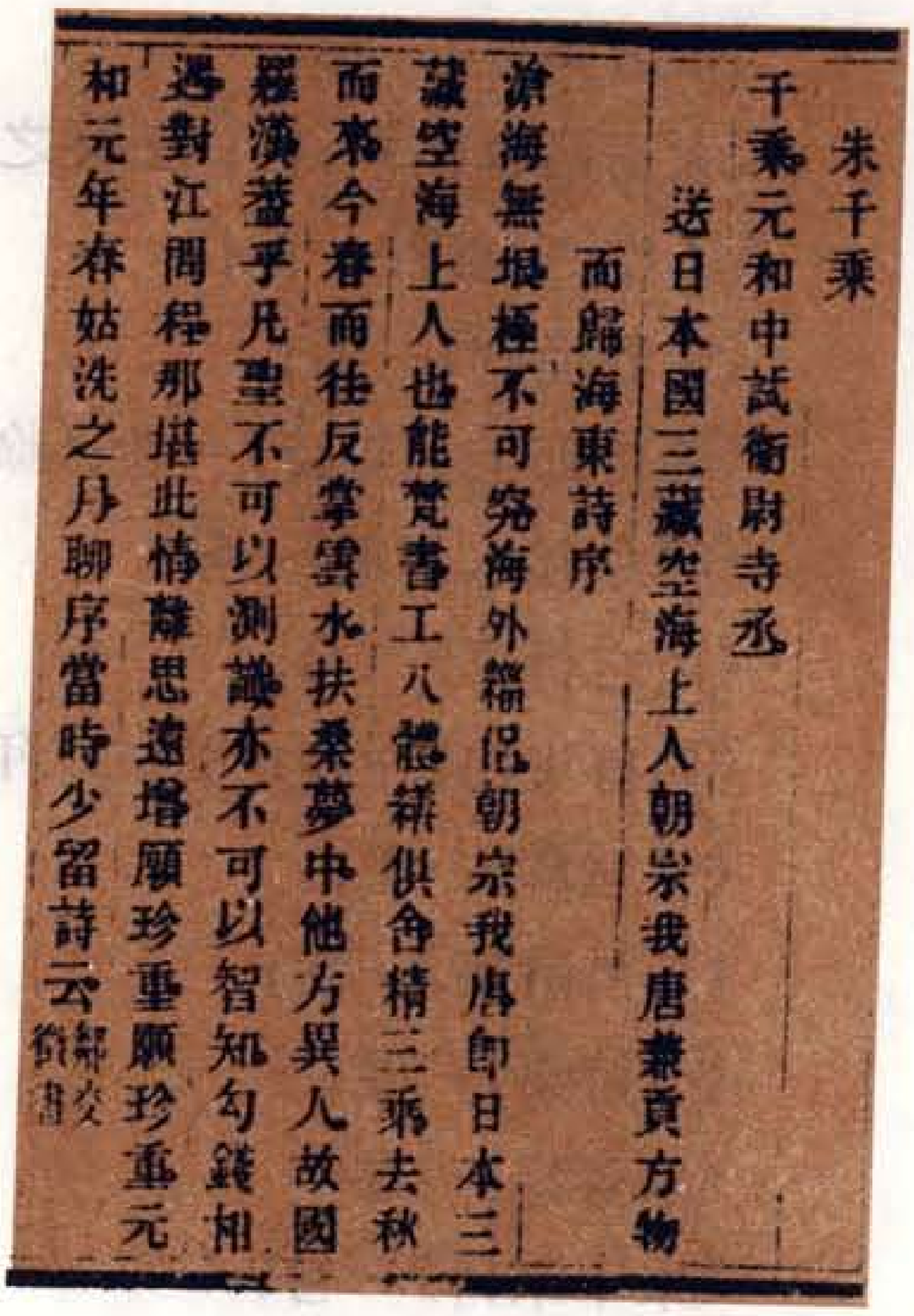
按上揭天台佛窟和上即《高僧传》所称“始从张怀瓘学草书，独尽笔法”的佛窟岩遗则和尚。此间书，即留唐之日时人所临写的书法作品。

空海（774—835，图 8－1.3），俗姓佐伯氏，生于赞岐国多度郡之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二十三岁出家，投奈良大安寺习三论宗。法名初为教海、如空、无空，后改空海。贞元二十年（804）偕最澄入唐，至长安，从青龙寺惠果学密教，号“遍照金刚”。又从天竺僧般若习梵文。回国后弘布秘密法门，开日本真言一宗。承和二年即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去世。醍醐天皇赐谥曰弘法大师。

空海在华，除留心经卷之外，还着意艺文，交游亦多为诗人。所作《在唐日赠剑南僧惟上离合诗》，曾见赏于泉州别驾马总，其《赠日本僧空海离合诗》有“何乃万里来，可非衒其才。增学助元机，士人如子稀”之赞。空海之才能，亦备受到唐土士大夫的称述，如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以为：“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留学幽微旨，云关护法崇。”其序又云，“能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盖乎凡圣不可以测识，亦不可以智知。”（图 8－1.4）至于书法，尤其草书，更为儒、释所惊叹，其中，毗陵子胡伯崇直喻之盛唐名书家张旭，有《赠释空海歌》云：“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日本书法》引《杂家言》所记尤见详尽：

> 又有当时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及扇书。扇书者，在行草之间，取疾速意。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敕补唐官壁上字。所传执笔法腕法，有：一、枕腕（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

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


朱千乘
千乘元和中試衛尉寺丞
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
而歸海東詩序
滄海無垠極不可窮海外籍侶朝宗我唐即日本三
藏空海上人也能梵書工八體繕俱舍精三乘去秋
而來今春而往反掌雲水扶桑夢中他方異人故國
羅漢蓋乎凡聖不可以測識亦不可以智知勾錢相
遇對江問程那堪此情離思遠增願珍重願珍重元
和元年春姑洗之月聊序當時少留詩云 鄰交 贈書

8-1.4 朱千乘 《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

韩方明为中唐著名书论家，其《授笔要说》记有五种执笔法。空海之有称“五笔和尚”[9]，或得韩方明之真传，尤善其五种执笔。《性灵集》卷二收有空海为恩师龙兴寺惠果和尚所立颂德之碑，首题“日本国学法弟子苾刍空海撰文并书”，显然出自拓本，其善用悬腕铭石，当也是事实。据其《献狸毛笔表》所说，他还善于制笔，有真书、行书、草书、写书、拓书、临书以及隶书小字等几款式样，且“自家试看，新作者不减唐家”。沈寐叟所记，盖有所据。以其一介入唐之日僧，能得唐朝君王赏识而命其题补内廷壁上（屏风）之字，其声誉亦自可想知。

学问僧来华摄取唐文化，留意处与其修养有关。正因为空海入唐前具有较高的诗文、书法造诣，所以他在研习密宗的同时，大量收集诗文和名家书迹，其中书法尤以真迹居多，书体也众。其《性灵集》所记呈献于日本嵯峨天皇的有唐名篇或名书家之真迹，可见者便有：

《刘希夷集》四卷；

《王昌龄诗格》一卷；

《贞元英杰》三卷[10]；

《飞白书》一卷；[弘仁二年(811)六月二十六日献]

《德宗皇帝真迹》一首；

《欧阳询真迹》一首；

《张谊真迹》一卷；

《大王诸舍帖》一首；(王羲之)

《不空三藏碑》一首；

《岸和尚碑》一铺；

《徐侍郎宝林寺诗》一卷；(徐浩)

《释令起八分书》一帖；

《谓之行草》一卷；

《鸟兽飞白》一卷；(弘仁二年八月献)

《急就章》一卷；

《王昌龄集》一卷；

《杂诗集》一卷；

《朱昼集》一卷；

《朱千乘诗》一卷；

《杂文》一卷；

《王智章诗》一卷，赞一卷；

《诏敕》一卷；

《译经图记》一卷；(弘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献)

《梵文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

《古今文字赞》三卷；

《古今篆隶文体》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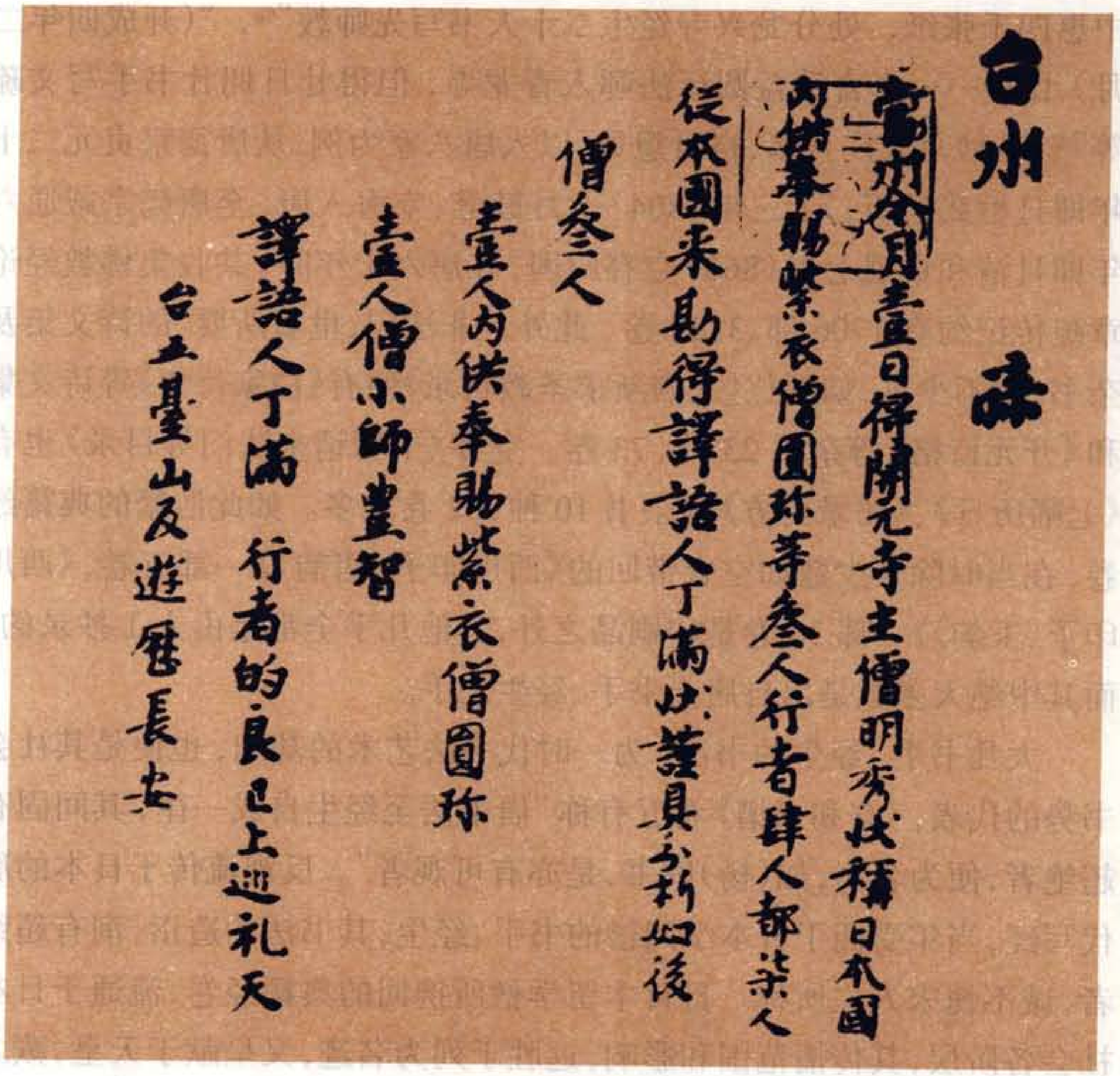
《梁武帝草书评》一卷；

《王右军兰亭碑》一卷；

《昙一律师碑铭》一卷；(草书，弘仁五年闰七月二十八日献)

《李邕真迹屏风》一帖。

按《不空三藏碑》，即徐浩建中二年(781)正书严郢《不空和尚碑》；《岸和尚碑》，岸和尚即会稽龙兴寺道岸律师，鉴真曾从其受菩萨戒，开元五年(717)八月十日卒，碑文出自礼部侍郎姚奕；《昙一律师碑》，昙一即会稽开元寺僧，碑文系徐浩大历十一年(776)所撰。以上三和尚之碑



8－1.5 《台州日僧圆珍团牒》

与《王右军兰亭碑(兰亭序)》,盖并出中唐拓本。其他,当系真迹,或为手抄本。

此外,由唐宣宗大中七年即日文德仁寿三年(853)入唐至大中十二年即日天安二年(858)辞归的空海侄子智证大师圆珍(814—891)也携去了数种杂碑铭文(见图 8－1.5)。

正是由于学问僧的不懈努力,唐代书法名家之名迹东渡扶桑,遂促进并影响了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

同时,入唐学问僧不仅自己收集抄录,而且还大量佣用当地的书手、经生抄录典籍经卷,如最澄"(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台州陆郎

中惠四千张纸，处分龙兴寺经生二十人书写先师教”⑪，“（开成四年二月）廿日……真言请益圆行法师入青龙寺，但得廿日佣廿书手写文疏等”⑫。其抄写之广且多，自可想见，以入唐八家为例，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即日桓武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最澄、空海入唐，至唐懿宗咸通六年即日清和贞观七年（865）空睿归国，在唐六十年间，共收集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约有 1706 部、3225 卷。此外，“非法门，世者所要”的诗文集及杂书，也不少见，如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便有《白家诗集》等诗文集和《开元诗格》等杂书 23 种、73 卷。空睿《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也有《七曜历日》、《秘录药方》等杂书 10 种、62 卷之多。如此浩繁的典籍经卷，在当时除了少数如空睿带回的《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韵〉》一部 30 卷是印刷品之外，其他几乎全都是由人工抄录的。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出自唐土书手、经生之手。

大凡书手、经生的书法，为一时代书法艺术的基础，也便是其社会书势的代表，《宣和书谱》卷五有称“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杨）庭书，是亦有可观者”。反观流传于日本的唐代写经，当年受佣于日本学问僧的书手、经生，其书法的造诣，洵有超绝者，诚不愧宋人之所称。且日本留学僧所携回的典籍经卷，流通于日本社会各阶层，其传播范围和影响，远胜于列为名迹，又呈献于天皇，藏之于内宫的诸如王羲之、欧阳询之法书。正是由于凭藉典籍经卷而流入日本的经生、书手的书法艺术，它的社会作用远胜于王、欧诸名迹，遂促进了中唐书法对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或者可以说，唐代的书法，尤其是中唐社会书势，其所以能传播域外，大都是凭藉由经生、书手所抄录之典籍经卷，而其东渡扶桑则依靠了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的种种努力。

经生、书手的书法，多属应用性，其传播日本，纯出无意识。而最澄、空海所携回的大部分书迹，虽然是拓片，但出自名家，代表着唐代的艺术水平。它的汲取，可以说是有意识的。日本的书法艺术，正是在有意、无意中承受着大唐书法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当然，日本的书法也曾传播于中土，同样也影响了唐代书法艺术的

发展。日释一乘忠《睿山大师传》记最澄入唐时，皇太子（后为平城天皇）曾托带经卷供养于天台山之事。其说：

> 春宫殿下择好书之上（手），书写《法华》《无量义》《普贤观》等大乘经三部二通。即以一通附送大唐，和上坚持，渡海入唐，安置天台山修禅寺一切经藏。

最澄同时带来供养于天台山的，还有《屈十大疏》十卷、《本国大德诤论》二卷[13]，这些日本善书手所抄录的经卷，它的书法也必然无意地影响着潜心研习的天台宗高僧和恭敬谨录的唐土经生。

唐代文化的东渡传播，不仅直接影响日本，如大学中所设“籀篆”一通，便是直仿唐朝书学，内容也兼及文字和书法两门专业。其他书师、装潢、校生等职务的设置，也是出于抄写典籍的需要从唐土引进的。至于吉备真备和空海回国后，整理日本文字，分别利用汉字书法中楷书点画和草书偏旁，制造片假名、平假名，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影响更是深远。而且，由于中土社会书势以及名家书迹的传播，也导致平安朝初期书坛弥漫着盛烈的唐风。日本虎关师练所汇编的《异制庭训往来》曾记录当年情境：

> 夫诸家笔法，汉朝达者，和国俊才，恰若芝兰逞芳，锦绣耀彩也……本朝延历、大同之昔者，和汉同其芳躅。

延历、大同为平安朝桓武天皇、平城天皇纪年，“和汉同其芳躅”，盖言是时书坛竞以唐风为师模。其代表人物即是日本书道史上著名的“三笔”——空海、橘逸势和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生平已见上述。其书法代表作，空海有《风信帖》《三十帖策子》《灌顶记》《大日经》四通，尤以《风信》《灌顶》著名。理论著作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以及《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橘逸势，传有《伊都内亲王愿文》一通。至于嵯峨天皇（786—

842)乃日本第五十二代天皇,讳神野,桓武天皇第二子,与空海并称“书圣”。空海从唐土携回的诗文和名迹,便是呈献于他的。代表作有《光定戒牒》和《李峤百咏》。以《李峤百咏》结体、用笔俨然出自欧阳询而论,乃与最澄(代表作有《久隔帖》,甚似《圣教序》)、空海一样,亦甚重唐之名迹,其所心仪手追者,盖乎惟唐风是从。

第二节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隋唐之际,分高丽、百济、新罗三国,至初唐高丽、百济相继而亡,新罗遂一统半岛,且日见强盛。新罗诗人崔致远曾记朝鲜半岛三国与唐朝的关系,他在《上太师侍中状》中说:“伏闻东海之外有三国,其名马韩、卞韩、辰韩。马韩则高句丽(高丽),卞韩则百济,辰韩则新罗也。高句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挠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我武烈大王,请以犬马之诚,助定一方之难,入唐朝谒,自此而始……至今三百馀年,一方无事,沧海晏然。”[14]新罗,因唐朝助其讨平高句丽、百济,一统三韩,不仅邦交和睦,其文物制度,也极力模仿唐风,奉唐历,行唐礼,衣唐服,几同出中土。唐朝对新罗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唐代有关书法的传播,见诸史书者,始于初唐:

高丽甚重其(欧阳询)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15]

(贞观)二十二年(648),真德(乐浪郡王)遣其弟相国、伊赞子金春秋(即后之武烈王)及其子文正来朝……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16]。

按《温汤》即《温泉铭》，唐太宗撰并行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十七日；《晋祠碑》，即《晋祠铭》，唐太宗撰并行书，贞观二十一年(647)七月立石。新罗王所遣其相春秋来朝，时在贞观二十二年(648)闰十二月七日，见《旧唐书》卷三《太宗纪》。唐太宗所赐《温泉》《晋祠》两铭，当和《晋书》一书，并出御上新制。《晋祠》以碑称之，盖出拓本。三韩之地世重欧阳询、唐太宗之书[17]，盖不无原由。

三韩之人来中国者甚多，贞观初年已相继遣其子弟留学于国子监。国子监时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高丽及百济、新罗诸国所遣留学生亦当有入书学者。且当时甚重书法，国子监内书学之外的诸学生徒，也规定学书，日写一幅，兼习《说文》《字林》《三苍》一类的字书，以便适应“楷书正详”的科举要求。三韩留学生例当遵从，或更见努力。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的也很多，凡登进士科者，时称“宾贡进士”，如李同、崔彦拱、崔致远等人，其中以崔致远最著名，且为高丽一代书家。

崔致远(857—?)，字海夫，号孤雲，新罗庆州梁郡部人。唐懿宗咸通九年即新罗景文王八年（868），年十二，随新罗商船入唐，“观光六年”（《进诗赋表状等集状》）遍访中土名师巨公，励志求学，于咸通十五年[十一月改乾符元年(874)]登进士科，初仕宣州溧水县尉。秩满，入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扬州幕，任都统巡官，专掌书记之职。著名的《檄黄巢书》，即出其手。四年后表请回国，唐僖宗许其以唐使者(国信使)归乡。光启元年即新罗宪安王十一年(885)三月抵至新罗，留任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后为权臣所忌，出为太山郡太守。唐昭宗景福二年即真圣女王七年(893)，自富城郡太守拜使唐贺正使，未成行。四十岁后，退居山林。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即敬顺王二年(928)，曾代高丽太祖王建作《檄甄萱书》，俄而即卒，享年七十二岁以上。谥文昌侯。有《桂苑笔耕》二十卷行世。

崔致远为三韩名书家，《石南山后记》有记：“一代三崔，金榜题回，

曰崔致远、曰崔仁涚、曰崔承祐。”[18]一代三崔，崔致远名声虽更见卓殊，而著录所见仅《新罗真鉴禅师碑》一石，正书并篆额，文亦出自其手。立石约在唐光启、文德年间(885—888)，书法出自欧阳询而见放纵。所传庆尚道尚存有“夜游岩”三大字，“双溪石门”四大字和“洗耳岩”三大字。另有《笔法》一诗，云：

见说书窗暂卧龙，神传妙诀助奇锋。
也知外国人争学，惟恨无因乞手踪。

参其下注“南朝萧子雲，善书，百济使人求手踪，以为国宝”云，按萧子雲，字景乔，晋陵人，其楷书、飞白《书断》列入妙品，且立传称：“创造小篆飞白……妍妙至极，难与比肩。其真书少师子敬，晚学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其飞白，后传欧阳询，崔氏隐喻萧子雲者，不独见其自重，亦可知其书法之追慕。

崔仁涚，致远从弟，亦出身辰韩茂族，著录可见有正书《新罗朗慧和尚塔铭》(崔致远撰，唐昭宗时立石)，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卷二有称：“文笔亦典赡风华，海东碑之最可宝贵也。”另有《新罗真镜大师塔铭》篆额(新罗景明王朴升英撰，释幸期正书。龙德四年四月一日立石)，其正、篆并擅，盖亦一博涉多优者。

崔致远之外，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尚有金仁问和金生两位。

金仁问(？—694)，新罗太宗武烈王金春秋次子，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兼涉庄老、浮图之说。自二十三岁始，七入唐廷宿卫，凡二十二年。曾从唐王朝讨平百济、高勾丽，一统三韩之地。在唐授辅国大将军、上柱国、临海郡开国公，左羽林大将军。延载元年(694)四月卒于唐，武后命司礼寺陆元景送柩归乡，新罗王追赠为大角干。《朝鲜史略》卷二称其“工隶书”。著名的《新罗太宗武烈王陵碑》便是他的代表作，今尚存其额“太宗武烈大王之碑”篆书八字。

金生(711—？)，字知端，新罗昭圣王即唐德宗时代人，出身低微，不

知世系。好佛，隐居不仕。平生不攻他艺，唯书为业，年逾 80 犹操笔不休。《朝鲜史略》卷三称他“隶、行、草入神”，并注引：“高丽洪灌入宋，以金生行草示翰林杨球、李革二人，曰：‘天下除右军，焉有妙笔如此哉。’赵孟頫跋金生《昌林寺碑》曰：‘字画深有典刑，虽唐人名刻，未能远过之。’”金生来唐与否，虽无明记，然以上引所评，其书盖出有唐二王一路，且甚见高明。他的书法影响很大，后梁贞明三年即新罗神德王六年(917)十一月所立崔仁渷《新罗朗空大师塔铭》即出自释端目所集金生之书铭石的。金生的书法，存世不多，著录所见唯全罗道万德山白莲社大字额一通和《庐山瀑布诗》《田游岩山家序》诸帖。

与金生同时的东溪沙门灵业，书品相伯仲，有誉“擅倚天之笔”。存世有行书《新罗神行禅师碑》，金献贞撰，元和八年即新罗宪德王三年(813)九月九日立石，书法亦出自二王。

至于《新罗鏊藏寺碑》《高丽麟角寺碑》，号称“俱集晋王右军行书，颇具典型”⑲，可见二王法帖传播三韩之多。唐僖宗中和四年即新罗宪康王九年(884)九月九日所立金颖《新罗普照禅师塔铭》，武州昆湄县令金蕴和殿中大监金彦卿(第七行禅字以下)合书，形质甚近二王。其虽非名书家，而风貌如是，亦可知二王书法影响三韩之广且深。

---

①⑤⑥⑯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传》。

②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十九次，今从王勇·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人物卷》。

③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人物卷》第三章记 5200 人左右。

④ 《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第二章《遣唐使》注引《职员令》。

⑦ 《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第二章《遣唐使》条引《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卷三。

⑧ 《唐文续拾》卷五。

⑨ 五笔和尚之称，首见圆珍《请弘传两宗官牒案》：“寺主僧惠灌，借问五笔和尚在无。圆珍语知此大僧正空海大法师，便答亡化。惠灌槌胸悲慕，称叹异艺，未曾有伦。”

⑩ 原注：文是秀逸之文，书则褚临王之遗体也。

⑪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注引日本《天台法华宗传法偈》。

⑫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⑬ [日]最澄《传教大师全集》卷一《显戒论缘起》。

⑭ 《唐文拾遗》卷四十三。

⑮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

⑰ 后晋天福五年(940)七月崔光允曾集文皇书以铭高丽太祖王建所撰《晋兴法寺忠湛大师碑》。

⑱ (清)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卷二引。

⑲ (清)刘喜海《海东金石苑题辞》注。

第九章

五代杨凝式及其他书家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一作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或出郡望。唐哀帝相杨涉之子。自号癸巳人、杨虚白、希维居士、关西老农。因其后汉时任职太子少师,又称曰"杨少师"。又因佯狂,时人称之"杨风子"。天祐二年(905)登进士第,解褐度支巡官,迁秘书郎,直史馆。后历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官至左仆射,太子太保,显德元年(954)冬日卒于任上,赠太子太傅。杨凝式形貌寝陋,不能远视,但率性狂放,不拘小节,又以诗书寄情,吏隐如愚,不独《题壁》似有退居岩穴之志,"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题怀素酒狂帖后》更是悟得闲逸之所发,"十年挥素学临池,始识王公学卫非。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终于历五代之更易,以智自完。且性聪颖,博览经籍,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尤以善书名高五代而声继三唐,遂为一时之杰出者。是时,释门与道家对其更

见景仰，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记：

> 杨少师凝式……能文工书，其笔力健，自成一家体……在洛多游僧寺道观，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僧道等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出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游客睹之，无不叹赏。故冯瀛王次子少吉尝于寺壁留题曰："少师真迹满僧居，只恐锺、王也不如。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进士安鸿渐题云："端溪石砚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书札，人间无此五般高。"

五代之季，干戈繁多，杨凝式虽佯狂避世，以书写意，然已不允其从容铭石而碑版四裔，故存世者大多为题名与手札，几乎不见有一石著录。宋代内府曾收有草书《古意帖》和行书《韭花帖》《乞花帖》三通。此外，宋贤所见虽大都为寺院题壁，然评述特高，苏轼以为自颜真卿、柳公权没世以来，笔法衰绝，加上唐末的丧乱，人物凋落，至五代文采风流已经扫地殆尽，惟独杨凝式其人，"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馀，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十说得具体，有称："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②又说"世以凝式行书，颇类颜鲁公，故谓之颜杨云"。至于黄庭坚更为推崇，以为当时洛阳僧壁杨凝式题字为旷世绝艺，不仅有"无一字不造微入妙。此书盖当与吴生（道子）画为洛中二绝"③云，而且还认为即使追寻自晋以来五百年间书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后书法超逸绝尘者，也惟颜真卿和杨凝式二人，他说："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王献之）。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④又题诗以志之：

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
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按张世南、邵伯温，不见有善书之名，或其不尽能解书意；苏轼壮岁学颜、杨之书，是评或有“偏誉于所嗜”之嫌；黄庭坚乃东坡门生，其颂述颜、杨之书，亦似有逢迎之疑；宋人论杨凝式书者，惟《宣和书谱》卷十九评其手札之所谓“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云，盖见平允。纵观五代行草，风骨既乏，品格更俗，尤其中州之地，几近凋零。张洎《贾氏谭录》有记：“中土士人平常札翰，多为院体。院体者，贞元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尝工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徒尤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则又甚矣。”杨凝式其不染时习，且能崇尚雄逸，追仿晋唐诸贤如是，乃其过人之处。有过人之处，自当有过人之量，然后方可独行其是而不为流俗所囿者，诚然不诬矣！

杨凝式书法，世人多重其行草，其实楷书亦甚见深工，邵伯温尝见之，其《邵氏闻见录》卷十六有记：“其书法自颜、柳以入二王之妙……近岁刘寿臣为留台，于故案牍中得少师自书假牒十数纸，皆楷法精绝，世论少师书以行草为长，误矣。”世论“行草为长”者，盖不见其楷书矣。

存世可见杨凝式书迹仅《韭花帖》《夏热帖》和《神仙起居法》三通。

《韭花帖》（图 9.1），即宣和内府藏本之仅存者，风度凝远，萧散有致，直追晋唐气韵，宜其黄庭坚特有“下笔便到乌丝栏”之评。《夏热帖》，沉著而不失潇洒；《神仙起居法》（图 9.2），欹侧而寓谨严，并如刘熙载《书概》所言：“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此即所谓笔迹雄杰者，自与《韭花帖》迥异，或为杨凝式早期之风范。

近年洛阳出土杨凝式所撰墓志三石：《李德休志》，长兴三年（932）

9.1 杨凝式 《韭花帖》(局部)

9.2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正月三日入窆，原武县主簿李光愿正书并篆盖；《张季澄志》，清泰三年(936)二月十三日入窆，河阳随使押衙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郭兴正书，度支巡官张季鸾篆盖；《张继昇志》，天福四年(939)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窆，妫州录事参军刘珙正书。杨凝式以善书称一时之绝，而墓志属书于李光愿、郭兴、刘珙及张季鸾诸人，即使刘珙为张继昇门吏，张季鸾为张季澄之弟，当亦为一善书者，况且诸石书法，并见端严劲拔，《张季澄志》之爽朗，《张继昇志》之凝重，《李德休志》更是精正可喜，皆不失为五代志石之佳者，宜其书写杨凝式之文而并称于后世也。

五代书家为后世称述者，杨凝式之外，尚有王文秉，李鄂以及贯休三人。

王文秉，丹阳(今属江苏)人，出身江南刻石世家，南唐时见任左千牛卫兵曹参军。以小篆名世，李日华《紫桃轩又缀》有记："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号王逸老，欲与逸少相抗。"宋季有《小篆千字文》(建隆元年)、《紫阳石磬铭》(张献撰，亦小篆书，建隆二年)二石存世，欧阳修曾亲见之，并加推重，其《集古录跋尾》有谓"其笔甚精劲"，见卷十《徐铉双溪院记》条。又说："小篆自李阳冰后，未见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画之精，远过徐铉，而朝中之士，不知文秉，但称徐常侍者，铉以文章有重名于当时故也……五代干戈之际，士文艺有至于斯者，太平之世学者可不勉哉。"⑤

李鹗，后唐四门博士，官至国子丞，以楷书名，宋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其《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正书一石，清泰三年(936)八月立石，李棁撰，其卷三十《跋尾》有称："《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余后得此记，其笔法盖出于欧阳率更，然窘于法度而韵不能高古，非名笔也。"参阅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四月敕，其有《九经》"宜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谨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⑥云，及其所写监本《五经》与《论语》《孝经》《尔雅》四书，可知李鄂盖为当时国子监特召之"能书"人，其所"谨楷"之书，自以楷正是敬，岂敢有一私意气加以注泄。其书，虽见平俗，然所写欧体，殆为后世印刷宋体之滥觞，厥功不当抹煞。

贯休(832—912),俗姓姜氏,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七岁出家于本乡和安寺。二十岁受具足戒,移住本州诸暨五泄山寺,修禅十年。后杖锡周游,先后客居洪、常、杭、荆四州。居杭州灵隐寺时,曾受吴越王钱镠礼遇,天复三年(903)入蜀,为前蜀高祖王建所重,赐号"禅月大师",为之建造龙华院居之。永平二年即梁乾化二年(912)十二月卒于院内,年八十一。次年三月十七日葬于成都北门,置塔,谥曰白莲之塔。有诗名,当时名诗人陈陶、方干、李频、许棠、张为、曹松、吴融、王贞白、韦庄、罗隐、罗邺、齐己等,并为友善,皆有唱酬。贯休擅画,尤以罗汉像见称于世,人视其画迹莫不珍若拱璧。书法以善草书而争鸣于时,或比诸怀素,更为释门所重,有"能草圣"之誉,赞宁《高僧传》卷三十《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记:"(贯)休书迹,好事者传号曰'姜体'是也。"北宋宣和朝内府所藏书迹尚多,记有草书《常侍帖》及《千字文》(六通)和行书《梦游仙诗》,凡八帖。《宣和书谱》卷十九称"作字尤奇崛,至草书益胜,崭峻之状,可以想见其人。喜书《千文》,世多传其本。虽不可以比迹智永,要自不凡"云。有论书诗《观怀素草书歌》,亟颂怀素草书之雄逸。

至于同时名书家徐铉,仕于南唐;王著,举于后蜀;郭忠恕,曾为后周书学博士,惟其显赫于宋代,"晋才楚用",虽堪可称述,实难归之于本篇矣。

---

①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② 《旧五代史》本传引《别传》同,或本是。

③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王羲之诸家书》。

④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法帖》。

⑤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王文秉紫阳石磬铭》。

⑥ 《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学校部·刊校》。

第十章

唐五代的书法理论

王羲之书法，自从唐太宗倡导以来，经重臣如虞世南、褚遂良辈希旨张扬，贞观年间渐见风靡，庶几乎独尊天下。然亦有不明睿意，仍沿用陈言者，如房玄龄、刘洎之赞太宗“笔迈锺、张”①，“锺、张何阶于入室”②。显庆三年(658)，李义府为兰陵公主作颂，也称“□岁学书，尽锺、张之妙迹”③。《唐朝叙书录》记许圉师龙朔年间评高宗书有“圉师见古迹多矣，魏晋以后，惟称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观圣迹，兼绝二王。凤翥鸾回，实古今书圣也”云，此称谀之词，虽属轻薄，亦可见高宗朝崇王之风已见减弱。至武后朝，有怀仁集王右军之书铭石为《圣教序》，立在京师，士类景从，莫不临习追仿之，惟书法理论已不见有贞观之推重。孙虔礼《书谱序》虽仍遵循名教，有“子不及父”之说，但其锺繇、张芝、王羲之并论，且谓“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者，盖已非独尊之意。同时李嗣真《书品后》，更见修正，不特有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

一反“子不及父”之传统名言，且又以“逸少加减太过，朱粉无设”，而改易唐太宗“尽善尽美”之评。至开元年间，唐玄宗锐意隶书，尚古崇丰，张怀瓘《书断》有“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之称，又直讥右军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又评曰，“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锽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④此乃有唐一代崇王论说之演进，虽未可言“淳醨一迁，质文三变”，也可见其“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者也。

第一节

初唐崇王论

1. 孙过庭及其《书谱序》

孙过庭（约646—690），名虔礼，以字行，陈留（今河南开封）人，郡望出自富阳。历右卫胄曹，官至率府录事。天授元年（690）暴卒于洛阳，年约四十四。与书家王绍宗、名才士陈子昂相友善。当其卒后，陈子昂有《祭率府孙录事文》奠之，且撰墓志铭颂述之，有云：

> 呜呼！君讳虔礼，字过庭，有唐之不遇人也。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得禄值凶孽之灾（此句疑有脱漏，意为□□得禄，值凶孽之灾）；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堙厄贫病，契阔良时，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生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将期老有所述，死而不朽。宠荣之事，于我何有哉！志竟不遂。

是知孙氏中年遭谗，终身蒙冤，以致寄意老庄，病居江湖，最后夭折客

乡，嗣子孤贫。然以书咄咄逼古人，且有书论遗世，遂名高一代，声播千古。不独友人陈子昂有“元常之殁，墨妙不传，君子逸翰，旷代同仙”⑤之颂，开元年间书论家张怀瓘《书断》亦有称：“博雅有文章，草书宪草(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书，亚于草矣……隶、行、草入能品。”唐末吕总《续书评》其评有唐草书十二人，列张旭为第一，孙氏第二，并说：“孙过庭书，丹崖绝壑，笔势坚劲。”至宋，尤见推崇，米芾《书史》“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云，已见张扬，有超过欧、虞之意，《宣和书谱》卷十八所谓，孙氏“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辨。文皇(疑为文宗之讹)尝谓过庭小字，书乱二王，盖其似真可知也……然落笔喜急速，议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趣也”，更是特许其为二王之再出。然而当时评语亦有乖分。窦臮是乾元年间的书法评论家，其《述书赋》肆意讥弹前朝书家，甚轻孙氏之书，认为“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纵览孙氏《书谱序》墨迹，张氏所评，并非夸饰。后人或合张、窦二家之说而折衷之。至明、清则多从张氏，遂不见有过贬之词。

《书谱序》即存世《书谱》卷上序言，旧称《书谱》。《书断》曾称：“(孙虔礼)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指趣。”所引“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羲、献兼之”即其序中语。《宣和书谱》沿称《运笔论》，谓其“字逾数千，妙有作字之旨，学者宗以为法”。其说与传世的卷上情形相类。由此可见，张氏、宣和所称之《运笔论》，内容大抵与《书谱序》相同，或系其中一段，或为是卷易名。今观《书谱序》，骈风森然，其遣词运语，甚为讲究，斟文酌句，更见认真，显然非一时稿草之作。意以为作者随而授之，粗举纲要，又经反复传抄，私下流传，致使内容文字有所增删，文章名称亦因而更易。《书断》《宣和书谱》所见为《运笔论》；日僧空海所临为《书谱》。张氏引文“逸少兼之”讹为“羲献兼之”；空海传录本

则大有盈语，竟多“草无点画，不扬魁岸；真无使转，都乏神明。真势促而易从，草体赊而难就”六句二十八字⑥。

《书谱序》文思缜密，言简意赅，多见真知灼见，诸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之说，以为：

> 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又如真、草两体的辩证关系：

>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无点画，不扬魁岸；真无使转，都乏神明。真势促而易从，草体赊而难就。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

其他如学书三步骤：“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即《书断》所谓“得书之指趣”者以及去繁除滥，改革书风，“贵使文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下笔无滞”的理论主张，至今仍为学者所仰重。

《书谱序》的艺术主张，如区理古今、妍质、点画、使转、真草以及点画与使转、形质与情性的相互关系和运用方圆、反正、顿挫、起伏、曲直、迟速的辩证手法，虽然大多出自老庄哲学，但对于书学功用的理解，还是基于儒家思想，不独以为“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波澜之际，已浚发于灵台”，书法乃其意气之写照，必须立身务本以道德修养为上。而且，尤首肯其独善之乐，功愈弈、钓，有称“夫潜神对弈，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讵若功定礼乐，妙

拟神仙，犹埏埴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

“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孙过庭虽为有唐不遇之士，实亦无违于时代，即使蒙受不白、穷极无聊之日，仍冀图藉书法以“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其推崇右军及二王优劣论，尤见至诚：

>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锺、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百（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子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锺、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
> ……
>
> 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

是论，抑子扬父，包世臣以为囿于“以文皇有饿隶之诮也”⑦。其实并非体会唐太宗之睿意，而乃出之于名教，如锺繇之书，唐太宗也曾指瑕，有

“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云者，而孙过庭一无涉及，甚至以为三贤并美，各具优长。是或即出自武周朝时风之所致。

2. 李嗣真及其《书品后》

李嗣真（？—697），字承胄，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人，一作赵州柏（今河北隆尧）人，或出郡望。明经登科，乾封初年（666）补许州司功，时兰台太史贺兰敏之受诏刊正经史和著撰传记，奏引入直弘文馆参与其事。嗣真与学士刘献臣、徐昭，皆少年俊杰，有名当时，馆中号称“三少”。咸亨初（671）出为义乌令。调露中（680），改始平令，有政绩，史称“风化大行”。其后入为司礼丞，散官加至中散大夫，封爵常山县子。永昌年（689），除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天授中（691），受命巡视河东，临行，合朝作诗送行，杜审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志其事，有云：

秩比司空位，官临御史员。
雄词执刀笔，直谏罢楼船。
国有大臣器，朝加小会筵。
将行备礼乐，送别仰神仙。
……
雨霈鸿私涤，风行睿旨宣。
茕嫠访疾苦，屠钓采贞坚。
人乐逢刑措，时康洽赏延。
赐逾秦氏级，恩倍汉家钱。
拥传咸翘首，称觞竞比肩。
拜迎弥道路，舞咏溢郊廛。
……
学总八千卷，文倾三百篇。
澄清得使者，作颂有人焉。

莫以崇班阂，而云胜托捐。
伟材何磊落，陋质几翩翾。
江海宁为让，巴渝转自牵。
一闻歌圣道，助曲荷陶甄。

此即李邕喻之为“玉山桂”之千古名篇，见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邕》：“例及吾家诗，旷怀埽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杜审言以“恃才謇傲”称，而推崇嗣真如是，盖非其寻常应酬之作。李嗣真其后因奏事忤旨，出为潞州刺史。寻为酷吏来俊臣所陷，天授三年（692）正月配流岭南藤州，至万岁通天年（697）征还，归至桂阳而卒，年五十余。有诏州县护丧还乡，赠济州刺史，谥曰“昭”。中宗复辟，又赠御史大夫。新、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新唐书》卷九十一。

李嗣真多著述，撰有《明堂新礼》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8]和《古今画人名》各一卷。又以擅画见称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其为高宗朝名画师尹琳之弟子，亦以善画佛道鬼神名世。

李嗣真所著《书品》为初唐论书名篇，因先有王愔、王僧虔、袁昂、庾肩吾所撰诸《书品》，所以又称《书品后》或《书后品》。永昌年（689）作于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任上，后孙虔礼《书谱序》（垂拱三年）二年。

李嗣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有称：“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盖一道家者流，然其于书，则出儒家经世之用，归之于士人之修养包括六艺与道德。其《书品后》云：

项籍云：“书足以记姓名”，此狂夫之言也。嗟尔后生，既乏经国之才，又无干城之略，庶几勉夫斯道。近代虞秘监（世南）、欧阳银青（询）、房（玄龄）、褚（遂良）二仆射、陆学士（柬之）、王家令（知敬）、高司卫（正臣）等，亦并由此术，无所间然。其中亦有更无他技，而俯拾朱绂如此，则虽惭君子之盛烈，苟非莘野之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诚凌云之台，

拂衣碑石之际邪！

斯言与孙虔礼“义理会归”云者，同条共贯，或乃时代使之然。然而，李嗣真之于锺、张、二王优劣论，则较孙氏似见进步。

《书品后》评锺、张、二王，虽并称“旷代绝作”，然各加臧否，议之曰：“锺、张则筋骨有馀，肤肉未赡；逸少则加减太过，朱粉无设。”至于二王优劣，则一反自唐太宗以来迄至孙虔礼所谓“子敬不及逸少”的传统论说，明言：

> 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灵运（一作谢安石，似是。）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也。

评述至此，唐太宗之所谓“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枒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云云之睿旨，已一扫而空。由是可以概知，李嗣真之崇王，盖出己意，且仅止于楷、行、章草三体及飞白之书。唐太宗之崇王论自发见之后，虽时见修正，如上揭孙虔礼《书谱序》，但无视其右军独尊者，有唐书论乃首出李嗣真之《书品后》。

中国书法理论自梁武帝君臣论书以来，王僧虔评骘古今善书人；袁昂以“谢家子弟”“河洛少年”比况王氏父子等二十五人；庾肩吾又以九品品第真、草书家一百二十八人，品藻之风日见盛烈。且王僧虔录呈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自秦迄晋能书者凡六十九人为之叙次列传；虞龢记叙二王书事，并搜访名迹情形，至是，论书之著述更趋宏富，书学遂与字学分作二途。入唐则承前启后，条目日见繁衍。初唐王方庆论古今书人优劣；姚思廉集善书人名状，虽然仿拟羊欣之作，但甚见新意。至于褚遂良《右军书目》，集录真迹名目；唐太宗以战况论书，又撰《笔法》《指意》《笔意》三篇，论述用笔；虞世南《书旨述》设问答之辞来阐发书

旨，以及孙过庭《书谱序》之“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并见发明，启开有唐书学之门户。至李嗣真仿庾肩吾《书品》，分评十等，三品九等之上，又设逸品，且品后各加评赞。按其书人载自秦相李斯至并世书家王知敬凡八十二人，各有叙录，遂成为有唐书法品第之先河，后之论书者如张怀瓘、窦臮诸人，虽略见异词，亦大抵本是而出。其逸品之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也曾加仿用。

初唐名家，起先并无“四家”之说，《书品后》序言虽虞世南、欧阳询、房玄龄、褚遂良并称，然其“上下品”仅列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其云：

> 欧阳草书，难于竞爽，如旱蛟得水，毚兔走穴，笔势恨少。至于锼勒及飞白诸势，如武库矛戟，雄剑森森（欲飞）。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萧）子雲之上。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其贬抑褚遂良如此，或出武后之不喜其人，然是论多为后人所本，如《述书赋》之“恐无成如画虎，将有类于效颦。虽价重衣冠，名高内外，浇漓后学，而得无罪乎”云，诸如此不公之论，即肇启于此。至于《书断》抑欧扬虞之说，如“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之评，虽出英雄所见，并以平和为绳，然李嗣真之发明，或有启于张氏之定论。至于“初唐四家”之说，如张说《魏叔瑜碑》之“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张怀瓘《评书药石论》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为初唐“四子”；徐浩《论书》以“欧、虞为鹰隼，褚、薛为翠翟”，四人并称[9]，其成偶之说，亦皆本之于此而略加增易。其实，陆出于虞，薛出于褚，并无超迈独绝之处，初唐书家扬声腾气者，亦仅如李嗣真所评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家而已。

第二节

盛中唐书论的推进

1. 张怀瓘《书断》及其他

张怀瓘，本名怀素，玄宗敕改今名，广陵海陵（今江苏泰州）人，郡望出自范阳，晋司空张华十二世孙。其父张绍先（一作绍宗），官至邵州武岗令，卒赠宜春郡太守，韦述撰有神道碑志述之。博学工书，与高宗朝名书家高正臣友善，且书迹相近，张怀瓘于《书断》记其事："怀瓘先君与高（正臣）有旧，朝士就高乞书，冯先君书之。高曾与人书十五纸，先君戏换五纸以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张公也。'终不能辨。"又说，"有人求高书一屏幛，曰：'正臣故人在申州，书与仆类，可往求之。'先君乃与书之。"并引宋令文评书语，有"力则张胜，态则高强"之论。著有《蓬山事苑》三十卷，苏颋为之序。

张怀瓘，开元十五年（727）九月以善书自举应制，召入翰苑，为待诏，迁右率府兵曹参军，后外放为升州司马，改鄂州司马，除长史。或卒于长史任上，时在肃宗乾元（758—760）初年。

张怀瓘以善书受召，供奉于内廷，直言书道，虽有违时议，然终以书论垂世，不独名高于盛唐，而且遗泽千年，至今不废。其著述可见者，有《书断》三卷和《书估》（天宝十三载正月十八日）、《二王等书录》、《书议》（乾元元年四月）、《文字论》诸篇，并载张彦远《法书要录》[10]。又有《评书药石论》一卷（升州司马任上所作），见诸《书苑菁华》。以《书断》最著名。

《书断》，又名《十体书断》，上、中、下三卷，即当年干谒名公巨卿之行卷，始撰于开元十二年（724），完篇于十五年（727）初春。上卷列古文、

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隶书(楷)、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体，各述源流，系之以赞，末有总论一篇。中卷下卷分神、妙、能三品评述“爰自黄帝、史籀、仓颉，迄于皇朝黄门侍郎卢藏用，凡三千二百馀年”间之书家，每品各以书体分。凡神品 25 人(各体重复 13 人)，妙品 98 人(各体重复 59 人)，能品 107 人(各体重复 72 人)，前列姓名，后为小传，传中附录又 38 人，记述甚详，论评亦允。《书断》，乃其成名之作，初得名才士如苏晋、王翰、褚思光、万希庄、包融诸人激赏，尤其褚思光有“妙绝”之誉，亟称：“犹蓬山沧海，吐纳风云，禽兽鱼龙，于何不有？见者莫不心醉，后学得渔猎其中，实不朽之盛事也。”⑪其后又有赵僎者，作《系论》一篇，喻之为孔子之修《雅》，其云：

> 兹又论夫文字发轫，笺翰殊出，本于其初，以迄今代，三千馀载，眇然难知，而《书断》之为义也。闻我后之所好，述古能以方之，不谓其智乎。较前人之尤工，陈清颂以别之，不谓其白乎。体物备象，有《大易》之制；纪时录号，同《春秋》之典。自古文逮草迹，列十书而详其祖，首神品至能笔，出三等而备厥人，所谓执简之太素，含毫之万象，申之宇宙，能事斯毕矣。若是，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评之，评之有不能文之，今斯书也，统三美而绝举，成一家以孤振，虽非孔父所刊，犹是丘明同事。伟哉独哉，君哉臣哉。前载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谁究哉！

《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论书，一改九品等第之陈习，且倡言“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因是得公卿之荐闻，受帝王之知遇，“选材于弃木，擢臣于翰林”⑫，宜当不仅止于张怀瓘之高才卓见，实乃出自盛唐通变精神之鼓舞。其《书断》诸多论点，并非首倡，李嗣真早已启萌于前，显明如二王优劣论，“若逸气纵横，则羲(王羲之)谢于献(王献之)”和“惟行、草之间，逸气过也”云，即本于《书品后》所谓王献之“逸气过父”者。《书断》所推进者，乃在于了结自梁虞　迄至唐初孙虔礼二百年来有关锺、张、二王四绝并称及其优劣的争论，而特以锺繇、张芝、杜度、

王羲之、王献之五贤替代之。其有评云：

夫椎轮为大辂之始，以椎轮之朴，不如大辂之华，盖以拙胜工，岂以文胜质？若谓文胜质，诸子不逮周、孔，复何疑哉。或以法可传，则轮扁不能授之于子。是知一致而百虑，异轨而同奔。锺、张虽草创称能，二王乃差池称妙，若以居先则胜，锺、张亦有所师。固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虽则齐圣跻神，妙各有最，若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杜度）第一；若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则伯英第一。其间备精诸体，惟独右军，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然此五贤，各能尽心而际（跻）于圣，或有侮毁，亦犹日月之蚀，无损于明。白云在天，瞻望悠邈，固同为终古独绝，百世之模楷。高步于人伦之表，栖迟于墨妙之门，不可以规矩其形，律吕其度，鹏搏龙跃，绝迹霄汉，所谓得玄殊于赤水矣。

中晚唐后之抑王论，实于此已见端倪。

《书断》之承前启后、发扬光大者，以形制而言，尚有为书家立传，兼品与评，且亦甚见精鉴。

张怀瓘一江左处士，以干谒之文，臧否先贤，其轻视汉魏以来乃至有唐先圣如是者，已属不易，其后之论并世书家，则更显谔谔，如《评书药石论》以相马法评书，直讥当时书势：

夫马筋多肉少为上，肉多筋少为下。书亦如之。今之书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莸同器，十年不分，宁知不有藏其智能，混其体法，雷同赏遇，或使之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马为驽骀，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故小人甘以坏，君子淡以成。耀俗之书，甘而易入，乍观肥满，则悦心开目，亦犹《郑》声之在听也……棱角者书之弊薄也，脂肉

者书之滓秽也……从宋、齐以后，陵夷至于梁、陈……肥纯之弊，于斯为甚。贞观之际，崛然又兴，亦至于今，则脂肉棱角，世俗相沿，千载书之季叶，亦可谓浇漓之极。

晚年又撰《书议》，以“风神骨气”为尚，有讽“妍美功用”之书：

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令了然……然智则无涯，法固不定，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草书）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有论……夫聋俗无眼有耳，但闻是逸少，必暗然悬伏，何必须见，见与不见，一也。虽自谓高鉴，傍观如三载（岁）婴儿，岂敢斟量鼎之轻重哉……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贤人君子，非愚于此而智于彼，知与不知，用与不用也。书道亦尔，或贱于此，或贵于彼，鉴与不鉴也。智能虽定，赏遇在时也。

此则著名抑王论，为后之韩愈《石鼓歌》“羲之俗书逞姿媚”者所本。

张怀瓘《评书药石论》自言“臣以小学说君，道岂止乎书”。反观盛唐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尚古崇丰，李邕、张旭、蔡有邻、韩择木以及徐浩、颜真卿并适通变。其间或有失之于肥俗如徐浩之楷者，及唐玄宗隶书，虽经侍书们润饰，其丰丽者，盖亦出剩肉太过。翰苑所重如蔡有邻、韩择木、顾诫奢诸人之书，又皆属妍美功用者也。张氏之谠言谏议者，实有关朝廷之崇尚。联想到张怀瓘应制入仕，召为待诏，以书法顾问于左右，然旋即外放，不复再入翰苑，其言论，虽明智，且合睿意，如《宣和书谱》所记唐玄宗“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云，终因曲高词直，难为时俗所容。

张怀瓘工书，以草书见称于吕总《续书评》，有“继以章草，新意颇

多”之评。天台山佛窟岩遗则法师的书法则从其出。张氏亦高自矜饰，行书自量可比于虞世南、褚遂良，而草书“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则自诩谓可独步于数百年间。在翰林供奉期间，曾书楷、行、草三体，合其弟张怀瓘之大小篆与隶书为六体，呈进于玄宗。惟其一无书迹流传。又善鉴识，《述书赋》“张氏旁求”条下有称，“利无推斥，道在专精”云。

其弟张怀瓘，亦以善书自举，偕兄应制入第，召入翰林院待诏，后官至盛王府司马，集贤院侍读学士。有文名，又以善大小篆及隶书著称。且喜收聚，亦为善鉴明识之人，《述书赋》钤有其“张氏永保”之印记，又称之“翰林之寻绎”有注云：“俱好无厌，亦能臆断。”曾充使岭南摹勒圣碑，杜甫、司空曙并有诗志其事。

2. 窦臮、窦蒙及其《述书赋并注》

窦臮，字灵长，唐初宰相窦抗后裔，武功扶风（今陕西麟游）人。代宗朝曾任检校刑部、户部员外郎，范阳功曹，宋、汴节度参谋。德宗朝贞元初见任浙江东西节度判官，检校兵部中兼侍御史，后官至都官郎中。约卒于贞元三年（787）。文章、书法并为时所重，其兄蒙《语例字格序》有谓：“翰墨厕张、王，文章凌班、马。词藻雄赡，草隶精深。”所书《华阴三洞景昭大法师碑》，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卷六亦记：“尝作《述书赋》七千馀言，收罗美备，阐幽发微，可谓极书家之意趣者。故宜其书之老健如是。”

窦蒙，字子全，臮之兄，历官太子司仪郎，检校国子司业，太原县令（大历十年），安南都护。都护或为其终官。亦善书，其弟《述书赋》有称“书包杂体，首冠群贤”云。赵明诚《金石录》收有陆宗隶书张谓《宋武受命坛记》，永泰元年（765）三月立石，其篆额乃出自窦蒙手笔。窦氏家族，为有唐著名“蓄聚之家”：其伯父邠王司马瓒有“耽玩达旨，固求不匮”[13]之誉；族兄给事中窦绍，“志宏雅道，不倦虚求”[14]，也以“别识收藏之人”而见称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窦臮、窦蒙弟兄虽非图书之府，但其久游翰苑，皆好图书，徐浩《古迹记》有评“辨伪知真，无出其右”。《历代名

画记》列为“善鉴明识”之人。窦蒙著有《画拾遗录》(已佚)。窦氏家族又以书法传家,窦臮兄弟之外,伯父瓒,族兄绍、锡和外高祖刘珉、外曾祖刘玄平以及舅氏刘绘、姨兄明若,皆以善书名世。

窦臮著有《述书赋》二卷,其仿拟杨泉《草书赋》,词藻雄赡,且品题叙述,也皆精核。其兄窦蒙《语例字格》有称:“精穷旨要,详辨秘义,无深不讨,无细不闻。”朱长文《墨池篇》以为是赋“虽风格非古,其勤博亦可尚已”。又说:“窦臮赋多古人评品之所遗,观之者知介善片能亦有所取也。”至近代,又见重于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其有称:“自来名著,后人咸有续编,或事仿效。独此篇之后,迄今一千馀年,书家之多,竟无嗣响。盖搜集批评,两难难并,文辞之不易工,犹其馀事,此篇所为千古独传之作也。”是赋所论历代书家,起自上古,迄于并世,而终于其兄蒙,凡13代。其中工书史籀等190人(上卷注107人,疑有脱漏),署证徐僧权等8人,印记太平公主等11家,述作虞龢等10家,征求宝玩韦述等26人,利通货易穆聿等8人,总7640言。而其印记一章,兼画印模于句下,不啻为后来记书画并载印章者所取法,且开鉴识印谱之先河,朱、余之论,洵属不虚。

《述书赋》,初撰注于乾元(758—760),后施朱点发,随时补益,复检核改定,终遗稿于贞元初年(785—787)。其间,窦蒙曾预审校。后因其赋“结语立言,曲申幽奥。一字一句,数义旁通”,遂作《语例字格》,加以阐明,“注有未尽,在此例中,意有未穷,出此格上”。《法书要录》所收不见《语例字格》,或唐时已散佚。《语例字格》明言“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而今仅可见90言,并注180句,似有遗脱。又赋文及注,多见歧误,唐时传抄,或已有讹漏。

窦臮,长于文章,天宝年曾献《大同赋》《三殿蹴踘赋》,窦蒙有称:“以讽兴谏诤为宗,以匡君救时为本。”[15]其《述书赋》亦自言“资乐道兮善莫大,佐玄览兮寄所赖。芝兰满室兮遗美芳,朋友忘言兮古人会。想贤玩迹俨如在,史册悠悠几千载”,盖一如天宝之献赋,亦寓有功利者在。

《述书赋》所评有唐书家,自唐高祖李渊以下,凡52人,每每加以赞

述，特称颂盛唐书家，尤于张旭、贺知章为烈。其评云：

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馀兴。若遗能于学知，遂独荷其颠称。虽宜官售酒，子敬挥帚，遐想迹观，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黄卷，则多胜而寡负。犹庄周之寓言，于从政乎何有？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

贺监条下又注："知章性放善谑，晚年尤纵，无复规检……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亦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

然而，对初唐书家如褚遂良、陆柬之、薛稷以及孙虔礼则备加贬抑：

河南专精，克俭克勤。伏膺《告誓》，锐思猗文。恐无成如画虎，将有类乎效颦。虽价重衣冠，名高内外，浇漓后学，而得无罪乎？柬之效虞，疏薄不逮；少保师褚，菁华却倍。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

《语例字格》云："且褒且贬，还同谥法。"窦氏之评张旭"逸轨神澄"，"逸，纵任无方曰逸"；"神，非意所到，可以识知"；贺知章"落笔精绝"，"精，功业双极曰精"。其与之视褚遂良、陆柬之、薛稷为"效颦"和孙虔礼为"凡草，闾阎之风"者，褒贬之间，一扬一抑，谅非一时兴会，随意之所发。联想到中唐崇尚闲逸的时代风气，窦氏兄弟乃受其影响，抑或亦即此时尚之首倡者也。

《述书赋》立论，多见前人之所未发，如评述历代书论之得失，倡言"亲睹"和不偏私好者，试看其云：

宋虞龢《表》闻于明皇帝；齐简穆《书》答于竟陵王。《表》称委尽，《书》乃备详。（原注[下同]：宋中书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论古今妙迹……齐司空简穆公琅邪王僧虔《答景[竟]陵王子良书》，序古善书人，评议无不至当……）藻鉴则梁高祖巧而未博；（武帝[萧衍]时撰《书评》）邵陵王博而未至。（萧纶亦撰《书评》）庾中庶失品格，拘于文华；（梁庾肩吾撰《书品论》）傅五兵比亡年，广于职位。（梁傅昭撰《书法目录》）《名录》编于司马；（隋蜀王府司马姚最撰《名书录》）《善状》集于散骑。（右散骑常侍姚思廉集《善书人名状》）李亚相著藻饰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真撰《书品》）张兵曹擅习玩之利。（率府兵曹鄂州长史张怀瓘撰《十体书断》上、中、下）考数公之著称，多博约而位记。余不敏于登高，岂虚言而求备。敢直笔于亲睹，非偏誉于所嗜也。

其他如评张从申书“恨于历览不多，闻见遂寡。右军之外，一步不窥。意多拓书，阙其真迹妙也”云，虽与其自恃门第、轻视吏胥有关，然所评张怀瓘兄弟以为“俱好无厌，亦能臆断”者，实出自学术之互歧与文人之相轻。细阅窦氏之评王羲之，所谓：“穷极奥旨，逸少之始。虎变而百兽跧，风加而众草靡。肯綮游刃，神明合理。虽兴酣兰亭，墨仰池水。《武》未尽善，《韶》乃尽美。犹以为登泰山之崇高，知群阜之迤逦。逮乎作程昭彰，褒贬无方。秾不短，纤不长，信古今之独立，岂末学而能扬……然而真迹之称，独标俣俣。忘本世心，余所不取。”其崇王之论，几逾于文皇，与《书断》之相左，甚见分明。“忘本世心”，或有诮于张氏之讽也。窦氏重真迹轻传拓之论点，后为米芾之《海岳名言》“石刻不可学”者所张本。

至于记述武则天征集王方庆先祖书迹事，有称“从人欲而不顾兼金”。又注云：“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绩，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参其有訾长安书贩穆聿之所谓“后至德中，因告讦征搜古迹，并强括石泉公（王方庆）家则天后所还书功，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详，乘危射利”云，至德，乃肃宗之年号，肃宗即其初撰《述书赋》

时当朝之皇上。穆聿之乘危射利者，若出肃宗使之然，其所诮者，盖不仅止于穆聿一人。两下相阅，已见刚正。且不以武后君临为讳，又并俦于高祖、太宗、睿宗、玄宗四帝，斯亦为有唐书论之所仅见者，《述书赋》诚不愧其“直笔”之自诺。

第三节

晚唐及五代书论

1. 张彦远及其《法书要录》

张彦远（约815—约877），字爱宾，河东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出身于缙绅大族，高祖嘉贞相玄宗，封爵河东侯；曾祖延赏相德宗，封魏国公；祖弘靖相宪宗，封高平侯，有“三相张氏”之称。其初仕左补阙，大中初年（847—849）迁尚书员外郎，寻转祠部。大中五年（851）奉诏，偕韦澳、蒋偕、李荀、崔瑄续修柳芳《唐律》，崔龟从监修，其年七月，撰成《续唐历》三十卷上之。咸通元年（860）出为舒州刺史，次年八月，重刊独孤及所撰《镜智禅师碑》（张从申行书，李阳冰篆额，大历八年十二月立石，会昌年所毁），并题《三祖大师碑阴记》立于州上。其后复入尚书省为兵部员外郎，咸通六年（865）二月见任，乾符二年（875）七月见任大理卿，约后二年（877）卒于任上，年六十余。

张彦远出身名门望族，为有唐著名图书之府，史称其“家聚书画侔秘府”[16]，且以书传家，张彦远《法书要录》自称：

> 河东公（高祖张嘉贞）书迹俊异，尤能大书，本传云：“不因师法，而天姿雄劲”（原注：《定州北岳碑》为好事所传）。曾祖魏国公（张延赏）少禀师训，妙合锺、张，尺牍尤为合作。大父高平公（张弘靖）幼学元常，自

镇蒲陕，迹类子敬；及处台司，乃同逸少。书体三变，为时所称……先君尚书（桂管观察使张文规）少耽墨妙，备尽楷模。彦远自幼及长，习熟知见。

赵明诚《金石录》曾收有张弘靖元和六年（811）四月正书裴垍《田绪遗爱碑》一石。张彦远虽甚自谦，有“书则不得笔法，不能结字，已坠家声，为终身之痛；画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娱”[17]云，然《宣和书谱》有称其书：“落笔不愧作者。”参阅宣和内府曾收藏其隶书《李将军征回诗》《维山庙诗》《宿僧院诗》《山行诗》四通；临王羲之草书《初日帖》《还问帖》《思想帖》《丹阳帖》《清和帖》《别纸帖》《书问帖》七纸，以及《宣和书谱》作者有评：“仿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其书法自当不俗。张彦远存世书迹，仅有韩幹《照夜白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题记“韩幹画照夜白，彦远”八字墨迹。

张彦远以收藏鉴识自重，于此用力亦最勤。不独自许“有一日之长”，且详言此道“癖好”之深笃：

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弊衣，减粝食。妻子僮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惟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18]

其执着专精如此，恐非李嗣真、张怀瓘、窦臮诸贤所可类比者。

张彦远博学工文，著述甚富，《续唐历》之外，可知者还有《彩笺诗集》[19]、《闲居受用》[20]以及《历代名画记》十卷（大中元年）和《法书要录》十卷。

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甚见自重，不独前书有称“好

事者得余二书，则书画之事毕矣”㉑，后书也重加申述，庶几不嫌复言见赘有损其谦退之志。然参阅其“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云㉒，盖如张怀瓘、窦臮者类，亦寓有“讽兴诤谏”“匡君救时”之深意在。

《法书要录》，其编集与《历代名画记》相先后，约在大中年间，辑自东汉历晋、宋、齐、梁、陈、后魏，迄至有唐元和年间八代数朝著名书论凡百篇，今见录《书断》三卷，《述书赋》二卷及散论三十九篇。除去有目无文者（《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宋王愔文字志目》《蔡恽书无定体论》《颜师古注急就章》《张怀瓘六体书论》）五篇外，加上卷一附见《传授笔法人名》（目不见），末附《右军书记》，实收三十六篇。《右军书记》，记是时所存王羲之书 465 帖及王献之 17 帖，并注释文，开刘克庄《阁帖释文》之先河。

是书，宋季《宣和书谱》已见首肯，有谓“（张彦远）尝作《法书要录》一十卷……更撰《历代名画记》为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书，则书画之事毕矣。’观其编次之善，果非虚语”。明毛晋集刻《津逮秘书》，曾题识称之曰：“余读其《法书要录》十卷，载汉、魏以来名文百篇，不下一注脚，不参一评跋，岂其鉴识未精耶？盖谓昔贤垂不朽之艺，后人睹妙绝之迹，自有袁昂、二庾及窦臮诸人月旦在。”㉓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遂为定论。其云：

> 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即庾肩吾《书品》，李嗣真《后书品》，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各有别本者，实亦于此书录出。自序谓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殆非夸饰也……则其沾溉于书家者，非浅鲜矣。

其实，编集亦凭鉴识，其有目无文者，如《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孙虔礼《书谱序》已称“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张怀瓘六体书》，乃论文字；《蔡恽书无定体论》，或亦如颜师古之《急就章注》，以

无关书法而见遗者，取舍大抵得当。至于《笔阵图》，孙虔礼《书谱序》、蔡希综《法书论》并归于王羲之名下，而《法书要录》一分为二，《笔阵图》题卫夫人作，《题后》始定王羲之，斯虽或可疑，然视其非一人之所撰，亦非明鉴者不能加裁。

2. 其他书论

晚唐书论，张彦远《法书要录》丛辑之外，无甚宏篇，更无精妙卓论可称，所可记述者，惟吕总《续书评》及论书诸诗，斯或可见晚唐乃至五代书法之趋向。

吕总，号遗名子，有《续书评》集评有唐书家自孙虔礼、卢藏用以下迄至张从申凡四十人，其中篆书李阳冰一人，隶书梁昇卿、卢藏用、张庭珪、韩择木、史惟则五人，真行草薛稷、萧诚、韦陟、李邕等二十二人，草书张旭、孙过庭、张怀瓘、张芬等十二人，多为盛、中唐论书家所未及者。其比况奇巧，直如禅家之机锋公案，佳趣多凭参悟。其云：

梁昇卿　　惊波往来，巨石前却。
卢藏用　　寒涧花妍，凝烟修竹。
张庭珪　　古木崩沙，开(闲)花映竹。
韩择木　　龟开萍藻，鸟散芳洲。
史惟则　　雁足印沙，深渊鱼跃(跃鱼)。
薛　稷　　风惊苑花，雪惹山柏。
萧　诚　　舞鹤交影，腾猿在空。
韦　陟　　虫穿古木，鸟踏花枝。
李　邕　　华岳三峰，黄河一曲。
宋　儋　　春秋(暮春)花发，夏柳低枝。
颜真卿　　绝锋剑摧，惊花逸势。
沈千运　　饥鹰杀心，忍瘦筋骨。
郑　虔　　云送秋霜，霞催月上。

李 璆 垂藤差池，枯木如折。
赖文雅 腾沙郁雾，翻浪扬鸥。
张 旭 华峰巉怪，占尽生意。
张 芬 孤松耸身，弱草露节。
邬 彤 寒鸦栖林，平冈走兔。
陆 曾 惊波鱼跃，深水龙潜。
梁 耿 错落鱼纹，纵横鸟迹。
房 黄(广) 婉美芬靃，春莺欲娇。
沈 益 春鹭窥鱼，秋蛇赴穴。

《续书评》评书，大抵两句八言，惟其特重李阳冰之书，况之“古树倚物，力有万人”后，又独加“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八言。后之朱长文《续书断》视李阳冰篆书“杰立特出”，且比肩于颜真卿(楷)张旭(草)，而并列为有唐神品者，盖本之于是。以其“力有万人”之喻，参省李清吉“变化自逸，代有斯人”，释玄悟“骨气无双，迥出前辈”，史鳞“逸气雄镇，超然不群”，以及徐浩“固多精熟，无有意趣”之评，吕总所推崇者，殆属雄逸一路。

有唐草书，自怀素以来，释门尤见擅场。至晚唐，晉光以草书应制，亚栖因草书获赐，高闲时见召对，贯休迥承天眷，并为一时之荣。然接踵怀素，为士大夫所称美者，惟晉光一人。当其归乡之际，名才士如吴融、司空图、张颉、罗隐、陆希声以及陆宸、李磎、杨钜、崔远、卢知猷、卢汝弼、薛贻矩诸人并有歌行壮其声。诗虽不甚高致，然晚唐书法之时尚，则可赖之以稍知消息。

吴融《览晉光上人草书想贺监赋》赞之曰：“云情自远，鹤态难羁，但将健笔以为适，岂待闲人之见知，邈矣清风，兹焉仰止。今观上士之殊艺，可继伊人(贺知章)之逸轨”。其《赠晉光上人草书歌》又云：“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司空图喜其劲逸，作歌助狂，有《晉光大师草书歌》称：“落笔纵横不离禅，方知草圣本非颠。”又谓“看师逸迹两相宜，高適歌行李白诗”[24]。陆希声《寄晉光上人》亦有“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

雷雨变逡巡”之颂。诸如是云者，参阅同时贯休《观怀素草书歌》：

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
师不谭经不说禅，筋力惟于草书朽(妙)。
颠狂欲恐是神仙，有神助兮人(神)莫及。
……
怀素师，怀素师。
若不是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岳孕灵。
固宜须冷(令)笑逸少，争得不心醉伯英。(王羲之，张芝)
……

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海为水)，天与(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

常恨与师不相识，一见此书空叹息。

伊昔张渭(谓)、任华、叶季良，数子赠歌岂虚饰，所不足者浑未曾道著其神力。

其健笔之适、逸轨之承者，所论虽一无新意，仅属中唐之绪胤，然亦与《续书评》同声相应，倡言骨力，并力崇闲逸，是或可概见晚唐及五代书法之崇重。

至于笔法，虽言之甚多，各持一说，且大都托之以名家，所谓口授秘传，不可尽信，然韩方明《授笔要说》记执笔五种：执管、撚管、撮管、握管、搦管；林蕴《拨灯序》记卢肇“推、拖、捻、拽”四法，洵属不虚。至于卢携《临池妙诀》取《翰林隐术》、王羲之《笔势论》、徐浩《论书》、窦臮(蒙)《字格》以及《永字八法势论》，删繁选要，谋为完篇。其目有八：第一，用纸笔。第二，认势。第三，裹束。第四，直如立，行如行。第五，草如走。第六，上稀。第七，中均。第八，下密。今仅存用笔、用墨三条。按韩方明自谓“贞元十五年(799)，授法于东海徐公琦。十七年(801)授法于清河崔公邈”[5]。按徐琦，徐浩长子，浩为张旭弟子，琦乃其再传。崔邈，乃出张

旭亲授。《授笔要说》称"方明传之于清河公(崔邈)"。《临池妙诀》亦言："(崔)邈传褚长文、韩方明。"若是,韩方明盖张旭之再传。其所谓"平腕双苞,虚掌实指,妙无所加"的执管之法,即勾、挑、讦、送(抵送),乃出自张旭。卢携所取"拓、挑、敛、拒"四法,实即韩方明"勾、挑、讦、送"之异名。执笔之法,至陆希声演成"挑、押、勾、格、抵"五字,《宣和书谱》记钱若水言"古之善书鲜有得笔法者,唐陆希声得之,凡五字:挑、押、勾、格、抵。自言出自二王、斯(李斯)与阳冰(李阳冰)得之"。其实,五字执笔乃陆氏家法。按希声六世祖陆柬之,笔法得自舅氏虞世南,而传之于其子彦远。彦远乃张旭堂舅,亲授之于旭。《授笔要说》之谓"至张旭始弘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者,当非夸饰。陆氏执笔,盖与韩、卢四字法全同,并为掌虚指实,五指齐力。所异者,韩、卢之说,仅取大指(勾或曰拓),第二指(讦或曰敛),中指(挑),无名指(送,或曰拒)。小指虽偕无名指抵送,然无其名号或称谓,终嫌忽略。陆氏五指各遣一词,明言五指并运,遂始见有执笔五字法而沿用至今。《宣和书谱》卷十所记韦荣宗:"须浅其执,牢其笔,实其指,虚其掌。"又说,"真书小密,执宜近头;行书宽纵,执宜稍远;草书流逸,执宜更远"云,盖本之于是而加以发挥者。

林蕴所传卢肇"推、拖、捻、拽"四字法,其虚掌实指者,或另一执笔法,意以为乃四指执笔,或即后世拇指与二指双苞作龙口状者。

---

① (唐)房玄龄《谏伐高丽表》。

② (唐)刘洎《论太子初立请尊贤讲学表》。

③ (唐)李义府《大唐故兰陵长公主碑》。

④ (唐)张怀瓘《书议》。

⑤ (唐)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

⑥ [日]日下中邦彦《书道全集》八、[日]中田勇次郎《孙过庭の书谱つじて》插图三四东京书道博物馆《传空海〈书谱〉》。

⑦ (清)包世臣《自跋删拟书谱》。

⑧ 即《后画品》,补谢赫《古画品》之缺。

⑨ (明)解缙《春雨杂述》直称贞观四家。

⑩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又记《六体书》书目,文字不录,撰于翰林待诏任上。陈思《书苑菁华》作《六体书论》。

⑪　(唐)张怀瓘《文字论》。

⑫　(唐)张怀瓘《评书药石论》。

⑬⑭　(唐)窦臮《述书赋》。

⑮　(唐)窦蒙《语例字格》。

⑯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嘉贞传》。

⑰⑱㉑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

⑲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唐朝下》"郑审"条下记。已佚。

⑳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序。已佚。

㉒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宣和书谱》卷二十引其言亦有"观其为论,以谓书非小道,本以助人伦、穷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灵怪不能以遁其形"云。

㉓　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学丛书》本《法书要录附录》引。

㉔　此《謦光大师草书歌》,《全唐诗》卷八百三十七误作贯休。

㉕　(唐)韩方明《授笔要说》。

附　录

隋唐五代书法史大事年表

隋文帝开皇元年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辛丑　581）

二月四日，周相国隋王杨坚为皇帝，改元开皇，是为隋高祖。六日，世子勇为太子。废除周六官，依汉魏之制，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又置勋官、散官。

欧阳询，二十五岁。养父江总，时任陈太常卿，年六十三（519—）。

虞世南，二十四岁。自继父虞寄卒后，服勤于会稽乡里。至本年，服阕，召为建安王府法曹参军。

四月，山西平定立正书《豆卢通等造像记》。

本年，顾野王（519—）卒。

徐陵，七十五岁（507—）；薛道衡，四十二岁（540—）；褚亮，二十二岁（560—）；房玄龄，三岁（579—）；魏徵，二岁（580—）；颜师古（—645）生。

开皇二年　太建十四年　（壬寅　582）

正月十日，陈宣帝卒，年五十三。十三日，太子叔宝即皇帝位，史称后主。四月二十三日，立皇子胤为皇太子。

正月十三日，江总除陈祠部尚书，又领左骁骑将军，参掌选事。

十二月廿六日，陕西华池人窆正书《李和志》。

开皇三年 陈后主至德元年 （癸卯 583）

正月初三日，陈改元至德。二月二十五日，葬陈宣帝于显宁陵，庙号高宗。

江总，正月初三日，迁陈吏部尚书。

十月十日，洛阳邙山人窆正书《姜敬亲志》；廿日，又人窆正书《梁邕志》。

开皇四年 至德二年 （甲辰 584）

正月二十九日，隋颁甲子元历。

江总，五月二十七日，除陈尚书仆射。

三月十日，洛阳人窆正书《杨居志》。

八月十日，历城立《杨静太造像记》。

开皇五年 至德三年 （乙巳 585）

正月十一日，隋颁行新修五礼。

八月，河北定县立《惠郁太造像记》。

开皇六年 至德四年 （丙午 586）

十月十六日，江总为陈尚书令。

正月，立丁道护正书李德林《兴国寺碑》。

二月八日，兖州高平立正书《仲思那等造桥碑》。

河北正定县龙藏寺立正书张公礼《龙藏寺碑》。

开皇七年 陈后主祯明元年 （丁未 587）

正月初三日，陈改元祯明。

九月十五日，历城立正书《静玄造像记》。

开皇八年 祯明二年 （戊申 588）

十一月廿日，磐阳人窆正书《淳于俭志》。

开皇九年 祯明三年 （己酉 589）

正月十二日，隋师入建康，俘后主，陈亡。陈有州30，郡100，县400，皆入于隋。三月六日，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康，入于长安。

欧阳询偕虞世南随陈后主及王公百司降隋，自建康诣长安。

江总入隋为上开府。

十二月七日，山东汶上县立正书《章仇氏造像》。

十二月廿五日，洛阳邙山入窆隶书《□真暨妻王氏志》。

立有隶书《太平寺碑》。

开皇十年 （庚戌　590）

建康立虞世南书薛道衡《平陈碑》。

本年先后立有正书《赵芬碑》。

开皇十二年 （壬子　592）

十一月七日，安平人窆正书《李则志》。

开皇十三年 （癸丑　593）

山东东阿县立正书《曹植庙碑》。

开皇十四年 （甲寅　594）

江总（519—）卒于江都。

正月，终南山立正书《信行禅师碑》。

开皇十五年 （乙卯　595）

始平县人窆正书《巩宾暨妻陈氏志》。

开皇十六年 （丙辰　596）

褚遂良（—658）生于长安。

二月八日，立正书《张元象造像记》。

四月，河北定县立隶书《正解寺碑》。

八月二日，乾县立正书《贺若谊碑》。

本年前，洺州立隶书《沣水桥记》。

开皇十七年 （丁巳　597）

三月廿六日，长安人窆正书《陶贵志》；十月十二日，又人窆正书杨秀《董美人志》。

开皇十九年 （己未　599）

李世民（—649）生。

开皇二十年 （庚申 600）

十月九日，废皇太子勇为庶人。十一月三日，以晋王广为皇太子。

十月廿八日，太兴县立正书《孟显达碑》。

十二月四日，四川奉节入窆正书《龙山公志》。

隋文帝仁寿元年 （辛酉 601）

正月朔，改元仁寿。

十月十五日，逢山县立正书《青州舍利塔铭》。

十一月二十九日，涿县人窆《阳瑾志》。

仁寿二年 （壬戌 602）

八月四日，洛阳人窆隶书《郭休志》。

十二月十五日，立丁道护正书周彪《启法寺碑》。

仁寿三年 （癸亥 603）

三月七日，同州人窆正书《苏慈志》。

八月十五日，河阴人窆隶书《张俭暨妻胡氏志》。

仁寿四年 （甲子 604）

七月十三日，隋文帝卒于大宝殿，年六十四。二十一日，发丧。太子广即皇帝位。十月十六日，葬隋文帝于太陵，庙号高祖。

四月八日，梓州立正书《牛头山舍利塔铭》。

隋炀帝大业元年 （乙丑 605）

正月朔，改元大业。五日，立晋王昭为皇太子。八月十五日，乘龙舟，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大业二年 （丙寅 606）

欧阳询出任太常博士，奉诏与奉王府学士潘徽，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等人助越国公杨素撰《魏书》，会杨素卒而止。欧阳询与褚亮之交谊，盖始于是时。

五月，越州立史陵正书《隋禹庙碑》。

十二月廿九日，邯郸县人窆正书《张贵男志》。

本年山西高平县人窆正书《张弘秤暨妻蔡阿妃志》。

大业三年 （丁卯　607）

四月六日，颁新律。十四日，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

八月，人窆正书《常醜奴暨妻宗氏志》。

十一月廿七日，洛阳邙山人窆正书《刘渊志》。

本年后，山西永济县立正书贺德仁《栖岩道场舍利塔碑》。

大业四年 （戊辰　608）

四月，欧阳询正书徐敞《周罗睺志》。

大业五年 （己巳　609）

是岁，凡有郡 190，县 1255，户 890 万有奇，是为隋王朝之极盛日。

四月，钦江立正书《宁赞虎碑》。

大业六年 （庚午　610）

十二月廿日，河南县人窆正书《宫人朱氏志》。

大业七年 （辛未　611）

褚亮见任太常博士，与欧阳询同僚。

十月二十一日，万年县人窆欧阳询正书虞世基《姚辩志》。

四月廿一日，洛阳邙山人窆正书《斛斯枢志》。

九月廿四日，武安县立正书《李君謦造像记》。

十二月廿二日，河南县人窆正书《宫人魏氏志》。

大业八年 （壬申　612）

欧阳询、虞世南并随隋炀帝征高句丽，正月初一，集于涿郡。二十四日，内史令元长寿卒于征辽途中，虞世基撰文志颂，欧阳询为之正书铭石，立于万年县。

八月十五日，河南县人窆正书《高紧志》。

二十五日，洛阳邙山人窆正书《裴逸志》。

大业九年 （癸酉　613）

虞世南撰并行书《隆圣道场碑》，十二月，立石定州。

八月，褚亮坐以杨玄感谋逆事，左迁西海郡司户。褚遂良兄弟并随远徙。

三月十日，洛阳邙山入窆正书《张盈志》。

十月十五日，大兴县入窆正书《尼那提志》。

大业十一年 （乙亥 615）

五月十七日，长安县入窆正书《尉富娘志》。

八月廿四日，大兴县入窆正书《姬氏志》《元智志》。

十一月九日，洛阳邙山入窆正书《□德志》。

大业十二年 （丙子 616）

二月廿五日，洛阳入窆正书《□侃昂志》。

十二月廿日，河南县入窆正书《牛方大志》。

大业十三年 （丁丑 617）

十一月九日，唐公李渊入长安，十四日，立代王侑为皇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

薛据据州起事，号西秦霸王，旋称帝，建元秦兴。褚亮任其黄门侍郎；褚遂良为通事舍人。

大业年间，博兴县立有正书《龙华碑》。

唐高祖武德元年 （戊寅 618）

三月十二日，宇文化及等弑杀炀帝于江都（时年五十）。五月十四日，隋恭王禅位于唐王李渊。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改元武德。以隋恭帝为酅国公。罢郡为州。二十四日，隋越王侗称皇帝于东都，改元皇泰。二十八日，命官修定律令，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六月，废大业律令，颁新格。

武德二年 （己卯 619）

正月十八日，欧阳询、虞世南从宇文化及东走聊城。至二月二十七日，窦建德平聊城，欧阳询、虞世南并入夏，欧授太常卿；虞为黄门侍郎。

七月廿□日，洛阳县人窦正书《韦匡伯志》。

裴行俭(—682)生。

武德四年 （辛巳 621）

五月初二日，秦王李世民破窦建德于虎牢，平河北。欧阳询偕虞世南并入唐，迁给事中。七月，制开元通宝钱词及书之，时称其工。始居西京通化坊。

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偕文学褚亮等人充文学馆学士。

纳言窦抗卒，欧阳询为之撰志并隶书，明年三月，入窆京兆。

时褚遂良为秦王府铠曹参军，始交于虞世南。

武德五年 （壬午 622）

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增置楷书手，缮写内府经籍。

欧阳询与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等撰《艺文类聚》。

十二月廿六日，欧阳询受诏偕秘书监窦琎、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书》。历数年，竟不就。

武德六年 （癸未 623）

王方翼(—685)生。

武德七年 （甲申 624）

九月十七日，欧阳询等人奉诏撰《艺文类聚》成一百卷，询奏上之，赐帛二百段。

武则天(—705)生。

武德九年 （丙戌 626）

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及其诸子，七日，立为皇太子。八月八日，传位于皇太子，九日，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太宗。十月八日，立中山王承乾为太子。

二月十三日，盩厔县立欧阳询撰并隶书《大唐宗圣观记》，陈叔达撰铭。

六月十二日，虞世南迁太子中舍人；褚亮为舍人。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虞世南转著作郎；褚亮除太子舍人，迁

太子中允。

九月，欧阳询偕虞世南以本官兼充弘文馆学士。同时为学士者有：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褚遂良检校馆务，号馆主。

十二月廿九日，京兆新建孔庙，虞世南奉敕撰并正书《孔子庙堂碑》。

武德年间，立欧阳询撰并隶书《楚哀王李稚诠碑》。

虞世南为法琳《破邪论》撰序。

唐太宗贞观元年 （丁亥 627）

正月朔，改元贞观。

欧阳询奉敕偕虞世南入弘文馆教示楷法，时有二十四人入馆学书。

褚遂良时为馆主，检校事务，虞、欧入馆教授书法或出其意。

褚遂良父亮，以本官兼充弘文馆学士，借魏徵、虞世南、李百药改制《秦王破阵》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吕才协音律。

贞观二年 （戊子 628）

十一月二十一日，置书学，隶国子学。

十月，虞世南撰有《庞某碑》。

李治生（—683）。

贞观三年 （己丑 629）

十二月，虞世南奉敕撰《昭觉寺碑》。

褚遂良撰《慈雲寺碑》。

贞观四年 （庚寅 630）

三月十九日，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卒，虞世南奉诏撰述碑铭，欧阳询隶书，立在昭陵。

虞世南抗表致仕，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十一月，除秘书少监。

九月，褚遂良随驾幸陇州，途经扶风，有《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诗。

李善(—689)约生于本年。

贞观五年 （辛卯　631）

三月三日，章丘立欧阳询隶书李百药《房彦谦碑》。

九月二十九日，虞世南偕魏徵、褚亮、萧德言等所编《群书治要》始成，凡五十卷，上之。

十一月十六日，洛阳立欧阳询正书李百药《化度寺碑》。

本年，太宗尝与司徒长孙无忌列论大臣，亟称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

贞观六年 （壬辰　632）

正月八日，整理御府所藏古今工书及锺、王等人真迹凡1510卷。

四月，麟游县立欧阳询正书魏徵《醴泉铭》。

五月中旬，欧阳询书有《兰惹帖》。

七月十二日，欧阳询书有《付善奴帖》。

闰八月十七日，虞世南上《圣德论》，太宗有答诏称之。

虞世南奉敕偕魏徵、褚亮等分制乐章，凡八章。冬至，祀昊天于环丘。

撰有《虞荷碑》。

褚遂良奉敕书《阴符经》，草书，凡五十本。

贞观七年 （癸巳　633）

正月十日，太宗制《破阵乐舞图》，其后，令虞世南偕魏徵、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于廷。

正月十二日，虞世南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继魏徵缮写四部群书。

六月初五日，武昌郡公戴胄卒，虞世南奉敕为撰碑文。

本年，虞世南尝谏作艳诗，九月二十三日，太宗亟称之。

十月，《孔子庙堂碑》勒成，立石新庙，墨本进呈，受赐王羲之黄

银印,有谢表。

贞观八年 (甲午 634)

十一月,咸阳立欧阳询正书《张崇碑》。

虞世南进封县公。

贞观九年 (乙未 635)

五月六日,高祖李渊(566—)卒。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廿七日,葬于献陵。

四月初六日,康国献狮子,虞世南奉诏撰《狮子赋》。

七月廿四日,诏定高祖山陵制度,务在崇厚。虞世南上《山陵封事》谏之,未报,又上《论山陵疏》。由是,稍见减省。

十月廿七日,高祖将葬献陵,虞世南有《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志之。

褚亮封爵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

贞观十年 (丙申 636)

六月二十一日,皇后长孙氏卒,年三十六,谥曰文德,十一月四日,葬昭陵。

皇后长孙氏既丧,百官缞绖,中书舍人许敬宗笑欧阳询状貌丑陋,为御史所劾。其前,赵国公长孙无忌亦嘲其陋异。

九月十一日,将葬文德皇后于昭陵,虞世南撰《哀册文》以志之。

褚遂良自秘书郎迁起居郎。因魏徵之誉,谓"甚得王逸少体",即日召令侍书。

十一月四日,昭陵立欧阳询隶书唐太宗《文德皇后碑》。

十一月十六日,汝南公主卒,虞世南为之撰书墓志铭。

贞观十一年 (丁酉 637)

九月,欧阳询正书《阴符经》。

十月二十二日,昭陵人窆欧阳询撰并正书《温彦博志》。其正书岑文本《温彦博碑》同时立石,见署检校太子右庶子。

十一月十五日,太宗狩于济源陵山,虞世南上《谏猎疏》谏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欧阳询书有《赠高颍礼部尚书诏批答》。

贞观十二年 （戊戌　638）

五月二十五日，虞世南（558—）卒，太宗举哀，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懿。十一月，改谥文懿。又命魏王泰祭之，有“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之誉。太宗又撰诗一篇，令褚遂良诣灵帐前读而焚之。虞世南有集三十卷，褚亮奉敕序之。又有《帝王略论》五卷。虞世南生前曾与褚遂良论书，有欧阳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褚遂良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之说。

耀州立王行满正书于志宁《窦良碑》。

贞观十三年 （己亥　639）

褚遂良偕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四长波门外鉴别内府法书真伪。撰有《王羲之书目》凡正书四十帖，行书十八帖。

四月九日，内出《乐毅论》，摹拓赐诸臣，褚遂良撰《拓本乐毅记》志之。

十二月，内库图书装成部帙，褚遂良等于卷下排署记名。其草迹，用楷书小字帖纸影之。十九日，有王廙书一卷更署名记。

昭陵立正书《秦琼碑》。

贞观十四年 （庚子　640）

三月十二日，昭陵入窆正书《杨恭仁志》。

三月二十三日，褚遂良有王羲之书法一卷四帖后署名。

四月二十二日，唐太宗撰并真、草书《屏风铭》。

贞观十五年 （辛丑　641）

欧阳询卒（557—）。贞观年间书有《皇甫诞碑》（正书）、《唐瑾碑》（正书）、《六马赞》（隶书）、《段文振碑》（隶书）、《段纶碑》诸碑。

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褚遂良与安德郡公驸马都尉杨师道友善，曾偕岑文本、刘洎、许敬崇、上官仪、杨绩预宴其安德山庄，有《安德山池宴集》诗酬唱。师道亦有《中书寓直咏雨简起居上官学士》诗记其交游。

七月，蒋善进临智永《千字文》。

十一月，伊阙立褚遂良正书岑文本《三龛碑》。

贞观十六年 （壬寅 642）

褚亮进爵为阳翟县侯。致仕于家。

四月二十八日，太宗问起居记录事，褚遂良谓“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

五月四日，京兆至德观立褚遂良正书岑文本《孟法师碑》。

薛曜(—703)生。

贞观十七年 （癸卯 643）

二月二十八日，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 24 人于凌烟阁。

四月朔，皇太子承乾有罪，废为庶人。褚遂良受诏偕司徒长孙无忌等参鞫太子承乾谋反事。七日，谏立魏王泰为太子，即日偕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人定策，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十七日，立晋王治为皇太子。褚遂良授太子宾客。

褚遂良奉敕预修《隋书》十志。

敕阁立本画武德功臣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虞世南忝列其间。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

正月，昭陵立唐太宗撰并行书《魏徵碑》。

九月二十一日，昭陵入窆正书《长乐公主志》。

魏徵卒(580—)，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

贞观十八年 （甲辰 644）

九月，褚遂良以黄门侍郎参与朝政。

二月五日，昭陵入窆正书《刘娘子志》。

昭陵立诸葛思桢正书许敬宗《瑶台寺碑》。

贞观十九年 （乙巳 645）

二月十二日，褚遂良从驾征辽。有《春日侍宴望海应诏》诗。六月二十一日，应诏奉和，作《辽东侍宴山夜临秋同赋临韵应诏》诗。

十一月二十八日，车驾发定州。褚遂良诬奏侍中刘洎。

八月，汴州立褚遂良行书唐太宗《帝京篇》。

十月，昭陵立释智辨正书于志宁《姜确碑》。

十一月十四日，昭陵入窆正书《王君愕志》。

咸阳立褚遂良正书于志宁《独孤延寿碑》。

颜师古卒(581—)，谥曰戴。

杜审言约生于本年(—708)。

贞观二十年 （丙午　646）

闰三月四日，诏重修《晋书》，褚遂良偕房玄龄、许敬宗掌其事。

十二月十四日，昭陵入窆正书《薛颐志》。

贞观二十一年 （丁未　647）

褚遂良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十月，因父亮卒（560—），罢职服勤。亮有文集二十卷。陪葬昭陵，殷仲容隶书其碑。

四月二十八日，昭陵入窆正书《李思摩志》；八月十一日，又入窆正书《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志》。

七月，太原立唐太宗撰并行书《晋祠铭》。

京兆立畅整《佛石迹图传碑》。

杨师道卒。

司马承祯生(—735)。

贞观二十二年 （戊申　648）

二月，褚遂良起复为黄门侍郎。九月二十一日，除中书令。

正月十七日，京兆立唐太宗撰并行书《温泉铭》。

三月廿二日，昭陵入窆正书《文安县主志》。

七月，房玄龄卒(579—)，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

贞观二十三年 （己酉　649）

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卒（599—）。六月朔，皇太子李治即皇帝位。八月十八日，葬太宗于昭陵，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

五月，太宗病日重，二十六日，临死前托孤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诸人，并令遂良起草遗诏。有《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

六月朔，褚遂良封爵河南县公。

昭陵立褚遂良正书上官仪《裴艺碑》。

本年新罗王真德（乐浪郡王）遣其弟相国、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拓本并新撰《晋书》。

贞观年间，昭陵立殷仲容隶书《降王名》。

薛稷（—713）生。

唐高宗永徽元年 （庚戌 650）

正月朔，改元永徽。六日，立妃王氏为皇后。

褚遂良进封郡公。十一月二十四日，因监察御史韦思谦劾其抑卖中书省翻译官之地，出贬同州刺史。

昭陵立正书李义府《豆卢宽碑》。

永徽二年 （辛亥 651）

闰九月十一日，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

传有《随清娱志》，记褚遂良本年九月某日夜梦司马迁妾平原随清娱，为之撰墓志铭书之。

四月十日，昭陵入窆正书《牛秀志》。

八月二十三日，昭陵入窆正书《段简璧志》。

李思训（—716）生。

永徽三年 （壬子 652）

正月十一日，褚遂良自同州征还，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七月初二日，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褚遂良兼太子宾客。褚遂良奉诏偕太尉长孙无忌、弘文馆学士谷那律等二十四人刊定孔颖达《尚书正义》。

昭陵立褚遂良正书高宗《房玄龄碑》。

京兆立郭谦光隶书苏诜《尹惠碑》。

永徽四年　（癸丑　653）

二月初三日，驸马都尉房遗爱伏诛，褚遂良因素与江夏王李道宗不协，谮言其交结于房遗爱。江夏王因之坐事，配流象州，卒于途中。

三月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

九月二十五日，褚遂良除尚书右仆射。

十二月十日，京兆慈恩寺立褚遂良正书唐太宗序高宗记《圣教序并记》。万文韶刻。

京兆立李玄植正书许敬宗《刘德威碑》。

永徽五年　（甲寅　654）

正月初五日，褚遂良奉敕正书《阴符经》一百二十卷。

五月十五日，麟游县立高宗撰并行书《万年宫铭》。

永徽六年　（乙卯　655）

二月九日，昭陵入窆正书《张廉穆志》。

二月，昭陵立赵模正书许敬宗《高士廉茔兆记》，见署□□府录事参军。

三月十四日，三原立王行满正书于志宁《韩仲良碑》，见署门下录事。

九月初三日，褚遂良因谏立武则天为后，出贬潭州都督。

十月十三日，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

褚遂良与长安令裴行俭友善，其前曾私议立后事，行俭以为国家之祸必自此始。

永徽年间，昭陵立有苏敬正书法琳《张公谨碑》。

显庆元年　（丙辰　656）

正月六日，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七日，改元显庆。

褚遂良，二月，有《湘潭偶题》诗；五月八日，有《潭府帖》。

四月十四日，玄奘迎接高宗御制并正书《慈恩寺碑》文。

五月十六日，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许敬宗进所撰《东殿新书》二百卷，高宗为之序。

十月十八日，昭陵立于立政正书于志宁《崔敦礼碑》，见署太常少卿；又入窆正书《韦氏志》。

十一月廿四日，昭陵入窆正书《唐俭志》。

京兆立王行满书许敬宗《石氏浮图铭》。

显庆二年 （丁巳 657）

二月十四日，昭陵入窆正书《五品宫女志》。

三月十六日，褚遂良转桂州都督。八月十一日改爱州刺史。

十一月十八日，昭陵入窆张玄靓正书上官仪《张士贵志》，见署梓州盐亭县尉。

十二月，京兆招提寺立王行满行书唐太宗序唐高宗记《圣教序》，见署门下录事。

显庆三年 （戊午 658）

正月五日，长孙无忌等修《新礼》成，凡 130 卷，259 篇，诏颁于天下。

四月九日，昭陵立王行满正书许敬宗《周护碑》，见署门下录事。

五月，昭陵立王知敬正书许敬宗《李靖碑》，见署直弘文馆。

九月，废书、算、律学。

九月十七日，李善见任右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献所注《文选》六十卷。

十月十二日，入窆敬客正书上官灵芝《王公砖塔铭》。

褚遂良(596—)卒于贬所。

张庭珪(—745)生。

显庆四年 （己未 659）

贺知章(—744)生。

四月十四日，昭陵入窆正书飞白盖《尉迟敬德志》和《苏斌志》。

八月十五日，汜水县立高宗撰并行书《大唐纪功碑》。

十月廿九日，昭陵立窦怀哲正书李义府《兰陵公主碑》，见署驸马都尉庆州刺史。

显庆五年 （庚申　660）

三月三日后，入窆正书并篆盖《宇文修多罗志》。

显庆六年　龙朔元年 （辛酉　661）

二月三十日，以益、绵等州皆言龙见，改元龙朔。

龙朔二年 （壬戌　662）

正月十六日，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

二月四日，改京诸司及百官名：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左右仆射为左右匡政，左右丞为肃机，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自余多以义训改之。

五月十七日，复置律、书、算三学。

龙朔三年 （癸亥　663）

二月，诏以书学隶兰台。皇太子弘撰成《瑶山玉彩》，凡五百卷。

十二月二十一日，诏来年正月一日改为麟德元年。

十月十日，长安立欧阳通正书李俨《道因法师碑》，见署兰台郎。

麟德元年 （甲子　664）

十二月十五日，庶人李忠坐与西台侍郎上官仪交通，赐死。

正月廿八日，昭陵立高正臣正书李俨《杜君绰碑》，见署殷王府□□□□□□□□弘文馆。

二月十八日，入窆正书《李文志》。

十月二十二日，昭陵入窆正书《郑仁泰志》。

十月，昭陵立畅整正书李俨《清河公主碑》，见署雍州长安县品子。

麟德二年 （乙丑　665）

五月二十日，颁李淳风所造《麟德历》。

本年大稔，米斗五钱。

十月十一日，昭陵立畅整正书许敬宗《程知节碑》，见署品子；入窆正书《程知节志》。

十一月，昭陵入窆正书《李震志》和《王氏志》。

十二月，昭陵入窆正书《三品亡尼志》。

京兆入窆畅整书灵瓒《忍辱阇黎塔铭》。

乾封元年 （丙寅 666）

正月五日，改元乾封。

李嗣真见任许州司功。

张嘉贞（—729）生。

二月，兖州立高宗撰并行书《登封纪号文》。

五月二十五日，改铸乾封泉宝钱。

十一月廿八日，昭陵立李玄植正书李安期《李孟常碑》，见署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知馆事侍皇太子书。

十二月二十九日，昭陵入窆正书《韦珪志》。

乾封二年 （丁卯 667）

正月十六日，罢乾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十一月十七日，茅山立石王玄宗正书于敬之《华阳观王先生碑》。

乾封三年 总章元年 （戊辰 668）

二月十二日，改元为总章元年。

昭陵立殷仲容隶书李安期《武氏碑》，见署前戎卫兵曹参军。

总章三年 咸亨元年 （庚午 670）

三月朔，改元为咸亨元年。

诸葛思桢见任许州临隶县令。

李嗣真见任义乌令。

正月，昭陵立王知敬正书许敬宗《尉迟宝琳碑》，见署膳部员外

郎直弘文馆。

二月六日，昭陵入窆正书《李勣志》。

十月，昭陵入窆敬客师正书崔行功《王大礼志》，见署右威卫仓曹参军。

十一月十日，昭陵入窆正书《斛斯政则志》。

绛州立传陈惟玉篆书《碧落碑》。

咸亨二年 （辛未 671）

六月十三日，泾城令李善以与周国公贺兰敏之交游，坐事流放姚州。

九月二十日，昭陵立普昌正书《张阿难碑》，见署瑶台寺僧。

十二月廿七日，昭陵立高正臣书许敬宗《燕氏碑》，见署冀王府属直右春坊侍皇太子书；正书《燕氏志》同时入窆。昭陵又入窆正书《赵王李福志》。

咸亨三年 （壬申 672）

王知敬见任冀王友，奉敕书《金刚经》。

咸亨五年 上元元年 （甲戌 674）

八月十五日，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

李善遇赦，由姚州放还，隐居于汴、郑间，以教授《文选》为业。

十月，昭陵立殷仲容隶书许敬宗《马周碑》。

上元二年 （乙亥 675）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弘卒。五月初五日，追谥曰孝敬皇帝。六月五日，立雍王贤为皇太子。

张旭（—约759）约生于本年。

李邕（—747）生。

八月十九日，偃师立高宗撰并行书《孝敬皇帝睿德碑》。

十月十五日，昭陵入窆正书《阿史那忠志》。

上元三年 仪凤元年 （丙子 676）

十一月八日，改元仪凤元年。

四月廿五日，上元立高正臣行书王知敬篆额高宗《明徵君碑》。正臣见署行金吾卫长史侍相王书；知敬见署朝太子洗马。

刘昇(—730)生。

仪凤二年 （丁丑 677）

十月六日，昭陵立高宗撰并行书《李勣碑》。

十一月十五日，润州立张德言正书胡楚宾《魏法师碑》。

十二月廿六日，昭陵入窆正书《典灯志》。

徐峤之(—736)生。

仪凤三年 （戊寅 678）

四月二十二日，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通乾。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二月十四日，昭陵入窆正书《元万子志》和《唐嘉会志》。

六月八日后，昭陵入窆正书《优昙禅师塔铭》。

仪凤四年 调露元年 （己卯 679）

六月三日，改元调露元年。

三月，虢州立李君惠集王羲之书越王贞《舍利塔碑》。

十二月廿六日，洛阳邙山入窆欧阳通正书王德真《泉男生志》，见署司勋郎中。

调露二年 永隆元年 （庚辰 680）

八月二十二日，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二十三日，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永隆。

正月上元夜，高正臣等六人唱和，作《上元夜效小庾体诗》，以春字为韵，孙正隐序。晦日，唱和于高氏林亭，凡二十一人，以华字为韵，陈子昂为之序。(《全唐诗》卷七十二又有《晦日重宴》，凡九人，以池字为韵，周彦晖序。是晦日当与前晦日异月。其三集高氏林亭，或出自高正臣之招宴。)

李嗣真改始平令。

永隆二年 开耀元年 （辛巳 681）

三月二十三日，入窆正书《法乐志》《法灯志》。

十月（一作九月）二十四日，改元开耀。十一月八日，徙庶人贤于巴州。

姜晞登进士第。

开耀二年　永淳元年（壬午　682）

二月十九日，以太子诞皇孙满月，改元永淳。三月二十五日，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

王方庆，二月见任吏部郎中。

四月，裴行俭（619—）卒，赠幽州都督，谥曰献。有集二十卷，撰《草字杂体》数万言，并传于代。

十月十一日，昭陵入窆正书《昭仪志》。

十二月二十五日，昭陵入窆正书郭正一《临川公主志》。

十二月，嵩山立沮渠智烈正书杨炯《少姨庙碑》。

立郭谦光隶书吴师道《李璿碑》。

永淳二年　弘道元年（癸未　683）

十二月六日，改元弘道。是夕，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谥号皇大帝，庙号高宗。二十一日，中宗李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

王知敬见任司门郎中太孙谘议。

正月，嵩山立沮渠智烈正书崔融《启母庙碑》。

昭陵立殷仲容隶书《褚亮碑》。

唐中宗嗣圣元年　唐睿宗文明元年　武后光宅元年（甲申　684）

正月朔，改元嗣圣。二月六日，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仍改赐名哲。七日，立豫王轮为皇帝，令居于别殿。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改元文明。皇太后仍临朝称制。十八日，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三月，庶人贤死于巴州。四月二十六日，迁庐陵王哲于均州。八月十一日，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九月六日，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

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时柳州司马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十月六日，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希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讨之。十一月十八日，平之。

王绍宗寓居扬州寺中佣力写佛经已三十年。文明中，徐敬业于扬州作乱，遣使征之，绍宗称疾固辞。又令唐之奇亲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业大怒，将杀之，之奇劝之，由是获免。及贼平，行军大总管李希逸以其状闻，则天驿召赴东都，引入禁中，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

三月，洛阳人窦欧阳通正书郑玄挺《徐氏志》。

八月，乾陵立中宗正书武后《述圣颂》。

十月二十四日，昭陵人窦正书郭正一《安元寿志》。

武后垂拱元年 （乙酉 685）

正月朔，改元垂拱。三月十一日，迁庐陵王哲于房州。

颜元孙登进士科。

李隆基(—762)生。

十二月四日，济源县立沮渠智烈正书李审幾《奉仙观老君像碑》，见署朝散郎上骑都尉。

王方翼(623—)卒。

垂拱二年 （丙戌 686）

四月，登封立王绍宗正书王玄宗《王徵君临终口授铭》，见署行秘书少监东宫侍读兼侍书。

垂拱三年 （丁亥 687）

李邕与博陵沔结交。

右卫胄曹参军孙虔礼书记《书谱序》。

垂拱四年 （戊子 688）

五月十八日，皇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八月十七日，博州

刺史琅邪王冲据博州起兵，命左命吾大将军丘神勣为行军总管讨之。二十五日，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贞举兵与博州相应。九月朔，命内史岑长倩等率兵讨之。十一日，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殆将尽矣。

二月，欧阳通见任司府卿。

四月，富平立尹元凯篆书韦元旦《美原神泉诗碑》。

十一月十七日，人窆郑庄正书朱宾《梁寺志》。

永昌元年 （己丑　689）

正月朔，改元永昌。

李嗣真除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撰《书品后》。

孙过庭移官率府录事参军。

正月十三日，昭陵人窆正书《金氏志》。

李善（约630—）卒，年六十余。《文选注》六十卷大行于世。又撰有《汉书辨惑》三十卷。

天授元年 （庚寅　690）

依周制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赐姓武后。以皇太子为皇孙。

孙虔礼（约646—）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陈子昂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祭录事孙君文》祭奠之。

二月十九日，昭陵立行满正书苗神客《乙速孤神庆碑》，见署净□寺僧。

天授二年 （辛卯　691）

李邕，年十七，遇人启护，倾囊相助，义气之举，人引为美谈。

李嗣真，正月，见任御史丞知大夫事。

八月，欧阳通以夏官尚书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十月十二日，为酷吏所陷，被杀。

十月十日，昭陵立姜晞撰并正书《姜遐碑》，见署礼部侍郎。

天授三年　如意元年　长寿元年（壬辰　692）

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初九日，改元长寿。

潞州刺史李嗣真等被诬谋反，正月初四，流配岭南。

韩择木（—约766至768）约生于此年至长寿三年。

长寿三年　延载元年（甲午　694）

五月十一日，改元延载。

李邕年弱冠，与崔沔同游秘阁，引以为知己。

薛稷登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

新罗金仁问，四月，卒于唐。

证圣元年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　695）

一月朔，改元证圣。九月九日，改元天册万岁。腊月十一日，改元万岁登封。

贺知章登进士第，并举超拔群类科。

二月，洛阳立相王旦正书武后《昇中述志碑》；又立相王旦正书李峤《封中岳碑》。

十二月十七日，洛阳立薛稷正书崔融《封中岳碑》。

十二月，登封立薛曜正书武三思《封祀坛碑》，见署春宫郎中。

万岁登封元年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　696）

三月二十六日，改元万岁通天。

崔沔登进士第，并举贤良方正科，拜麟台校书郎，引李邕于秘阁读书。

二月，洛阳立相王旦正书李峤《封中岳碑》。

长安立畅整正书薛曜《梁师敬碑》。

万岁通天二年　神功元年（丁酉　697）

九月九日，改元神功。

李邕见特进李峤，得其赏识。直秘阁读书。

薛稷见任中书舍人。

李嗣真征还，归至桂阳而卒，年五十余，赠济州刺史。神龙初，又赠御史大夫。撰《明堂新礼》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各一卷。

五月，凤阁侍郎王方庆呈献先祖王羲之等二十八人遗迹凡十卷。旋装饰退还。

三月六日，入窆正书《梁师亮志》。

八月十五日，入窆殷祚撰并正书《道感法师塔铭》。

十月一日，立薛稷撰并正书《杳冥君铭》，见署凤阁舍人。

韦陟(—761)生。

圣历元年 （戊戌　698）

正月朔，改元圣历。三月九日，召庐陵王哲，二十八日，至神都。九月十五日，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

王方庆，八月初七日，自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罢为麟台监。

圣历二年 （己亥　699）

正月八日，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

薛稷以凤阁舍人充内供奉，充《昇仙太子碑》检校勒碑使。

薛曜、尹元凯偕李峤、张说、宋之问、沈佺期、刘知幾等二十六人同修《三教珠英》。

二月八日，嵩山立司马承祯隶书王適《潘尊师碣》。

三月二十九日，入窆王景正书薛稷《王德表志》，见署前河内县主簿。

六月十九日，偃师县立武后撰并行书《昇仙太子碑》。

历圣三年　久视元年 （庚子　700）

五月五日，改元久视。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十月十日，复旧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赦天下。

三月十八日，溧水县立周道赐正书《寻仙观仙坛山铭》。

五月十九日，登封立薛曜正书武后君臣《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见署左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

六月，洛阳立薛稷撰并正书《郑敞碑》。

九月，汝州立殷仲容正书李峤序武后君臣《流杯亭宴诗碑》，见署麟台丞。

十月二十八日，入窆狄仁杰撰并正书《袁公瑜暨妻孟氏志》。

咸阳县立蔡有邻隶书员半千《萧宗道碑》。

大足元年　长安元年　（辛丑　701）

正月三日，改元大足。十月二十二日，改元长安。

出内府二王真迹二十卷示诸宰相。

十一月十二日，薛曜等所撰《三教珠英》1300 卷修成，上之。

五月十五日，河内县立贾膺福撰并隶书《大雲寺碑》，见署太子中舍人。

五月，立相王旦正书武后《许由碑》。

九月，福昌县立薛稷撰并正书《张及碑》，见署前凤阁舍人。

十二月，太原立相王旦正书李峤《武士彠碑》。

十二月，京兆立锺绍京正书张嘉贞《周静法师方坟记》。

长安二年　（壬寅　702）

五月，王方庆卒，赠兖州都督，谥曰贞。中宗朝追赠吏部尚书。

六月，咸阳立相王旦正书武三思《顺陵碑》。

七月，荥阳立卢藏用撰并隶书《汉纪信碑》，张敬镌。

长安三年　（癸卯　703）

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象，号为“高士图”。

徐浩生（—782）。

二月，立卢藏用撰并隶书《孔昌寓碑》。

四月八日，锺绍京奉拓相王旦正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额》，见署左豹卫长史。

九月廿二日，昭陵入窆正书《三品亡尼志》。

长安四年 （甲辰　704）

四月，内史李峤、监察御史张庭珪并荐李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臣，乃召拜为左拾遗。十二月下旬，邕即支助御史中丞宋璟奏请审理张易之、昌宗兄弟不顺之状。太后闻言，始从璟奏。

邕与卢藏用交游，盖始于本年。

唐中宗神龙元年 （乙巳　705）

正月朔，改元神龙。二十二日，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张易之、昌宗，二十三日，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二十四日，武后传位于皇太子。二十五日，即皇帝位。二十六日，武后徙居上阳宫。二月四日，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寺宇、台阁、百官、文字皆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改左右肃政台为左右御史台。十月十九日，改弘文馆为修文馆。十一月初二日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二十六日，则天(624—)崩于上阳宫。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王皇后）、萧（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皆赦之。"谥曰"则天大圣皇后"。

是岁，户部奏天下户 615 万，口逾 3 714 万。

四月初一日，李邕上疏谏阻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不从。

王绍宗坐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见废，卒于乡里。

神龙二年 （丙午　706）

五月十八日，葬则天皇后于乾陵。

三月，李邕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四月，贬常州司户。中书令李峤赋诗送行。

八月二十七日，僧师勒武后君臣《游仙篇》于《昇仙太子碑》阴，薛曜正书武后诗，见署奉宸大夫。薛稷正书题御制及建辰并武三思诸大臣名。锺绍京奉敕勒御书及正书题诸公名，见署行左春坊录事

直凤阁。

八月，长安立薛稷正书越王贞《信行禅师碑》，见署中书舍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韩筠撰并隶书《陈泰暨妻房氏志》，见署别敕选。

神龙三年　景龙元年　（丁未　707）

七月六日，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帝遽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从散去，杀李多祚诸人，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至鄠西，为部下所杀。九月五日，改元景龙。

十月十七日，立中宗撰并正书《赐卢正道敕》。

十月，立郭谦光撰并隶书《□部将军功德记》。

景龙二年　（戊申　708）

四月二十一日，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

卢藏用见任学士，薛稷、武平一见任直学士。

杜审言（约645—）卒。

景龙三年　（己酉　709）

六月十五日，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

二月十一日，中宗幸太平公主南庄，李邕随李峤、韦嗣立、宋之问、沈佺期、苏颋、邵昇、李乂等修文馆诸学士应制属和，有《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诗。

是时，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

颜真卿（—785）生。

三月，洛阳立卢藏用隶书张说《马克忠碑》。

八月，京兆立颜惟贞正书苏颋《武承规志》。

景龙四年　唐睿宗景雲元年　（庚戌　710）

六月二日，中宗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韦氏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七日，少帝即位，时年十六，改元唐

隆。二十日，淄王李隆基起兵诛诸韦，封平王。二十三日，睿宗即位。二十七日，册平王李隆基为皇太子。七月二十日，改元景雲。

七月下旬，李邕自常州司户起为左台侍御史，分司东都台。八月，与崔日知共挫谯王重福逆形，加阶朝散大夫，除户部员外郎。时睿宗赠故尚书令韦巨源特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请谥曰"昭"，邕上书驳之。处直执不改，邕又驳之。

五月，陈州立卢藏用隶书张说《龙兴寺碑》，见署吏部侍郎修文馆学士。

八月，入窆颜叔坚正书苏颋《武承规志》。

十一月二十五日，入窆豆卢欣期卢藏用《薛氏志》，见署左千牛中郎卫护军。

立卢藏用撰并隶书《苏瓌碑》（张说铭）。

景雲二年 （辛亥 711）

二月间，词人王翰在京师张榜窃定海内文士百余人，列李邕、张说为第一。是时玄宗尚在东宫，邕与崔隐甫、倪若水同被礼遇，岑羲等忌之。又岑羲、崔湜恶崔日用，而邕与之交，遂贬邕舍城丞。

二月，乾陵立张庭珪隶书徐彦伯《刘延景碑》。

七月，万年县立薛稷撰并正书《王美畅碑》，见署礼部尚书昭文馆学士。

九月，立睿宗撰并正书《景龙观钟铭》。

九月，万年县立郭谦光隶书胡皓《崔敬嗣碑》，见署国子监太学助教。

十月十九日，入窆岐王李范正书卢粲《李贤志》。

昭陵立房琳正书崔融《房仁裕碑》，见署国子丞。

唐肃宗李亨（—762）、湛然（—782）、新罗金生生。

太极元年　延和元年　唐玄宗先天元年 （壬子 712）

正月十九日，改元太极，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旧纪》作辛未，即初三日）。七月二十五日，睿宗传位于皇太子李隆基。八月三

日，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七日，改元先天。

十月，京兆立玄宗书睿宗题额李迥《窦孝谌碑》。

十二月十六日，咸阳立殷玄祚正书娄师德《契苾明碑》，见署左肃御史。

坊州立褚庭诲正书杨齐哲《韦维善政论》，见署前洛州丞。

先天二年　开元元年　（癸丑　713）

七月三日，玄宗与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诸人定计诛太平公主党。十二月一日，改元开元。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

李邕起为江州别驾。

七月初三日，薛稷（649—）以太子少保为太平公主死党，不赦，赐死于万年狱。

张旭、贺知章、包融、张若虚始以“吴中四士”名世。

开元二年　（甲寅　714）

十一月七日，葬殇皇帝于武功西原。

李邕，六月，撰有《张韩公（仁愿）行状》。

贺知章撰有《戴令言志》。

季春上巳日，何延之撰《兰亭记》，叙右军《兰亭序》流传始末。

襄州立锺绍京正书韦承庆《偏学寺碑》，见署太子詹事越国公。

越州立贺知章撰并正书《龙瑞宫记》。

开元三年　（乙卯　715）

李邕季春入为户部郎中。

二月，严州立徐峤之正书康希铣《龙兴寺碑》。

十月十三日，陕州立徐峤之正书胡皓《姚懿碑》，见署行将作少监。

开元四年　（丙辰　716）

六月十九日，上皇睿宗（662—）崩于百福殿。十月二十八日，葬

于桥陵。

姜皎、张庭珪共相援引，为李邕谋取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嫉其躁，因而构成其罪，冬季，出贬松阳令。

八月，右武卫大将军画家李思训(651—)卒。时隔二纪，邕为之撰书神道碑铭。

容州立卢藏用撰并隶书《景星寺碑》，见署容州都督。

开元五年 （丁巳 717）

九月六日，改紫微省依旧为中书省，黄门省为门下省，黄门监为侍中。

三月，李邕赴任途中，道出兖州金乡，撰书《叶国重碑》。又撰《叶慧明碑》，国子监太学生韩择木隶书，七月，立在金乡。未至任，改括州司马。

十一月五日，收掇二王真迹得 158 卷。大王正书 3 卷、行书 150 卷、草书 150 卷。小王书都 30 卷、正书 2 卷。

十一月，敕秘书省昭文馆广召诸色能书者充抄书手，皆亲经御简。

徐浩登明经第；褚庭诲、殷践猷并举文儒异等科。

宋王傅、昭文馆学士柳冲卒，后六年，邕撰书《大雲寺碑》有称。

正月，酸枣县立吴光璧集王羲之行书卢藏用《三门碑》，光璧见署前华州郑县尉；藏用见署中书舍人（藏用中书舍人任上撰有《甘元柬志》或同时人窆）。

四月二十七日，陕州立徐峤之正书崔沔《姚彝碑》，见署行将作少监。

开元六年 （戊午 718）

十一月，李邕因宋璟奏请除渝州刺史。

工部侍郎吕延祚进吕延济、刘臣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文选》三十卷，以补李善《文选注》之不足。昭宗朝李匡乂非之，其

《资暇集》卷上以为五人之注比之李善,有"狗虎、鸡凤"之谓。

正月三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1510卷。

二月,京兆立行敦集王羲之书崔融《怀素律师碑》。

四月,陕州立梁昇卿隶书崔沔《杨元琰碑》。

六月,万年立魏华正书张说《魏叔瑜碑》,见署安州都督。

十月,洛阳立徐峤之正书崔日用《郑氏碑》。

十月,咸阳立魏华正书李湛然《窦希瑊碑》,见署陕王府司马。

十月,京兆立刘昇隶书李畬《苏氏造观音像碑》。

京兆立张庭珪隶书王简栖《头陀寺碑》。

长安立郭谦光隶书崔日用《姜维碑》,见署国子监丞。

开元七年 (己未 719)

九月四日,改昭文馆依旧为弘文馆。学生三十八人。

李邕撰有《孔子庙碑》,张庭珪隶书,十月十五日,立在曲阜孔庙。

五月,立徐峤之撰并隶书《永丰陂堰碑》。

八月,京兆立刘昇隶书裴耀卿《苏诜碑》。

十一月十日,安邑立侯焕正书赵隐仕《天尊像铭》。

十一月,大荔立玄宗隶书张说《王仁皎碑》。

开元八年 (庚申 720)

皎然(—793)生。

四月,长安立郭谦光隶书裴子馀《尹尊师碑》。

洛阳立玄宗隶书苏颋《卢怀慎碑》。

清河县立徐峤之正书姚崇《陶大举碑》。

华州立刘昇隶书李休光篆额咸廙《华岳精享昭应碑》,昇见署殿中侍御史;休光见署检校华州刺史。

开元九年 (辛酉 721)

李邕依常调,季春移官海州。水路返京,过巴硖,有《度巴硖》诗。途经汴州,闻崔颢美名,于馆中召见,及其献文,首章曰"十五嫁

王昌”,以为轻薄,乃斥去。有《大相国寺碑》。

道士司马承祯应召入京。三月,置石柱于景龙观,令其依蔡邕石柱(《石经》)三体书写老子《道德经》。

三月二十六日,定州曲阳立陈怀志行书韦虚心《北岳府君碑》,见署前邠州府参军直秘书省。

十月二十三日,京兆立释大雅集王羲之行书《兴福寺碑》(《吴文碑》),徐思忠等刻字。

十月,清河县立徐浩正书沈淮南《康正碑》。

十一月,兖州立张庭珪隶书狄光嗣《韦光珪碑》。

十一月六日,入窦岐王李范撰并正书《李嗣庄志》;入窦正书贺知章《封祯志》。

开元十年 (壬戌 722)

九月,张惟充知图书括访异书使。

三月朔日,王皇后季父王仁忠薨,李邕应其子所请,撰《王仁忠碑》志述之。八月朔日,立在太原(书人无考)。又撰《狄仁杰生祠碑》,张庭珪隶书,十一月,立在魏州。有《六公咏》,以狄仁杰为一章,张柬之等五人为一章。明年,胡履虚隶书,立在荆州。同时又撰有《狄公别传》三卷和《郭元振行状》。

李阳冰约于本年生。

均州刺史何延之命其子永写进所撰《兰亭记》。

开元十一年 (癸亥 723)

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中书令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

敕令释法明画丽正书院诸学士像。

李邕撰书《海州大雲寺碑》;六月十五日,刘知柔卒,邕应其婿李暠之请,撰写神道碑颂述之;应淮阴县令张松质之请,撰书《娑罗树碑》,十月,铭石立在本县大宁寺。十二月,立邕行书睿宗《孔子老子》、玄宗《颜子赞》立在州治孔庙。今冬起为陈州刺史。至任即撰书

《大雲寺讲堂碑》。

贺知章见任太常博士，以文学之士充丽正院修书学士，参撰《六典》及《文纂》。

三月五日，车驾还京都，司马承祯请还天台，玄宗赋诗以遗之。

韩滉(—787)生。

正月十七日，灌县立甘遗荣正书张敬忠《青城山常道观奏表》。

四月，越州立徐峤之正书姚弈序贺知章铭《徐师道碣》。

五月朔日，绛州立徐浩书李璿之《玉京观碑记》。

五月，京兆立梁昇卿隶书张说《郭知运后碑》。

六月，又立徐峤之正书康希铣《香积寺碑》，见署赵州刺史。

京兆御史台立梁昇卿隶书崔湜《御史台精舍碑》，见署殿中侍御史。

太原立玄宗撰并隶书《起义堂碑》。

立郭谦光隶书崔尚《冯仁碑》，见署国子监丞。

立裴濯正书张说《上党宫述圣颂》。

开元十二年 （甲子 724）

七月二十二日，废王皇后为庶人，寻卒。

张怀瓘卧病广陵，草撰《书断》。

正月立卢鸿撰并隶书《普寂禅师碑》。

十一月二十六日，桥陵立玄宗隶书苏颋《凉国公主碑》。

韩择木隶书《延庆观记铭》。

开元十三年 （乙丑 725）

四月五日，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贺知章以礼部侍郎充学士，韦述、吕向并以左补阙充直学士。

李邕，十一月中旬，在汴州谒见玄宗，诏献词赋，甚得帝旨。有

《杨历碑》,后锺绍京入朝补铭并行书,至十九年立在万年县。有《八卦坛碑》。又有《薛元允碑》,秘书郎白羲晊隶书,明年立在绛州。

正月十五日,永济立梁昇卿撰并隶书《伯夷叔齐庙碑》。

正月十七日,青城山立甘遗荣正书《常道观敕碑阴》。

二月十六日,昭陵立白羲晊隶书刘宪《乙速孤行俨碑》,见署秘书郎。徐元礼镌。

四月,蒲城桥陵立玄宗隶书张说《鄎国公主碑》。

六月,华阴立吕向撰颂并正书达奚珣《述圣颂》,见署左补阙集贤殿直学士。

七月七日,华阴立玄宗撰并隶书《华岳庙碑》。

十月,阳翟立魏栖梧正书卢奂《文荡律师碑》,见署著作郎。

开元十四年 (丙寅 726)

武惠妃宫中礼秩,一如皇后。五月二十六日,户部奏今岁户7 609 565,口 41 419 712。

李邕为殿中侍御史薛自劝与外生库狄履温所控,下狱当死。由许州人孔璋上书代死得免。春初,左迁遵化县尉。

九月十二日,泰山立玄宗撰并隶书《纪泰山铭》;又立梁昇卿隶书苏颋《东封朝觐碑》。

开元十五年 (丁卯 727)

李邕,正月廿五日,撰《端州石室记》。撰有《王有方碑》,梁昇卿隶书,元行冲篆额;又撰有《王行果碑》,书人无考。

锺绍京自温州别驾入朝,即日拜右谕德,寻转詹事,年80馀卒。

张怀瓘定稿《书断》,其前曾以行卷干谒吏部侍郎苏晋,兵部员外郎王翰,乞求后序,未果。九月,与其弟张怀瓌并应制举沉沦草泽科,擢翰林学士。

正月二十四日,入窆魏少游正书刘昇《魏靖志》。

九月三日,入窆杨汲正书贺知章《杨执一志》。

十月廿日，嵩山立宋儋撰并行书《道安禅师碑》，李镐篆额。

开元十六年 （戊辰 728）

李邕以功徙澧州司马。

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古迹总160卷，付集贤院依文拓本进内，分赐诸王。

三月，定州立蔡有邻隶书赵僎《卢舍那碑》。

七月十五日，登封立裴漼撰并正书《少林寺碑》，见署吏部尚书。

万年立玄宗隶书所撰《一行禅师铭》。

开元十七年 （己巳 729）

李邕有《龙兴观碑》立石蜀州。归至桂州，撰有《程府君碑》。历邵州，有《光八郎帖》（《濮王帖》）。又撰有《宁银青神道碑》。

徐浩自汝州鲁山县主簿进太子校书郎仍充集贤院校理，间兼待诏。

七月十五日，江州立张庭珪隶书李讷《佛陀禅师碑》。

九月三日，浮山县立玄宗隶书所撰《纪圣铭》，吕向正书碑阴及建碑年月，见署敕建造摹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颍王、永王文章。

万年县立玄宗隶书张说撰《王君奠碑》。

张嘉贞（666—）七月十三日卒，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恭肃。

开元十八年 （庚午 730）

李邕为旧友左羽林大将军臧怀亮撰书其神道碑及墓志铭，七月，立石（入窆）于三源县。应潭州司马窦彦澄之请，撰并行书《麓山寺碑》并阴，题名，九月十一日，黄仙鹤刻石立于麓山。

六月二十九日，刘昇（676—）卒。

五月，万年县立玄宗隶额梁昇卿隶书张说《萧灌碑》。

灌县立玄宗撰并行书《赐张敬忠手诏》，甘遗荣勒并隶题。

开元十九年 （辛未　731）

李邕撰并行书《东林寺碑》；五月，万年立邕序锺绍京铭并行书《杨历碑》。

二月，中书令萧嵩访得王羲之正书扇书一卷。

九月，洛阳立卫包隶书崔圆月《李自正碑》。

开元二十年 （壬申　732）

天下户 7 861 236，口 45 431 265。

五月，长安立锺绍京撰并行书《徐元贵碑》；又立锺绍京正书殷彦方《阿弥陀佛赞》。

八月二十日，入窆阳伯成正书王仲丘《薛璿志》，见署左司郎中。

十月，潭州立萧诚正书赵颐真《南岳真君碑》，见署荆府兵曹。

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窆正书贺知章《王氏志》。

十二月十四日，京兆立唐玄宗隶书《注道德经》。

清河立徐浩正书姚弈序张昇铭《陶公碑》。

开元二十一年 （癸酉　733）

八月，河中府立玄宗撰并隶书《后土神祠碑》。

十月二十八日，入窆阳伯成正书所撰《李肃志》，见署前左司郎中。

万年立梁昇卿隶书棣王洽《冯昭泰碑》，见署中书舍人内供奉；又立梁昇卿隶书陆坚题额冯绍正《请立冯公碑表》。

京兆立蔡有邻隶书孟匡朝《张去奢碑》。

开元二十二年 （甲戌　734）

李邕有《晴热帖》。与萧诚交游，戏鉴书迹。

张怀瓘本名怀素，奉诏改今名。

颜真卿、杜鸿渐、郗昂登进士第，李琚状元。颜真卿有《雁塔题名》。

八月十九日，张庭珪（658—）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

五月，立梁昇卿隶书苏颋《解琬碑》。

六月，顺安立苏灵芝行书《实谛寺碑》。

十月二十二日，入窆张若芬隶书万俟馀庆《张休光志》，见署许州县丞直集贤院。

开元二十三年 （乙亥 735）

李邕，季春起为括州刺史。六月廿二日，至当涂，有《胜和帖》。经越州，游秦望山法华寺，应户曹袁楚客之请，撰并行书《法华寺碑》。又有《越州华严寺钟铭》。

春日，徐浩正授监察御史充集贤院修撰。

十二月，徐峤之以洺州刺史为河北采访使举良刺史上闻。

颜真卿偕萧颖士、李华、赵骅、柳芳、殷寅、陆据、邵轸始作“开元八士”之交。

正月十五日，湖州乌程县立徐峤之正书徐陵《孝义寺碑》，见署银青光禄大夫湖州刺史。

正月，偃师立史惟则隶书孙逖《王同晊碑》。

四月，洛阳立宋儋撰并正书《珪禅师碑》。

四月，茅山立司马承祯撰并篆书《贞白先生碑阴记》。

五月五日，蜀州立玄宗行书《赐赵仙甫诗》。

七月，京兆立梁昇卿隶书韩休《张守让碑》。

九月八日，入窆正书徐安贞《萧谦志》。

华州立史惟则隶书王晫《杨暘碑》；立郑虔隶书《华山石阙题名》。

司马承祯(647—)卒。赠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先生。

开元二十四年 （丙子 736）

李邕撰书《普光王寺碑》。

徐浩丁父忧，服勤于洛阳。

颜真卿吏部铨选，试《三命判》，入高等，举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校书郎。始编纂《韵海镜源》。

徐峤之(677—)卒,李邕为之撰写碑文志述之(已佚)。

二月八日,赵州元氏立蔡有邻隶书邵混之《庞履温碑》。

二月,徐州立梁昇卿隶书崔沔《裴守真碑》。

四月,洛阳立史惟则隶书《邢义碑》。

五月,荥泽立梁昇卿撰并隶书《郑曾碑》。

七月四日,入窆玉真公主正书卫灵鹤篆额徐峤《金仙长公主志》。

八月,怀州立玄宗隶书并注《道德经》,皇太子绍、庆王琮等书注。

九月十八日,京兆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严挺之《大智禅师碑》暨阴,见署右羽林军录事参军集贤院待制兼校理。

十月,陕州立玄宗撰并行书《卢奂赞》。

十一月,闻喜县立玄宗行书张九龄《裴光庭碑》。

河中府立韩择木隶书赵良器《裴宽碑》。

开元二十五年 (丁丑 737)

四月二十一日,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

李邕撰书《怀道阇梨碑》,七月,立在福州;又书有"大乘爱同之寺"额。

零陵怀素生。

四月,京兆立史惟则隶书韩休《韦夫人碑》。

五月十五日,长安立史惟则隶书徐彦伯《万回神迹记》,又隶书并篆额阳伯成《碑阴记及赞》,见署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集贤院学士(待制)。

八月十二日,入窆温古行书羊愉《景贤大师身塔记》。

八月,临安立褚庭诲正书徐安贞《玄览律师碑》,见署谏议大夫。

立王良辅集王羲之书唐玄宗《令长新诫》。

清河立梁昇卿隶书李讷《李景伯碑》。

开元二十六年 (戊寅 738)

六月三日，立忠与玙为皇太子。

李邕撰有《许王素节碑》，李随行书，四月，立在京兆；有《张嘉贞碑》，蔡有邻隶书，四月，立在洛阳；有《千秋观碑并阴》，管卿行书，七月立在成都；有《玄觉碑》，天宝元年二月立石；又有《缙雲帖》及题龙泉乡开悟寺额。

颜真卿校书郎任上，其母殷夫人卒，年六十余，颜真卿兄弟丁内忧去职守丧。

二月二十五日，相州立蔡有邻隶书阎伯玙撰序颜真卿铭《尉迟公庙碑》及孙士良《尉迟公庙碑阴》。

六月，顺安立苏灵芝行书《高阳实谛寺碑》。

七月，洛阳立韩择木隶书裴总《洛阳食堂记》

秋日，磁州立蔡有邻隶书严浚《丛台赋》。

十月，立蔡有邻隶书严浚《定进岩碑》。

十一月，济源立徐浩正书梁陟《李造碑》，见署监察御史集贤院修撰。

开元二十七年 （己卯　739）

李邕应嵩岳寺道奂禅师请求，撰《嵩岳寺碑》，胡英集王羲之书铭石。有《奂上人帖》。本郡龙兴观道士邓思璀十月七日卒，为其撰《邓天师碣》，次年二月，立于麻姑山。十一月十七日，旧友太子宾客崔沔卒，为撰《墓志铭》，大历十三年，徐珙隶书铭石入窆。

正月二十七日，入窆褚庭诲正书刘彤《程伯献志》，见署给事中。

三月，唐州立萧诚行书张鼎《李適之碑》。

五月三日，易州立苏灵芝行书王端《易州铁像碑》，见署前行易州录事。

秋日，磁州立蔡有邻隶书严浚《登丛台怀古赋》。

冀州立田琦隶书并题额王端《述刊勒手诏书》。

开元二十八年 （庚辰　740）

是岁，天下县 1 573，户 8 412 871，口 48 143 690。京师米斛不满200，天下富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

李邕有《邓天师碣》，二月二十日，立在麻姑山；有《开元寺碑》，七月，铭石立在本郡。华州立邕撰并行书《李思训碑》。

二月，泾州立褚庭诲正书彭杲《牛仙客父祖赠官记》。

八月，万年立梁昇卿隶书卫包篆额苏颋《庞承宗碑》。

十月十六日，易州立苏灵芝行书徐安贞《田琬碑》，见署逸士。

十一月十九日，入窆湛然隶书郑僎《郑德曜志》。

长安立韩择木隶书吴巩《尹愔碑》。

开元二十九年 （辛巳　741）

李邕有《淄川郡述德诗》，崔器记，崔尚、蒋涣、王晃等序，天宝十年九月，立在本郡。又有《惠沼神塔碑》。移官滑州。七月十五日，恩许入朝上计。为故吏淄川令裴大智撰神道碑，萧诚正书，十一月，立在济源。有《独孤册遗爱碑》，萧诚行书，立在襄州岘山。又有《龙兴寺净土院碑》，韦同隶书，开元末，立在华州。至洛，会王昌龄赴任江宁丞，昌龄有《送李十五》诗送别。其历洛，而京，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官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为人阴中，不得留，遂辞归州。

萧诚见署司勋员外郎。

三月三日，入窆正书徐安贞《张九龄志》。

三月，太原交城立高氏行书《安公美政颂》。

五月十八日，京兆立史惟则隶书阳伯成《大智禅师碑阴记》，见署伊阙县尉集贤院待制兼校理。

六月一日，易州立苏灵芝行书并篆额唐玄宗《梦真容碑》。

六月二十四日，太原交城立高氏行书苏琬题额林谔《铁弥勒像颂》，见署太原府参军房璘妻。

十月，易州立苏灵芝正书梁德裕《候台记》。

十月，京兆立张旭正书张九言《郎官石记序》。

开元末年，桥陵立玄宗行书徐峤之《金仙长公主碑》；冀州立玄宗撰并行书《敕冀州刺史杨源复诏》；襄州立史惟则隶书阎宽《卢僎碑》。

天宝元年 （壬午 742）

正月朔，改元天宝。诏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二月十一日，上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二十日，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左右丞相依旧为仆射，又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下天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其年，天下郡府 362，县 1 528，乡 16 629。户 8 525 763，口 48 909 800。

李邕，正月上旬，撰并行书《李秀碑》，郭卓然摹勒上石立在范阳。二月初八日，洛阳立邕撰并行书《卢正道碑》。去冬今春，因奂上人之请，撰书《大照禅师塔铭》，二月十五日，立在河东藏海寺。又有《京兆西明寺道理碑》。归至滑州，撰并行书《灵岩寺碑》，十一月十五日，立在齐州。

颜真卿，九月十八日，以前资官由扶风郡太守崔琇荐举，登“博学文词秀逸”科，十月，依资授京兆醴泉县尉。

正月三日，入室湛然撰并正书《李氏志》，见署大福光寺僧。

二月十五日，洛阳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苏颋《管元惠碑》，见署河南府伊阙县尉集贤院直学士。

二月，洛阳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卢僎《普寂碑》，见署伊阙县尉集贤院待制兼校理。

三月二日，台州立韩择木隶书崔尚《桐柏观碑》（玄宗正书题额），见署翰林院学士、庆王府属。

四月十日，华阳县立韩择木隶书韩贲《告华岳文》，见署诸王侍书荣王府司马。

四月二十三日，兖州曲阜立包文该正书《兖公颂》。

七月十五日，盩厔立戴仮隶书戴璇序刘同昇颂《玄元灵应颂》。

九月，蕲州立吕向正书李適之《法现禅师碑》，见署主客郎中右补阙集贤殿学士。

十月十三日，入窆徐珙隶书陈齐卿《慕容相暨妻唐氏志》。

十二月一日，偃师入窆张旭正书张万顷《严仁志》。

长安立吕向行书梁陟《韦坚碑》。

天宝二年 （癸未　743）

李邕有《李希倩碑》，梁昇卿隶书，徐浩篆额，四月，立在伊阳。又有《文纲碑》（已佚）。芮挺章选录开元初至本年诗为《国秀集》，收邕《咏雲》诗一首。有《滑州大厅铭》。

十二月二十日，太子宾客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

九月十二日，入窆苏灵芝正书陈遘《刘智志》。

十月，舞阳县立史惟则隶书徐浩篆额王利器《舞阳侯祠堂碑》，史惟则见署集贤院待制，徐浩见署京兆府司录。

十一月十五日，浮山县立史惟则隶书崔明允《庆唐观金箓斋颂》，见署伊阙县丞集贤待制兼校理。

十二月十一日，京兆立怀恽行书《隆阐法师碑》。

寿州立吕向正书史惟则篆额《卢成务碑》。

济源立萧诚行书玄宗隶额蔡玮《玉真公主祥应记》，见署弘农郡别驾。

天宝三载 （甲申　744）

正月朔改年为载。

李邕以常调迁汲郡。

正月初五，贺知章还乡，玄宗遗左右相已下祖别于长乐坡，上赋诗赠之。至乡，舍会稽宅为千秋观。无几寿终（659—）。

正月，襄州立萧诚行书周择从《库狄履温碑》。

二月五日，登封县立徐浩隶书裴迥篆额李林甫《嵩阳观碑》，徐浩见署检校金部员外郎。

二月，凤翔立史惟则篆书《香谷渠碑》。

四月十二日,入窆裴炫隶书吕向《豆卢建志》。

六月十七日,亳州立玄宗隶书所撰太子亨题额《真源观钟铭》。

七月,咸阳县立韩择木隶书并题额张垍《豆卢建碑》,见署诸王诗书荣王府司马。

十二月,陕州立棣王琰隶书《三门祀功颂》,太子亨题额。

入窆徐珙撰并书《□教志》,见署洛阳进士。

天宝四载 (乙酉 745)

李邕开元年间撰有《任令则碑》,并行书,十二月廿八日,立在武功。

九月,京兆立玄宗隶书所注《孝经》(太子亨题额)。

九月,洛阳立史惟则篆书李適之《李象碑》。

汝州梁县立史惟则隶书孙逖《宋公碑》,见署阳翟县尉集贤校理御书。

天宝五载 (丙戌 746)

李邕移官北海。时邕从侄李之芳自尚书郎出为齐州司马,杜甫再游齐鲁首访之,并邀邕来齐相晤。邕自北海而至,相见甚欢,日与同游。甫与邕杯酒相接之间,纵谈当代文学,于甫祖杜审言极表倾倒之意。时李白初至,作《上李邕》诗谒见之。高適时在汶阳,邕驰书相召,適即来相聚。初秋,甫、適随邕返郡,十月,至青州。途经淄州,太守裴敦复荐太子良娣姐夫柳勣,邕赠马相结交。又与邺郡太守王琚友善,皆华首外迁,书疏往复,以谴谪留落为慊。权相李林甫阴议除之。会柳勣下狱,李林甫于是引入案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别遣监察御史罗希奭往郡按之。有《徐惲碑》,徐浩行书,八月,立在济源。有《窦天生碑》,段清云正书,明年二月八日,立在泾阳县。

四月间,颜真卿以清白为关内道黜陟使王鉷荐举,授通直郎陟长安县尉。

徐浩以河南府督邮迁河阳县令。

五月二十五日，入窆褚庭诲正书王寿《李氏志》。

七月，同官立韩滉撰并正书卫包篆额《弥勒石像碑》，滉见署同官主簿；包，集贤院学士。

七月，许州立史惟则隶书张粲《颍阳观碑》。

十一月，京兆立蔡有邻隶书崔潭《龟诗》。

天宝六载 （丁亥　747）

正月五日，李邕（675—）强死于北海郡任上。权葬郓东。至代宗朝工部尚书卢正为之讼理，得昭雪，追赠秘书监。大历三年，尚书右丞韦元甫供钱二十万以及刍灵之物，命其侄暄自郓城营护归葬于洛阳北原祖茔。族子著作郎李昂撰《墓志铭》志之。有文集七十卷，及《狄仁杰传》三卷，《金谷园记》一卷，并行于世。

颜真卿以长安县尉迁监察御史，与鲜于仲通为同僚，始结游。巡复诸陵。秋季充河东、朔方军试复屯交兵使。至五原县理冤狱。友陆据为父颜惟贞撰写神道碑铭，蔡有邻隶书，十月，立石于万年县墓田。

六月，万年立张少悌行书裴炫《王四娘塔铭》。

七月，孟州立徐浩隶书祁顺之《开梁公堰颂》。又立薛希昌隶书卫凭《贞一先生庙碣》，见署右监门卫兵曹参军。

七月，洛州立徐浩正书邢韶《程玄封碑》。

十月十九日，入窆蔡希寂正书张阶《蔡希周志》，见署洛阳县尉。

万年县立玄宗撰并隶书太子亨题额《杨玄琰碑》。

天宝七载 （戊子　748）

颜真卿秋季充河西、陇西军试复屯交兵使，岑参作《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送行。始结交哥舒翰、鲁炅诸人。

正月，洛阳立李遇正书徐浩撰并隶额《窦戒盈碑》。

二月，孟州立徐浩隶书平洌《房琯遣爱颂》。

五月十五日，长安立张少悌行书《佛顶尊胜陀罗尼咒》。

五月二十五日，定州曲阳立戴千龄隶书并篆额李筌《北岳恒山安天王铭》暨阳。

七月二十九日，洛阳入窆蔡希寂正书张阶序韩液铭《李琚暨妻薛氏志》，见署洛阳县尉。

八月，伊阳立胡霈然行书篆额王雄风《乘真禅师碑》。

十月二十□日，济宁立蔡有邻隶书并篆额韦述《章仇元素碑》，见署翰林院学士左卫率府□□□□。

天宝八载 （己丑 749）

颜真卿，春季充河东、朔方军试复屯交兵使，劾荥阳郑氏兄弟三人母亡殡寺二十九年未葬。返京，奏金吾将军李延业素召蕃客内宴引驾使不报。并从处置之。由是，天下耸动，朝廷肃惮。八月，迁殿中侍御史。未几，因援救中丞宋浑，未果，为宰相杨国忠所忌，出为东都畿采访处置使判官。

五月五日，雍州立韩择木隶书卫包篆额冯用之《赵公颖碑》。

七月，洛阳立徐浩行书李造《郭玄宗碑》。

十月九日，入窆正书徐浩《陈希望志》。

十月，偃师立徐浩正书史惟则篆额李邕《徐峤之碑》。

十月，京兆立史惟则隶书边旻《刘大雅碑》；蓝田立卫包正书并篆额李幼卿《石门汤泉记》，见署太仆寺主簿文学直修书院。

天宝九载 （庚寅 750）

颜真卿，十月，再入御史台为殿中侍御史。

四月十五日，登封立勤行行书崔琪《灵运禅师塔铭》。

四月，华州立卫包撰并篆书《三方功德颂》《金箓斋颂》，又篆书韦元忠《岳庙古松诗》，撰并正书《御书华岳碑堂修饰记》《修金天王庙灵异述》，见署右补阙集贤殿修书。

六月，立王士则隶书崔恁《尊胜石幢铭》。

十一月，长安立刘秦行书李邕《陈文叔碑》。

十二月，洛阳立史惟则隶书《刘飞造像记》。

三月十五日，咸宁入窆张少悌正书申屠洮《屈元寿志》。

万年立蔡有邻隶书陶翰《徐筠碑》，见署翰林待诏左卫率府兵曹参军。

长安立韩择木隶书韦述《韦凑碑》。

汾州立邬彤行书孙宰《刘寂碑》。

天宝十载 （辛卯　751）

颜真卿季春改兵部员外郎。

二月，长安人窆韩择木隶书王齐同《棣王琰志》。

三月，洛阳有徐浩行书《康珽告》。

四月，立胡霈然行书陈章甫《七祖堂碑》。

七月，襄州立韩择木隶书李憕《放生池碑》。

七月，立徐浩正书郑炅之《明禅师碑》。

十月，入窆隶书徐浩《张庭珪志》。

十一月，洛阳立徐浩正书史惟则篆额韦述《新安郡太守张君碑》。

长安立蔡有邻隶书冯用之《章仇兼琼碑》，见署左卫率府兵曹参军集贤院待制。

十二月除日，苏州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赵居贞《春申君庙碑》，见署前广陵大都督府户曹参军集贤院待制。

天宝十一载 （壬辰　752）

三月二十八日，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将作大匠、少匠为大、少二监。

颜真卿，三月，偃师首阳山立其所撰并正书之《郭虚己碑》《郭揆碑》。四月二十二日，西京千福寺法华院内立其应楚金禅师之请而正书之岑勋《多宝塔感应碑》，检校都官郎中徐浩题额。

二月廿四日，入窆李凑正书张之绪《李氏志》。

二月，长安入窆韩择木隶书王齐同《棣王志》。

二月，洛阳立徐浩撰并正书《玄隐禅师碑》。

二月，邢州立史惟则隶书宋鼎《能大师碑》，见署阳翟县丞；又立蔡有邻隶书《能大师碑》。

三月六日，入窆胡需然隶书《周献志》。

闰三月，洛阳立徐浩隶书李华《东光县主碑》。

七月，入窆韩择木正书褚(洪)孝伟《荥阳王妣朱氏志》。

十月，清河立徐浩正书翟颋《杜夫人碑》。

十一月廿三日，咸宁入窆韩择木正书赵楚宾《南川县主志》，见署太子及诸王侍书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

十二月，京兆立韩择木隶书韩晔《瑶台寺大德碑》。

天宝十二载 （癸巳 753）

颜真卿春日自兵部员外郎出为平原郡太守。六月，赴任，岑参赠《送颜平原》诗壮行之。

正月，立蔡希综撰并行书《治浦桥记》。

八月十六日，扶风县立玄宗撰并隶书《杨珣碑》(太子亨篆额)。

十二月，潞州立玄宗撰并隶书《启圣宫颂》。

万年立太子亨撰并行书篆额《杨铭碑》。

天宝十三载 （甲午 754）

颜真卿至任平原郡，始修《韵海镜源》条目，成二百卷。至安禄山作乱止，纂成四分之一。季冬，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安禄山判官殿中侍御史平冽、监察御史阎宽、李史鱼，右金吾胄曹参军宋謇巡按至郡。颜真卿迎之于境，相与狎游安德县东北之东方朔庙，见其开元八年(720)，原刺史韩思复所立夏侯湛《画赞碑》，磨损已甚，于是援翰重书，复刊于石，并撰书碑阴记以志之。后十余年，由是州别驾吴子晁起立于庙前。其前颜真卿尚撰书二碑，一纪周时台省擢牧诸郡十余人者，立于郡门之内，一纪颜氏曹魏时颜斐，高齐时颜之推俱平原太守，至颜真卿凡三典兹郡，立于郭门之西。

归登(—820)生。

正月十八日，张怀瓘作《书估》。

二月七日，忠州立玄宗撰并行书《送康昭远诗》。

二月，河中立徐浩隶书苏颋《薛悌碑》，见署武部郎中。

四月，万年立玄宗撰并隶书《武氏碑》（太子亨题额）。

十一月二十九日，入窆湛然正书郑沔《郑炅志》，见署大福光寺僧；又入窆田颖书窦忻《刘元尚志》。

闰十一月二十九日，入窆刘秦正书张渐《唐玄宗第五孙女志》，见署太子宫门郎翰林院供奉。

洛阳立徐浩隶书并篆额陆据《裴仲将碑》。

万年立徐浩隶书《韦馀庆碑》。

天宝十四载 （乙未 755）

十一月初九日，安禄山发十五万众反于范阳，以讨杨国忠为名，引兵南下，直趋洛阳。十九日，安禄山下博陵，至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伪降之。十二月初二，安禄山自灵昌郡渡河。初六，下陈留。初九，拔荥阳。十二日，陷东都，杀留守李憕，中丞卢奕，判官蒋清。

颜真卿初知安禄山必反，遣使奏告，状留禁中不报。又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廪，以预战事。及禄山反，即派司兵参军李平乘驷间道奏报。并与洛阳封常清联络，得募捕逆贼牒数十封回平原。颜真卿遣亲客密诣诸郡，由是多有应之者。安禄山陷东都，遣段子光携李憕等三人首级以胁降河北诸郡。十八日，至平原，颜真卿腰斩子光，祭奠烈士，即日揭义旗起兵以拒逆，召清池尉贾载、河内尉穆宁及清河尉张澹诣郡计事。河间司法李奂、济南太守李随、饶阳太守卢全诚，景城司马李玮，邺郡太守王焘各率众以归，共推颜真卿为盟主。颜真卿遣堂甥卢逖赴藁城联络常山太守堂兄颜杲卿共举义旗。二十二日，颜杲卿杀安禄山所署将吏，起兵反正，河北十七郡并加响应，复归朝廷。附逆者仅范阳、卢龙、密雲、渔阳、汲、邺六郡而已。

十二月，韩择木见任鲁郡太守。

徐浩自武部郎中出守襄州，寻加本州防御守捉使。

二月，立胡霈然隶书《苗公归乡记》。

二月，洛阳立徐浩正书隶额达奚珣《姚弈碑》。

天宝十五载 唐肃宗至德元载 （丙申 756）

正月朔，安禄山称帝于洛阳，国号燕，改元圣武。六月初九，潼关失守，十三日，玄宗仓皇西奔，十四日，至马嵬驿，军士杀杨国忠诸人，玄宗被迫缢死杨贵妃。十五日，将发马嵬，百姓请留太子李亨，许之。十七日，长安沦陷。七月初九，太子李亨至灵武，十二日，即皇帝位，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

颜真卿，正月十五日，因守城有功，拜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始结交李光弼。三月初，颜真卿采纳李萼意见，联结清河郡，并以平原、清河、博平三郡之兵收复魏郡，由是军声大振。是时，平卢游奕使刘正臣将谋范阳归顺朝廷，颜真卿遣判官贾载泛海计会，并将长子颇为质信，以谋联结。时颇年仅十岁余。二十九日，李光弼迁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颜真卿同日加河北采访处置使，分理本道民事。潼关失守，李光弼、郭子仪引兵退入井陉，颜真卿复区处河北军事。肃宗即位灵武。有《修书帖》。不日，诏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史，依旧守平原郡。散官加银青禄大夫。十月，安禄山侵陷河间、景城诸郡，又遣将攻平原城。颜真卿谋与众，知孤军不敌，乃于二十二日弃城渡河，经广陵、丹阳，然后水路至荆、襄，与各地采访使计会，竟不得兵马。

春日，张旭与李白相遇于溧阳，李白作《猛虎行》送别之。

肃宗即位后，徐浩奉召赴行在，自襄阳太守改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

正月二日，入窆顾诚奢隶书苏预《高元珪志》，见署太子率更丞翰林院待诏。

四月一日，入窆田颖行书《张希古志》。

五月十九日，入窆苏灵芝行书《刘奉智暨妻孙氏志》。

六月，越州立徐浩行书万齐融《玄俨律师碑》，见署武部郎中。

武州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窦公衡《山阴述》。

天宝年间，陕州立史惟则隶书贾廷瑶序王谭铭《裴遂碑》。

至德二载 （丁酉　757）

正月初六，安庆绪杀其父禄山，寻篡位。二月十日，肃宗至凤翔。二十八日，收复西京。十月十八日，收复东京。十九日，肃宗发凤翔，遣使入蜀奉迎上皇。二十三日，入西京。是日上皇发蜀郡。十二月初四，上皇还西京。近所改郡名、官名，一切复旧，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

颜真卿由荆、襄北超行在，行次武当，授宪部尚书。四月，至凤翔。弹劾吏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五月十日，房琯获罪罢相，左拾遗杜甫疏救之，肃宗怒，诏与韦陟、崔光远三司推问。寻代韦陟为御史大夫。十月十二日，广平王俶东向讨贼，出辞凤翔，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上马，颜真卿进状弹之。十九日，扈从肃宗发凤翔，二十三日，随帝至京。奏请祭太庙，筑坛于野，皇帝三日哭，肃宗酌而从之。十一月二十八日，因忤旨出贬同州。十二月十五日后至任。

韩择木，十月，见任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盖并为颜真卿宪台、御史台副手。有《狄公帖》。

中书舍人徐浩，十二月十五日，以灵武扈从立功之臣加兼尚书右丞，封爵会稽县开国男。充使搜访图书，收获二王等书迹二百余卷，殿中侍御史集贤院直学士史惟则，两京收复后，即奉使晋州，博访书画，得扇书《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献至阙下，肃宗赐帛一百匹。

十一月十五日，范阳立苏灵芝行书张不矜《宝塔颂》，见署经略军胄曹参军。

至德三载　乾元元年 （戊戌　758）

初五，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五月十九日，立成王淑为皇

太子。

颜真卿，三月五日，迁蒲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封爵丹阳县开国侯。十八日，至任。是时侄泉明于常山求得其兄季明之首，九月三日，扶榇归京，道出蒲州，颜真卿撰《祭侄季明文》奠祭之。十月初九，因酷吏唐旻之诬，左迁饶州刺史。十二日，途经华阴，谒金天王祠，有《华岳庙题名》。二十一日，至洛阳，撰书《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张怀瓘，四月，撰《书议》。

八月三十日，湖州立邬彤行书《金刚经》《尊胜经》。

窦臮于京始撰《述书赋》。

蒲州立玄宗撰并隶书《登逍遥楼诗》。

胡证(—828)生。

乾元二年 （己亥 759）

颜真卿游览鄱阳县荐福山，见欧阳询所书《荐福寺碑》，建亭护之，后人因名“鲁公亭”。与元结游，规其苟戏。六月九日，除升州刺史充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途经金陵，有《与蔡明远书》。秋末至任，撰《天下放生池碑铭》一章，绢写托宣谕使元琮随表奉进，兼乞肃宗御书题额。又作《与蔡明远书》。撰《李侍御构写真赞》。

韩择木，五月，见任右散骑常侍。

张旭，二月八日，书有《千字文》，或即卒于是年(约 675—)。

五月，蕲州立史惟则隶书张粲《杜敏生祠记》。

八月十五日，缙雲立李阳冰撰并篆书《城隍庙记》，见署缙雲县令。

十二月，入窆李潮撰并隶书《彭元曜志》。

缙云立李阳冰撰并篆书《忘归台铭》。

乾元三年　上元元年 （庚子 760）

闰四月十九日，改元上元。

颜真卿，正月十九日，受召入朝，未至京，初为刑部侍郎，寻改

尚书，晋爵县公。七月下旬，擘窠大书《天下放生池碑铭》，随表进奉，复乞肃宗御书题额，既许，未及下，因与御史中丞敬羽语及政事，忤旨，八月十六日，出贬蓬州长史，客次新政县，因故旧鲜于昱之请，为其父鲜于仲通撰写《离堆记》。

韩择木，闰四月二十二日，以右散骑常侍为礼部尚书。

徐浩，十月，自国子祭酒出贬庐州长史。

五月，张怀瓘作《二王等书录》。

十月，立卫秀集王羲之书郭翥《梁思楚碑》。

上元二年 （辛丑　761）

九月二十一日，去上元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十一月）为岁首。

五月二十八日，宗正卿李齐物（道用）卒，颜真卿为其撰写神道碑铭。

庐州长史徐浩，正月，自合肥至豫章，与江西观察使韦元甫等五十九位名公俊髦相集宴，独孤及作《豫章冠盖盛集记》志其事。三月，画家侍御史韩至清至豫章为徐浩写真，独孤及又题赞歌颂之。

张从申见任秘书省正字。

正月十一日，入窆刘秦行书赵昂《刘奉芝暨妻赵氏志》，见署卫尉寺丞翰林院待诏。

正月，凤翔立韩择木隶书肃宗篆额《来曜碑》（张镐撰序，萧昕撰铭）。

七月二十二日，缙云立李阳冰撰并篆书《孔子庙碑》。

八月十九日，韦陟（697—）卒，赠荆州大都督。

王维（701？—）卒。

唐代宗宝应元年 （壬寅　762）

建巳月（四月）初五，玄宗（685—）卒。十五日，改元宝应，复以建寅月为正月。十八日，肃宗（711—）卒。二十日，皇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

代宗即位后，召拜颜真卿为利州刺史。五月十六日，途经新政县，正书旧文《离堆记》。时因羌围利州城，不得入，乃追赴上都。十一月初，归至西京。十二月下旬，京兆尹、户部侍郎刘晏以颜真卿文学正直举以自代，除户部侍郎。

韩择木，三月二十八日，以礼部尚书为太子少保。

徐浩，六月，自庐州长史应召回京，复为中书舍人，加银青光禄大夫，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

李阳冰，十一月十日，在当涂县令任上为李白编集，并为之撰《草堂集序》。

怀素，本年先后自零陵出访。

三月，舒州立徐浩隶书房琯《璨大师碑》。

七月，缙云立李阳冰撰并篆书《重修文宣王庙记》，见署缙云令。

凤翔立韩择木隶书元载《来曜碑阴记》。

宝应二年　广德元年（癸卯　763）

闰三月十七日，葬玄宗于泰陵。二十六日，葬肃宗于建陵。十一日改元广德。

颜真卿，三月，改吏部侍郎，寻复阶银青光禄大夫。正书独孤及《韦缜碑》。八月二十七日，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加阶金紫光禄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置使。未行，受代。十月初七，扈从代宗奔陕州，迁尚书右丞。十一月初，正书其父颜惟贞、母殷氏《秘书少监》、《兰陵郡太夫人》两告。

韩择木，以太子少保致仕。

广德二年（甲辰　764）

正月初五，颜真卿除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营汾晋等六州宣慰使，诏谕旧友仆固怀恩，未行。因尚书刘晏改任太子宾客，留知省事。三月二十二日，晋封鲁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七月四日，友临淮郡王李光弼卒，年五十七，颜真卿为其撰写神道

碑铭，张少悌行书铭石。十一月十四日，汾阳王郭子仪自泾阳入朝，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并于安福寺举行兴道之会。左仆射郭英乂谄事军容使鱼朝恩，礼遇高于六部尚书，颜真卿即疾书纠之，有《与郭仆射书》。不数日，为郭子仪撰并正书《郭公家庙碑》。

五月，凤翔立韩择木隶书史惟则篆额房琯《李岘碑》。

潞州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元载《李抱玉碑》。

永泰元年 （乙巳 765）

正月朔，改广德三年为永泰元年。

颜真卿，正月，正除吏部尚书，会诏赠韦陟谥曰忠孝。颜真卿以为忠孝不并立，拟议太高，上《驳吏部尚书韦陟谥忠孝议》奏改，不从。交游于太子太保李光进，自二月十四日《捧袂书》始，历闰十月十四日《奏事》，至翌年二月十一日《疏拙》，先后八首。撰并正书乃祖《颜显甫碑》，立于万年县祖茔。八月仲秋日，因刑部郎中孙宿之请为其父即座师孙逖文集作序。有《南来帖》。

三月，立陆宗隶书窦蒙篆额张谓《宋武受命坛记》。

四月二十九日，武昌立魏万理行书阎伯均《黄鹤楼记》，李阳冰篆额。

五月十一日，武昌立李莒隶书裴虬《怡亭铭》，李阳冰撰序并篆书。

九月十三日，入窆正书吴通微《韩氏志》。

十一月，潞州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张楚金《郑刘婴碑》。

长安立张少悌正书陈翊《桑如珪碑》。

万年立徐浩隶书王缙《郭敬之家庙碑阴并子孙题名》。

永泰二年　大历元年 （丙午 766）

十一月十二日，改元大历。

颜真卿，二月，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之于朝，宰臣元载坐以诽谤时政，奏贬。二月初九，出为硖州司马，旬馀改吉州别驾。十月，因旧友康没野波之请，为其父康阿义屈达干撰写神道铭。十一

日至蓝田，有《疏拙帖》(《硖州帖》)。赴贬地，道出邓州内乡，扫祭二嫂陈氏之墓，并草书其碑立于墓所。六月，至荆州，经烈士左伯桃墓，节概交感，撰诗鸣之。七月初，次江州，上庐山，八日题名于东林寺，九日题名于西林寺。至任，撰并正书《鲜于仲通碑》。又有《奖谕仲通碑》。

杜甫作《八哀诗》哀念李邕，《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亟颂张旭，《李潮八分小篆歌》力宣韩择木、蔡有邻及李潮。

七月一日，恒州真定立王士则正书并篆额王佑《李宝臣碑》，见署推勾官司议郎。

十一月，人窆吴通微正书赵早《韦器志》。

万年立史惟则隶书徐浩《庾光先碑》。

本年，瞿令问于江华县令任上书元结文凡四通：三月十五日，隶书《舜庙置守户状》；五月十一日，三体《朝阳岩铭》；十二月廿日，篆书《窳尊铭》及隶书《寒亭记》，立在永州祁阳。

大历二年 （丁未 767）

十一月十四日，改黄门侍郎依旧为门下侍郎。

颜真卿有《守政帖》。十月二十六日，游靖居寺；二十七日，题名于寺壁。

徐浩自中书舍人迁工部侍郎。五月二十五日，除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刘长卿、皇甫曾赠诗送行。怀素自潭州南下投靠之。

杜甫，十月十九日，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又极颂张旭草书。

日僧最澄(—822)生。

十一月，陇州立史惟则隶书邵说《新筑陇州城记》。

咸阳立徐浩正书常衮《承天皇帝墓文》。

十一月二十□日，京兆立李阳冰篆书李季卿《栖先茔记》《三坟记》。

洛阳立徐浩行书席豫《严浚碑》。

京兆立有韩择木隶书裴士淹《孙志直碑》。

大历三年 （戊申　768）

颜真卿吉州司马任上，编有《庐陵集》十卷。四月，除抚州刺史。为道士谭仙岩书《马伏波语》。至任抚州，即整理旧编《韵海镜源》增广之。

怀素自广州返回潭州，知遇于州牧张谓。

徐浩，十月间，自广州入朝为吏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

正月，耀州立史惟则隶书于休烈序刘单铭《于默成碑》。

正月二十七日，京兆立史惟则隶书元载《郭英乂碑》。

三月，洛阳立徐浩撰并行书《魏少游碑》。

三月十五日，富平县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杨炎《李楷洛碑》，见署守都水使者集贤殿学士仍翰林待制。

四月，汾州立张少悌行书韩雲卿《马璘德政碑》。

六月廿九日，人窆吴通微撰并行书《李氏志》，见署大理评事。

八月，万年徐浩隶书邵说《王延昌碑》，见署广州都督。

闰八月九日，永州祁阳立袁滋篆书元结《唐颜铭》。

徐浩有行书《朱巨川告》（八月四日敕下）。

十一月，立段季展行书崔巨《禹庙碑》。

同州立史惟则隶书李邕《王仁忠碑》。

柳公绰（—832）生。

大历四年 （己酉　769）

颜真卿，正月二十五日，撰并正书《桥仙观碑记》。三月春日，撰书《魏夫人仙坛碑铭》。嗣后又撰书《华坛仙坛碑》。四月初，撰书《谢康乐翻经台记》；二十四日，撰书《允南碑》《乔卿碑》《幼舆碑》《允臧碑》。

怀素因左庶子张谓之召，自潭州入京。

二月十日，入窆刘朝正书孙成《慕容曦皓志》，见署楚州功曹参

军直集贤翰林供奉。

三月，偃师立韩择木隶书李阳冰篆额韩雲卿《徐昕碑》。

三月二十四日，登封立徐浩正书王缙《大证禅师碑》。

冬日，江阴立张从申书《西王母授黄帝秘诀》。

十一月，万年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元载《辛雲京碑》。

三原立韩择木撰并隶书《臧希忱碑》。

沈传师(—827)生。

大历五年 （庚戌　770）

颜真卿，年初因旧友徐缜之请，撰《徐秀碑》，三月，韩择木隶书，李阳冰篆额，立于河南偃师。五月，为舅氏殷践猷及其子殷摄撰神道碑铭，正书铭之。为表兄先刺史张景佚撰并正书《清德颂》，立之于城郭。十二月，因故人宋璟之孙宋俨之请，始以卢谌行状，撰写《宋璟碑》。撰并正书《元子哲遗爱颂》，立于崇仁县。

二月，京兆入窆程浩撰并正书史惟则篆额《裴冕志》。

三月二十一日，万年入窆史惟则隶书常衮《王铁志》。

六月一日，上元立张从申行书并篆额许登《福兴寺碑》，见署大理评事。

九月三日，宁阳立李阳冰撰并篆书《庾公德政碑》。

十月十五日，三原立韩秀弼隶书并篆额张孚《臧希晏碑》。

万年入窆徐浩正书杨炎《杜鸿渐志》。

立吴通微行书元载《裴冕碑》。

正月，阿倍仲麻吕(晁衡)(约 698—)卒，赠潞州大都督。

大历六年 （辛亥　771）

颜真卿，三月下旬，撰并正书《戒坛碑》。四月，撰并正书《仙坛记》。六月，正书旧友元结《大唐中兴颂》，立于祁阳石崖。撰《慈恩寺常住庄田地碑》，韩择木隶书，代宗篆额，八月，立石京兆。撰并正书《千金陂碑》。有《案杨志坚妻求别适判》，《宝应殿记》。又《临川集》十卷，左辅元编次之。八月，经江州，水路至上元，作茅山游，道出溧

水县，复见古烈士左伯桃墓，遂题旧诗于蒲塘客舍。撰书《横山庙碑》祈祷山神。有《泾县碑》《江宁国题名》《玄武湖记》。游蒋山寺，书李白《志公像赞》于寺壁。南下苏州，游虎丘，书铭清远道士、周恭子《游虎丘诗》于岩际，并题诗和之。十二月，祭扫白下祖茔，撰并正书《颜含大宗碑》。又撰书《颜默碑》。

三月，滁州立李阳冰撰并篆书《新泉铭》，又立李阳冰篆书《琅邪泉题名》。

三月，京兆美原县立萧森撰并集王羲之书《永仙观碑》，见署丹州别驾。

闰三月，长安立张楚昭行书韩择木篆额于益《再修信行禅师碑》。

五月，万年立史惟则隶书并篆额韩雲卿《李氏碑》。

七月十五日，京兆立韩择木隶书史惟则篆额韩雲卿《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

七月，陕州阌乡立韩择木隶书席豫《杨仲昌后碑》，见署太子少保致仕。

长安立张少悌正书裴士淹《吴令珪碑》。

大历七年 （壬子　772）

颜真卿返京途中，客次上元。春日，送旧友刘太冲西游，有《送刘太冲序》。四月，正书晋李阐序宋颜延之铭《颜含碑》。道出汝阴，立《颜默碑》于颍州。五月，赴宋州，八日有《八关斋会报德记》。后历汴州，撰书《开元寺僧碑》。九月，经郑州归至东郡。与怀素相遇，为其《怀素上人草书歌行集》作序。二十六日，正书《宋璟碑》。十一月十四日，迁葬伯父颜元孙夫妇墓于万年祖茔，有《与妻帖》《颜元孙碑》。又有《臧怀恪碑》。起家为湖州刺史。二十六日，为故友元结撰写神道碑铭，正书铭石立于鲁山。

刘禹锡(—842)生。

五月十五日，龙门重立张庭珪隶书李邕《程文英碑》。

七月，登封徐浩正书杜鸿渐《广德禅师碑》。

八月十四日，江宁立张从申行书李阳冰篆额柳识《玄靖先生碑》，见署大理司直。

福州立李阳冰篆书李贡《般若台题名》。

万年立张少悌行书史惟则篆孙宿《孙廷玉碑》；又立张少悌书邵说《辛惟谦碑》。

大历八年 （癸丑 773）

颜真卿，正月，至湖州刺史任，修正《韵海镜源》。始交游诗僧皎然。有《竹山连句题潘氏书堂》，又有《文殊师利菩萨碑》、《文殊帖》。八月二十五日，重书乾元三年《天下放生池碑》旧篇，追立于骆驼桥东。十二月，撰并正书《吴兴沈氏述祖德记》。

徐浩以吏部侍郎曲选违格，五月十一日，出贬明州别驾。

柳宗元(—819)生。

正月，滑州立徐浩行书并篆额《令狐彰开河碑》。

十月，夏县立韩秀实隶书程浩《薛嵩碑》，见署梁州都督府长史翰林待诏。

十二月，舒州立徐浩隶额杨琳撰并行书《司命真君庙碑》。

十二月，扬州立张从申行书李阳冰篆额李华《法慎律师碑》。

舒州又立张从申行书李阳冰篆额独孤及《镜智禅师碑》。

明州立李阳冰篆书王密《裴儆纪德碣》。

大历九年 （甲寅 774）

颜真卿，正月，正书颜元孙《干禄字书》。修成《韵海镜源》，凡360卷。七月二十七日，撰并正书《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记其乞肃宗题额书立《放生池碑》始末，翌月，铭勒于《放生池碑》之阴。又铭肃宗行书《放生池碑额批答》。有《谢公碑阴记》。撰并正书《颜杲卿碑》。

徐浩于明州别驾任上归乡会稽祭扫祖茔，有《徐氏山口碣石题刻》志其事。

日僧空海(—835)生。

八月二日,滑州立李阳冰篆书李勉《滑台新驿记》。

万年人窆张少悌正书常衮《信王瑝志》。

夏县立韩秀实隶书杨炎《郝玉碑》,见署前梁州都督府长史翰林待诏。

大历十年 (乙卯 775)

颜真卿,春日,奉和玄真子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十月,有《欧阳琟碑》。十一月,有《刘中使帖》。

窦蒙见任检校国子司业太原县令。

四月三日,渭南立王缙行书赵慧篆额元载《王忠嗣碑》。

十月,立张从申行书樊晃《怪石碑》。

富平立韩秀实隶书杨炎《李光进碑》,见署梁州司马。

洛阳立李阳冰篆书《大历十年具官名氏》。

大历十一年 (丙辰 776)

颜真卿,四月,因友崔祐甫之请,撰写《崔孝公宅陋室铭》。交游名才士耿沣。秋仲,陪张志和游平望驿。张志和溺水而亡,因是撰《玄真子张志和碑铭》颂述之。撰有《和政公主碑》《玄宗贤妃卢氏志》,并吴通微行书。应旧友茅山景昭法师之请,始撰《李含光碑》。

十一月十六日,人窆卢杞撰并正书《卢涛志》。

大历十二年 (丁巳 777)

颜真卿,二月初一,有《送辛晃序》。三月二十八日,宰臣元载获罪下狱,翌日赐自尽。因之,于四月十二日召命回京。下旬,于岘山送京兆府法曹参军李阳冰西上献书。五月初,项王庙旧碑崇树既毕,撰并正书《项王碑阴述》。撰并正书《唐希铣碑》。撰并正书《李含光碑》。有《吴兴集》十卷。是月,出苏州,入毗陵,转丹阳、次建业,溯江西上,至江州,立《祖亭碑》。有《一行帖》。道出许州,有《张敬因碑》。至洛阳,立伯母《颜真定碑碣》于万安山。八月二十五日,诏除刑部尚书。十一月,友婿杜济归柩万年,撰并正书其神道碑铭及墓

志,二十四日,立于墓田。十一月二十五日,呈献《韵海镜源》凡360卷,诏付集贤院。

怀素,十月二十八日,传有《自叙帖》。

二月,明州立徐浩行书崔殷《董孝子碣》,见署吏部侍郎集贤院学士。

三月,汝州立韩秀弼隶书《李深遗爱颂》。

五月,南部立韩秀弼隶书李阳冰篆额韩雲卿《鲜于氏里门记》。

十月二十八日,入窆道秀正书有则《第五玄昱志》。

桂林立韩秀弼隶书李阳冰篆额韩雲卿《平蛮颂》,见署梁州都督府长史武阳县开国男翰林待诏。

万年入窆吴通微书裴郁《萧淑志》。

大历十三年 (戊午 778)

颜真卿,正月十五日,三上表乞许致仕,未允。二月,奉使谒拜昭陵,过瑶台寺,有《瑶台帖》。奉敕正书杨绾《李抱玉碑》。三月,改吏部尚书。撰《宋璟碑侧记》及书《广平帖》。

四月八日,入窆徐珙隶书李邕《崔沔暨妻王方大志》(崔祐甫补叙),九日,又入窆徐珙隶书王颂《王媛志》,见署颍阳县丞。

徐浩,春日回乡谒禹庙,游宝林寺,各题诗,铭之于一石。

柳公权(—865)生。

四月,句容立张从申行书杨绾《王师乾碑》,见署大理司直。

七月二十四日,杜陵入窆韩秀实隶书独孤愐《李氏志》。

十月,立徐珙隶书李阳冰篆额李翰《郑君碑》。

杜陵入窆韩秀实隶书成朝秀《辛浩志》。

潞州立史惟则隶书郗昂铭《张君碑》。

大历十四年 (己未 779)

五月二十一日,诏皇太子李适监国,是夕代宗卒,年五十三。十月十三日,葬代宗于元陵。五月二十三日,皇太子即位,是为德宗。

颜真卿，六月十二日，德宗谅阴期间，以吏部尚书充礼仪使，委以山陵之事。正书程浩《马璘新庙碑》(韩秀实隶额)。撰并正书《颜勤礼碑》。

四月二十七日，入窆道秀正书令名《曹惠琳志》。

八月廿七日，润州立张从申正书李阳冰篆额萧定《重修延陵季子庙记》，见署前试大理司直。

清河立韩秀弼隶书李阳冰篆额崔造《裴旷碑》。

大历中，万年入窆吴通微书颜真卿《玄宗贤妃卢氏志》。

唐德宗建中元年 （庚申　780）

正月朔，改元建中。是岁，户 3 085 076。

颜真卿以敦化坊颜思鲁宅为颜氏家庙。六月，撰并正书《颜氏家庙碑》(李阳冰篆额)，宏扬祖德，七月初一刊毕。八月二十七日，改太子少师依前充礼仪使。十月，又撰书《碑后记》并《碑额后记》补述之。

徐浩自明州别驾征召入京，拜彭王傅。

锺绍京，十一月初五，加赠太子太傅。

张从申见任检校礼部郎中。

三月二日，桂林立韩秀实正书李阳冰篆额韩雲卿《舜庙碑》，见署梁州都督府长史翰林院待诏。

三月，阳翟立张从申行书李阳冰篆额李翰《黄公庙碑》。见署检校礼部郎中。

八月二十八日，长安入窆徐浩撰并行书《史继先志》，见署明州别驾。

十一月廿三日，邙山入窆徐珙隶书李阳冰篆盖邵说《崔祐甫志》。珙，见署颍阳县丞；阳冰，见署国子丞。

长安立韩秀弼书并篆额朱巨川《李自正碑》。

建中二年 （辛酉　781）

十月，颜真卿有《元陵注》一卷。正书李舟《王密碑》，李阳冰篆

额、徐浩书敕文，十月，立石明州。

三月，徐浩撰《古迹记》。

正月七日，宋兆立吕秀岩正书景净《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见署前行台州司士参军。

十一月十五日，京兆立徐浩正书严郢《三藏和尚碑》，见署彭王傅会稽郡开国公。

十一月三十日，入窆正书张少悌《刘鸿志》。

建陵入窆徐浩正书卢杞《郭子仪志》。

明州立李阳冰篆书并古文额王密《裴儆碣》，见署集贤院学士。

建中三年 （壬戌 782）

颜真卿，八月二十七日，改太子太师。委托门生左辅元编集《礼乐集》十卷。正书李华《元德秀碣》，李阳冰篆额，明年秋日，立石于伊阳。

徐浩（703—），四月二十五日，卒于长安永宁里，赠太子少师。十一月，葬于东都偃师祖茔。

湛然（711—）卒。

建中四年 （癸亥 783）

自去年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相继叛反，十一月，各僭称王号，滔称冀王，悦称魏王，武俊称越王，纳称齐王之后，淮宁军节度使南平王李希烈亦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朱滔等四人胶固为逆。至本年正月十三日，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别署判官周晃为刺史。又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其所败。东都士民惊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二十一日，以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畿汝节度使，东讨李希烈。二月初八，收汝州。四月十四日，以永平等军节度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襄阳帅贾耽、嗣曹王皋等副之。十月初，遣泾原兵东征讨伐，翌日过长安，哗变，奉朱泚为主，德宗出奔奉天。朱泚入长安，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杀唐宗室七十七人。十二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上表言

宰相卢杞等罪，十九日，贬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杞为新州司马。二十七日，李希烈复陷汝州。

颜真卿，正月十七日，受命赴许州宣慰李希烈，有《守政帖》。至许州宣诏，遭拘。十月后李希烈因部将周曾等反正，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泄遂移囚于汝州龙兴县佛寺，有《奉命帖》。

十二月，吴通微自金部员外郎改职方郎中，翰林学士并如故。

兴元元年 （甲子　784）

正月癸酉朔，改元兴元。朱泚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诏除朱泚外，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皆赦其罪，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谢罪。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建元武成，以汴州为大梁府。五月廿日，神策节度使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二十七日，入长安。改梁州为兴元府。七月十三日，车驾还京。十一月二十一日，宋亳节度使刘洽等攻汴州，李希烈遁蔡州，汴州平。

颜真卿被拘囚于汝州龙兴。李希烈数遣使逼于囚所，不为屈礼。

万年立袁中孚正书李阳冰篆额武元衡《咸宜公主碑》，阳冰见署将作少监集贤院学士。

十二月，赠萧定太子太师。

贞元元年 （乙丑　785）

正月，改元贞元。三月十二日，李希烈陷邓州。

正月五日移囚蔡州龙兴寺。有《移蔡帖》。八月廿日，颜真卿(709—)受害于该寺。

柳公绰应制举，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四月，京兆立太子诵行书德宗《殷秀实碑》。

耀州立张少悌正书张蔬《王仁敬碑》。

贞元二年 （丙寅　786）

正月二十二日，德宗闻颜真卿死讯，辍朝五日，谥文忠，赠司

徒。旧吏辰州刺史戎昱作诗悼亡。四月初七,淮西牙将陈仙奇鸩杀李希烈,以淮西归顺。二十五日,尚书左丞郑叔则充使宣慰淮西,奠祭于蔡州。陈仙奇遣专使营护神榇归京师。栎阳尉颜颖、正字颜硕迎父丧至襄城。东都留守贾耽奠于厝所,权葬汝州。十一月三日,迁祔于万年县凤栖原祖茔。旧友吉州刺史李萼、检校国子祭酒杨昱、户部员外郎权器及其亲戚给事中殷亮、吏部员外郎柳冕诸人协理丧事。殷亮撰《颜鲁公行状》申报尚书省。旧僚令狐垣又撰神道碑铭,李萼刊石建碑,旌其不朽之功。

七月二十二日,入窆张劝正书穆员《郑中志》,见署前山南东道节度推官试大理司直;又入窆张劝撰并正书《封揆志》。

八月,陕州立胡证隶书郑士材《韦奥颂》,见署前进士。

九月,立韩秀弼隶书刘太真《元待聘碑》。

九月,邠州立张谊行书高参《郭子仪庙碑》,见署右威卫仓曹参军。

立郑雲逵撰并行书《尚可孤碑》。

贞元三年 (丁卯 787)

吴通微见任起居舍人。

二月韩滉(723—)卒,赠太傅。

正月十五日,茅山立窦泉正书篆额陆长源《景昭法师碑》。

二月十七日,入窆张文哲正书刘震《司马齐卿暨妻王氏志》,见署前恒王府参军直集贤院。

四月十九日,入窆张文哲行书并篆盖尹雲《张俪暨妻贾氏志》。

七月,洛阳立归登隶书赵赞《张延赏碑》。

十月四日,入窆雷迅正书吴通微《冯氏志》。

京兆立张谊行书独孤及《樗里子碣》。

贞元四年 (戊辰 788)

柳公绰再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科,授渭南县尉。

五月,立吴通微行书吴通玄《鱼朝恩碑》。

六月，京兆立太子诵行书德宗《麟德殿宴群臣诗》；又立太子诵行书吴通微《修贞宫碑》。

冬日，立吴通微行书程浩《藏用上座院序》。

洛阳立韩秀荣隶书《畅悦碑》。

贞元五年 （己巳　789）

九月二十三日，诏以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图形于凌烟阁。

八月十一日，华州立韩秀弼隶书李彝篆额张濛《李元谅碑》。

九月，滑州立徐琦正书李腾篆额贾耽《新井铭》。

十月，滑州立徐琦正书《说文字源》，李腾篆额贾耽撰序。琦，见署前扬府户曹参军。

入窆孙公辅撰并正书《孙君暨妻李氏志》。

贞元六年 （庚午　790）

林藻，登进士科。

李贺（—816）生。

七月，万年立韩秀荣隶书李竦《辛京杲碑》。

入窆吴通微撰并正书《大圣真身塔铭》。

贞元七年 （辛未　791）

吴通微见任职方郎中、知制诰。正月，撰有《俱慈顺志》。

十月，立徐现撰并正书《大德律师塔铭》。

长安立韩秀弼《贞元同官记》。

裴休（—864）生。

贞元八年 （壬申　792）

三月，湖州长兴立徐琦正书于頔《袁高茶山诗述》，见署前潞州长史。

京兆立太子诵行书德宗《幸章敬寺诗》。

长安立韩秀弼隶书张彧《李晟庙碑》。

咸阳入窆韩秀弼隶书张奢《陈氏志》。

贞元九年 （癸酉 793）

柳宗元、刘禹锡登进士科。

皎然(720—)卒。

四月，邠州立张谊行书张琯篆额高郢《姜嫄新庙碑》，见署节度巡官试大理评事。

七月廿五日，华岳有裴潾正书题名，见署华州参军事。

七月，颍阳立韩秀荣隶书于翰《郑叔清碑》。

八月二十七日，入窆皇甫阅正书梁宁《澄空塔铭》，见署校书郎。

长治立班宏行书韩秀弼篆额董晋《李抱真碑》，秀弼见署朝散大夫守□□府长□□阳县开国男。

贞元十年 （甲戌 794）

正月，清河韩秀荣隶书于邵《王之咸碑》。

正月，湖州长兴立徐琦正书李吉甫《袁高茶山诗述碑阴记》。

洛阳立徐现书并篆额郑叔规《辨正禅师塔铭》，见署汜水县令。

贞元十二年 （丙子 796）

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

六月，河中立胡证隶书陈翊序《郭子仪将佐略》。

闰八月，幽州立颜颗正书篆额韦稔《复舜庙碑》。

立柳宗元撰并正书《祷雨碑记》。

贞元十三年 （丁丑 797）

三月，立张仲严集王羲之书卢虔《楚王堤记》。

五月，洛阳立归登隶书李腾篆额权德舆《赵憬碑》。

八月十七日，入窆张文哲正书《崔氏(无生忍)志》。

八月廿日，盐池立韦纵正书并篆额崔敖《灵庆公神祠碑》，见署前试大理评事。

贞元十四年 （戊寅 798）

吴通微见任中书舍人。

正月，立王承规集王羲之书洽《僧道源发愿文》。

三月，徐州立太子诵行书德宗《送张建封还镇诗》。

五月廿五日，立郑雲逵行书姜元素篆额陈京《郑楚相碑》，雲逵见署卫尉卿。

十二月，河中立胡证隶书《政刑箴碑阴表》。

京兆立太子诵行书吴通微《纪南充县谢自然上升敕》。

贞元十五年 （己卯　799）

六月二十四日，入窆徐顼正书并篆盖樊泽《李皋志》，见署河南府功曹参军。又改卜十三年(797)张文哲正书之《无生忍志》。

十一月廿四日，偃师立徐现正书并篆额张式《徐浩碑》，现，碑记"罢宰王畿之新安"。

偃师立王伾正书权德舆《董晋碑》，见署皇太子侍书。

贞元十六年 （庚辰　800）

四月，洛阳立徐现正书《王虔碑》。

十二月八日，入窆吕恭正书吕温《吕渭暨妻柳氏志》和《柳氏志》。

贞元十七年 （辛巳　801）

杜佑进《通典》凡九门，共二百卷。

六月，襄州立胡证隶书于頔《王粲石柱记》。

十月，同州立韦纵正书并篆额杨凭《崔淙碑》。

十月二十日，立韦纵正书袁滋篆额王颜《王卓碑》。

十一月九日，河南阌乡县立表滋篆书王颜《轩辕铸鼎原铭》。

贞元十八年 （壬午　802）

正月二十三日，入窆刘钧正书杨叶《大德演公塔铭》。

贞元十九年 （癸未　803）

杜牧(—853)生。

四月，庐州立徐珏正书并篆额杨凭《罗珦碑》。

长安立崔公馀行书郑赞《王武俊先庙碑》(太子诵题额)。

贞元二十年 （甲申 804）

日本学问僧空海、留学生橘逸势自福州入唐；学问僧最澄自明州入唐。

十一月十三日，立郑雲逵撰并行书袁滋篆额《李广业碑》，见署刑部侍郎。

十一月，彭州立太子诵正书德宗《韦皋碑》；十二月，简州又立石。

京兆立孙藏器撰并正书《惠日禅师塔铭》。

贞元二十一年　唐顺宗永贞元年 （乙酉 805）

正月二十三日，德宗(742—)崩于会宁殿。二十六日，皇太子诵即皇帝位，是为顺宗。三月二十四日，立广陵郡王淳为皇太子，改名纯。八月四日，退位。五日，改元永贞。九日，皇太子纯即皇位，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柳宗元为邵州司马，刘禹锡为连州司马，陈谏为河中少尹。十月十四日，葬德宗于崇陵。十一月十四日，再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

沈传师登进士科。

二月二十日，入窆屈贲撰并正书《张惟暨妻王氏志》。

五月，日学问僧最澄自明州归国。

七月廿五日，长安立吴通微行书飞锡《楚金禅师碑》，见署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十一月五日，入窆孙保衡正书裴垍《孙君暨妻卢氏志》，见署乡贡进士。

十一月三十日，宣州立颜颛书严绶《通公碑》。

唐宪宗元和元年 （丙戌 806）

正月二日，改元元和。十九日，顺宗(761—)卒。七月十七日，葬于丰陵。

沈传师登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

三月，太原立颜颛正书令狐楚《晋祠新松记》。

五月四日，郑雲逵卒。

八月，日学问僧空海和留学生橘逸势归国。

十月，京兆立卢佐元正书颜真卿《颜杲卿碑》。

立裴潾正书裴度《卢瑗碑》。

元和二年 （丁亥　807）

敕依国子监奏西监书馆学生定额十员，东监三员。

五月二十七日，萍乡立刘禹锡撰并正书《乘广禅师碑》（刘申锡篆额），见署郎州司马。

八月十一日，入窆孙审象正书孙保衡《郑炼暨妻孙氏志》。

八月十七日，入窆毛伯良正书王涮《刘氏志》，见署衡州司仓翰林待诏。

十一月朔，入窆萧祐正书郑宗经《高行晖志》，见署殿中侍御史。

入窆孙藏器正书郑德玄《僖王志》。

立裴潾正书张参《李公碑》。

京兆立孙藏器书郑德玄《王隐朝碑》。

元和三年 （戊子　808）

柳公权登进士科，为状元，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潭州立柳宗元撰并正书《般舟和尚碑》。

十月十三日，万年入窆孙藏器撰并行书《骆氏志》，见署试太子通事舍人。

七月，应天立王遹篆书陆机《汉高祖颂》。

元和四年 （己丑　809）

二月廿九日，成都武侯祠堂立柳公绰正书裴度《诸葛武侯祠堂记》。

四月，京兆立张宏靖正书胡证篆额权德舆《裴倩碑》。

六月，应天立王遹篆书李白《李锡去思颂》。

十月，鼎州立刘禹锡正书刘申锡篆额董侹《修阳山庙碑》。

同州入窆胡证撰并书《颜防志》。

入窆沈传师正书韩愈《韦氏志》。

元和五年 （庚寅 810）

十一月，柳公绰吏部郎中任上献《太医箴》谏游猎，深得嘉赏。

十二月，拜御史中丞。

二月，洛阳立郑馀庆正书权德舆《武就碑》。

五月，洛阳立郑馀庆撰并正书《贾耽碑》。同时，入窆郑馀庆书权德舆《贾耽志》。

七月，潭州立柳宗元撰并正书《弥陀和尚碑》。

河中立徐玫书卢顼《卢俊碑》。

河中立郑馀庆书归登《卢虔碑》。

元和六年 （辛卯 811）

柳公绰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

六月二十六日，日僧空海献《飞白书》等诗文集及真迹于嵯峨天皇；八月又献《德宗皇帝真迹》等法书名品。

十一月十五日，义兴县立黄口集王羲之书华明素篆额陆机《周孝侯碑》，见署前试太常寺协律郎。

元和七年 （壬辰 812）

七月十九日，立遂王宥为皇太子，更名恒。

正月，华州立胡证隶书篆额许孟容《乌承玭碑》。

八月七日，入窆符载撰并正书《李氏志》。

十月，京兆立郑馀庆正书韩愈《路庆碑》。

十月，京兆立胡证正书篆额冯宿《狄梁公祠堂颂》，见署华州节度副使、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

十一月，绛州立归登隶书篆额许孟容《裴耀卿碑》。

七月二十九日，日僧空海献《急就章》等经籍于嵯峨天皇。

元和八年 （癸巳 813）

柳公绰以湖南地气卑湿，不能迎侍母亲，乞分司洛阳，久不许。十月，移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

正月，京兆立郑馀庆正书袁滋篆额许孟容《尚书省新修记》。

二月，京兆立胡证撰并隶书《尚书省石幢记》。

八月，洛阳立徐现撰并正书《灵珍禅师塔铭》。

十一月二十三日，入窆屈贲正书崔归美《张曛志》。

十一月，立胡证隶书篆额韩愈《田弘正家庙碑》。

十二月，立郑馀庆正书李绛《樊泽碑》。

京兆入窆归登撰并行书篆额《处道和尚塔铭》。

洛阳立归登隶书韩愈《刘昌裔碑》。

元和九年 （甲午　814）

四月二十五日，入窆崔巨雅正书崔元略《李辅光志》，见署前晋州司法。

十月，孟州立裴潾正书郑冠篆额李蟠《济亭记》。

洛阳立颜颢书严绶《严公碑》。

闰七月二十八日，日僧空海献《兰亭碑(序)》等拓本于嵯峨天皇。

元和十年 （乙未　815）

三月十四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

四月十五日，杭州立归登行书并题额崔元翰《大觉禅师国一碑》。

洛阳立归登隶书篆额许孟容《赵昌碑》。

元和十一年 （丙申　816）

柳公绰入为给事中，拜京兆尹，以母崔氏忧免。公权偕兄并服勤于墓庐。

李贺(790—)卒。

三月十八日，入窆习经撰并正书及篆盖《董文萼志》，见署国子监广文馆进士。

六月，立郑馀庆书郑绚《孔述睿碑》。

十一月，杭州立王遵正书卢元辅《胥山铭》。

京兆立归登隶书篆额权德舆《于頔先庙碑》。

元和十二年 （丁酉 817）

闰五月十三日，入窆寇立正书王众仲《窦氏志》。

十月，柳宗元撰《柳州復大雲寺记》，柳公权正书铭石。

七月十日，万年入窆孙藏器行书裴询《秦朝俭志》，见署前太子通事舍人。

元和十三年 （戊戌 818）

河东节度使张弘靖进献以锺繇、张芝、韦诞、索靖真迹各一卷，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又别进《玄宗马射真图》。

柳仲郢登进士科。

十月二十日，入窆玄应撰并行书《宪超塔铭》。

十二月，洛阳立裴潾正书李绛《李众碑》。

立郑馀庆书权德舆《百岩大师碑》。

元和十四年 （己亥 819）

柳公权服除。五月后夏州刺史李听辟为掌书记，兼判官，太常寺协律郎。兄公绰起为刑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

十一月八日，柳宗元(773—)卒。

二月，凤翔立沈传师正书归登篆额张仲素《大圣舍利塔铭》。

入窆归登书所撰《大慧禅师塔铭》。

洛阳立郑馀庆隶书赵赞序郑绹铭《权公碑》。

咸阳立孙藏器行书邢叔度《焦伯瑜碑》。

元和十五年 （庚子 820）

正月二十七日，宪宗(778—)卒。闰正月三日，皇太子恒即皇帝位，是为穆宗。五月十九日葬宪宗于景陵。

三月，柳公权奉使入京奏事，因前《题朱审寺壁山水画》诗书法为穆宗所赏重，二十三日，召拜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兄公绰转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

闰正月，河中立公权正书并篆额孟简《薛苹碑》。

七月，立裴潾正书李绛《吕元膺碑》。

十月一日，立陈谏正书篆额韩愈《南海神庙碑》，见署循州刺史。

入窆沈传师正书韩愈《柳宗元志》。

归登(754—)卒。

唐穆宗长庆元年 （辛丑　821）

正月三日，改元长庆。

柳公绰，二月罢盐铁使，三月复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改吏部侍郎。

故刑部侍郎杨凭子深之尽以家藏书画献宰相段文昌，求致进士第。

正月十一日，柳州立沈传师正书陈曾篆额韩愈《罗池庙碑》；又立沈传师正书韩愈《黄陵庙碑》。

长庆二年 （壬寅　822）

十二月二十日，立景王湛为皇太子。

九月，柳公权迁右补阙。兄公绰迁御史大夫。

裴休登进士科。

日僧最澄(767—)卒。

二月十一日，入窆郗从周撰并正书《梁氏志》，见署余平县尉翰林待诏。

入窆沈传师正书沈亚之《郭铦志》。

长庆三年 （癸卯　823）

穆宗朝，柳公权有“笔谏”。

柳公绰改尚书左丞。五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四月，华州立胡证隶书篆额韩愈《胡珦碑》。

洛阳立裴潾正书李宗闵《韩光碑》。

蔡州立裴潾正书王起《高承简碑》。

洛阳立崔从书胡证篆额李宗闵《崔能碑》，见署户部尚书。

长庆四年 （甲辰 824）

十二月，柳公权见任起居郎。九日，偕谏议大夫独孤朗等抗疏论淮南节度王播厚赂求领盐铁使事。兄公绰加检校左仆射。

正月二十一日，诏皇太子监国。二十二日，穆宗卒，年三十。二十三日，皇太子湛即皇帝位，是为敬宗。十一月十五日，葬穆宗于光陵。

四月六日，京兆西明寺立公权正书《金刚经》。

六月，赣州立柳公权正书胡证篆额李渤《大觉禅师塔铭》。

唐敬宗宝历元年 （乙巳 825）

正月七日，改元宝历。

正月廿四日，柳公权题王献之《洛神赋》。

柳公绰入为刑部尚书。

宝历二年 （丙午 826）

十二月八日，敬宗卒，年十八。十二日，江王昂即皇帝位，是为文宗。

柳公绰授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十二月二十三日，迁为刑部尚书。

三月，随州立柳公绰正书李白《紫阳先生碑》暨李繁《碑阴记》。

十一月二十六日，人窆孙纾正书令狐绚《孙简志》，见署渭南县尉集贤校理。

唐文宗大和元年 （丁未 827）

二月十三日，改元大和。二十四日，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册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七月十三日，葬敬宗于庄陵。

沈传师(769—)卒，赠吏部尚书。

大和二年 （戊申 828）

三月十日，柳公权见任司封员外郎，题王献之《送梨帖》。五月二十一日，充侍书学士。二十三日，赐紫。十一月二十一日，改库部

郎中。七月初一日，兄公绰检校左仆射、兼刑部尚书。

七月，洪州立柳公权正书武翊黄《涅般和尚碑》。

杜牧登进士科。裴休、杜牧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十月胡证(758—)卒，赠左仆射。

萧祐卒，赠右散骑常侍。

三月，长安刘禹锡题《游玄都观诗》。

大和三年 （己酉　829）

建申月，济源立张弘明正书《贞一先生坐忘论》。

四月六日，高陵立柳公权奉敕正书并篆额裴度《李晟碑》。

七月七日，入窆郗玄表正书宋若宪《田元素志》。

九月，陕州立裴潾正书李演篆额冯宿《薛苹增修家庙碑》，潾见署给事中。

十月，京兆立唐玄度篆书杨承和《塔阴文》。

万年立刘禹锡撰并正书《令狐楚先庙碑》(陈锡篆额)，见署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

大和四年 （庚戌　830）

三月，柳公绰为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安抚回鹘、沙陀等族。

四月，耀州立柳公权正书李宗闵《王播碑》及牛僧孺《王播志》。

四月，台州立颜颢篆额元稹撰并书《修桐柏宫碑》。

八月，长安立刘禹锡正书陈修古篆额王源中《何文悊碑》。

十月二十九日，入窆李约正书魏则之《杨珽志》。

十二月，台州立颜颢正书颜汝玉篆额颜真卿《智者大师画像赞》。

京兆立唐玄序集王右军书唐玄度篆额王源中《李藏用碑》。

大和五年 （辛亥　831）

柳公权因兄公绰致书宰相李宗闵乞换一散秩，七月十五日出院，迁右司郎中。

二月，京兆人窦公权正书庾敬休《韦文恪志》。

十二月间，公权正书京兆《太清宫钟铭》。

京兆立唐玄度隶书篆额朱景玄《骆奉先碑》。

大和六年 （壬子 832）

十月五日，立鲁王永为皇太子。

柳公绰以病自河东征还。三月，授兵部尚书。四月三日卒（768—），赠太子太保，谥曰成。

春日，京兆立唐玄序集王右军书唐玄度篆额《金刚经》。

正月，京兆人窦裴休正书刘禹锡《韦翊志》。

贯休（—912）生。

大和七年 （癸丑 833）

柳公权迁兵部郎中。正书冯宿《刘从政碑》，唐玄度篆额，四月，立石。凡二碑，一在东都，一在长安。

八月七日，正式册立鲁王永为皇太子。

十二月，明州立范的行书万齐融《阿育王寺常住田记》。

大和八年 （甲寅 834）

柳公权，十月十五日，自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三充翰林侍书学士。

杜牧撰并行书《张好好诗》。

孟州立郑瀚正书唐玄度篆额韦表微《翰林学士院新楼记》。

大和九年 （乙卯 835）

柳公权，九月十二日，加知制诰，充翰林院学士，仍兼侍书。七月初，召对于禁中，处置人事。

日僧空海（774—）卒。

正月，京兆立裴休撰并正书《定慧禅师碑》（柳公权篆额）。

京兆立唐玄度隶书篆额许康佐《崔守诚碑》。

大和年间，京兆立唐玄序行书唐玄度篆额许康佐《崔谈峻寿堂碑》。

开成元年 （丙辰／ 836）

正月一日，改元开成。

九月二十八日，柳公权除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是时文宗读易经每有疑义，即召公权及侍讲学士王起、许康佐入便殿顾问讨论，率以为常，时谓“三侍学士”。四月廿日，万年县立柳公权正书令狐楚《回元观钟楼铭》。

二月十四日，入窆崔绰正书崔耽《崔洧志》，见署著作佐郎集贤修撰。

四月三日，入窆裴居实正书裴从实《裴成志》，见署国子监广文馆博士。

十月十九日，入窆毛伯良撰并正书《贾雄志》，见署吉州司功翰林待诏。

十一月，洛阳榆林立柳公权正书丁居晦篆额裴度《王智兴碑》。

京兆立朱玘行书毛伯贞篆额袁郁《第五从直碑》。

开成二年 （丁巳　837）

柳公权，二月从幸未央宫，应制作诗。四月十一日，便殿君臣对答，有诤臣之誉。即改谏议大夫，翌日下制。

五月，万年县立公权正书并篆额王起《冯宿碑》，见署河东县开国男。

七月，洛阳立柳公权正书丁居晦篆额郑浣《阴符经序》。

洛阳立柳公权书并题额李绛《罗公碑》。

华原人窆柳公权撰并书《柳尊师志》。

开成三年 （戊午　838）

十月十六日，皇太子永卒，谥曰庄格。

夏日，文宗与学士联句，柳公权有“熏风自南来”句。九月二十八日，公权迁工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

裴潾，四月卒，赠户部尚书，谥曰敬。

正月，洛阳立柳公权正书李绛《崔稹碑》。

七月，万年立柳公权正书丁居晦《韦元素碑》。

正月，洛阳立刘禹锡正书丁居晦篆额裴度《崔群碑》。

日学问僧圆仁、圆行、常晓入唐。

贯休年七岁，出家兰溪和安寺。

开成四年 （己未 839）

十月十八日，立敬宗六子皇侄陈王成美为皇太子。是岁，户部计见管户 4 696 752。

日学问僧圆行、常晓回国。

七月，咸阳立柳公权正书李宗闵《元锡碑》。

秋日，兴元立柳公权正书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

万年县立柳公权正书杜牧《庄淑公主碑》；又立有柳公权正书《宪穆公主碑》；又立柳公权正书李景让《李有裕碑》。

五月十六日，入宻建初行书刘轲《玄奘塔铭》，见署安国寺内供奉讲论僧；又入宻建初行书李弘庆《基公塔铭》。

十一月，洛阳立刘禹锡撰并正书《王质碑》（郑槎篆额），见署太子宾客。

湖州立杨汉公重摹颜真卿正书颜元孙《干禄字书》。

入宻朱景玄正书所撰《朱叔夜志》。

开成五年 （庚申 840）

正月二日，下诏立颍王瀍为皇太弟，全权处置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四月，文宗（809—）卒。十四日，皇太弟瀍正殿受册，是为武宗，杀陈王成美等人。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

三月九日，柳公权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寻宰相崔珙荐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

柳公权奉敕撰有《何进滔碑》，并奉敕正书，唐玄度篆额，正月，大名县立石。

二月，高陵县立柳公权正书王起《罗让碑》。

京兆又立柳公权正书李石《李听碑》。

开成三至五年间，富平立柳公权正书并篆额李宗闵《符璘碑》。

洛阳追立柳公权正书郑儋《李说碑》。

六月十八日，立诸葛鉴元正书《道士邢令闻题名》。

八月二十九日，入窆安景之正书唐玄度篆盖李褒《李溶志》，景之见署翰林待诏守徐州□县尉；玄度见署翰林待诏守梁府司马。

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窆孙景商撰并正书《李氏志》，见署殿中侍御史。

洛阳入窆刘禹锡书白居易《昭公塔铭》；又立刘禹锡撰并书《史孝章碑》。

唐武宗会昌元年 （辛酉　841）

正月九日，改元会昌。

五月，偃师立柳公权正书刘禹锡《崔陲碑》。

十二月廿八日，京兆立柳公权正书并篆额裴休《玄秘塔碑》。

京兆西明寺立柳公权正书严厚本《宣公律院碣》。

八月，入窆孙储正书孙瑝《孙备志》。

十月十八日，入窆张模撰并行书《姚氏志》，见署试太子通事舍人。

会昌二年 （壬戌　842）

八月，日学问僧惠运入唐。

刘禹锡（772—）卒，赠户部尚书。

日留学生橘逸势卒。

十一月六日，京兆立朱玘行书毛伯贞篆额裴素《修汉未央宫碑》。

会昌三年 （癸亥　843）

四月，万年县立柳公权奉敕正书徐方平篆额崔铉《神策军碑》。

十月，万年县立柳公权正书徐方平篆额王起《昊天观碑》。

京兆立朱玘行书严厚本《郗士荣碑》。

会昌四年 （甲子 844）

四月，京兆立柳公权正书《金刚经》，郑□题额。

十月，伊阳县立柳公权正书高元裕《高重碑》。

八月二十二日，入窆柳公权书裴休《演公塔铭》。

十月六日，入窆张模撰并行书《段氏志》，见署试太子通事舍人。

会昌五年 （乙丑 845）

是岁天下 4 955 151 户。

六月二十一日，入窆正书柳仲郢《柳老师志》。

长安县立柳公权正书并篆额裴璟《李载义碑》。

会昌六年 （丙寅 846）

三月朔日，因武宗久病未愈，改名曰炎。十三日卒(814—)。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怡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宣宗。八月，葬武宗于端陵。

正月十六日，入窆柳公权书《福林寺戒塔铭》。

十二月，孟州河阴汉祖庙立柳公权正书李德裕《李石碑》。

唐宣宗大中元年 （丁卯 847）

正月十一日，改元大中。

柳公权转太子少师(四月见署)，上谢表(已佚)，宣宗召见于升殿，御前书三纸：一纸真书十字，一纸行书十一字，一纸草书八字。

六月，日学问僧惠运归国；九月，学问僧圆仁归国。

正月，商州立柳公权正书李商隐篆额韦琮《商於驿路记》。

四月，三原立柳公权正书并篆额李回《王起碑》。

十一月十日，入窆孙洎正书王融《成氏志》。

京兆立石柳公权细书李商隐《太仓箴》，又入窆公权细书苏涤《苏氏志》。

京兆入窆侯湘行书毛伯贞篆额吕让《田绍宗志》。

大中二年 （戊辰 848）

柳公权见任左散骑常侍，封爵河东郡公。

十二月，立柳公权正书唐玄度篆额《刘沔碑》。

六月，明州立贝灵该隶书王方外篆额孙谏卿《蓬莱观碑》。

大中三年 （己巳　849）

五月十九日，万年县立柳公权正书并篆额李钰《牛僧孺碑》，同时入窆柳公权正书杜牧《牛僧孺志》。

十一月十六日，入窆张模撰并行书《赵群志》，见署前漳州军事判官试太子通事舍人。

大中四年 （庚午　850）

万年县立柳公权正书李邕旧文《普光王寺碑》。

正月十七日，入窆张模行书篆盖陈上美《王氏志》，见署前漳州军事判官试太子通事舍人。

十月十七日，入窆孙顼撰并正书《孙君暨妻张氏志》，见署国子春秋博士分司东都。

十二月十一日，入窆正书柳知微《陈兰英志》。

大中五年 （辛未　851）

张彦远偕韦澳等撰成《续唐历》三十卷，七月，上之。

贯休弱冠，受具足戒，移住婺州五泄山寺。

七月十二日，入窆吕文广正书毛伯贞撰并篆盖《吕氏志》，文广见署试金吾卫兵曹；伯贞见署翰林待诏舒州长史。

八月四日，京兆入窆朱玘行书唐远篆盖李忱《仇氏志》，朱玘见署翰林待诏茂王傅。

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奏请《孔子庙堂碑》题额“大周”改“大唐”字样。

京兆立朱玘行书毛伯贞篆额郑楚《仇士良碑》。又立朱玘行书朱景玄《重建章资师传教碑》。

大中六年 （壬申　852）

二月二十三日，万年县立柳公权正书萧邺《韦正贯碑》；又立柳公权撰并正书及篆额《刘荣璨碑》。

五月二十四日，入窆孙景商正书旧铭《孙廿九女志》，见署给事中。

大中七年 （癸酉 853）

学问僧圆珍入唐。

二月，万年立柳公权撰并正书《康约言碑》。

八月八日，柳公权正书天台国清寺额及批答。

十一月十日，洛阳立柳公权正书萧邺《高元裕碑》。

青州立柳公权正书李宗闵《薛平碑》。

彭城立柳公权正书刘三复《刘君碑》。

万年县护国寺又立柳公权正书段成式《观音院记》。

杜牧(803—)卒。

大中八年 （甲戌 854）

柳公权知太子少傅。

寿安县立柳公权正书蒋伸《崔从碑》。

七月，江州立王遹篆额惟嵩书李演《慧远法师影堂碑》。

大中九年 （乙亥 855）

本年或去年，柳公权由国子祭酒迁工部尚书。

卢携登进士第。

七月二十五日，入窆孙钺正书篆盖孙纾《李氏志》，见署乡贡进士。

十月十三日，鄠县立柳公权篆额裴休撰并正书《圭峰定慧禅师碑》。

万年县立柳公权撰并正书《濮阳长公主碑》。

京兆入窆朱玘书任吉《蒋洞幽志》。

大中十年 （丙子 856）

十月二十七日，入窆孙备正书蒋伸《孙景商暨妻于氏志》。

大中十一年 （丁丑 857）

四月廿六日，庐山东林寺立柳公权正书崔黯《復东林寺碑》。

六月二十八日，入窆鲁谚正书张宗厚篆盖李恽《鲁子谦志》，宗厚见署翰林待诏。

新罗崔致远生。

大中十二年 （戊寅　858）

正月一日，柳公权含光殿受朝称贺，误上尊号，为御史弹劾，罚一季俸料。

六月，日学问僧圆珍归国。

二月二十一日，入窆郑晦撰并行书《闾知诚志》（毛伯贞篆盖，见署翰林待诏襄州长史）。

大中十三年 （己卯　859）

八月七日，宣宗卒，年五十。宣遗诏立郓王温为皇太子，改名灌。十三日，柩前即皇帝位，是为懿宗。

六月，京兆安国寺摹立柳公权正书《西明寺金刚经》。

四月十四日，入窆史颀正书篆盖陈竦《王公素志》，见署休宁县主簿直翰林院。

八月二十日，入窆孙钺正书篆盖孙徽《韦氏志》，见署乡贡进士。

唐懿宗大中十四年　咸通元年 （庚辰　860）

二月，葬宣宗于贞陵。十一月二日，改元咸通。

季春，柳公权从孙蓝田尉柳珪擢右拾遗，或以不能事父，有司驳还其制。公权为之讼枉。

张彦远见任舒州刺史。

贯休游学洪州。

二月二十七日，入窆孙郑九正书孙纾《韦氏志》。

赵州立贝灵该隶书赵璘《戒珠寺碑》。

咸通二年 （辛巳　861）

八月八日，柳公权题福州九峰镇国禅院额。

长安县立柳公权正书郑处晦《蒋系先庙碑》。

咸通三年 （壬午　862）

九月，日学问僧空睿入唐。

咸通四年 （癸未 863）

贯休始居钟陵山。

京兆立柳公权书《封敖碑》。

四月十七日，入窆张宗厚正书毛知俦篆盖独孤霖《平原长公主志》，宗厚见署翰林待诏前守右威卫长史；知俦见署翰林待诏行左春坊典膳局丞。又入窆程进思正书程再思篆盖温宪《程修己志》，进思见署甘泉主簿。

咸通五年 （甲申 864）

裴休（791—）卒，赠太尉。

凤翔立柳公权正书令狐绹撰《魏謇碑》。

长安立柳公权正书并篆额崔玙《魏謇先庙碑》。

十二月七日，入窆董威隶书篆盖崔希古《金氏志》，见署翰林待诏守建州长史。

咸通六年 （乙酉 865）

柳公权（778—）卒。赠太子太师。

四月十七日，入窆吴弁正书毛知俦篆盖颜谭《严氏志》，知俦见署翰林待诏。

七月二十三日，入窆张宗厚正书董咸篆盖刘允章《杨氏志》，宗厚见署翰林待诏守泗州司马；董咸见署翰林待诏守建州长史。

又入窆郭弘范行书毛知俦篆盖裴璩《崔氏志》，弘范见署翰林待诏行舒城县主簿；知俦见署翰林待诏守左春坊典膳局丞。

咸通七年 （丙戌 866）

七月三十日，入窆张宗厚行书毛知俦篆盖卢深《晋康公主志》；宗厚见署翰林待诏守凉王府谘议；知俦见署翰林待诏守尚舍局直长。

入窆孙阿陀正书孙奭《孙嗣初志》。

咸通八年 （丁亥 867）

四月十六日，入窆郭弘范正书董咸篆盖李骞《郎宁公主志》，弘

范见署翰林待诏行亳州谯县丞;董咸见署翰林待诏尚药奉御。

咸通九年 （戊子 868）

张彦远华岳题名。

八月十一日,入窆孙郢正书孙邺《孙方绍志》。

新罗崔致远入唐。

咸通十年 （己丑 869）

二月,京兆入窆柳仲年正书郑言《王承业志》。

咸通十一年 （庚寅 870）

正月,立柳知微正书郑绱《孔岑父碑》。

二月,京兆立柳仲年正书篆额韦保衡《同昌公主碑》。

五月十五日,入窆毛知微行书那希言篆盖崔驯《杨氏志》,知微见署守右司御率府胄曹翰林待诏;希言见署翰林待诏守秋浦县主簿。

七月十一日,绛州立郑承规篆书《碧落碑》。

八月二十二日,入窆孙纲正书篆盖孙徽《孙景裕志》。

咸通十二年 （辛卯 871）

正月二十五日,入窆张元龟正书董咸篆盖薛调《王氏志》,元龟见署翰林待诏守池州司仓;董咸见署翰林待诏守尚衣奉御。

十一月十二日,入窆徐珙正书王钰《樊骃志》,见署前度支供军巡官试协律郎。

十二月五日,入窆孙饶正书孙杲《孙泳志》,见署前淮南观察支使试协律郎。

咸通十四年 （癸巳 873）

七月七日,立晋王俨为皇太子,改名儇。十八日,懿宗卒,年四十一。二十日,皇太子俨即皇帝位,是为僖宗。

杨凝式(—954)生。

二月二十五日,孙岩正书孙纬《裴氏志》,见署乡贡进士。

咸通十五年　唐僖宗乾符元年 （甲午 874）

二月,葬懿宗于简陵。十一月五日,改元乾符。

卢携以谏议大夫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寻加户部侍郎、知制诰。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十月二十九日，入窆孙二哥儿正书李楷重《李审规志》。

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窆孙纾正书令狐绚《孙简暨前妻武氏继妻李宗衡志》，见署集贤校理。

新罗崔致远登进士科。

乾符二年 （乙未 875）

张彦远，七月，除大理卿。

贯休自江西、吴越返居婺州。

乾符四年 （丁酉 877）

卢携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充弘文馆大学士。

张彦远约卒于本年，年六十余。

七月二十一日，入窆王谦逢行书董璹篆盖崔庾《李行莘志》，谦逢见署翰林待诏守尚辇奉御；董璹见署翰林待诏守左司御率府仓曹。

京兆立张宗厚正书篆额韦蟾《段居本碑》。

乾符五年 （戊戌 878）

学问僧圆载归国。

乾符六年 （己亥 879）

五月，卢携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二月，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八月二十七日，入窆姜仁表行书董璹篆盖裴澈《李侹健志》，仁表见署翰林待诏行虔州雩都县主簿；董璹见署翰林待诏守都水监丞。

广明元年 （庚子 880）

正月朔，改元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黄巢入京城。十三日，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

卢携，时为宰相，十二月五日，贬为太子宾客，是夜仰药死。

中和四年 （甲辰 884）

六月十七日，黄巢自杀于泰山狼虎谷。

正月十六日，成都立李郜行书董璹篆额王徽《创筑罗城碑》。

中和五年　光启元年　（乙巳　885）

三月十四日，改元光启。

新罗崔致远返国至新罗。

日本学问僧宗睿入唐。

唐昭宗乾宁元年　（甲寅　894）

正月朔，改元乾宁。

贯休自婺州往钱塘谒武穆王钱镠，为其所礼遇。

乾宁二年　（乙卯　895）

十一月二十日，入宓阎湘书董璹篆盖裴庭裕《吴承泌志》，阎湘见署翰林待诏检校右散骑常侍守蜀王傅兼御史大夫；董璹见署翰林待诏检校左散骑常侍。

贯休往江陵，居龙兴寺。

乾宁三年　（丙辰　896）

贯休有《西岳集》，兵部侍郎吴融为之作序。

天复二年　（壬戌　902）

贯休得罪荆帅成汭，流放黔州。冬日，潜逃南岳隐居。

成都立董璹篆额赵玙书吴融《王公进生祠堂碑》。

天复三年　（癸亥　903）

秋日，贯休入蜀，为前蜀高祖王建所重，赐号“禅月大师”，为建龙华院居之。

唐哀帝天祐二年　（乙丑　905）

二月二十日，葬昭宗于和陵。

杨凝式登进士第，释褐度支巡官。

天祐四年　（丁卯　907）

八月二十七日，禅位于梁王朱全忠。四月二十二日，梁王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奉哀帝为济阴王。

八月，杨凝式见任直史馆，讽其父摄侍中涉为押传国宝使诣大

梁,事后即装疯。

天祐年间,入窓王正己正书张颂《张氏志》,见署翰林待诏。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 (壬申 912)

十二月,贯休(832—)卒。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 (壬辰 932)

四月敕,召能书人,谨楷抄写《九经》。

正月三日,入窓李光愿正书杨凝式《李德休志》,凝式见署右散骑常侍。

后唐末帝清泰三年 (丙申 936)

二月十三日,入窓郭兴正书张季鸾篆盖杨凝式《张季澄志》,凝式见署兵部侍郎。

八月,立李鹗正书李棁《后唐汾阳王真堂记》。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 (己亥 939)

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窓刘珙正书杨凝式《张继昇志》,凝式见署礼部尚书。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 (甲寅 954)

杨凝式改左仆射,太子太保。冬,卒于洛阳(873—),赠太子太傅。

后周恭帝显德七年 (庚申 960)

王文秉篆书《千字文》。

主要参考文献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　中华书局　1958 年影印本

《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79 年

《全唐诗外编》　王重民等　中华书局　1982 年

《全唐文》　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

《唐文续拾》（清）陆心源　中华书局　1983 年《全唐文》附

《文苑英华》（宋）李昉等　中华书局　1966 年影印本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　中华书局　1961 年点校本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　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朝野佥载》（唐）张鹭　中华书局　1979 年

《大唐新语》（唐）刘肃　中华书局　1984 年

《隋唐嘉话》（唐）刘餗　中华书局　1979 年

《封氏闻见记》（唐）封演　中华书局　1958 年

《国史补》（唐）李肇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7 年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中华书局　1981 年

《云溪友议》（唐）范摅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年

《唐语林》（宋）王谠　中华书局　1987 年周勋初校证本

《铁围山丛谈》（宋）蔡絛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颜氏家训集解》（北齐）颜之推撰　王利器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文房四谱》（宋）苏易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库全书》缩印本

《墨记》 (宋)何薳 《四库全书》缩印本
《墨经》 (宋)晁氏 《四库全书》缩印本
《墨经》 (宋)陆友 《四库全书》缩印本

《晋书》 (唐)房乔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隋书》 (唐)魏徵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北史》 (唐)李延寿 中华书局点校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 中华书局点校本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 中华书局点校本
《通志》 (宋)郑樵 中华书局 1987 年
《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 中华书局 1986 年
《宋高僧传》 (宋)赞宁 中华书局 1987 年
《旧唐书》 (五代晋)刘昫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中华书局点校本
《唐会要》 (宋)王溥 1955 年
《翰苑群书》 (宋)洪遵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库全书》缩印本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清)劳格 赵钺 中华书局 1992 年
《登科记考》 (清)徐松 中华书局 1984 年
《唐方镇年表》 吴廷燮 中华书局 1980 年
《元和郡县图志》 (唐)李吉甫 中华书局 1983 年
《唐两京城坊考》 (清)徐松 中华书局 1985 年
《元和姓纂》 (唐)林宝 中华书局 1994 年
《元和姓纂四校记》 岑仲勉 (附《元和姓纂》中华版后)
《唐仆尚丞郎表》 严耕望 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
《道家金石略》 陈垣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 饶宗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木宫泰彦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唐代工商业》 张泽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唐代财政史稿》 李锦绣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唐诗纪事》 (宋)计有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
《唐音统签》 (明)胡震亨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全唐文纪事》 (清)陈鸿墀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年
《郡斋读书志校正》 (宋)晁公武撰 孙猛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直斋书录解题》 (宋)陈振孙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海日楼札丛》 沈曾植 中华书局 1962 年
《唐才子传校笺》 傅璇琮 中华书局 1987 年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赵万里 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唐人轶事汇编》 周勋初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昭陵碑石》 张沛 三秦出版社 1992 年
《集古录跋尾》 (宋)欧阳修 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行素草堂本
《金石录》 (宋)赵明诚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
《集古录目》 (宋)欧阳棐 《石刻史料新编》云自在龛本
《宝刻丛编》 (宋)陈思 《石刻史料新编》十万卷楼本
《宝刻类编》 (宋)佚名 《石刻史料新编》粤雅堂本
《石墨镌华》 (明)赵崡 《石刻史料新编》知不足斋本
《金薤琳琅》 (明)都穆 《石刻史料新编》学古斋本
《古刻丛抄》 (明)陶宗仪 《石刻史料新编》学古斋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贞 浙江图书馆崇祯刊本

《金石文字记》（清）顾炎武 《石刻史料新编》亭林遗书本
《竹雲题跋》（清）王澍 《石刻史料新编》海山馆丛书本
《金石录补》（清）叶奕苞 《丛书集成》涉闻梓旧本
《金石存》（清）吴玉搢 《丛书集成》函海楼影印本
《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清）毛凤枝 《石刻史料新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本
《六一题跋》（宋）欧阳修 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画全书》津逮秘书本
《东坡题跋》（宋）苏轼 《中国书画全书》津逮本
《山谷题跋》（宋）黄庭坚 《中国书画全书》丛书集成本参津逮本
《广川书跋》（宋）董逌 《中国书画全书》适园丛书本参津逮、四库本
《书史》（宋）米芾 《中国书画全书》湖北先正遗书参百川学海、四库本
《海岳名言》（宋）米芾 《中国书画全书》湖北先正遗书参百川、说郛本
《书小史》（宋）陈思 《中国书画全书》武林往哲遗书参四库本
《兰亭考》（宋）桑世昌 《中国书画全书》知不足斋丛书参四库本
《兰亭续考》（宋）俞松 《中国书画全书》知不足斋丛书参四库本
《书史会要》（明）陶宗仪 《中国书画全书》影印洪武刊本参四库本
《庚子销夏记》（清）孙承泽 《中国书画全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本
《金石萃编》（清）王昶 中国书店 1985 年据扫叶山房本影印
《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据刘氏希古楼刊本影印
《历代名画记》（唐）张彦远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年
《法书要录》（唐）张彦远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年
《宣和书谱》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4 年
《书林藻鉴》 马宗霍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沈尹默论书丛稿》 马国权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年
《启功丛稿》 启功 中华书局 1981 年
《沙孟海论书丛稿》 沙孟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 年
《语石 语石异同评》（清）叶昌炽撰 柯昌泗评 中华书局 1994 年

《欧斋石墨题跋》 朱翼庵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古书画过眼要录》 徐邦达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7 年
《书道全集》 [日]神田喜一郎 [日]平凡社
《中国书道全集》 [日]中田勇次郎 [日]平凡社
《颜真卿传》 朱关田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0 年
《唐代书法考评》 朱关田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年
《唐代书法家年谱》 朱关田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隋石漫录》 朱关田 未刊本
《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 朱关田 未刊本
《中国书法全集 23·李邕》 刘正成主编、朱关田分卷主编 荣宝斋 1996 年
《中国书法全集 25·颜真卿一》 刘正成主编、朱关田分卷主编 荣宝斋 1993 年
《中国书法全集 26·颜真卿二》 刘正成主编、朱关田分卷主编 荣宝斋 1993 年
《中国书法全集 27·柳公权》 刘正成主编、吴鸿清分卷主编 荣宝斋 1993 年